

# 古巴史和古巴与 美国的关系

第一卷

(1492—1845年)

非·方納著

涂光楠、胡毓鼎译

田保生校





# 古巴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

附送第五卷

全一册

(1492—1845年)

从西班牙征服古巴到埃斯卡萊拉事件

菲·方納 著

涂光楠、胡毓鼎 译

田保生 校



Philip S. Foner  
 A HISTORY OF CUB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 1492—1845  
 From the Conquest of Cuba to La Escalera  
 据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1962年版译出

古巴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

第一卷(1492—1845年)

[美]菲·方纳著

涂光楠、胡毓鼎译

\*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sup>1</sup>/<sub>32</sub> · 印张 8 · 插页 2 · 字数 229,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2·377 定价(七) 1.05元

印数 0,001—2,600

为了紀念从十九世紀初以来为古巴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勇敢的男女~~们~~为了紀念~~他们~~他们在古巴的后代——今天他们正在建設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自由和独立第一次对古巴人民具有意义。

## 序 言

古巴是一个狭长的島，从东到西长七百八十哩，寬約二十五哩到一百二十五哩，它的面积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俄亥俄州。古巴在海地以西五十哩，在牙买加以北八十五哩，隔尤卡坦海峡距墨西哥約一百三十哩。哈瓦那在古巴的北岸，从古巴西端到哈瓦那約占北海岸綫全程的三分之一，距离美国的基韦斯特仅九十二哩。

古巴可以称为一个大平原，高山矗立在东端，在中部和西部只有一些零零落落的山脉。北部海岸峻峭而多巉岩，向东更加变得崎嶇不平。島的中部是廣闊的平原和淺河谷的地帶。在西部綿亘的小山脉有时高达二千呎。东部主要是山岳地帶，南海岸最嶮峻的高峰在海拔八千呎以上。南海岸的图基諾峰海拔約八千四百呎。

古巴虽然是西印度群島中最大的島屿，面积为四万四千二百一十八平方哩，但它仍然是一个小国。可是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超过了它的面积。古巴摆脱西班牙四百年統治的斗争經過，是历史上偉大的史詩之一。半个多世紀来，古巴为改变国家的地位，使自己从一个受美国帝国主义控制的、理論上的独立国家，变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的斗争历史，也是壮丽动人的。可惜的是，关于这一段經過的主要輪廓，虽然有英文的記載，但是今天还没有出版一本詳細分析古巴的历史以及古巴和美国关系的书籍。

一九二〇年，韦利斯·弗萊彻·約翰逊所写的《古巴史》五卷在美国出版了。虽然这是一部打先鋒的著作，所有写古巴历史的人都应当表示感謝，但是它側重政治和軍事方面，而不大注意經濟、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普通人民——黑人和白人——在古巴历

史上的作用。此外，該书对古巴和美国关系史的論述也极其膚淺，甚至对当时关于这一方面已經有的材料也利用得不多。尽管約翰遜批評了美国和古巴关系的某些方面，但大体上他还是认为古巴和它的邻国的联系是完全有利于該島的。他在这一著作的末尾預測，古巴的未来繁荣完全同“美国企业在这个島屿共和国……”的发展相联系。他在书中沒有一处說明，直到一九二〇年，为了“美国企业在这个島屿共和国……”的发展，古巴人民曾不得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如一九四一年哈罗德·安德伍德·福克納教授在叙述美国大企业集团控制古巴經濟的过程之后所指出的：“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古巴的財富已經落入美国控制之下，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三四年，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一九三四年以后，古巴的政治生活主要地受到华盛顿的操纵。結果是給古巴人民带来了贫困、墮落和剝削。一个历史学家曾經讲过：‘古巴并不比长島更独立’。它被征服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悲惨的記錄。”（《美国政治与社会史》，第 528 頁。）

自从約翰遜的著作出版之后，又有很多新材料問世。在古巴国内和国外出現了許多书籍、期刊文章和未出版的研究著作，特别是埃米尼奧·波尔特耳·比拉所写的《古巴同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史》五卷。这些著作弥补了古巴史和古美关系史的明显缺陷，闡明这段經過在过去一直被人忽視的方面。尽管有了这些进展，事实仍然是，从一九二〇年以来，沒有一个美国人着手詳細地介紹古巴的历史和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史。

若干年来，我一直从事研究古巴史和古巴同美国的关系的各个方面。在我所写的：《商业与奴隶制度：紐約商人和不可抑制的冲突》，《美国工人运动史》，《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和《馬克·吐溫：社会批評家》等书中，曾經叙述这一段經過的某些方面。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以后，我才决定写一部包括若干卷的书来叙述全部經過。若干年来，我一直从事写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工作。为了写古巴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在

一九六〇年初，我中斷了《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三卷的寫作。當時我認為，我這樣做可以對我國真正的國家利益作出最有益的貢獻。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編輯部編輯赫伯特·馬修斯告訴美國新聞報刊編輯協會說：“我在《紐約時報》工作的三十年里，從來沒有見過一部重大歷史像古巴革命那樣被人誤會、那樣被人惡劣地篡改和那樣被人錯誤解釋。”這種情況固然主要地是由於美國報刊、無線電台和電視台對古巴發生的事情故意歪曲，但也是由於完全忽視根據歷史觀察古巴的事態。一九六〇年在我幾次訪問古巴期間，古巴學者和革命運動領袖都一再向我強調這一點。

事實是，如果不了解古巴革命以前很長一段時期的歷史發展，也就不可能了解古巴革命和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執政的古巴革命政府。古巴當前的革命在過去就已經深深地扎下了根。正如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哈瓦那的一篇演說中所說的：“革命權力是很長的一系列鬥爭的產物。它是人民從上世紀所開始進行鬥爭的理想的最後實現。”

魯塞爾·菲茨吉本在《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學會年刊》（一九六一年三月號第114頁）上寫道：“在目前斷言像古巴那種性質和規模的革命為什麼在古巴發生而不在其他任何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發生，尚為時過早。”也許永遠不可能對這一問題下斷語。但是，當前所需要的是停止指名攻擊，集中力量於研究在古巴的發展中使這一革命必然爆發的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了解這一點，對美國人來說，肯定不是為時太早。古巴有一種單一作物經濟，依賴並且完全從屬於美國經濟，這一事實難道無助於解釋這一革命嗎？六十多年來美國對古巴的政治政策是扶植任何一個對美國的利益予以正常保護的政府，而不管這個政府是多麼專橫和反動。一九五〇——一九五七年，古巴每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大約是二百一十三美元，而美國最貧窮的密西西比州却是八百二十九美

元。在革命之前，古巴的失业率通常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古巴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百分之八的庄园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一。难道这些事实也无助于解释这个革命吗？

古巴革命的结果是世界上最小国家之一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美国力图用种种手段来扼杀古巴革命——单方面取消古巴蔗糖的份额制，断绝和古巴政府的外交关系，发动由中央情报局组织的入侵古巴，等等，但遭到了失败。其次，由于古巴的经验，成百万拉丁美洲的普通人民不得不对当代社会的基础作一番研究。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和古巴人民过去一样，开始发现，只要他们的国家继续依赖并完全从属于美国的经济和政策，他们的生活便不能使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得到适当的满足。

最近三年中，在美国出版了空前大量的著作，以解释古巴革命和它对美国的意义为目的。这些著作尽管有缺点，却表明不能抹杀古巴革命这一事实。对古巴革命必须了解，要了解古巴革命，又必须知道古巴革命以前的悠久历史背景。这就是我试图在本卷和以后几卷提供的历史背景。

本卷内容包括最初三个半世纪的古巴历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最初五十年的历史。第二卷将叙述一八四五——一八六八年期间的古巴历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从兼并主义时期到争取独立的十年战争的爆发。第三卷的内容将包括一八六八——一八九五年这段时期：从十年战争的开始到第二次争取独立战争的爆发。第四卷将论述一八九五——一九〇三年的事件：从第二次争取独立战争的爆发到古巴共和国的诞生。这四卷以后，将有若干卷，追溯从古巴共和国的诞生到当前的古巴革命这段时期的古巴历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

本书的这些卷总的讲来将记录五百年的历史，其中有許多历史事件密切触及美国的生活。一八九〇年，一位作者在《陆路月刊》（一八九〇年十月第15卷，第382页）上写道：“我们的历史很少有一个时期没有古巴问题存在……。”一八九〇年以后的情形更证实



了这一論断的正确性。

如果没有古巴和美国的許多研究机关、学者、同事和朋友們的帮助，要实现这样一个計劃是不可能的。我所感謝的人很难一一列举，因为这样一来名单就会太长。但是，我必须感謝哈瓦那国家档案局的几位負責人慷慨大度，当我在古巴的时候，他們慷慨协助我使用图书馆所藏的手稿、文件、期刊和图书，并且把一些重要文件和期刊寄給我，以供在美国使用。我还要特別感謝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家档案局的几位負責人，他們允許我大量使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

国会图书馆、紐約公共图书馆、杜克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圣路易大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和洛杉磯)大学图书馆、紐約大学图书馆和塔米門特学院图书馆，給予我自由使用材料的种种便利，对此我也愉快地向它們致謝。塔米門特学院图书馆館长路易絲·海因澤夫人和該館的職員通过館际借书办法协助获得材料，对我特別有帮助。

翻譯西班牙材料的这种慷慨支援对于本书的这一卷和其他各卷的写作帮助很大。我尤其感謝古巴人民百科全书編輯部的吉尔莫·洛倫森博士、哈維尔·德巴羅納博士和其他人員，他們协助翻譯国家档案局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材料。在翻譯方面，我也得到尼埃維斯·波薩达夫人和我的妻子罗斯林·赫耳德·方納的帮助，我願乘此机会感謝她們給予的寶貴合作。

一般說来，西班牙文的翻譯，尤其是詩的翻譯，多少有点是意譯的。但是，对于和重大問題有关的重要声明尽可能逐字地譯出。也許不需要指出，尽管非常慎重，在注釋、翻譯、壓縮、抄写和編輯这样大量外文資料的过程中，錯誤在所不免。

我还要感謝胡里奧·希羅納博士，他帮助我从古巴的公私图书馆获得一些重要文件、文章和书籍。

我尤其感激我的妻子罗斯林·赫耳德·方納，她花費了許多

時間翻譯西班牙文材料，為印刷所準備手稿，為出版進行設計，校對清樣。從我一開始計劃時起，她的援助和鼓舞支持了我。

菲利普·方納

一九六二年一月於紐約州

哈德遜河畔克羅頓

## 目 次

序 言	1
第一章 古巴的征服	1
第二章 古巴的经济发展(1520—1790年)	19
第三章 古巴的社会结构(1520—1790年)	31
第四章 大觉醒时期(1790—1808年)	43
第五章 “永远忠诚的岛”(1808—1820年)	61
第六章 独立运动(1820—1830年)	82
第七章 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形成(1800—1823年)	105
第八章 美国与古巴的独立(1823—1830年)	129
第九章 第二次改良运动	148
第十章 古巴的奴隶社会	161
第十一章 反对奴隶制度的高潮	179
第十二章 埃斯卡萊拉事件	191
引文注	205
索 引	233

# 第一章

## 古巴的征服

在欧洲人入侵新大陆的初期，古巴就已经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当哥伦布首次航行，在巴哈馬群島进行探险的时候，他就听到印第安人称之为古巴的一个大島。他以为这个島就是馬哥孛罗在他的日記中記載的那个盛产黄金、珍珠、宝石和香料的地方——西龐谷。于是，他继续前进，一四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古巴登陆。为了对卡斯提尔王国伊薩貝拉女王和她的丈夫阿拉岡王国斐迪南国王的儿子——唐胡安王子表示尊敬，他就把这个島命名为胡安娜<sup>①</sup>。

“当我到达胡安娜的时候”，哥伦布在他的发现該島的航行日記中写道：“我沿着海岸一直向西航行，我发现这个島很大，我认为它一定是大陆，是卡塔約省（属于大可汗版图）。我看到沿岸一带既沒有城市，又沒有村鎮，只有几个小村落有人居住，因为他们一见到我就立即逃跑而我无法跟他们谈话，我就顺着原来的方向前进，我想我一定会找到一些大城市。”<sup>1</sup>

哥伦布仍然认为他是到了西龐谷，他派路易斯·德托雷斯和罗德里戈·德赫雷斯带着两个印第安人一起去找大可汗。德托雷斯是一个懂阿拉伯語和阿拉姆語的犹太人，作为免被驅逐的代替办法，他被迫改信基督教<sup>②</sup>，并被雇用担任翻譯。三天以后，他們带

① 胡安王子逝世以后，該島改名为費尔南迪娜，但該島的印第安名称即古巴，逐渐被西班牙人所采用。

② 一四九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对西班牙的犹太人給予四个月的限期，要他們改信基督教，否則便驅逐出境。成千的犹太人宁願流亡，也有一些人如路易斯·德托雷斯則同意受洗，改信基督教。

了消息回来說：“他們已經找到了数不尽的小村落、无数居民，但是并没有什麼重要的东西。”<sup>2</sup>在島上看不到大可汗的首府，也沒有馬哥孛罗所形容的任何稀奇的东西。不过，在古巴島的“不重要的东西”中却发现了烟草。正如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神父在他以哥倫布的日記为根据而編写的《印度群島史》一书中对这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所叙述的：

这两个西班牙人，在当地人来来往往的村庄的路上，遇到了很多男男女女。男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枝火把，点着某种植物抽烟。这种植物是晒干了的，形状有点像火枪，或孩子們在圣灵节玩的紙做的爆竹。他們点着植物的一头，吸着或者嚼着另外一头，或者是在呼吸的时候把烟吸进去，他們的肉体就失去了知觉。也就是說，吸烟使他們麻醉，他們說这样就不会感到疲劳<sup>3</sup>。

欧洲人看到烟草，这并不是第一次。在圣薩尔瓦多島上就看見过烟草。但是，发现使用这种植物，这却是第一次<sup>4</sup>。

哥倫布把古巴說成是“肉眼从未見过的最美丽的島屿”。他发现了馬齿莧、野莧、蜂蜜和成千种水果；各种各样数不尽的和西班牙不同的鳥类使他心曠神怡；他对“十一月的天气……溫和而适合健康，好像五月一样的和煦”感到惊讶。西班牙君主希望，由于这些新发现，赶走摩尔人和犹太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可以得到弥补。哥倫布对他保证：“在有这样不可思議的美丽的地方，一定可以获得很多的利益。”<sup>5</sup>

哥倫布对于亚热带的苍翠欲滴，綠叶成蔭的森林，以及丛林中花香鳥語的描写，并没有引起西班牙君主的兴趣。他所渴望的只是黄金、珠宝和香料；但是哥倫布并没有見到古巴的土人有这些东西。由于古巴没有这些东西，西班牙对这个島屿失去了兴趣。它没有打算把它变成殖民地，因此，以后的探險也是零零散散的。确实，直到一五〇九年才断定古巴是不是一个島屿。塞瓦斯蒂安·德奧坎波环航該島一周之后，才解决了这个問題。

在哥倫布來到以前，古巴居住着三種土人：西波內人 (Ciboneys)、瓜納阿卡比貝斯人 (Guanahacabibes) 和達依諾人 (Tainos)。前兩種土人是以游牧、狩獵和捕魚為生。雖然他們也使用未加工的木頭、貝殼和魚骨以及未磨制的石頭作為工具<sup>6</sup>，但是他們的文​​化是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達依諾人的文化則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磨石刻木的時代。和游牧生活相反，達依諾人從事農業，過着定居的生活。

西波內人受到更有組織的居民的壓迫，沿着佛羅里達的海岸，渡過狹窄的海峽，移居適宜人居住的古巴西部海岸。他們零零落落​​地逐漸向東擴張，占領了古巴島的大部分。以後，在他們沒有遇到阻礙的移動中，繼續向南推進。

達依諾人被從加勒比沿岸向安的列斯群島發展的凶猛的加勒比人 (Caribs) 所驅逐，在波多黎各登陸，又從波多黎各遷到古巴​​和​​西波內人相遇。達依諾人把西波內人趕進了深山野林，把留下來的西波內人作為農奴。在西班牙人到來的前夕，達依諾人已經占領了古巴的東半部，只有極西端的一部分為殘余的自由而膽怯的西波內人和一小群無關重要的瓜納阿卡比貝斯人所有。

歐洲人突然來到，他們採用絕滅種族的手段，終於消滅了古巴所有的印第安人，留下來的只不過使人憶起在古巴曾經有過印第安人的社會。

雖然達依諾人的文化比西波內人先進，他們仍然處於野蠻狀態，他們的文​​化不能和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或秘魯所遇到的文化相比。達依諾族印第安人和在他們之前的西波內人是生活在所謂“貝殼時代”，用大軟體動物的貝殼做成瓶壺、錐子、齒子、刮具以及喇叭或号角之類的用器和工具。這種貝殼印第安人稱為“洛沃” (Lobo)，它們在神話中和宗教習慣上居于重要地位。

達依諾人不僅依靠農業為生，並且從事狩獵和捕魚。他們耕種土地，生產絲蘭（達依諾人把它製成麵包）、玉米、豆类、花生、南瓜、胡椒、水果和煙草。他們把大樹的樹身挖空做成獨木船，用來

捕魚。捕魚是他們所擅長的，他們甚至使用魚網、建造人工魚塘、或使用捕魚器。他們的手工業有木雕、編籃、制陶、用木棉織布和製造各種各樣的石器。他們用藤條或竹子建造房屋（達依諾人稱為“博伊沃”[bohíos]）。在屋子裏面，他們是睡在吊床上。這些房屋都集中在村落里，圍繞着一塊作為市場或跳舞場所的中心廣場。“用唱歌和跳舞這種娛樂表示對大事的慶祝，把值得保存的傳統、祖先的業績和種族的神秘的興衰變化留傳給年輕的人。”<sup>7</sup>

印第安人是由酋長(caciques)和祭司(behiques)統治的，他們共同執行領袖、祭司、醫生和先知的職能。他們實行一夫多妻制，尤其是酋長都有很多的妻子。不過在印第安人中，男女相當平等。婦女決不只是干活的人，年老的婦女有很多是醫生。印第安人都相信有超人的神，並且舉行儀式向這些神求拜。祭司們在宗教、作法術、醫療和部落儀式中都使用煙草(吸雪茄煙)<sup>8</sup>。

古巴的印第安人大體上都是和善的居民。他們熱情地歡迎了哥倫布派來內地的兩個西班牙人，把他們安置在他們最好的屋子裏，用他們所有的食品招待他們。當時就有記載說，“印第安人輕輕地撫摸他們，吻他們的手和足，向他們打手勢，表示對客人的欽佩和尊敬。”<sup>9</sup>

歐洲的生客走了以後，土著居民又恢復了他們的平靜生活。當時雖然有把被征服的人作為奴隸的情形，但是並沒有什麼證據表明在古巴原始社會中已經有從事剝削的富人和被剝削的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分。隨著西班牙人的到來，這一情況就改變了。

斐迪南國王在一五一〇年聽說古巴可能藏金甚富以後，便下令派遣遠征隊，進行探查和移民到這個島上居住。斐迪南國王命令哥倫布的儿子迭戈·哥倫布說：“因為我們懷疑古巴島上有黃金，你應當設法調查清楚”。迭戈·哥倫布當時是日斯巴尼亞(Hispañola，該島現在分為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總督。第二年，迭戈·哥倫布委派迭戈·貝拉斯克斯去征服和定居古巴。貝拉

斯克斯原是到新大陆来发财的許多西班牙破落貴族之一，他成为日斯巴尼亚的最富有的种植者。貝拉斯克斯帶領着三百个人（大多数是西班牙的冒險家），渡海征服古巴和进行殖民<sup>10</sup>。

貝拉斯克斯預料不会有多大困难，他曾向他的副手弗朗西斯科·德莫拉莱斯船长說：“当哥倫布第二次航行到这个島的时候，印第安人是很好客的，我想他們不会以敌視的态度来接待我們。”但是，德莫拉莱斯不相信是这样。他回答說：“假使島上土人和日斯巴尼亚的印第安人有来往的話，我不相信他們会用音乐和鮮花来接待我們。”<sup>11</sup>

这話的确是預言家的話。古巴的印第安人不仅和日斯巴尼亚島的印第安人有往来，而且从日斯巴尼亚島来的难民已經警告他們进行戒备和为生存而斗争。

西班牙征服者貝尔納尔·迪亚斯·德卡斯蒂略曾經写道：“发现新陆地是一件多么麻煩的事呵！”但是他馬上又說，这种麻煩有很大的报酬，“我們获得的財富是无法可以再夸大的了。”<sup>12</sup>在日斯巴尼亚，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征服者最初到处都受到印第安人的殷勤接待；但是不久，印第安人惊愕地发现，他們由于殷勤好客而得到的报酬是奴役和死亡。古巴解放者何塞·馬蒂在《黄金时代》一书中，生动地描述日斯巴尼亚島印第安人所遭到的悲惨命运：

他們把大胡子的白人当做朋友来接待；他們用蜂蜜和玉米来款待他們，甚至貝埃奇奧国王还把他的女儿伊格莫塔許配給一个漂亮的西班牙人为妻，她像一只野生的鴿子和一棵高貴的棕櫚树。印第安人让白人看他們的金山和金光閃閃的河流，以及他們用純金做的裝飾品，并且将这些裝飾品放在他們的盔甲上。但是这些殘忍的白人把印第安人用鏈条吊起来；擄走他們的妻子和孩子；他們把印第安人赶到矿井深处，迫使他們用头去拖石头；并且把他們分开，給他們打上烙印<sup>13</sup>。

印第安人遭到殘酷无情和有組織的剝削，对于矿里的艰苦劳动素无准备，因而有大批死亡。在印第安人慘遭大規模屠杀的消



息傳遍全島以後，成群的印第安人紛紛起來驅逐殘害他們的人。印第安人酋長卡奧納博所領導的一次起義取得了暫時的勝利，摧毀了哥倫布回西班牙時留下的要塞。但是印第安人用他們的幼稚的武器敵不過有火槍的西班牙人，所以征服全島和奴役當地土人繼續迅速進行。

西班牙人最後到了離海地不遠的瓜哈巴小島。這個島現在的名稱是果納夫。瓜哈巴島的領袖是印第安人酋長阿多歐。阿多歐雖然比較年輕，但他的舉動與其說像一個軍事統治者，倒不如說像一個族長，他獲得了他的人民的尊敬。在日斯巴尼亞島的領袖中，只有阿多歐一人由於聽到西班牙人來的消息而感到驚慌。當他聽到有一種罕見的人登陸的時候，他甚至不肯去看哥倫布。西班牙人殘暴對待印第安人成為人所共知的事情以後，阿多歐的恐懼證實了，他開始籌劃抵抗對他的村子的侵略。但是當他在这方面還沒有很大的進展以前，西班牙人已經登陸了。經過一番激烈戰鬥，阿多歐認識到他的軍隊無法長期抵抗武器裝備比他強的征服者，於是就下令撤退到山里去。

阿多歐斷定再留在日斯巴尼亞島已不可能，因此決定率領他的殘余人民躲到古巴島，那時古巴還沒有西班牙人。這個計劃獲得了瓜哈巴島的殘部的同意，於是開始準備遷移。他們造了許多獨木舟，大約有四百個印第安人——男人、婦女和小孩——由阿多歐率領到古巴去了。有一個歷史家寫道：“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哥倫布尋找新陸地時，陸地上的居民为了不致受到征服者暴行之害，都極為恐懼地從他們自己的家園逃跑了。”<sup>14</sup>

阿多歐和隨從他的人到達古巴，在邁西附近出現，使當地印第安土人為之一驚，他們誤認為這批移民是來搶劫的加勒比人，因此，就都逃到山里去了。阿多歐所派的使者逐漸使古巴的印第安人確信他們是和平的兄弟姐妹，是為了逃避奴役和死亡而從白人那里逃來的。印第安人回到了他們自己的村庄。阿多歐竭力勸他們為西班牙人不可避免的入侵進行準備。他邀請了全古巴的酋長參加

一次庆祝会，在唱歌跳舞之后，他把日斯巴尼亚島上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他叙述印第安人如何把各种金饰礼物送给西班牙人表示欢迎，而征服者为了搜括更多的黄金，如何以奴役和死亡来报答印第安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获得了一份关于他所說的話的記載。据德拉斯卡萨斯說，阿多欧向到会的印第安人这样說：

你們知道，西班牙人准备入侵古巴島的消息已經傳播海外。你們現在不是不知道我們的朋友和同胞們所遭到的他們的虐待，以及他們在日斯巴尼亚島上的殘酷行为。西班牙人目前正向这里来了，他們怀有对我们实行同样殘暴行为和迫害的阴谋。我們不知道他們到这里来打算干什么，但是我們知道他們是十分凶恶和殘暴的人。我告訴你們，这些欧洲人所崇拜的是一个十分貪婪的上帝，因此是很难使他們滿足的。为了表示对这个偶像的虔誠，他們将从我們身上勒索財宝并且将千方百計地使我們淪于悲慘可怕的奴隶地位，否則就置我們于死地。

以后，他将一小籃子的黄金和珠宝放在听众的面前。他大声說：“这就是西班牙人所崇拜的上帝，为了这些东西，他們打仗和杀人；为了这些东西，他們迫害我們，这就是我們为什么要把它們拋到海里去的原因。这样一来，当他們来到这里时，他們不会找到一块像这样的石头，他們会相信沒有这样的石头。”之后，阿多欧便要求古巴的印第安人动员起来，保卫他們的土地和他們的人民：

他們就在这里。我們以为他們是从天上降下来把我們从加勒比人和死亡中解放出来的人。但他們比加勒比人更加殘暴。他們妄用我們的單純，用武力来征服我們。他們认为，他們有权夺取我們的土地和自由，因为有一个他們称之为天父的人，曾經把一切土地的所有权給了另外一个他們称之为国王或主人的有势力的人。他們告訴我們，这些暴君崇拜和平与平等之神，但是他們却夺去了我們的土地，并使我們成为他們的奴隶。他們虽然對我們讲灵魂不死和永恒的报酬与惩罚，

但他們却搶去了我們所有的東西，勾引我們的婦女，蹂躪我們的女兒。這些懦夫不如我們驍勇善戰，於是用盔甲來保護他們自己，這樣，我們的武器便刺不進去。他們甚至感到這個有利的條件也不可靠，又用一種光綫從我們的箭射不到的地方來傷害我們，……但是他們人少，而我們人多；他們是在別人的領土上作戰，而我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戰鬥；他們祈求一個使人流血和追求黃金的上帝，而我們却有一位公正而聰明的上帝支持我們……

讓我再一次提醒你們，那些暴君所崇拜的上帝就是蘊藏在我們土地底下的黃金。黃金就是他們的主子；黃金就是他們為之效勞的東西；黃金就是他們所追求的東西。因此，我們必須從河流的沉睡中掘走他們的上帝（為了這個上帝，基督教徒已經為我們造成了這許多苦難），因為如果我們讓這個上帝留在我們的內部，我們就不能保證這些“加勒比人”不會尋找它而害我們的性命。我們這樣做了以後，他們就不知道黃金在哪裡，就會讓我們的地方安謐<sup>15</sup>。

阿多歐的講話是人類反抗壓迫鬥爭史上重要文獻之一，它深深地感動了從邁西、巴拉科阿和巴亞莫附近來的印第安人。但是有許多從島的中部和西部來的酋長根本不瞭解阿多歐所講的恐怖情況，而且，他們還懷疑阿多歐這個古巴的外人是利用這些事情來取得對島上所有的部落的領導權。他們的多疑和猜忌使他們註定要遭受浩劫。

雖然阿多歐只能發動他自己的人民和周圍地區的印第安人，他準備應付他們所遇到的危險。他每一分鐘都在海灘上進行戒備，注視西班牙人的到來。當迭戈·貝拉斯克斯遠征隊的船隻駛近古巴島的時候，印第安哨兵就大聲高喊：“白人來了！白人來了！”在阿多歐指揮下，所有用黃金做的東西都立刻被投到河里；婦女和孩子們立刻被送往山里；並且派人迅速向全島的酋長通知侵略者已經來到的消息，催促他們集合起來保衛古巴島。

阿多欧命令他的战士们从海滩上撤退，在大树和岩石后面布置阵地，准备弓箭等待西班牙人。比贝拉斯克斯更著名的埃尔南·科尔特斯和船长弗朗西斯科·德莫拉莱斯继贝拉斯克斯之后来了。他们带领着西班牙人登上了被放棄的海滩。德莫拉莱斯所率领的侦察队回来报告说岛上找不到印第安人。贝拉斯克斯于是就命令德莫拉莱斯带领一队人深入森林。西班牙人还没有走到最前面的一排树林的时候，就有一阵箭向他们射来。争夺古巴的战争于是就开始了！

印第安人打伤了几个西班牙人，但是和所有对武器更优良的征服者的战斗一样，他们每打倒一个西班牙人，自己就有几十个人死伤。在第一場战斗结束时，印第安人被迫撤退到山中，有很多战士陣亡。

阿多欧和他的印第安土人在遭到这次挫折以后，又受到了另一次打击。他派出去的使者回来报告说，岛上其他酋长不肯出兵协同抵抗。这样，阿多欧就只剩下了从日斯巴尼亚逃来的难民以及迈西、巴拉科阿和巴亚莫的印第安人。他们在人数上确是比西班牙人多得多，但是他们的武装不能和西班牙人的枪炮与战马相比，阿多欧因此断定，和西班牙人公开作战无异于自杀。于是他定出了“游击战”的战术。以后在古巴历史上每一次解放斗争中都采取了这种战术。

阿多欧的战略是不断进行突袭，然后迅速分散到山中去，使贝拉斯克斯的军队疲于奔命。印第安人人数众多，熟悉作战地带的地形，可以恐吓西班牙人，使他们总是提心吊胆，并且也许在最后使他们感到留在岛上真是太危险了。无论如何，这些印第安人可以赢得时间，以便劝说古巴岛上其他酋长来帮助他们。

阿多欧的战略收到了一些效果。西班牙人曾经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日斯巴尼亚，使印第安人的没有组织的抵抗力量流了很多的血。但是在古巴，他们却遇到了不同的敌人。贝拉斯克斯无法完成他的迅速进军、横跨全岛、在一夜之间征服古巴的任务。相反地，

他的軍隊困在巴拉科阿城他們建築的堡壘里，採取守勢，幾達三個月之久。阿多歐把印第安人分成若干小股，命令他們在西班牙人開始進攻時撤退，絕不要公開作戰。印第安人這樣就使征服者經常處於恐慌之中。雖然他們用拙劣的武器使敵人遭到的死亡不大，他們卻使西班牙人的生活受到折磨，因為歐洲人絕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會再受到攻擊。自從他們到新大陸以來，西班牙人第一次知道恐懼是怎麼一回事。西班牙軍隊發生了內訌，幸亏由於貝拉斯克斯是一個有力的指揮官和意志堅強的人，他才有力量阻止發生公開叛變。他不斷安慰他的士兵們說，他知道印第安人的心理情況，要粉碎對西班牙人前進的抵抗，必須捉住阿多歐；發現阿多歐藏身之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捉住阿多歐以後，印第安人的抵抗就會結束。

他的預言是應驗了。雖然被俘虜的印第安人甚至在受到最野蠻的拷打的時候也不肯把西班牙人帶到阿多歐藏身的地方，但是這位偉大的領袖，最後被一個印第安人出賣了。這個印第安人曾經在日斯巴尼亞和他發生過爭吵，現在要報仇。西班牙人由叛徒向導，包圍了阿多歐在奧連特山中秘密藏身的地方，捉住了他。貝拉斯克斯答應阿多歐，如果他告訴印第安人的黃金藏在什麼地方，就饒他的性命，但是阿多歐拒絕了。

一五一二年二月二日，歡欣鼓舞的西班牙人舉行慶祝。這一天要把他們的仇人阿多歐燒死，借此向古巴所有的印第安人表明，如果他們胆敢抵抗征服者的話，等待他們的就是這種命運。他們豎了一根柱子，準備好了燃料，四個兵士把阿多歐帶到貝拉斯克斯的面前。

“你死的時辰已經到了”，貝拉斯克斯冷酷地說，“給你最後一個機會。黃金在什麼地方？”

“黃金，可惡的黃金！”阿多歐回答說，“你們在這個島上找不到黃金，因為我們已經使它無影無蹤了，你們決不可能發現我們把它藏在哪裏。誰要講出黃金藏在哪裏，誰就會遭到天譴。”

“綁上刑架！”貝拉斯克斯大聲喝道。阿多歐就被綁上了刑架。神父胡安·德特辛走到這位印第安人的跟前，向他說：“孩子，你承上帝的恩，死去吧！”同時，神父把一個木头十字架送給阿多歐，問他是否願意在臨死前接受基督教和受洗。

“為什麼我應該做基督教徒？”阿多歐問道。

“我希望你在死時得到上帝的恩，使你，孩子，能夠進天堂。所有上帝饒恕的好人都進天堂。”

“那麼基督教徒也進天堂嗎？”阿多歐問道。

“是的，如果他們是好人，在死時得到上帝的恩的話，他們就能進天堂。”

阿多歐以嘲笑的口吻所做的答復，甚至也感動了西班牙寫歷史的人。他說：“如果基督教徒進天堂，我就不願意進天堂。我不想再遇到像基督教徒這樣殘忍惡毒的人，他們殺害印第安人和強迫印第安人做奴隸。”<sup>16</sup>

阿多歐就這樣死了，他在死時拒絕了教會對他表示的一切安慰。熊熊烈火燒毀了古巴第一個爭取自由的偉大戰士和美洲殖民史上真正英勇人物之一的身體。

隨着阿多歐的死去，正如貝拉斯克斯所預料的，印第安人的抵抗幾乎全部崩潰了。但這並沒有使鬥爭完全結束。阿多歐的一個名叫卡瓜斯的同胞起來承擔領導決心繼續戰鬥的印第安人的任務。但是，裝備優良的西班牙人把印第安人追到山里去，殺害和俘虜他們，鎮壓印第安人的反抗。

這一悲劇的最後一件事是斐迪南國王所下的把所有參加“阿多歐叛亂”的印第安人都作為奴隸的命令。印第安人像牲口一樣，在前額上被打上了烙印，借以警告印第安人，奴隸的命運在等待任何愚蠢而反抗西班牙人的人<sup>17</sup>。

貝拉斯克斯在巴拉科阿建造了一個木头堡壘，這個堡壘現在成為古巴的第一個永久性的定居地，貝拉斯克斯從這裡派遣了一百五十個人，由潘菲洛·德納瓦埃斯率領，搜尋島上的黃金。教士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随同远征队一起出发，不久，他就以“印第安人的布道者”聞名。德拉斯卡薩斯已經深知西班牙人对待日斯巴尼亚島印第安人的殘暴行为，但是，他在这次远征期間，以及从在古巴得到的其他經驗中，痛苦地知道了征服者的无法形容的全部野蛮行为。他写道：“沒有一个人的舌头能够向人們叙述所有这些嗜血的人干下的可怕的坏事。他們似乎是人类公敌。”<sup>18</sup>

德拉斯卡薩斯叙述了在德納瓦埃斯远征期間，当缺乏水和食物的西班牙人到了一个名叫卡奧納奧的大村庄的时候，印第安人如何給他們水喝，給他們魚和面包吃。根据德拉斯卡薩斯所說的，正当二千五百个印第安人和平地看着西班牙人吃完肉，并且称赞他們的馬的时候，西班牙人开始攻击他們。西班牙人橫冲直撞，屠杀印第安人，取出了他們的肝腸，一直到血流成河。德拉斯卡薩斯說德納瓦埃斯队长如何騎在馬上，看着屠杀，甚至沒有举举手，命令停止，然后他就笑着对这位教士說：“法师对我們西班牙人所做的这件事有何想法？”德拉斯卡薩斯憤怒地回答說：“我要把你和他們一齐送給魔鬼。”

到一个周末，西班牙人离开的时候，居民已經剩余无几了。德拉斯卡薩斯在結束他对恐怖的一周的叙述时写道：“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見的，因为我当时正在那里并且看到这场屠杀，为了簡單起見，我略去了很多細节。”在西班牙人从卡奧納奧繼續西进的时候，他們发现到处荒无人烟。印第安人听到了大屠杀的消息，早已逃到离开海岸的小島上去避难了。

德拉斯卡薩斯說服了印第安人回到他們的村庄，他对印第安人回家的情形的叙述非常动人：“男人和妇女像綿羊一样，每一个人背着一包破烂的东西。”但是德拉斯卡薩斯一生十分后悔他对印第安人的劝告，因为他看到印第安人遭到鞭撻、折磨、閹割和杀害，妇女們被奸污，村庄被燒毀，孩子們挨餓，土地被沒收，当地的劳动力都被当做奴隶，部落都被消灭，居民遭到恐吓或扫蕩，被拖去为西班牙人劳动，在矿里从早工作到晚，或者站在河里一連十二个小

时淘金。

德拉斯卡薩斯报告說，在三、四个月里他看到有七千多个儿童餓死，因为他們的父母被赶到矿里去了。父母也并不比他們的孩子活得长，因为德拉斯卡薩斯談到西班牙人怎样“要印第安人做远远超过他們体力的工作；他們挑着把腰都压弯的沉重担子；要他們拉他們拉不动的东西；用殘酷的戏謔和愚弄，斫断印第安人的手足，用不忍描述的方法殘害他們的身体”。但是，德拉斯卡薩斯不能不談到他的同胞的一种駭人听闻的行为，就是把印第安人作为喂他們的警犬的食物。德拉斯卡薩斯写道：“军队牵着一串用鏈条拴起来的奴隶，把他們当作食物喂狗，这是一件极其常見的事情。較有人性的軍官先把印第安人杀死，然后再拿去喂狗，但是別的人就干脆放餓狗向很害怕的赤身裸体的活的受难者扑去。同样地，有些西班牙人还被說成为‘十分爱好猎取印第安人的游戏’，这些人比赛斫印第安人的头，借此試驗他們的刀鋒是否銳利和他們的刀法是不是好。”<sup>19</sup>

印第安人至少不必閱讀西班牙国王所頒布的伪善的宣言。这些宣言說西班牙人在新世界是为了促进原有居民的幸福并且命令探險者和殖民者以人道仁慈的行为对待印第安土人，从而感化印第安人相信信奉基督教是明智的。一五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当西班牙国王——虽然他一定已經接到了关于对印第安人的殘酷行为的消息——对貝拉斯克斯占領古巴和他对“土人的人道待遇”表示感谢的时候，这就表明印第安人究竟能有几分可以信賴西班牙国王的仁慈和他的基督徒精神<sup>20</sup>。

印第安人在被征服以后，立即被編成劳动队进行开矿、照管田地和羊群、背重的东西和当西班牙人的僕人。的确，在征服后的头几年里，印第安人是开拓古巴的主要劳动力。

由于印第安人工作不是出于自願而是出于强迫，于是就訂出了各种制度，把这种强迫劳动組織起来并且证明这是正当的。在这些制度中最主要的是监护制度(encomienda)和分摊制度(repar-



timiento)。从理論上說，监护制度就是一种王室把它认为有权从印第安臣屬得到的貢物——这种貢物可以是劳动力——賜給西班牙人个人的办法；西班牙人則必須保护这些印第安奴隶并且要对他們傳播基督教教义。分攤制度就它的充分发展的形式來說，是一种貫徹监护制度的手段，它是把一批批的强制的劳动力加以分配，担任具体工作<sup>21</sup>。

因此，监护制度就是使用一定数目的印第安人劳动力的权利<sup>①</sup>。行使这种权利的借口是西班牙人应对暂时“委托”給他們的印第安人的精神生活和經濟福利負責；西班牙人應該把基督教的教义傳授給印第安人，教他們在新条件下工作，并且照顾他們的需要。簡言之，应当供給印第安人衣食，照顾他們的健康——“在世上受到教化，在天堂里得到超度”。

从法律上說来，印第安人不是奴隶，而是被监护人 (encomendados)，可以要他們离开殖民者<sup>②</sup>。但是事实上监护制度就是奴隶制度，而且可以要印第安人离开殖民者这一事实使这种奴隶制度的性质更加恶化。西班牙人决心要在控制印第安人期間尽量榨取他們的劳动力。他們用印第安人来耕种土地、看管牲畜。但是由于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得到黄金，他們首先是用印第安人来开采金矿，从河床和小溪里淘金，清理土地和砌壩。西班牙人对黄色金屬这样貪得无饜，以致簡直使印第安人为了开采黄金而累死<sup>22</sup>。

最初，准許实行监护并不赋予对于在它的範圍内的土地所有权，不过，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事实上土地所有权也产生了。不久，多数监护人 (encomenderos)取得了对在监护範圍内特定财产的直接所有权，并且甚至开始把土地出售給外人。土地所有权也由于君主的自由賜予、向印第安人购买土地以及——在許多情况下——霸占乡村的土地而获得<sup>23</sup>。

① 一五二二年，分配給每个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的数目規定最多为三百人。

② 不过，在法律上也有一个印第安人奴隶階級。这些人就是在反对西班牙人的战争中被俘虏的印第安人。

西班牙人所带来的财产独占和私有观念对于固有的印第安文化有一种十分陌生的观念。某些印第安人的土地是公社性质的，它们生产的東西被指定供乡村的共同需要，别的土地的生产則是給耕种这些土地的具体家庭。但是在这种办法下，从来没有发生过财产所有权可以买卖的事情，并且西班牙人带来了使拥有所有权的人有任意处理土地的独有权利的概念。当享有使用某些土地的权利的印第安人被杀或死亡的时候，监护人在土地还没有归还乡村共同所有之前，干脆就取得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他通过继续不断地使用土地而逐渐取得了所有权。当然，印第安人是无法维护他们的权利的<sup>24</sup>。

于是，古巴原有的居民被征服者用这些方法所瓜分；最后，土地也被征服者所瓜分。

监护制的假想的利他主义目的的迅速放弃，引起一些以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为首的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西班牙人提出废除监护制的要求。这位比几乎任何西班牙人都更熟悉古巴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风俗习惯的“印第安人的布道者”，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一份报告中，陈述了在监护制下印第安人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残酷暴行，并且认为印第安人是优秀的通情达理的人，应当和白人一样有权享受美好的生活<sup>25</sup>。

德拉斯卡萨斯遭到了征服者、地主和教士的激烈反对，只要能使他们发财致富，他们就毫无顾忌地使印第安人淪于半人类的地位。他们指责德拉斯卡萨斯损害了西班牙人的利益，鼓励产生一种对印第安人的不现实的看法。他们指责印第安人是野蛮人，“天生懒惰恶毒，有神经质，胆怯，而且一般都是撒谎、无能的人。”他们结婚不举行圣礼，只是亵渎神灵；他们崇拜偶像、好色、性嗜鸡奸，以男性生殖器为图腾进行崇拜，爱好各种情欲上的仪式和喜欢春药，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都使用魔鬼的杂草——烟草。总之，他们是介乎人与兽之间的一种没有灵魂的中間物，把普通基督教正当的法則和規矩适用于一群没有灵魂的东西的身上就是亵渎基督

教徒品行的意义。实际上,这就是說,印第安人應該只能为他們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主人砍柴和挑水<sup>26</sup>。

西班牙人替他們奴役印第安人辯护的办法是顛倒黑白,把印第安人的文化說成是一种崇拜魔鬼的文化。有如著名古巴历史学家費尔南多·奥尔蒂斯博士在他的研究印第安古巴文化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印第安人对迫使他們屈服所进行的頑强而英勇的抵抗证明了印第安人剛强的本性。”他指出印第安人并不反对工作,但是“像一切生物一样,他們是反对过度工作,无休止的工作,部分是徒劳无益的工作,工作沒有报酬,或者报酬和所用的力量不相称。”为了繼續进行从印第安人的无偿劳动中发财的做法,“某些批評的人用最凶恶的詛咒来誹謗印第安人。”<sup>27</sup>

这种爭論吵鬧甚至傳到了羅馬教皇保罗三世的耳中,他于一五三七年頒布了以《至高无上》(Sublimis Deus)为开端的著名教諭,宣布土人是真正的人,必須把他們的灵魂爭取到教会这一边来,西班牙人根据正义不能任意支配他們的财产和生命。在这种压力下,查理五世打算宣布古巴的印第安人是自由的和廢除监护制。但是,在古巴的西班牙人警告查理五世說,如果这种政策一旦实行的話,印第安人就会“暴动起来,把所有基督教徒都杀死,恢复他們的罪恶行为和崇拜邪神。”因此,他們請求維持現有的监护区。他們說:“这可以为上帝服务,增加君主的收入,和对西班牙人有好处……而且这些印第安人由于和这些基督教徒往来,可以更快地真正了解我們神圣的天主教教义。”<sup>28</sup>

查理五世妥协了,他派日斯巴尼亚的塞瓦斯蒂安·拉米雷斯主教研究古巴的监护制問題,調查关于虐待印第安人的指責和处罰任何有犯罪行为的主人。为了便利他进行工作,拉米雷斯主教被任命为古巴印第安人的保护者。虽然当时有一項規定,教士和保护者不得用印第安人为他們服务,但是拉米雷斯主教接受了在监护制下的印第安人为他自己服役,从此可以看出对他的“保护”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当国王命令拉米雷斯主教放棄他的监护区

的时候，他只是把它交给一个亲戚<sup>29</sup>。

拉米雷斯主教例子代表了在征服古巴时期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态度，这种态度从这种意见中表示出来：“印第安人为了灵魂得救而使身体受到奴役，这个代价不大。”<sup>30</sup>

以后，国王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用印第安人来开矿。古巴地方当局根本置之不顾，没有把这一命令发表，因此命令也就从未执行<sup>31</sup>。

监护制最后是在一五五〇年被正式废除了。但是这一措施没有力量和效力。在那时，古巴的印第安人差不多已经消灭了<sup>32</sup>。

印第安人并不是没有进行英勇斗争就屈从这一切的。成群的人反抗西班牙剥削者，战至最后一人，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杀死而不愿让他们遭受奴役。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当墨西哥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吸引许多西班牙人离开古巴的时候，幸存的印第安人仿效阿多欧的先例，拿起武器起义反抗。从沿海小岛和山里来的难民，一群群的印第安人——由于他们的皮肤是褐色的，被称为锡马龙人（Cimarrones）——袭击了西班牙人的种植园，放火烧毁了房屋，杀死了他们的征服者。在这种攻击之后，西班牙人通常进行迅速的报复，在报复中，印第安人遭到杀戮、俘虏、奴役和被打上烙印。但是在一位名叫瓜马的酋长和他的妻子阿巴瓜内斯领导下发动的一次比较长的斗争，具有类似内战的性质。他们两人都出生在古巴。一五二九年，瓜马组织了一次力量强大的抵抗运动，从古巴东部山岭中向西班牙人展开了攻击。这次暴动蔓延很广，常常有成千的人投入公开战斗。一五三二年十二月，西班牙人最后派遣大军进入山中，打败了瓜马和随从他的人，没有杀死的人都成了奴隶<sup>33</sup>。

虽然还有小群的人和个别的人在“山岭深处的隐密山寨”继续抵抗，但是这一次斗争似乎是印第安人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反抗西班牙人的暴动<sup>34</sup>。到了这个时候，古巴岛上生存的印第安人为数太少，不能对西班牙征服者进行任何真正的反抗。

仅仅由于殘酷暴行，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費尔南多·奥尔蒂斯写道，“开矿的劳动很殘忍，身体或精神都沒有补偿。除了每五个月有四十天使印第安人‘从事他們的耕种’外，他們成年累月都繼續工作，如果付給报酬时，一年也只有一个比索。从事开矿，从事枯燥无味的劳动，既有害身体，又很艰苦，而且也沒有什么宗教仪式，这就像是剝夺了印第安人生活的理由。这使印第安人脫离了农业和狩猎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印第安人形成他的宗教的精神核心，对时间和宇宙一体的意識，人类有如同胞的感情和他們的乡土意識。有这么多人死去，便沒有有什么奇怪了！”<sup>35</sup>

成千上万沒有被杀死、餓死或者实际上劳累而死的人，以自杀来逃避这些命运。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新疫癘，这些新疫癘都是西班牙人帶給印第安人的，印第安人对于这些疫癘沒有天生自然免疫性。据估計，一五五七年在整个古巴生存的印第安人不到两万人<sup>36</sup>。一八二〇年，古巴有一个居民写道：“散布在这些島屿上的大約三百万当地人民，沒有一个活下来。”<sup>37</sup>

在不过几十年中，古巴的原有居民，一个整个民族，实际上已經絕迹了——由于劳动过度，营养不良和疾病而被害死了<sup>38</sup>。

## 第二章

# 古巴的经济发展

(1520—1790年)

著名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和地理学家唐哈科沃·德拉佩苏埃拉-洛沃在论古巴早期的经济发展时写道：“在西班牙人占领古巴后两个半世纪内，商业对古巴岛的重要性不大，我们不值得对这个漫长的贫困时期加以描绘……”<sup>1</sup>要准确地指出这种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并不困难。这个小岛一经勘察和征服并且肯定采矿是有利可图之后，西班牙殖民者便蜂拥而来。种植者、工匠和商人也随着寻找黄金的人一起到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住在贝拉斯克斯征服时期建立的七个城市及其周围。这七个城市是：巴亚莫、西恩富戈斯、特里尼达德、圣斯皮里土斯、圣地亚哥、巴拉科阿和哈瓦那<sup>2</sup>。

但是，古巴所蕴藏的黄金不久就被开采完毕。到了一五三五年，大多数的矿开始倒闭。在发现墨西哥，特别是秘鲁有无限财富以后，古巴对西班牙人不再有很大的吸引力。关于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的消息使西班牙移民大为兴奋，甚至已经在古巴立定足跟的人也只有一个念头：“愿上帝带我到秘鲁去！”

从一五一八年起，西班牙其他殖民地财富的诱惑继续不断地使人离开古巴，到墨西哥和中美洲去，到使人惊奇的秘鲁王国去，和到人们知道得不多但抱有很大期望的佛罗里达去。每一次发现新的财富，就有一批移民离开古巴。有如洛佩斯·德戈纳指出的，“在印度群岛每一个人都想身居显贵或发财致富。”因而要找到人或长期投于土地或生产食糖的企业资本就很困难。的确，到了

十六世紀中叶，古巴有成为一片空地的危險<sup>3</sup>。

西班牙国王急于要使古巴不致被完全放棄，努力設法鼓励移民并且保证他們可以安心长期定居下来。他甚至对于未經当局批准擅自离开古巴島的人規定可以处以死刑和沒收财产。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見效，人們知道一旦到了古巴就可能不能离开，这就使他們不去移居古巴。到了一六〇二年，古巴的人口只有两万人，其中有一万三千人住在海港城市哈瓦那及其周圍<sup>4</sup>。

哈瓦那是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之間的航路上的一个地處要冲的港口，它的良好海港保护着它，使它不致受到颶風和海盜的侵襲，因而发展迅速。它的发展主要由于有大量流动人口，人們来到这个城市等候从卡塔黑納（哥倫比亚）、維拉克魯斯和圣多明各开来的西班牙船队，以便回到塞維利亚去。这就使接待军队和水手的酒店及旅館生意兴隆，并且也帮助了烟草种植业的发展，因为烟草是要运到哈瓦那，以供在当地和旅程中吸用和将来在塞維利亚出售的<sup>5</sup>。

在这一时期，古巴的其他經濟活动有飼养牲畜、种植絲兰、为前往美洲大陆的征服者供应肉干和面包（Casabe）。在西班牙統治的最初一个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古巴主要是征服和移民美洲大陆的活动基地，是前往西方和南方富饒地方的中間站，而不是一个本身需加开发的殖民地。

古巴的經濟发展又由于欧洲連續不断的战争对美洲的影响而进一步受到妨碍。古巴島一再遭到和西班牙交战的國家（法国、英国和荷兰）的攻击。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海盜使这块殖民地蒙受恐怖。一五三六年，哈瓦那曾被一个法国人所搶劫；次年，圣地亚哥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一五五四年，法国再一次攻击圣地亚哥，搶去八万美元。一五五五年，法国另一个海盜搶劫和焚毀了哈瓦那<sup>6</sup>。

这些海盜的侵襲使稳步发展成为不可能。只是在一六九七年簽訂禁止海盜行为的里斯微克条約之后，古巴才能摆脱这些搶劫所造成的停滞状态而开始恢复。

从此以后，情况慢慢地改变了。十八世紀开始时，有許多定居点已經在古巴內地建立成功，这些地方从事飼养牲畜，种植烟草和甘蔗。其他作物包括靛青、咖啡、棉花和蜂蜡。蜂蜡是出口供墨西哥的教会之用的。但是，牛肉、蔗糖和烟草仍然是主要的产品。

到了这个时候，古巴的农业已經比来自其他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貴重金屬更加重要。誠然，这些农业活动規模不大，不能和以后的一个世紀的农业发展相比，但是这个殖民地的重要性却因此迅速增加，人們承认古巴的农业生产，特别是蔗糖的生产，是一种潜在的、无可估量的富源<sup>7</sup>。

阻碍古巴經濟发展的其他因素，包括教士的勒索。这种勒索从一开始起就是古巴經濟的一种沉重負担。所有耕种生产所得都要遵守什一稅法。根据什一稅法的規定，作物的价值的十分之一應該納入教会的財庫。（生产糖的人甚至不能从什一稅 减去榨蔗和加工制糖所需的任何費用。）这种負担有时由于賄賂征收什一稅的人或者用其他方法欺騙教会而減輕，而教会本身也急于要使它得到收入的土地的經濟生产力不致受到妨碍，于是也和生产者一致反对国家限制生产的命令。不过，当在向国王繳納的賦稅之外，再繳納总生产的十分之一的教会稅，或者为逃避什一稅而付出巨額賄賂的时候，生产者感到要使出入和抵便很困难<sup>8</sup>。

而且，教会还迫使土地所有者在死亡时，把土地贈送給寺院或其他教会組織，以便在来世得到永生。据德拉佩苏埃拉所說的，到了十七世紀中叶，古巴教会的基金已經积累达四百万美元。他还說：

“他們已經抽走了社会財富的三分之一。巴里納斯侯爵唐加夫列尔·德比利亚洛沃斯在給查理二世的一个很长的报告中說了这样一句話，这句話十分正确。他說：‘我几乎无需向陛下指出(哈瓦那)居民所遭受的极端不幸和沉重負担。如果对这种情况不加以糾正，这个城市不仅不能兴盛，而且会因而衰落。在五十年內所有財產都将落入教士的手里，而一般平民将只有忍受不堪忍受的



負担’。”<sup>9</sup>

古巴人民繼續忍受着这种“不堪忍受的負担”，一直到十九世紀；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这个島屿的經濟发展，由于教士的貪得无饜，受到了严重損害。

已經落后过时的西班牙重商主义的貿易制度，特别是在它的海外屬地实行的那种制度，对古巴經濟进展的打击甚至更大。简单地說来，西班牙对它的屬地的商业政策是使貿易实际上由西班牙壟断。外国人既不准作为商人，又不能作为定居者。这些政策曾經得到教皇批准，作为对西班牙人努力傳播教义的一种报酬。

西班牙虽然絕不是唯一实行以殖民地作为向母国提供财富的政策的国家，但是欧洲其他殖民国家执行这个政策都不像西班牙那样严格<sup>①</sup>。这种情况反映西班牙作为一个大国正在衰落，而这是实行反动和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它的宫廷和統治階級腐化的結果。它的擴張主义政策一再引起战争。为了执行这种政策，对西班牙人民越来越横征暴斂。自从一五八七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以后，“(国王菲利浦)在国内外采取了各种勒索剝削的手段，直至民穷財尽……”到了一五九六年，国家已陷于破产。正如当时的一个报告所說的：“沒有一人有錢或債权了，国家已經完全荒蕪。賺来的錢都被藏起来了，財主靠着它过无聊的生活，一直到把它用完为止。貿易由于賦稅沉重而被扼杀。在主要城市里，大多数房屋都关闭起来，无人居住。”<sup>10</sup>

在这些情况下，西班牙指望它在海外的屬地能够提供复兴它那日益恶化的国家經濟的手段。西班牙政府实行了可能实行的最

---

① 最近的学者，特别是詹姆斯·汉密尔顿教授、欧文·里昂納德教授和薩尔瓦多·德馬达里亞加等都力图修改这种看法，即西班牙坚持完全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利用殖民地的严格政策。他們都坚持說，在新世界实际上沒有什么西班牙“殖民地”，只有設有自治政府的王国，而母国和“王国”之間的利益均衡，有时有利于这一方面，有时有利于另一方面。这种重新估价虽然有一些对的地方，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在大部分時間里，这种均衡是有利于母国的。

严格的貿易控制，其目的不是促进殖民者的利益，而是补充由于不断进行战争而消耗殆尽的西班牙国库。因此，国王规定殖民地和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貿易是不合法的。

这个政策由于规定和母国的合法貿易只能在塞維利亚港进行而更加复杂：政府把貿易壟断权卖给了私人。和新大陆做生意是一种特权，西班牙国王根据他所规定的繁重的条件只把这种特权给予自己的臣民，并且只给予在臣民中挑选出来的一些人。因此，两半球的貿易就被殘酷地利用来为塞維利亚商人牟利。西班牙的貿易条例规定它的殖民地在海外购买的商品（包括食物）必須向伊比利亚半島的商人购买和經過西班牙的港口。这样在原来的成本上就又加上了利潤、佣金、運費和种种賦稅<sup>11</sup>。

古巴自从成为一个殖民地时起，就大大遭到对西班牙其他殖民地所实行的同一专制制度的損害。但是因为古巴的出口不多，所以多少年来古巴受到西班牙貿易政策的影响比其他殖民地小些。对于一个在当时还不产糖而烟草又很少（这是两种在以后成为它的主要出口貨物的产品）的島屿來說，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貿易只是一个空洞的問題。但是，对于輸入这个殖民地的商品所征收的沉重关税，始終成为困难，因为这种关税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极其昂貴。

在十八世紀上半世紀，古巴的經濟发展起来。随着經濟发展，它开始感到殖民剝削的整个压力。烟草种植者对这一点感觉最敏銳。

古巴的烟草最初只是为了供本地消費而熏制。到了十八世紀，当吸烟在欧洲已經成为一种牢固的习惯时，古巴輸往欧洲的烟草便重要起来。但是，古巴的烟草种植者必須和西班牙一整套苛重的重商主义制度及其种种限制进行斗争。烟草的稅很重，烟草种植和銷售往往受到限制，因而只能銷售給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走私商人。一六一四年，不許古巴种植烟草的十年禁令是取消了，但是，收获的全部烟草必須运往塞維利亚。違者处以死刑<sup>12</sup>！

随着古巴烟草的消费增加，西班牙政府看出它是一种很好的财源，垄断和限制制度于是更变本加厉。它实行政府垄断，以贱价在古巴购进烟草，而在欧洲以高价出售。一七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国王谕令规定古巴全部烟草生产由政府垄断。在哈瓦那设立了一个烟草垄断公司(Estanco de Tabaco)，在巴亚莫、特里尼达德和圣地亚哥都设有分公司。烟草种植者只能把他们的烟草卖给垄断机构，该机构按质定价，但不保证购买种植者(Vegüero)的全部烟草，而只按照它自己规定的价格购买它所需要的数量。种植者不得把他们的剩余烟草售给私商<sup>13</sup>。

古巴烟草种植者并不是唯一受到垄断制度之害的人，这种垄断制度有利于私人公司，而受到损害的是种植者。一七四〇年，在哈瓦那设立了皇家贸易公司，它的资本是九十万比索，当时唯一能够和古巴进行合法通商的港口卡迪斯的几个商人投资五十万比索，其余来自哈瓦那的一群商人。公司发行了股票，每股为五百元，有二百股立刻送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使他们在公司中享有特殊利益。

对这个公司不仅赋予垄断烟草贸易的权利，而且对它也赋予了垄断古巴岛全部进出口贸易的权利！

在皇家公司存在的二十年間，它为公司的董事和股东获得了巨额利润。古巴的生产者不仅被迫按照低价把他们的糖、皮革、烟草等等卖给垄断公司，而且消费的人民也受到了生活必需品的高价剥削<sup>①</sup>。商品价格很高，使输入古巴的货物减少，而收购古巴产品的价格很低又使出口下降。整个殖民地的商业发展因此大为迟滞<sup>14</sup>。甚至受到皇家特别照顾，获得贷款、土地、延期偿还债务和准许进口奴隶的甘蔗种植者，也受到垄断的损害。

最初反抗西班牙在古巴所实行的弊端百出的特权制度的方式是走私。国王规定古巴不能和任何其他国家贸易的命令根本被置

<sup>①</sup> 皇家公司一桶面粉在西班牙所花成本为五、六个比索，在古巴卖三十五至三十六比索。

之不理。法国、英国和荷兰的船只停泊在古巴的海岸，带来了亚麻布、絲綢和其他制造品，換得烟草、皮革、腌肉和靛青<sup>15</sup>。走私成为东部大城市巴亚莫的主要业务，甚至教士也参加。一六〇二年，古巴总督唐佩德罗·德巴尔德斯向馬德里报告，不仅教外人士从事走私，教士也是一样；巴拉科阿的牧师“……是整个印度群島所能找到的最大的異端者和敌人之一，古巴島所有的修士和牧师都公开仿效地，毫不隱瞞”<sup>16</sup>。

一六〇三年，西班牙当局企图制止巴亚莫走私者的活动，規定把烟草出售給外国人的人將被处以死刑。但是走私非常盛行，无法根除；走私不仅繼續存在，而且成为一种正常的商业活动。德拉佩苏埃拉指出：“走私几乎从十六世紀末开始，在整个十七世紀始終繼續未停，这样做甚至比把哈瓦那建成为船队中心更加奠定有利可图的基础。这些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重复进行和予以增加的发财致富活动，对于逐漸扩大烟草种植頗有作用。”<sup>17</sup>

早在十七世紀初，巴亚莫走私商人就公然不顾西班牙政府的命令，这是对西班牙在这个島上所实行的弊端百出的限制反抗越来越大的证据<sup>18</sup>。一六八三年，古巴总督向国王申訴，他对哈瓦那出售烟草征稅的計劃在哈瓦那遭到普遍反对。他說：“……住在这个城市（哈瓦那）的人天生地反对命令他們做的事情，并且醉心自由，以致每一件事都引起許多麻煩。”<sup>19</sup>

三十年后，古巴发生了第一次反对西班牙的束縛的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反对一七一七年实行的烟草壟断制度<sup>①</sup>。五百名憤怒

---

① 根據有些历史学家的意見，发动这次暴动的是烟草貿易商人或“投机商人”。他們煽动烟草种植者為他們的利益进行斗争。毫無疑問，在这次暴动中有“投机商”参加，但是在基本上这是一次烟草种植者反对壟断制度的叛乱。（見韦利斯·弗萊彻·約翰遜(Willis Fletcher Johnson):《古巴史》(The History of Cuba), 紐約1920年版, 第1卷, 第338頁; 唐哈科沃·德拉佩苏埃拉-洛沃(Don Jacobo de la Pezuela y Lobo):《古巴島地理、統計、历史辞典》(Diccionario geográfico, estadístico, histórico de la isla de Cuba), 馬德里1863—1866年版, 第2卷, 第58—59頁。)

的烟草种植者拿起武器反对西班牙人，举行“烟草种植者的暴动”（Sublevación de los Vegueros）。并且占领了哈瓦那郊区的赫苏斯德尔蒙特教堂。在城里，也举行了同情烟草种植者的示威游行。哈瓦那女修道院院长向西班牙国王提出抗议，指出“在所有出产烟草的地方”，都对修道院缴纳巨额的税款，以供维持修道院之用；而在拟议中的垄断制度下的这些税款将停止或大大减少<sup>20①</sup>。这次抗议十分强烈，以致古巴总督被迫辞职，回到西班牙。

但是烟草垄断制度还是继续下去，一七二〇年烟草种植者又举行了一次暴动。他们这次赢得了让步，减轻了他们的一些负担。但当瓜索总督拒绝实行已经答应过的改革时，烟草种植者于一七二三年又举行了暴动。在圣米格耳、瓜纳巴科阿、赫苏斯德尔蒙特有五百个人举行集会，约定不把烟草卖给垄断组织，并且烧掉那些把烟草卖给垄断组织的烟草种植者的烟草。

暴动的种植者立即前往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在那里他们毁坏了把烟叶卖给垄断组织的种植者的烟田。西班牙当局派了一支军队来到出事地点，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有九个小农被杀死，十二个人被俘虏并在当天根据瓜索总督的命令处死，甚至没有经过审判的形式。十二具尸体吊在从哈瓦那通向赫苏斯德尔蒙特

---

① 在古巴从开始种植烟草的时候起，就适用什一税法，教会征收收割的烟草的价值十分之一，因此，教士反对所有减少收成价值的计划，而依照一七一七年的国王法令则将引起这种结果。弗赖·赫罗尼莫·巴尔德斯主教公开赞助烟草种植者的叛乱，甚至威胁，如果总督不取消对赫苏斯德尔蒙特教堂的包围的话，即将对他予以驱逐出教处分。哈瓦那多米尼加教区教士萨尔瓦多·苏亚雷斯神父由于公开支持叛乱者，以致国王警告他的上司，“特别注意，不要让你的下属扰乱那个共和国的安宁，推翻或干涉它的正当行政工作和执行国王的命令……”一七二一年，西班牙国王下令把苏亚雷斯神父流放到“他无法再煽惑人心的遥远的地方”。（玛丽亚·比尔图德斯·莫兰（María Virtudes Morán）：《古巴的教会和国家》（Church and state in Cuba），1950年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写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第11—12页；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费尔南德斯（Fernando Ortiz Fernández）：《古巴的两种产品：烟草和糖》（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纽约1947年版，第217—218页。）

的路边的树上，这是西班牙当局对赫苏斯德尔蒙特烟草种植者的一个警告：他们必须屈服，否则就有灭亡的危险<sup>21</sup>。西班牙政府对烟草的垄断一直继续到一八一二年烟草种植者举行流血而胜利的暴动时才结束<sup>22</sup>。

一七二三年以后在古巴虽然没有再发生暴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满情绪已经消除。这从古巴内地市议会向西班牙国王提出的许多呈文中表现出来，这些呈文要求停止实行限制政策，特别要求取消皇家贸易公司<sup>23</sup>。国王对这些呈文置之不理，但是，不久就发生的一件有国际意义的事件增加了古巴抗议的力量。

一七六二年八月十三日英国占领哈瓦那，次年，把这个城市交还给西班牙，用以交换佛罗里达。但是这次短期占领的影响长久继续存在。英国人开放了这个港口，允许进行无限制的贸易，以低价出售商品和奴隶，并且使古巴人第一次尝到和其他国家进行合法贸易的滋味。在这一年的自由贸易期间，成千条船只装着从欧洲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运来的商品和从非洲运来的奴隶来到哈瓦那。

这一次摆脱西班牙在商业上的束缚，把古巴从西班牙垄断制度所造成的冬眠停滞状态中拯救出来。但是古巴不仅在经济方面获得了好处，重要的是，在英国占领期间，互济会进入了古巴，我们将看到它对推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热情起了主要作用。信仰自由也第一次在古巴得到容忍，这可能是因为英国的新教徒想借此使天主教徒皈依他们的宗教<sup>24</sup>。

在英国离开古巴以后，西班牙政府感到恢复旧的束缚在实际上已不可能。经过英国占领以后，皇家贸易公司不能恢复它享有二十多年的垄断特权<sup>25</sup>。

一七六四年标志着西班牙殖民地统治自由化的开始，对古巴尤其宽大<sup>①</sup>。查理三世关于贸易的法令——所谓“波旁王朝开明专制”时期的一部分——一直鼓励着这个岛的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一七六四年八月的命令除去别的规定外，还给予古巴以和西班牙进

行貿易的權利，不僅像過去一樣可以從哈瓦那進行，而且還可以從聖地亞哥、特里尼達德、巴塔巴諾、努埃維塔斯、雷梅迪歐斯和馬坦薩斯等地進行。它也打破了卡迪斯的貿易壟斷，開放西班牙其他港口和古巴進行通商，特別是巴塞羅那。一年以後，卡迪斯的阿吉雷·阿羅斯特吉公司被批准把黑奴運往古巴，並為西班牙人進口面粉、食鹽、肉和衣服。一七七四年五月三日的一項命令，准許古巴的糖和其他產品自由輸入西班牙。在這些年里，古巴和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進行貿易也第一次成為合法。一七七七年，這個島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這時在古巴設立了一個由總督領導的獨立的殖民地行政機構<sup>26</sup>。

緩和以前的嚴格限制在古巴的經濟方面迅速地反映出來。一七六二年，據估計古巴有七十個甘蔗種植園，所有這些種植園的產量合在一起抵不上一世紀以後一個大種植園的產量<sup>27</sup>②，這表明古巴在經濟上有了真正進展。另外，一七六二年英國的占領使哈瓦那的雪茄煙流傳整個歐洲，因此煙草的生產也增加了<sup>28</sup>。總的來說，從事古巴和西班牙之間的貿易的船隻數目表明了古巴的經濟發展情況：這種船隻在一七六五年有六艘，一七七八年增加到二百艘<sup>29</sup>。

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三年的美國革命，進一步刺激了古巴的

---

① 事實上，第一次放寬嚴格的貿易規則是在一七四八年查理二世命令取消護航制的時候。在護航制度下，每年只准許兩隊商船在三月和四月駛往哈瓦那進行貿易。這兩隊商船由軍艦護送到美洲海面，在巴拿馬的貝洛港和墨西哥的維拉克魯斯卸下貨物，然後再駛往哈瓦那，由那裏啟程返回西班牙。根據新的命令，船隻全年任何時候都可以單獨駛往古巴。〔克拉倫斯·哈維（Clarence Harvey）：《西班牙和印度群島之間的貿易和航運》（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the Indies），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 1918 年版，第 102—104 頁。〕

② 一七六三年全年蔗糖出口量據報告只有一萬三千箱。〔亞歷山大·馮·洪博耳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古巴島》（The Island of Cuba），紐約 1856 年版，第 252 頁。〕

經濟。在這一次戰爭期間，美國的私掠船<sup>①</sup> 大胆地開到了加勒比海。西班牙對這種船隻的到來予以容忍，因為對它的敵人英國和葡萄牙的任何攻擊都是它所歡迎的。一七七六年十一月五日，國王命令准許北美叛變船隻懸掛它們自己的旗幟前來購買必需品，但以付現金、票據或黑奴為條件。美國的私掠船於是迅速地利用這些讓步襲擊英國的商業，它們和古巴的貿易也興盛起來<sup>30</sup>。

一七七九年，西班牙正式加入了反對英國的鬥爭<sup>②</sup>，支持西班牙的盟國——法國，進一步間接地促進了這種貿易。供應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曾經遭到英國海軍的打擊破壞，西班牙政府必須發給臨時執照，允許古巴人從美國進口糧食<sup>31</sup>。這種貿易雖然由於有許多限制——關稅很重和任意扣留船隻——受到妨礙，但是它仍然很興旺。美國把第一個派往拉丁美洲的官方代表派到哈瓦那。這個代表是巴爾的摩的羅伯特·史密斯<sup>③</sup>。大陸會議命令他擔任駐哈瓦那的代表，幫助美國商人，並且在必要時為他們與西班牙當局進行交涉<sup>32</sup>。

古巴希望西班牙在一七六四年開始實行的它的殖民地壟斷政策的修正條例會固定下來。這些希望很快地就全都消失了，像古巴人所一再發現的，片面有利於西班牙的政策有時是放寬了，但是這種讓步往往是臨時性質的，而且各種改革也是不徹底的。要求恢復舊的政策壓力繼續存在。在查理三世執政的短暫的寬大時期，享受優待的西班牙商人不斷促使國王恢復他們的壟斷權，以及把古巴的門戶對外國人關閉起來。他們的主要不滿意見之一是外

---

① 戰時特准捕拿敵人商船的武裝私船。——譯者

② 關於西班牙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的討論。見下文第 41—42 頁。

③ 西班牙當局對史密斯像對他的繼任者奧立佛·波洛克一樣拒絕予以承認。〔羅伊·尼科耳斯(Roy F. Nichols)：《1779—1809 年貿易關係和西班牙美洲美國領事館的建立》(Trade Rela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ted States Consulates in Spanish America, 1779—1809)。《西班牙美洲歷史評論》(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 13 卷，1939 年 8 月號，第 291 頁。〕



国人濫用进口食物的特权，把禁止进口的制造品也运了进来<sup>33</sup>。

由于这种压力，西班牙当局在一七八四年一月頒布了一系列的命令，停止古巴和西班牙以外所有一切国家之间的合法貿易。他們还把所有外国人都从島上驅逐出去，其中包括继史密斯之后任美国代表的奥利佛·波洛克<sup>34</sup>。美国是受到这些命令影响最大的国家。它在一七八四年极力劝西班牙当局允許美洲这个新国家不受这些限制，让它根据互惠原則和西班牙在美洲的屬地，特别是和古巴进行貿易。美国的建議馬上遭到了拒絕。西班牙駐費拉德尔非亚的代表唐弗朗西斯科·倫东把这个建議轉給馬德里当局的时候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見。他认为西班牙的商业将受到不利影响，因为西班牙商人不能和美国的商人竞争。他实际的意思是，如果答应做出这些让步，古巴就会逐漸成为在經濟上依賴美国，这是一种西班牙决心要制止的发展<sup>35</sup>。

美国的一切努力結果都失敗了。西班牙不願意把它的殖民地貿易开放給其他国家。傳統的壟断政策在古巴又恢复了，同美国蒸蒸日上的貿易也衰落了，在近十年里这种貿易是秘密进行的。

在西班牙波旁王朝修改重商政策时期所做的各种让步，对古巴的經濟发展无疑地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例如和海地比起来，古巴的农业和商业发展实际上是可能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在一七九〇年的前夕，古巴的經濟情况是屬于一种多样性的經濟。許多小的和少数大的农場，种植甘蔗、烟草、咖啡；飼养牲畜和生产其他产品，規模不大。一七九二年的調查报告，列举了三百九十九个大牧場、四百七十八个甘蔗种植园和七千八百一十四个較小的种植烟草、蔬菜和飼养牲畜的农場<sup>36</sup>。

但是这是发生革命和重大轉化的前夕古巴的經濟情况。在研究这些新发展以前，讓我們先考察一下在一七九〇年以前时期内古巴社会的性质及其内部矛盾。

### 第三章

## 古巴的社会结构

(1520—1790年)

在我們已經叙述过的古巴經濟发展的几百年期間（前面的討論絕不含有企图对这个題目进行詳尽研究的意义），在这个島上：逐漸出現了三種人：古巴白人、西班牙人和黑人。在同時，這個島上也開始出現了三種鬥爭的萌芽：（一）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鬥爭，（二）古巴白人反對西班牙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三）古巴內部古巴人和西班牙人之間的鬥爭。

當然，以上情況也是整個西班牙帝國的情況，但是，在古巴最明顯地表現出來。古巴的歷史比西班牙美洲的任何其他國家更受到以上三種鬥爭的支配。

一七七四年的調查表明，當時古巴一共有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人，其中有白人九萬六千四百四十人；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種人三萬一千八百四十七人；黑人和黑白混血種奴隸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三人<sup>1</sup>。白人包括伊比利亞半島人（即在西班牙出生的西班牙人）和克利奧爾人（在古巴生長的白人）。雖然後者的人數大大超過前者，但是他們不分貧富或文化程度都被列為社會階層的第二等人。在古巴社會這一最高階層之下的是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種人；而在社會組織最低層的是黑人和黑白混血種奴隸，他們的勞動，生產了大多數西班牙人和許多古巴人所享用的財富。

“不可能找到印第安人……從事開墾和耕種土地所需要的工作，此項工作……應當交給較為強壯的人。”西班牙國王斐迪南七世在一八一七年解釋把黑奴運到古巴來的原因的時候就是這樣寫

的<sup>2</sup>。“不可能找到印第安人”的原因是，在遭到西班牙征服者殘酷殺戮之后，沒有一個人能够幸存，这显然是不相干的。無論如何，“較为强壮的人”就是黑奴。这些奴隶最初是从西班牙本国运到古巴来的，当时西班牙充滿了从几内亚和剛果来的奴隶；以后就直接从非洲——从大西洋沿岸地区（塞內加尔、几内亚、剛果三角洲和安哥拉）和从远及非洲大陆对岸的莫三鼻給。在这些地方，黑人作为战胜的部落酋长的俘虏，被卖给奴隶販子——主要的是英国人<sup>①</sup>——交换不值錢的小裝飾品和酒。这些奴隶被用船运到古巴。船上非常拥挤和不卫生，以致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的人在航行途中死亡<sup>②</sup>。沒有死的黑奴便在本国出售，奴隶販子和准許进行这种不人道买卖的西班牙国王得以撈到丰厚的利潤。在本国历史初期，这种貿易这样有利并且对王室財庫是这样一个大財源，

① 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所进行的奴隶貿易虽然規模很大，但是都不能和英国的奴隶貿易相比。“用英国船只載运的非洲奴隶将近所有其他国家船只載运的黑奴总数的四倍。”〔雷丁(J. S. Redding)：《他們带着鎖鏈到来》(They Came in Chains)，紐約1950年版，第17頁。〕卡尔·馬克思要人特別注意奴隶买卖在英国資本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利物浦市是在奴隶貿易的基础上进于繁荣的。奴隶貿易是它的原始积累的方法。”《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0頁。

② 在整个古巴奴隶貿易的历史上，这个比例一直繼續維持着。一八二〇年，古巴有一个观察家写道：“……在最近三十年里，有二十万以上的黑人被从非洲运到这个岛上，推测另有五万人在途中死亡，这是比較可靠的。对于这一点沒有評論的必要。”〔《一八二〇年哈瓦那来信，其中有关于古巴島目前情况的叙述以及对奴隶貿易的看法》(Letters from the Havana During the Year 1820,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Island of Cuba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Slave Trade)，倫敦1821年版，第36頁。〕杜波依斯博士根据平均运到西半球一个奴隶大約就有五个人在非洲被杀害或者在公海上死亡的估計，认为奴隶制度使非洲遭到大約六千万人这样可怕的損失：“整个地区人口减少了，整个部落都消灭了。这是在古代或現代历史上所罕有的(如果曾經有过的話)对一个大陆的掠夺。”〔杜波依斯(W. E. B. DuBois)：《黑人：过去和現在》(Black Folk: Then and Now)，紐約1939年版，第142頁。〕无怪馬克思談到关于資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出現时說过，“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骯髒的东西。”《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1頁。

以致西班牙政府坚持奴隶貿易必須得到国王的特許，而国王則从进口的每一个黑人获得一笔特許費。

国王在一五一三年第一次准許販运黑奴，但是第一次把黑奴大規模地运进古巴却是在一五二四年，当时允許进口三百个非洲人开采目阿瓜的金矿。以后，在一五五〇年，“因为古巴人天性懶惰，拒絕从事一切劳动”，国王給予商人們的一个企业联合組織以把非洲黑奴运入古巴的独占特权。

直到若干年以后，人們所希望的糖业发展才得到实现；輸入黑奴虽然一直在繼續，但是在十六世紀末以前进展很慢。在奴隶主中，教士构成了不是无关重要的一类，正同他們在过去得到印第安奴隶一样，教士們自从黑奴最初运到島上来的时候起，就一直把这些黑人当家务劳动和实业活动的奴隶。教士們早在一五三〇年就在古巴开办了几家炼糖厂，每家糖厂都有一批黑奴<sup>3</sup>。

和某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相反<sup>4</sup>，黑人并不是甘心情願地接受奴役的。在最初到来的黑奴中，就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他們和幸存的印第安人——特别是逃亡的奴隶——协力合作。他們联合在一起，反抗他們的共同压迫者，逃到山里过自由的生活。奴隶主雇用了打手来追捕逃跑的黑奴<sup>5</sup>。

古巴第一次有記載的黑奴暴动是一五三三年在霍巴博矿場发生的。虽然只有四个奴隶参加了这次暴动，但是总督却从巴亚莫派遣了一支大軍来镇压暴动。四个黑人坚持抵抗到死，他們的头顱被带回巴亚莫，用来安定吓坏了的殖民者的人心<sup>6</sup>。这种可怕的情形显然是不足以使奴隶主相信他們現在已經太平无事了，因此他們要求国王禁止黑人携带超过“一手掌长”的刀或者几个人一起出門<sup>7</sup>。

奴隶主恐惧是有根据的。一五三八年，黑奴乘法国海盗襲击哈瓦那的机会发动暴动，搶劫这个城市<sup>8</sup>。同时，个别奴隶的反抗行动（例如逃到山里）以及甚至諸如成群奴隶集体自杀等集体行动繼續发生<sup>①</sup>。一七二七年，在哈瓦那西边的古埃勃腊阿洽糖厂里

发生了一次奴隶暴动。有三百个奴隶参加了这次暴动，只是由于政府的军队开到，暴动没有进一步扩大。一七三一年，圣地亚哥德尔普腊多的铜矿又发生了一次暴动。古巴奴隶暴动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直到一八八六年废除奴隶制度时才告结束！

十八世纪大多数奴隶暴动虽然不如下一世纪的暴动组织得好，而且也不如后来广泛，但是暴动越来越频繁，对西班牙当局造成了很深刻的印象。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希望不致再发生新的奴隶暴动，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颁布了关于奴隶的新法律，有一个官员被任命为奴隶的保护者。根据这个法律，奴隶主必须依照规定的标准供给奴隶吃和穿，向奴隶宣传天主教，强迫他们做弥撒，并且为了这个目的指定一个牧师。对于虐待奴隶，处罚过分，或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奴隶主得处以罚款、提出刑事诉讼和没收他们的奴隶。这时奴隶将被卖给另外一个奴隶主，或者根据以前向官员的控诉选择另外一个主人。法律又规定，一年只有二百七十个工作日。

对奴隶的要求也规定下来。奴隶应当服从和尊敬他们的主人，奴隶的工作应当适合他们的年龄和情况。十七岁以下或六十岁以上的奴隶应当免除整天劳动（这种整天劳动是从破晓一直工作到太阳落山），收获季节除外，那时主人可以使他们的奴隶工作较久。一个奴隶如果没有完成他的任务，就可以用套上足枷铁镣，或者鞭笞的方法来惩罚他（但是鞭笞不能超过二十五下）<sup>10\*</sup>。西班牙人有句谚语：“接受而不照办”，这句谚语恰当地说明新法律在古巴的效力。尽管某些历史学家对这个法律不断称赞<sup>11</sup>（其中有一人甚至说西班牙国王应当在“人类恩人堂里有一个适当的地位”<sup>12</sup>），但是

---

⑩ 曼提加斯特别以集体自杀而出名。这些置生命于度外的奴隶认为，他们的肉体 and 灵魂会在他们的非洲故乡复活。为了阻止其他奴隶仿效他们，奴隶主把这些奴隶的尸体肢解，借此向活着的人表明自杀之后在非洲复活将没有头或四肢。（前引奥尔蒂斯(Ortiz)书，第86页。）

\* 原文漏注9。——译者

极其有力的证据证明，对奴隶主规定的义务并没有实施，而对奴隶规定的义务则严格执行<sup>13</sup>。对官员们进行贿赂，使他们对法律中目的在于保护奴隶的条款置之不问。在哈瓦那，有些奴隶确是得到了好处，但是在蔗田和糖厂里的奴隶不仅继续受到悲惨待遇，而且对他们的压迫事实上更加恶劣。由于叛变不断发生，逃到山里去的黑人越来越多，奴隶主不让奴隶住在茅屋里(bohíos)，而是让他们住在大房子里，这些大房子实际上就是监狱。一天工作完毕的时候，男女老幼都被关在这些只有一扇门和窗户的高而有栅栏的大房子里。在有些甘蔗种植园里，甘蔗田和厂房都有了望台和防舍，雇用的私人军队，二十四小时都进行警戒，防范奴隶暴动。奴隶主雇用被称为“兰查多雷”(ranchadores)的打手，带着训练有素的警犬，追捕越来越多的逃到山里去的黑人<sup>14</sup>。

自由黑人原来是从奴隶主把他们的奴隶出租作为计日工人的办法中产生的。他们可以用完成一天应做的劳动以后挣得的一切额外收入贖买他们的自由<sup>①</sup>。从法律上讲来，这种奴隶可以贖买他的自由的制度最初是在一七〇八年规定的。这个制度允许奴隶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贖回他的自由。对奴隶主的第一次付款为二十五到五十比索，以后他可以分期繳付余款，他每付一次款就可以按照比例获得一部分自由<sup>15</sup>。一个奴隶在能够付清他贖身钱的时候往往已经相当老了，主人也很愿意用奴隶付的钱买一个年轻的奴隶，年轻的奴隶可以为他捞到更多的钱。已经贖回自由的奴隶被称为“受约束的人”<sup>16</sup>(coartados)。

有些奴隶以逃到岛上没有熟人的地方的办法而变成自由的人。更常发生的情况是，一群奴隶逃到山里，耕种庄稼以维持生计；如果他们被跟踪追捕，他们就奋力自卫。这些自由的黑人被称

---

① 在一个短时期内，哈瓦那也有一批开设酒店和客棧的黑奴，他们用出售烟草和酒赚来的钱贖买他们的自由。但是市参议会在一五五七年五月十四日頒布一项命令，禁止黑奴经营酒店和客棧，特别是不准銷售烟草和酒，違者得处罰五十鞭。这项命令堵塞了这种贖买自由的机会。

为錫馬龙人 (Cimarrones)。我們記得，这个名称最初适用于曾經通过同样的道路从强迫劳动中获得自由的印第安人。

黑白混血种人就是白人主人和黑人女奴(通常是强奸)生下来的子女。这样生下来的子女虽然大多数仍然做奴隶，取得他們的母亲的地位，但是有些則由他們的父亲赋予了自由，他們又生下了别的自由的黑白混血种人。

在古巴社会中，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的处境虽然不像奴隶那样坏，但是也是够苦的。当时有一个观察家曾經这样写道：“他們受到大多数对奴隶实行的限制。”他們被白人看做是下等人，而他們的自由常常只是有名无实。每逢他們找到了一个可以使他們过良好生活的职业的时候，白人为了使只有自己能过这种生活，就对当局施加压力，禁止黑人繼續干下去。例如，黑人不得出售和种植烟草(自用为例外)，也不能經營旅館和酒吧間<sup>17</sup>。在对奴隶和自由黑人的違反行为規定处罚时，政府命令常常把他們放在一起。例如一五八六年九月管制烟草銷售的国王命令就說：“……如果(違反命令的人)是一个黑人或黑种女人，不論是自由人或奴隶，任何上述处罚(与白人違反命令者相比)应予加倍，并将在大街上鞭笞二百下。”<sup>18</sup>順便提一下，古巴对黑人的所謂种族寬大和別的国家比起来該是多么大啊！

在一七八九年的奴隶法中，自由黑人第一次被賦予某些权利，但是当他要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他常常发现事实上那些权利并不存在。而且，由于生产糖而对奴隶劳动力的需要不断增加，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經常有被劫走成为奴隶的危險。虽然有少数人成为地主、商人和专门职业的人，但是絕大多数的自由黑人都是散工，并且发现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遭到堵塞。

由于沒有政治权利和在奴隶社会中在社会上和經濟上受到排斥，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逐漸和奴隶一样仇視奴隶制度，这就不足为奇了。他們都知道奴隶制度存在一天，所有改善他們的地位的道路就被堵塞一天。因此自由黑人一再积极参加奴隶叛变。

在古巴，也有白人反对压迫制度。在古巴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一六〇八年的《忍耐的模范》(Espejo de Paciencia)中，诗人西耳维斯特雷·巴尔沃亚赞扬了他称之为一个“克利奥尔人”的古巴黑人士兵萨尔瓦多·戈洛蒙，并且说，甚至他的笔都无法表达：

在我的写作中，我对于一个无故  
遭到奴役和监禁的黑人有多么厚的感情<sup>19</sup>。

另外还有一些富于这种同情心的古巴白人。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尤其是这样。这个阶级的人陷于贫困，因为这个社会根据体力劳动不符合白人尊严这个恶毒的原则，把所有体力劳动都分配给黑人——奴隶和自由黑人——去做。这些古巴白人渐渐地认识到，奴隶制度一天继续存在，他们的地位就一天不能提高。我们将在以后看到，他们也将参加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sup>20</sup>。

但是古巴白人社会的上层——西班牙人和克利奥尔人——却完全决心要使奴隶制度保持完整。在其他问题上，这两个集团越来越对立，但是在维持奴隶制度问题上，他们是团结一致的。这两个集团和所有奴隶社会情形一样，是在经常害怕发生叛变中生活，并且相信只有加强镇压才能防止叛变<sup>21</sup>。

在其他方面，这两个集团的利益是处于尖锐矛盾中。

半岛人(西班牙出生的人)不是政府人员就是商人。他们有许多人在商业交易中做中间人，因为他们同塞维利亚和卡迪斯的西班牙商人有必要的关系。一般说来，半岛人都被列为商人或官员。从古巴的中央行政机关直到省和市镇的政府机关，实际上是被他们包办的<sup>22</sup>。

半岛人以他们是出生在西班牙而感到极端自豪，他们看不起所有其他社会集团，认为土生的古巴白人比他们低一等。由于他们包办了殖民地机关和政府工作，他们就使他们自己和马德里当局确信，古巴人是不能管理自己的，并且对于一般古巴人都不能赋予任何责任。从古巴回国的西班牙人散布克利奥尔人文化和智力



都很差的說法，他們說這是在美洲人種混雜的自然結果<sup>23</sup>。

隨着十八世紀古巴財富的增加，政府中的職位在西班牙人看來便成為非常好的職位。政府的高級官員有機會發財致富；甚至在古巴呆一個短時期，就一定可以帶着一筆財產和社會聲望回到西班牙。不用說，在國王面前或西班牙商人中有勢力的西班牙人便爭奪在古巴的重要職位，但是他們又聯合起來使在古巴土生的白人得不到這種職位。

西班牙在古巴的最高官員是總督。雖然在全部政策方面他聽命於西班牙政府，而且在國王不喜歡他的時候，他會被調回去，但他握有很大的自由決定的權力。在一七九〇年以前古巴雖然有過幾個寬厚的總督，但是大多數的總督都很殘暴，檢查、偵察、監禁、流放和處死成為他們的統治的特徵。

總督領導着一群較低的官員（全部是西班牙人）和指揮人數相當多的陸軍和海軍。他是這個島上唯一的政府的首腦，甚至在十九世紀市政府和省政府成立以後，他繼續控制地方單位。總督和他們的下屬常常更動，因而政府不穩定<sup>24</sup>。

到了十七世紀，島上產生了一類新的人。這一類人已經和西班牙失去一切聯繫，他們的前途只是和古巴相聯繫。他們就是克利奧爾人。他們主要地是西班牙人的後裔，一小部分人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或黑種婦女通婚所生的後裔。他們生在古巴，繼承了在島上的土地，他們成為畜牧業者和煙草或甘蔗種植者；以後，又成為律師、新聞記者、教育家或其他職業者。克利奧爾種植者從使用奴隸勞動來經營種植園和糖廠的富裕的甘蔗種植園主、依靠自己的勞動或偶而有一個黑奴的種植煙草的農民，直到住在一小塊土地上用簡單的木制壓榨機榨出甘蔗汁製成少量蔗糖的瓜希洛（guajiro）都有。

不管從事什麼職業，克利奧爾人都不願意無限期地接受次於西班牙統治和商人階級的地位。他們都抱有增進自己的利益的雄心，但是了解到古巴的發展和他們自己的利益的增進有着相互關

系，他們都认为必須对西班牙重商主义的制度进行重要改革，才能消除或者至少减少古巴經濟的落后状态。他們对增加土地庄稼的收成，发展島上的工业和同西班牙以外的其他国家通商借以扩大貿易，感到兴趣。

这样必然使他們和母国的西班牙当局以及他們在古巴的代言人和代理人——半島人——发生矛盾。很明显，根据西班牙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殖民地应当为西班牙而不是为古巴的利益服务；这个政策使古巴繼續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正因为实行了这个政策，半島人才得到了好处，維持旧的壟断办法，保证半島人能称心如意地和沒有風險地剝削这个島；除了以高利貸款給克利奥尔种植者借以取得他們的产品外，在古巴的西班牙商人还成为种植者出售产品和购买必需品的中間人。西班牙商人当然反对和准备以必需品交換种植者的产品的外国商人进行直接貿易。难怪在“开明专制”时期，他們对于古巴貿易关系的逐渐改变表現忌妒，并且对馬德里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它恢复过去的壟断制度<sup>25</sup>。

虽然甘蔗种植者和烟草种植者不同，在这一整个时期曾經得到西班牙政府各种帮助，但是他們却沒有得到他們最希望的事情：开放古巴港口，允許自由貿易和自由輸入奴隶。而且，和烟草种植者一样，他們也受到对消费品征稅的损害：对必需品的每一个阶段——从原料一直到制成品——都征稅。經濟方面的另一种負担是官員普遍貪污；有时，强迫征稅純粹是为了勒索賄賂。当馬德里政府期望古巴人和它自己完全一致时，这些半島人——西班牙政府在古巴的代理人——的行徑却专横自私，因此必然引起在古巴出生和成长者的反对。

克利奥尔人认为他們自己是財富的生产者，半島人要靠这些財富生存并且把这些財富輸出到西班牙去。克利奥尔人不久就把半島人看作是寄生虫。他們在要求减少对商业的限制和对古巴經濟发展的其他束縛外，还要求在古巴的政府里有和他們的社会和經濟地位相称的发言权。直到十八世紀的最后十年，古巴人的民

族觉悟才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我們所研究的这些世纪的文学中已经反映了人们对于作为一个克利奥尔人所感到的自豪正在产生，以及古巴人和半島人之间的利益冲突<sup>①</sup>。

人們从上述西耳維斯特雷·巴尔沃亚所写的詩集《忍耐的模范》中一六〇八年的那一首詩看到了这种情况。这首詩是对一个被西班牙壟断办法所迫而进行走私活动的社会的十分生动的描繪。另外一个住在太子港附近的詩人佩德罗·德拉托雷·西丰特斯上尉在称赞巴尔沃亚关心古巴的需要而不是关心西班牙人的需要的时候写道：

从我的手里接到，善良的巴尔沃亚  
这首来自这个国度的短詩，  
为此表示我的敬意<sup>26</sup>。

一七三三年在古巴出现了有記載的第一部由古巴作者写的戏剧——哈瓦那上尉唐圣蒂亚哥·德皮塔的《花匠王子和假的克洛里达諾》(El Principe Jardinero y Fingido Cloridano)。这部戏剧虽然和欧洲人的同期作品比起来有些缺点，但是它是当地文化发生的证据<sup>27</sup>。哈瓦那当地人何塞·馬丁·費利克斯所写和在一七六一年出版的《新世界的鎖钥，哈瓦那記述：关于它的基础、发展和情况的消息》(Key of the New World, Havana Described: News of its Foundations, Growth and Condition)一书，表示了作者以自己是一个克利奥尔人而感到的自豪和对于在島上出生的人在政府中沒有担任行政职务所感到的悲哀。他一再用克利奥尔人这一名詞来指在古巴土生的白人以区别于西班牙人，也是古巴民族觉悟开始的象征<sup>28</sup>。

毫無疑問，如果有出版自由的話，許多古巴人的根本不滿会在

---

① 不管这些作品的文学质量如何，人們必須一反某些权威者的意見，把它們看作是古巴文学的开始。关于古巴文学“从十九世紀才开始”的意見，請參閱韦利斯·弗萊彻·約翰遜(Willis Fletcher Johnson):《古巴史》(The History of Cuba), 紐約1920年版, 第2卷, 第255頁。

文学作品中有更多的具体反映。但是，在当时，只有得到总督批准的作品才能发表<sup>29</sup>。违抗西班牙严格的检查制度就意味着要受到即刻审讯和被关在莫罗城堡的地牢里。但是，西班牙对表现自由的限制，仍然不能完全阻止把他們所认为的“颠覆”文学作品偷偷运进古巴。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伏尔泰、卢梭、特别是托马斯·潘恩等的作品的译文曾经在古巴流传，甚至秘密地或合法地到了受过较好教育的克利奥尔人的藏书室里<sup>30</sup>。有些古巴人和北美政治领袖通信，因而知道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对英国政策有些不满，和古巴人开始反对的政策正相同<sup>31</sup>。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无代表，不纳税”的不平之鸣，是否也适用于古巴呢？还有，北美殖民地人民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宣布他們的表示反抗的独立宣言不是也不只是为了他們自己，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民的嗎？

当北美殖民地人民在他們的独立宣言中宣布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每一个民族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和宣布各国政府的权力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时候，古巴的克利奥尔人就开始考虑：在哪一方面古巴和其他的人不同呢？当然，他們很快地放棄了认为这些原则既适用于古巴的黑人，也同样适用于白人的想法——在知道当北美独立宣言主张自由和平等而殖民者控制着六十万个黑奴的时候，得出这个结论便更容易了。

美国独立战争的教训并不是沒有对心怀不满的古巴殖民地人民发生影响。最初，古巴人民的消息是偶然从来自新成立的北美合众国的私掠船得到的，并且得到很慢。但是在一七七六年十一月五日国王颁布允许北美船只与古巴通商的命令以后，尤其是在一七七九年西班牙参加战争和远征军离开哈瓦那前往帮助北美叛变者以后，关于美国战争发展的消息经常到达古巴的港口。

西班牙殖民当局，正确地了解到新共和国对他們自己在美洲的屬地的影响，千方百计地——甚至在卷入对英国的战争以后——把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說成是一小撮貪心的人为了他們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但是这种宣传不能对古

巴人民隱瞞这一事实：十三个沒有很大的財富和力量的殖民地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得到成功。一七八三年年底，尽管西班牙实行新聞檢查，古巴人民还是知道北方的新國家已經獲得了獨立。英國對它在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統治已經告終。殖民地人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國家是可能的<sup>32</sup>。

六年以後，又傳來了法國革命的驚人消息。一七八九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sup>①</sup>，和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宣言一樣宣布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一個國家的主權必須屬於它的人民；以及人民在受到壓迫時有權反抗。這個宣言對古巴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正如在整個拉丁美洲一樣<sup>33</sup>。

有些古巴人最初從托馬斯·潘恩所著《人權》这本小冊子中知道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內容。这本維護法國革命的輝煌著作載有這個宣言的全文，有時有人說這個宣言是出於潘恩的手筆。这本书被譯成西班牙文，並且秘密地在古巴發行<sup>34</sup>。它所提出的主張成立民主共和國的理由，對比較開明的克利奧爾人起了深刻的影響。但是許多古巴人特別感到興趣的却是潘恩關於“被奴役的西班牙人”的提法，以及他的“南美洲脫離西班牙而獨立和像北美現在的情形一樣，開放這些幅員廣大和有無窮財富的南美洲國家同全世界進行貿易”的主張<sup>35</sup>。

若干年來，在西班牙的統治下，古巴人一直都是很難駕馭的。有時像巴亞梅塞走私者事件、烟草種植者的暴動和反對皇家貿易公司的請願，這種不滿情緒已表現為具體行動。這些事件在散播未來暴動的種子方面雖然很重要，但是它們只反對經濟限制。到了一七九〇年，不斷積累的經驗，以及外國革命事件的刺激，擴大了早期反抗運動的範圍，在解除經濟上的限制的要求之外又加上了關於政治權利和人權的要求——當然，只限於白人。在以後幾十年中，我們看到這些觀念中有些是付之實施了。

---

① 按原文應譯為《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舊譯《人權宣言》。——譯者

## 第四章

# 大觉醒时期

(1790—1808年)

在一七九〇年，古巴出现了四个杰出人物：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科·德阿兰戈-帕雷尼奥、医学家和科学家托马斯·罗梅博士、古巴第一个著名哲学家何塞·阿古斯丁·卡瓦列罗和抒情诗人曼努埃尔·德塞基拉。他们是古巴历史上最早具有真正意义的突出人物。随着他们的出现，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开始了古巴大觉醒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极其注意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改革；科学发明；把现代哲学思潮输入古巴岛；扩大教育和把科学课程如实用物理学、植物学和农业研究列入古巴教育之内。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古巴的利益发展古巴，而不是为了西班牙。这些人所专心注意的是古巴的利益，古巴的前途，古巴的美丽国土<sup>①</sup>，古巴的思想。

① 在曼努埃尔·德塞基拉的诗中，不止一次地歌颂了古巴的美丽国土。在给菠蘿的诗中，他写道：

“在甜蜜的菠蘿酒中，  
造物主庄严地形成的  
一切才能，一切快乐  
都结合为一。

.....

保持你的光辉，使你成为  
我们国家的伟大人物。”

另一个诗人，曼努埃尔·胡斯托·德鲁巴耳卡瓦在圣地亚哥写了一首诗，称颂古巴的水果优美多汁，超过欧洲最好的水果。（何塞·安东尼奥·波图翁多（José Antonio Portuondo）：《古巴文学史大纲》（Bosquejo Histórico de las Letras Cubanas），哈瓦那1960年版，第14—15页。）

在德阿兰戈和他的同伴們的影响下，以及路易斯·德拉斯卡薩斯总督的合作下，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根据国王的命令，在哈瓦那成立了許多重要組織；路易斯·德拉斯卡薩斯在一七九〇年被任命为古巴总督，他是一个認識風向变化的人并知道适应于这种变化是最明智的政策。这些組織是：国家之友經濟学会（La Sociedad Económica de Amigos del Pais）、以后改名为促进委员会（Junta de Fomento）的皇家爱国-經濟学会（Real Sociedad Patriótica o Económica）和皇家农工商諮詢局（Real Consulado de Agricultura, Industria y Comercio）。它們立即执行发展这个島的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計劃。这些組織都是半政治性的，以諮詢組織身分政府服务；促进委员会甚至有时作为行政机构为政府服务<sup>1</sup>。

經濟学会在一七九三年成立，它首先注意弥补古巴生活中最大的一个缺陷——几乎完全沒有公共教育。經過三个世紀西班牙統治以后，古巴只有几所古巴人的子女能够就学的学校，而且这些学校都是私人开办的<sup>①</sup>。为了发展教育事业，經濟学会奖励开办学校；为它們的調查进行安排；搜集統計資料；并且創辦了一家报纸。这家报纸的利潤都用于教育事业。

以后，經濟学会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經費，作为办理普通教育之用，并且被授权和哈瓦那主教磋商筹集教育經費的最好方法。不过，經濟学会不久发现政府和教会实际上都不贊成这种計劃，并且也不准許实施普遍教育。因此，經濟学会不得不創辦自己的免費学校，成立了男校和女校各一所。此外，它还鼓励私人开办文艺学校。因此，古巴儿童所能受到的教育在不小程度

---

① 古巴第一所公立学校是一七八八年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种教士費尔南多·德阿耶貝創辦的。这是在西班牙开始殖民后二百七十七年。这一件事本身表明着西班牙殖民政策眼光狹隘。事实上，西班牙創办公立小学以前，已經在一七二八年根据国王命令在古巴設立了一所大学——哈瓦那大学。不过这是一个修道院，直到一八四一年它才把教育和宗教分开。

上是由于经济学会的不断努力<sup>2</sup>。

古巴在一七九〇年有了它的第一家报纸——《时代报》(Papel Periódico)。这是一个周刊,在一七九三年经济学会接办以后改为半周刊,一八一〇年又改为日报。这家报纸把赚来的钱用于建立一所图书馆。当人们考虑到西班牙一七七四年反对在它的殖民地开办印刷厂以及在一七九〇年以前古巴只有一个总督的印刷厂的时候<sup>3</sup>,这种发展是极端重要的。的确,对报纸发表的每一则消息都继续进行严格检查,因而限制了它作为表达古巴人民的愿望的工具的作用。

除了出版《时代报》(该报五个编辑之一是德阿兰戈-帕雷尼奥)以外,经济学会还鼓励它的会员研究古巴的历史。这一工作的结果是经济学会出版了一系列的《回忆录》<sup>4</sup>。经济学会也创办了一所公共图书馆(这是古巴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在许多年中也是唯一的一所),它促进了为着古巴的发展而进行的文学和科学研究工作<sup>5</sup>。

古巴日益发展的知识界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柱是圣卡洛斯-圣安布罗西奥皇家神学院(Real Colegio Seminario de San Carlos y San Ambrosio)。它是一七七三年在哈瓦那成立的。到了一七九〇年,它不仅是一个重要教会中心,它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古巴。该学院的教师,如分别担任哲学和神学讲座的贝尔纳多·德奥加瓦恩和何塞·卡瓦列罗影响当时的思想并且训练出一批古巴领袖,这些领袖将在下一代崭露头角<sup>6</sup>。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之初的大觉醒时期才开始时,古巴人的注意力就被离开古巴海岸几百英里的半属于法国和半属于西班牙的海地岛上发生的情况所吸引。一七九一年八月,海地岛的法国统治部分发生了奴隶叛变,接着又发生了历时十几年的全岛流血战争。一七九三年六月,当叛变的奴隶占领了首府的时候,法国统治部分的白人就跟着法国舰队逃走。以后就是西班牙统治部分的西班牙人和牙买加的英国人入侵和占领全岛,这些英国人对于离开



他們的屬地这样近的地方被黑人控制感到害怕。一七九四年末，在过去的奴隶杜桑·卢維杜尔领导下黑人把西班牙人赶出了海地。四年以后，英国人军队由于热病流行，以致削弱，因而撤退。杜桑·卢維杜尔統治全島，一八〇一年七月一日，卢維杜尔頒布宪法，正式廢除奴隶制度；他虽然承认法国在海地島的主权，但宣布海地独立，不受任何外国的干涉。

收复海地的法国統治部分和重新建立白人的优越地位，在拿破侖的殖民計劃中居于第一位。一八〇一年，拿破侖派遣了一支法国精銳军队，由他的妹夫維克托·勒克累率領，前往恢复法国的統治。卢維杜尔被驅坐船到法国去談判解决办法。法国人背信棄义地抓住了他，并且把他监禁起来。虽然卢維杜尔死在監獄里，但是他的精神在叛变的海地島依然很有力量。当一八〇二年拿破侖企图恢复奴隶制度的时候，又普遍发生了叛变。欧洲军队由于患黄热病本来已經死亡很多，黑人又使他們遭受惨重的損失。一八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拿破侖派到海外去的四万三千人，只剩下八千人，他們都向黑人投降了。两年以后，海地黑人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是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这些事件在許多方面对古巴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一)在一七九一年叛变以前，对法国來說，海地比法国所有其他殖民地合起来都更有价值。海地是生产咖啡、棉花、烟草、靛青，尤其是糖的重要产地。到了一七四二年，单是海地島的法国統治部分所生产的糖就超过了英屬西印度群島全部地区合起来的产量<sup>7</sup>，不久，海地就成为世界上的主要产糖地方。但是奴隶叛变和继之发生的流血战争破坏了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使海地的糖业和咖啡工业破产。古巴种植这两种东西本来数量已經相当可观，現在开始对世界市場供应不能再从海地得到的糖。从这一时期以后，古巴的糖产大大扩大，年产量从一七九〇年的一万四千吨增加到一八〇五年的三万四千吨<sup>8</sup>。

(二)从一七九五年到一八〇五年，海地的白人种植园主(很多

人带着他們的奴隶)涌入古巴。在这一时期结束时,这一批涌入古巴的人总数整整有三万。他們主要定居在古巴的东部,并且在那里栽植咖啡。咖啡在古巴迅速成为一种重要实业并且成为殖民地商业的一个重要部分<sup>9</sup>。海地迁来的白人种植园主和他們的奴隶給古巴島这一部分的很多地方取了法国名字,法国語言和風俗习惯也普遍起来。

(三)从海地来的白种移民給古巴带来了关于黑人革命的恐怖傳説,因而增加了古巴白人对于在古巴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恐惧<sup>10</sup>。这种恐惧不是純粹出于推测。海地的发展已經在古巴的黑人内部引起了激动,虽然有一个历史学家不正确的說,在这个时期,“古巴的黑人似乎特別馴服……”<sup>11</sup> 奴隶暴动是一七九二年和一七九三年在哈瓦那、太子港和特里尼达德附近的甘蔗种植园发生的。这些暴动都被鎮压下去。一七九五年自由黑人尼古拉斯·莫拉萊斯領導暴动,这次暴动是在巴亚莫开始的,但是迅速地蔓延到古巴島整个东部地区。除去它的规模外,这次暴动特別使奴隶主感到不安的是白人和黑人在叛变中联合在一起,像在海地革命中一样,要求黑人与白人一律平等。他們还要求廢除各种使穷人感到沉重負担的捐稅以及把土地分配給貧苦的白人和黑人<sup>12</sup>。

黑人尼古拉斯·莫拉萊斯領導的暴动被德拉斯卡薩斯总督率領的两班牙军队鎮压下去。接着在一年以后,又在博卡-尼基阿甘蔗种植园发生暴动,这次暴动也被鎮压下去。西班牙国王得到报告謂参加这次暴动的黑人都被处死了,这个报告向国王說:“对参加这次暴动的黑人的处罰和对这批作坏事的人的警戒,足以使公众心定神安”<sup>13</sup>。

但是奴隶主并没有放下心来。由于害怕奴隶叛变,他們对奴隶的虐待变本加厉,借以使奴隶經常处于恐怖之中。他們采取了更严厉的手段来对待难駕馭的和逃跑的奴隶。工作負担加重,吃不饱和过分的懲罰,这些結合起来的結果是奴隶的死亡率提高。奴隶主对这种情况毫不介意。由于古巴蔗糖生产增加一倍,以后

又增加两倍，在以前几乎没有人听到过的咖啡和棉花的种植也蓬勃发展，古巴奴隶主可以用他们不断增加的利润来补充在越来越恶劣的条件下死亡的奴隶<sup>14</sup>。

在海地生产下降的时候，古巴的农业经济繁荣发达。在促进古巴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参加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成立的三个组织（特别是经济学会）的人起了积极作用。他们都是富有的克利奥尔人，主要地属于地主（种植园主）阶级，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和少数西班牙人。他们希望促进古巴的繁荣，特别希望它成为一个产糖中心。一七九一年夏天，当海地奴隶大叛变的消息传到古巴的时候，这些人认为这是古巴以海地为牺牲而得到繁荣的宝贵机会。但是他们相信，如果不能摆脱西班牙的专横统治，古巴是不能利用这个机会的。

弗朗西斯科·德阿兰戈-帕雷尼奥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古巴必须立刻利用海地衰落的机会。德阿兰戈作为古巴经济界代表，在一七九一年坐船到马德里，他的目的是要求延长在一七八九年所作的让步，允许一切国家的船只从事奴隶贸易，为期二年。德阿兰戈在马德里的时候，得到了海地奴隶叛变的消息，他并不认为这个消息威胁到古巴，因为那时古巴的奴隶还比较少。固然，在两年的自由贸易期间，大约有两万个奴隶被运进了古巴。但是由于在一七九一年，古巴每二十三个居民中只有一个奴隶，德阿兰戈感到，古巴和海地的法国统治部分不同（这一部分在一七九〇年有三万二千个白种居民；二万四千个自由人和四十八万个奴隶），古巴可以有更多的奴隶而不致发生危险<sup>①</sup>。从海地来的白种

<sup>①</sup> 根据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二年的人口调查报告，古巴的人口总计为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人，其中有九万六千四百四十个白人、三万一千八百四十七个自由黑人和四万四千三百三十三名奴隶。由于古巴岛的陆地面积约为四万四千平方哩，每一平方哩只有一个奴隶，德阿兰戈认为，和海地一万一千平方哩土地有四十五万二千个奴隶或巴巴多斯一百六十六平方哩土地有六万二千一百一十五个奴隶对比起来，古巴的奴隶集中程度很低。（拉米罗·格拉（Ramiro Guerra）：《糖和人口》（Azúcar y Población），哈瓦那1928年版，第71页。）

移民可以进一步减少这种危险<sup>15</sup>。

在一七九二年給西班牙国王的一份奏章〔题为《論农业和发展农业的方法》(Discurso sobre la Agricultura y Los medios de Fomentarla)]中,德阿兰戈规划了古巴的經濟前途,分析了西班牙殖民制度的缺点,并且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德阿兰戈以促进古巴經濟利益为名,要求采取更大規模的自由貿易措施(特别是在奴隶貿易方面)和从美国免税进口炼糖机器。他的这些請求是以下述預測为根据:由于海地遭到灾难,热带产品价格上漲,将使古巴像墨西哥或秘魯一样富有,并成为西班牙国王的一个同样重要財源。他还預言,如果实行这些改革,古巴会成为白种小土地所有者一个繁荣的地方,白种小土地所有者的人数将大大超过黑人。因此輸入更多的黑人在古巴实际上不会有海地的可怖事件重演的危险<sup>16</sup>。

德阿兰戈曾經在古巴担任政府工作四十年,他亲眼看到后两种預言成为画餅。古巴并没有成为人数大大超过黑奴的白种小土地所有者繁荣的地方,而是成为大种植园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深怕古巴会成为一个新海地的恐惧,像幽灵一样經常使奴隶主感到苦恼。但是,在一七九二年,西班牙国王和他的大臣从德阿兰戈的建議中只看到无限收入的无穷希望。他們知道,尽管糖是古巴重新繁荣的基础,但增加糖的生产必需增加奴隶,砍蔗、搬运、榨糖、澄清、过滤、蒸发和結晶这一套工序需要很多人互相配合劳动。糖意味着大量廉价劳动;糖意味着可怕的奴隶貿易和奴隶制度;糖也意味着西班牙奴隶販子以及建造装运奴隶船只和制造大炮、鏈条、供购买黑色“包裹”<sup>①</sup>之用的棉織品和小裝飾品的西班牙工业城市大发橫財。

因此,西班牙人和古巴生产者都看出海地的困难所提供的机会。他們的压力使西班牙国王同意德阿兰戈的意見。但是也要考虑到伊比利亚半島的商人,他們反对任何可能削弱他們和西班牙

① 指奴隶。——譯者

殖民地貿易的壟斷的措施。結果是妥協。

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王命令延長自由奴隸貿易六年，降低了對古巴某幾種進口貨物的關稅；並且准許從美國免稅進口煉糖機器，不過這種機器必須用西班牙船隻裝運<sup>17</sup>。但是德阿蘭戈關於和所有國家貿易的要求是被拒絕了。西班牙堅持它的嚴格的壟斷制度；和它的殖民地進行合法貿易，即使得到允許的話，也仍然受到命令的擺布。這些命令，像我們將要看到的，是隨馬德里當局一時的念頭改變的。

但是，法國革命所引起的一系列戰爭，部分地幫助實現了單靠德阿蘭戈的主張不能實現的事情<sup>18</sup>。一七九三年，西班牙和君主的國家聯合起來反對共和政體的蘭西。這個步驟立刻使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之間的貿易中斷。法國的私掠船很快地就破壞了西班牙的海上貿易，西班牙的海外帝國只得靠自己想辦法。糧食缺乏是特別迫切的問題，即使是在平時，西屬西印度群島的面粉也大部分購自帝國以外，主要是購自美國。現在由於法國的私掠船在活動，西班牙根本不可能再供給了。

供應不足的現象迫使古巴政府當局修改西班牙的壟斷政策，甚至沒有和母國政府商量。一七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總督德拉斯卡薩斯開放了古巴的港口，允許從美國進口衣服。儘管伊比利亞半島商人反對，在戰爭的壓力下，西班牙政府不僅被迫在一七九三年六月批准了這種辦法，並且在同時把這種讓步擴大到包括食品。這次許可並不構成自由貿易制度。這毋寧是建立一種制度，授權西班牙駐在美國的外交和領事代表簽發執照或許可證，准許運送食物到古巴<sup>19</sup>。

這種讓步，照例又遭到伊比利亞半島商人的反對；由於他們的壓力，一七九四年規定這一命令的一部分停止執行。但是在古巴的西班牙官員根本就拒絕執行這個命令<sup>20</sup>。

以後，在一七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西班牙和戰勝的蘭西共和國簽訂了巴塞爾條約。在和平和正常情況恢復以後，西班牙政

府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下令禁止古巴港口和美国进行貿易。一七九六年六月十二日，西班牙駐美国的外交代表向美国报界发表了一个通告，宣布完全停止美国和古巴的貿易往来，并且声明現有的許可证不再有效<sup>21</sup>。

古巴和美国进行合法貿易的时期結束了，但是为时不久，因为西班牙享受和平的时期很短。在一七九六年八月，由于簽訂巴塞爾条約后的外交活动，西班牙成为法国的盟国。这就意味着和英国交战。西班牙在一七九六年十月六日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如果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之初在加勒比海的法国私掠船对西班牙是一个問題的話，英国的海軍便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西班牙和它的海外帝国之間的来往被切断了。依靠进口食物和各种百貨用品的古巴很快地遭到了严重困难<sup>22</sup>。西班牙企图用授予特許权所有人貿易壟断权的办法来提供古巴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母国和它的殖民地的生命綫已經被切断，这种努力失敗了<sup>23</sup>。結果是在一七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頒布国王命令，允許西班牙帝国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沿岸的港口根据暂时和紧急办法同中立国家进行貿易。它允許中立国家的船只載运食物、木材、船舶用品、制造品和奴隶开进这些港口，和运出殖民地的产品——糖、咖啡、烟草、靛青、可可和大米。

美国是中立国家中的主要海上国家。它是从这个国王命令得到好处最大的国家。美国商人由于地理位置而能迅速行动，他們从新制度里立即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古巴在这些貿易交往中是一个主要中心，因为战时情况所造成的食物繼續缺乏的現象鼓励了这种交易。古巴向美国出售糖、糖蜜、甜酒、咖啡、可可、靛青、烟草和雪茄，而向美国购买面粉和其他食物，以及酒、木料、铁、鞋、帽、未制成衣着的紡織品和家具。西班牙不得不允許美国船只把古巴的这些出口貨运到欧洲去和把欧洲和美国的貨物运到古巴来。虽然西班牙对这种貿易征稅很重，但是，由于战时物資缺乏和古巴生产品不断增加的刺激，这种貿易仍然繁荣活跃起来。一七九八年

古巴和美国的貿易的数量竟超过了古巴和西班牙的貿易数量<sup>24</sup>！

当然，从自由貿易得到很大好处的古巴种植园主和本地商人希望自由貿易会继续下去，于是古巴种植园主向西班牙发出一連串呼吁，請求母国允許在战争非常时期結束以后继续自由貿易<sup>25</sup>。但是古巴种植园主的努力不起作用，而伊比利亚半島的商人則更接近馬德里政府，这些人自然是反对实行这种使他們失去利潤丰厚的壟断权的新貿易制度。伊比利亚半島貿易集团还得到西班牙的盟国——法国政府的支持。法国在当时正和美国进行不宜而战的激烈战争。因此，在一七九九年四月十八日馬德里頒布一項国王命令，取消一七九七年的命令，并且禁止美洲西班牙帝国的大西洋沿岸港口和中立国家进行貿易<sup>26</sup>。

这个新命令减少了美国和古巴的合法貿易，但是没有使这种貿易停止。古巴总督在居民日益强烈的反对下，向西班牙政府报告說他无法执行取消一七九七年命令的命令。尽管伊比利亚半島商人反对，殖民地当局仍然利用他們的紧急和自由决定的权力，继续允許美国船只开到古巴港口。他們告訴西班牙政府，缺乏食物，使他們必須允許美国船开来，此外沒有别的办法<sup>27</sup>。

但是，随着一八〇一年欧洲和平实现，伊比利亚半島的商人终于能够如願以偿，古巴当局被命令关闭港口，完全不許美国船只进来<sup>①</sup>。以后，美国船只甚至只装压舱貨开来，以便运走美国的貨物也不被准許，有几个这样做的船长遭到监禁（甚至在圣地亚哥作为未获承认的美国領事約西亚·布累克利也被当作走私商人监禁起来）。古巴总督对于一切不滿意見只是回答說：“和美国的貿易从来沒有开放过，只是被容忍而已。”<sup>28</sup> 从一八〇一年到一八〇三年，由古巴开到費拉德尔非亚的船只由九十八艘减少到二十艘<sup>29</sup>！

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随着一八〇三年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重新爆发（西班牙作为法国的盟国在一年以后参加这次战争），

---

① 但是允許外国面粉运到古巴，以解决这个島的极大需要。不过从美国进口面粉的专有利权被交給莫波克斯德哈魯科的伯爵。

西班牙殖民地又正式开放,可以和中立国家进行貿易<sup>30①</sup>。由于和英国开战,所有用西班牙船只进行的貿易中断,古巴就依靠美国船只运进各种供应品和出售它自己的产品。一八〇五年一月(即新命令頒布后一个月),从美国开来的船只又恢复到很多,經營古巴的貿易。单是在一八〇五年十月中的一天,就有六十艘美国船停泊在哈瓦那港,在以后两年內由美国开来的船只繼續增加。根据費拉德尔非亚海关記錄,一八〇七年从古巴开来的船有一百三十八艘,有一百一十五艘办好古巴出港手續<sup>31</sup>。

这种增加趋势一直繼續到一八〇八年拿破侖入侵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于是又与英国結成同盟,并把古巴港口向英国商人开放,而这些英国商人比美国商人更受到优待。因此在一八〇八年到一八〇九年古巴和美国的貿易減少了。这次減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通过了杰斐逊的禁运法,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为避免美国卷入英国和法国的战争。这个法律完全禁止对外貿易<sup>②</sup>。

从古巴在一七九二年到一八〇八年欧洲战争期間的經驗中可以得出两个結論。第一个結論是在海地的糖和咖啡的生产实际上停止的时候,对糖和咖啡的需求不断增加,因而使古巴的生产大大地扩大。这些年确是克利奥尔地主的兴旺年头。一七七五年,古巴

① 在这种让步下根据典型的西班牙方式,发給中立国家和殖民地港口貿易的許可证的权利被給予宫廷的寵信人物和一些別的人,他們通常經過轉手人,把許可证出售給准备出价最高的人。

②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禁运法在西印度群島的效力有限,因为在这一整个时期这个法律一般遭到破坏。但是問題并不那么簡單。首先,美国禁止出口,使古巴的西班牙当局可以降低对其他国家进口貨的关税,提高对来自美国的船只和貨物的歧视性稅率。这样一来,英国便成为和古巴进行貿易最多的国家。其次,由于从一八〇八年一月一日到二月七日,有一百多艘船只(大多数是美国船只)开进了哈瓦那港,古巴在杰斐逊的禁运法生效的时候,已經囤积了許多美国运来的食品。当禁运的消息傳到古巴的时候,古巴总督禁止船只不載貨而离开,强迫它們裝滿古巴的产品。到一八〇八年夏季中,很显然,古巴并未受到禁运的严重影响。〔1808年2月7日安德逊(Anderson)致麦迪逊(Madison)函;1808年7月24日,11月18,20日,12月15日格雷(Gray)給麦迪逊函,載《領事书信集》,哈瓦那,第1卷,存国家档案局。〕



生产了大约四千七百吨的糖；到了一七九〇年，它的产量增加到一万四千吨。在以后的十年，产量增加一倍以上；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〇五年，平均年产量达三万四千吨。在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价格也上升了。在一七九〇年，糖的售价是二到四里尔<sup>①</sup>，随质量而不同，以后暴涨到二十八到三十里尔<sup>32</sup>。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有势力的、富有的甘蔗种植园主阶级，他们依靠为数日多的奴隶所创造的财富，过着奢侈的生活。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蔗糖生产，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蔗糖生产。

古巴本来是可以种植足够的小麦和大米来供给它的人民食用的，但是地主们宁愿种植利润更大的甘蔗和咖啡。集中力量于种植这些热带作物必然引起食品进口增加，由于欧洲的战争断绝了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交通，这种情况使古巴在经济上和美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些年时断时续的交往中，随着古巴越来越致力于糖和咖啡的生产，美国成为古巴所需要的大多数物资的来源地。古巴从美国进口粮食和其他食品，虽然在理论上是一种暂时必要，但是却成为古巴经济中一个经久不变的因素，因而使古巴经济依赖美国。

第二个结论是：尽管母国政府在古巴发展的道路上造成了障碍，但是古巴还是日益繁荣。当然，马德里政府对古巴的蔗糖和咖啡生产者作了几种重要的经济上的让步，尤其是允许无限期地输入奴隶的权利，这是事实；西班牙被迫向中立国家船只开放古巴岛也是事实，但是，它这样做都是出于不得已，并且在这一时期拒绝给予这种贸易以永久不变的地位。此外，这种贸易是在受到横征暴敛，一再遭到海盗抢劫，甚至从事贸易的人有时被监禁等障碍下进行的。西班牙政府的垄断思想仍这样浓厚，而且又如此害怕它对古巴岛的绝对控制的削弱，以致连允许外国领事或商务代表驻在古巴也不愿意。

---

<sup>①</sup> 西班牙及其领地所通用的小银币。——译者

但是,尽管有海盜、很高的關稅和西班牙官方的種種侮辱行為,古巴和美國的貿易仍然很發達繁盛,並且使從和美國的貿易中獲得好處的古巴人的生活發生很大變化。一個美國駐哈瓦那的臨時代表喬治·摩頓在一八〇一年寫道:“這個殖民地開放和美國貿易的幾年中,它的財富和重要性增長到極其驚人的程度,在工業的習性、對商業的知識、一般文明和生活享受方面……。”<sup>33</sup>

這個殖民地的繁榮——如果不是它的“一般文明”——一個徵兆就是奴隸從非洲源源而來,奴隸的勞動使種植園主享受“舒適生活”。從一七九一年到一八〇五年,單單經由哈瓦那到古巴來的奴隸就有九萬一千二百一十一人。請把這個數字和一七六四年到一七九〇年有奴隸三萬三千四百〇九人來到古巴比較一下吧<sup>34</sup>!

新興的有勢力的古巴種植園主階級,雖然樂意享受“舒適生活”,他們不是愚蠢而看不出這一事實:西班牙政府是在戰時緊急情況下被迫允許和中立國家(主要是美國)進行貿易的。他們對這件事有實事求是的認識,知道這是一種有限度的和暫時的讓步,一有機會便會取消。他們在古巴未來發展的光明前途之外,還看到西班牙專橫的宮廷和它的寵臣始終隱約存在的陰影,他們把自己利益永遠放在第一位。一個了解古巴對自由貿易的需要並且敢於不服從馬德里的命令(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和十九世紀初這種情況很普遍)的總督所開創的事業,在這些人被另一種不同的官員所代替時,就可能被破壞。這就使制定長期發展計劃幾乎不可能,尤其在當時盛行的產糖方法,大種植園需要大量投資和充分廉價勞動力的情況下。

而且,克利奧爾人深知,西班牙人反對和美國進行自由貿易是出於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考慮。在西班牙看來,與鄰近的北美共和國關係太密切,只會煽動古巴地主對於在管理他們自己方面沒有發言權的越來越多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隨着他們在古巴的財富和經濟地位增加而加劇。正如羅伊·尼科耳斯教授所指出的:“(西班牙政府)害怕成立共和國的想法太厲害,因而不肯給予任何

永久的特权。”<sup>35</sup> 继续和美国人接触会助长要求共和政体和独立的火焰，从而威胁西班牙今后的主权。

虽然，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因素，从一七九〇年到一八〇八年，克利奥尔人和半岛人之间的分裂更加发展，但是这不一定就意味着所有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古巴人都赞成改变现状。古巴人虽然受到天然反对西班牙压迫暴政的影响，但他们受到作为古巴繁荣的关键的奴隶制度的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的影响更大。随着在大种植园条件下，对甘蔗种植园奴隶的剥削更加残酷，害怕发生奴隶暴动成功的情绪也增长起来。

还有，奴隶从非洲源源而来，几乎继续不断威胁白人在人数上的优势。一八〇四年，印度群岛会议，由于想起海地事件，提出警告反对无限制地输入奴隶。贪求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的利润的人虽然对这种劝告置之不理，但是他们对记住海地事件的警告却没有置之不理。从这个法国岛上逃来的白人所强调的海地革命的一个教训，对于使部分克利奥尔人不参加任何改变现状的运动是一个有力的因素。来自海地的亡命者反复说甚至讨论增加岛上的白人政治自由问题也是危险的。他们在海地得到的经验表明，黑人也会要求自由，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会采取实际行动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们指出，在海地的法国统治部分的白种植园主在法国国王控制下长期抱着反抗态度，他们利用法国革命所提供的机会，要求自由（只限于白人）。这样就立刻引起自由黑人要求平等（只限于自由黑人）。一七九一年八月，一向外表上迟钝的大批黑奴开始骚动，要求摆脱奴隶制度和在海地社会中享有和他们人口相称的地位<sup>36</sup>。最后结果是成立了黑人共和国，把白人驱逐出去。

海地的移民所提出的问题在未来许多年内为古巴的自由主义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有许多克利奥尔人不论是否属于种植园主集团，都对黑人叛变的可能感到十分害怕，他们几乎不敢谈白人的政治自由问题。这条线究竟应该划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在奴隶的问题上宽大，就有被说成是要威胁国家安宁和经济的煽动分子

的危險。因此，對於改變現狀的要求，“記住海地”就是保守的古巴人一成不變的回答。在海地革命後六十多年內，在古巴沒有一篇維護現狀的文章忽視這個口號<sup>37</sup>。在這半個世紀里，像我們將要看到的，西班牙利用這些恐懼情緒極其有效地來確保它對這個殖民地的繼續統治。

這一派克利奧爾人由於害怕任何改變會加速海地事件的重演，願意繼續處於在西班牙壓迫統治之下。除去他們以外，大多數古巴人都一致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要求改變當前情況的古巴自由主義教育家們和作家們所傳播的大覺醒原則此時已非常根深蒂固。而且，戰爭年代使這些古巴人認識到，當他們和西班牙的聯繫被切斷的時候，他們沒有西班牙也能穩步前進，並且使他們有一種自信心，加強了他們要求擺脫專橫的西班牙統治、獲得更多自由的決心。

但是克利奧爾人對於實現改變的方式和方法意見不一致。一派贊成爭取改革或自治；另一派要求歸併美國；第三派主張完全獨立。在整個十九世紀，這三種思潮在古巴并存，它們的力量對比有變化；但是，在最初階段只占少數的要求完全獨立的思想，變成了大多數人的主張<sup>38</sup>。儘管這三種主張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它們在一點上是一致的，這就是：每一種主張都是古巴人對於在西班牙統治下粗暴反動力量的抗議，而且都牽涉到政治鬥爭。不過，改良主義和獨立這兩種主張完全起源於古巴本土，而歸併主義則是一種雜交產物，是美國的勢力和古巴的勢力產生和培養的。

改良主義者希望從西班牙獲得可以促進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發展的行政上的改變；他們並不要求結束西班牙的統治，如果西班牙給予領導改革運動的有勢力的古巴地主以發展經濟的機會和在管理該島的工作中發言權，他們就會滿足了。歸併主義者却相反，他們要求結束西班牙在古巴的統治，但是他們的目的不是要把這個島變成一個獨立國家，却是要把古巴變為美國的一部分。

另外還有些人主張把古巴和哥倫比亞或墨西哥合併，不過這

种想法存在时期很短，而古巴应该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建议则是一个存在较久的想法。

主张独立的人当然代表着最激烈的思想。他们主张把古巴和西班牙的传统关系一刀两断，使古巴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和南北美洲的姊妹共和国并肩存在。改良主义者和归并主义者被黑奴所吓倒，企图通过西班牙继续统治或归并美国而维持白人对该岛的统治，要求独立的人主张古巴的黑人和白人联合起来，共同从事革命，打倒西班牙。若干年来，这种进步主张不仅使独立运动受到古巴亲西班牙分子的极端仇视，而且也使它受到改良主义者和归并主义者的仇视。

在我们所说的这三派人中，在一八〇八年以前只有改良主义者这一派很明显。这一派是由富有的克利奥尔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主组成，而以弗朗西斯科·德阿兰戈-帕雷尼奥为首。他们的纲领是通过古巴的三个主要组织发表的，这三个组织是：哈瓦那市政府、皇家农商谘询局<sup>①</sup>，当然，还有国家之友经济学会。由于这些组织的领袖是富有的在外地主，他们有充裕的条件可以离开哈瓦那到西班牙去住，在西班牙他们提出了改革运动的纲领。

这个纲领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三大部分。在经济方面，改良主义者要求马德里政府允许古巴可以完全自由地与所有国家进行贸易，尤其是和美国进行不间断的贸易的权利。这就可以保证大量蔗糖（以后甚至还有咖啡）输往美国日益发展的消费市场。

在社会方面，改良主义者要求继续实行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这两种要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继续实行奴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古巴的种植园主能否从非洲得到新奴隶来补充在种植园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亡的奴隶（输入古巴的女奴比较少，奴隶人口由于生殖而增加的数目有限）。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在有势力的蔗糖和咖啡生产者看来，改革纲领中这些关于奴隶制度的部分

---

<sup>①</sup> 按上文应为皇家农工商谘询局。——译者

和他們的自由貿易部分一樣重要。在這裡，必須記住，在這個時期，所有蔗糖和咖啡生產都是依靠奴隸的體力勞動的。

改革運動的主要政治綱領是允許古巴同化或自治，或者兩者一併實行。要求同化的意思是，西班牙不把這個島當作一個殖民地，而是把它當作西班牙的一個省；古巴應當享有伊比利亞半島各省所享有的同等權利。要求自治的意思是，這個島應該在西班牙總督監督下有一個自治議會，議會將由古巴人選舉，並且處理有關這個殖民地的生活的問題。通過這種同化和自治相結合的要求，對西班牙所要求的是把古巴當作一個省而不是一個殖民地看待，古巴享有西班牙各省所享有的一切權利，此外再加上成立自治政府的權利。這是古巴的自己的管理機構，古巴人將在西班牙總督監督下參加這個機構<sup>39</sup>。

關於改良主義的這三個基本要求，應當指出的第一點，是它們把大覺醒時期發展起來的大部分思想都包括在內了。它們的目的是促進古巴島的經濟發展，使富有的地主對於計劃古巴的前途有發言權。在改革綱領中沒有規定在人口中很快即將成為大多數的那一部分人（自由黑人和黑奴）的地位，因為在大覺醒時期的思想中這一部分人也沒有地位；在綱領中甚至沒有暗示要找到某種辦法來結束奴隸制度的罪惡的可能性。相反地，這個綱領卻希望奴隸制度在這個島上發展，並且要求採取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這個目的不用說是不符合比較貧苦的克利奧爾群眾的“真正利益”的。富有的克利奧爾奴隸主自己負起代表這個島的任務，而克利奧爾群眾仍然過於沉默，沒有反對這種要求。

但是，指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在一八〇八年以前的時期內，富有的克利奧爾改良主義者還沒有由於害怕黑人會利用他們的要求來要求自己的政府而吓得癱瘓無力。在這一方面，在這些年代里他們比以往害怕會破壞社會結構而不敢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現狀的其他克利奧爾人先進得多。但是，在拉丁美洲和古巴革命事件的影响下，這種區別很快地消失。

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改良主义的这三个基本要求(自由貿易、繼續奴隶制度和奴隶貿易、同化或自治——或两者相結合)曾經在古巴的三个主要組織的會議上加以討論。大家同意由德阿兰戈-帕雷尼奧以这三个組織的名义一遇有适当机会立即向西班牙提出。

这个机会在一八〇八年席卷西班牙政治大变动中到来。

## 第五章

# “永远忠诚的島”

(1808—1820年)

尽管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离开母国很遥远、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心怀愤怒、它的行政制度笨拙不灵和它的重商经济落伍过时；尽管英国、法国和荷兰企图破坏它对殖民地的控制，西班牙还是设法维持住对它的殖民地的控制，直到十九世纪初。在这以前的一个世纪里，殖民地曾经发生过几次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大叛变，有几次是印第安的散工和黑奴发动的，有几次是克利奥尔人发动的，克利奥尔人的斗争开始逐渐同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些运动受到一七七六年美国革命、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和一七九六年海地革命的鼓舞，无论在次数上和范围上，都扩大了；然而，这些孤立的叛变没有一次发展成为全面的解放运动。有些暴动，特别是一七二一年到一七三五年在巴拉圭、一七四九年和一七九七年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一七六五年在基多(厄瓜多尔)、一七八一年在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一七七六年和一七八一年在智利，以及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秘鲁发生的一七八〇年暴动都很残酷猛烈；但是，它们只限于一个地方，并且都被西班牙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

直到一八〇六年，由于委内瑞拉克利奥尔领袖塞瓦斯蒂安·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的努力，才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独立运动。德米兰达是加拉加斯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参加西班牙皇家军队的一个支队和英国人作战；以后，他又积极参加了法国革命，曾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里做过一个时期的将军。德米兰达



曾經尋求英國幫助實現他的本國——委內瑞拉的獨立，結果是失敗了。在美國，他的要求得到了人們同情。一八〇六年二月，他從紐約出發進行遠征解放他的本國<sup>①</sup>。這次遠征失敗了，於是德米蘭達又到英國為再度遠征進行準備。

兩年以後，西班牙的劇烈發展終於引起了西班牙美洲的革命。在歐洲各地廢黜國王和扶植國王的拿破侖，決定在西班牙扶植一個傀儡。當他的軍隊侵入西班牙和占領它的大部分土地以後，軟弱無能的查理四世讓位給他的同樣軟弱的兒子斐迪南親王。斐迪南親王繼承王位，這就是斐迪南七世。可是拿破侖強迫查理四世取消退位的決定，把查理父子兩人召到法國巴榮訥來討論王位繼承問題。一八〇八年五月六日，在拿破侖的壓力下，兩人同意放棄對西班牙王位的要求。

但是，西班牙並不因此就沒有國王了。一八〇八年六月，拿破侖把他的兄弟約瑟夫安置在西班牙的王位上。

法國皇帝的高壓手段在伊比半島引起了革命。西班牙城鄉人民都奮不顧身地投入反對這個強加於他們的“入侵國王”、維護獨立的鬥爭。西班牙人民雖然不愛戴腐化墮落的波旁王朝，但是他們只承認斐迪南七世而不承認任何別的國王。他們發誓要進行鬥爭直到把最後一個法國人趕過比利牛斯山為止。組織抵抗的地方軍事委員會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第一步是宣誓效忠斐迪南七世。以後各軍事委員會又成立了一個中央委員會，以斐迪南的名義統治沒有被法國軍隊占領的西班牙土地。這個委員會以後稱為攝政顧問委員會，行使臨時政府的職能。

這些發展促進了西班牙美洲的獨立鬥爭。一八一〇年四月九日，在加拉加斯成立的臨時軍事委員會，把西班牙的官員驅逐出

---

① 在和德米蘭達一起從紐約出發的大約二百人中，有許多是美國人。（詹姆斯·比格斯（James Biggs）：《查弗朗西斯科·德米蘭達企圖在南美洲發動革命的經過》（The History of Don Francisco Miranda's attempt to Effect a Revolution in South America），波士頓 1810 年第 2 版，第 55—57 頁。）

去，并且实行了种种社会和政治改革。一八一〇年五月布宜諾斯艾利斯也仿效了这个榜样，总督被临时军事委员会所推翻。同年七月新格拉納达(哥伦比亚)的总督在首都斯塔費德波哥大遭到同样的命运。以后不久，在基多(厄瓜多尔)、墨西哥城和圣地亚哥(智利)都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西班牙在大陆上的殖民地中，只有秘魯沒有在那一年成立军事委员会。这些临时军事委员会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斐迪南七世的权力，实际上是“变相的革命”，并且为独立鋪平了道路<sup>1</sup>。

一八一一年七月五日，委內瑞拉联合省宣布独立。解放运动的两大领袖何塞·圣馬丁和西蒙·波利瓦尔从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加拉加斯开始把西班牙从新世界驅逐出去。一八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哥伦比亚共和国宣告成立；一八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秘魯发表了脱离西班牙的独立宣言，不过秘魯的完全独立直到一八二四年才实现。厄瓜多尔在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摆脱了西班牙的統治。一八二二年五月墨西哥宣告独立；一八二一年九月十五日在危地馬拉城发表宣言，成立中美联合省，包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危地馬拉和薩尔瓦多。这个联合省以后分裂成为几个国家。

西班牙在美洲大陆北部、中部和南部的統治，直到一八二四年才被完全推翻，从此沒有恢复。一八二四年十二月九日，西班牙的军队在秘魯的阿亚庫乔<sup>①</sup>一战中被西蒙·波利瓦尔领导的爱国者完全打敗<sup>②</sup>。在这次潰敗之后，西班牙只剩下了西印度群島中古巴和波多黎各两个島。

关于查理四世退位、約瑟夫·波拿巴就位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人民反抗法国、成立各省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消息在一八〇八年七月十四日傳到了古巴。古巴总督馬克斯·德索梅魯埃洛斯立刻宣布效忠斐迪南七世，并且声明古巴和法国处于战

<sup>①</sup> 秘魯境内一地名，苏克雷將軍十二月九日在此地击败了西班牙总督塞尔納，贏得了秘魯的獨立。——譯者

爭状态。古巴人民被西班牙事件所激动，对这个声明給予热烈的支持。为了对西班牙提供战争必需品而发行的公債，很快地就认购超过定額<sup>2</sup>。“在过去多少有点明显的古巴人和西班牙人之間的分歧和不同……在(古巴)殖民者竭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們在伊比利亚半島上进行斗争的同胞的时候都忘記了。”<sup>3</sup>

以后不久，在古巴成立了一个最高軍事委员会(Junta Superior)。这就使古巴参加了在西班牙殖民地到处成立的、以便在革命形势下进行統治的軍事委员会运动。在西班牙所有其他殖民地，这种运动几乎都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但是在古巴不是这样。一八一〇年五月最高軍事委员会接到加拉加斯軍事委员会的邀請，要求古巴人也采取他們的革命道路和参加反对西班牙的叛变。虽然这个建議在哈瓦那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得到贊同，但是最高軍事委员会还是拒絕了这个邀請，而且重申古巴忠于流亡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和摄政政权<sup>4</sup>。虽然像我們将要看到的，在古巴各地常常发生暴动和叛变，表明古巴有人敢于要使他們的国家和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的叛乱联合起来，但是在这个革命期間，古巴一直忠于母国，因而产生了古巴忠于西班牙的傳說，西班牙以后称古巴为“永远忠誠的古巴島”(la siempre leal isla de Cuba)。

有一个問題自然要发生：古巴为什么不参加美洲大陆西班牙殖民地的叛乱呢？对这个問題不能只提出一种答复。現在讓我們

---

② 只能是很适当地认为波利瓦尔对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統治給予了最后一击。波利瓦尔在一生事业中既遭到过挫折，也得到过胜利，但是他始終不屈不撓，坚持解放南美洲的决心。西蒙·波利瓦尔生于加拉加斯，他是一个委內瑞拉的克利奧尔人。他继承了一笔财产，因而能够到国外去旅行和受教育。当他在欧洲期間，有很多時間是在巴黎度过，在巴黎他吸收了法国革命的自由与平等思想。他受到孟德斯鳩、伏尔泰等的著作、特别是卢梭的著作的影响很大。他成为卢梭的学說的热烈信仰者。一八〇七年，他回到他的祖国委內瑞拉，过清殖民地地主的生活。波利瓦尔在一八一〇年参加了独立运动，并且把他的未来岁月——斗争、胜利、挫折、流亡牙买加和海地以及最后胜利的岁月，貢獻給这一事业。

研究一下各种原因。

一、对于革命的成功，古巴的情况不如大陆有利。西班牙在古巴的力量比在西班牙美洲任何殖民地都大。由于古巴从一开始起就是西班牙在新世界其他殖民地的供应基地和中間站，因此古巴成为西班牙在美洲的主要軍事根据地，它比其他殖民地防守更严。古巴是一个島屿，可以很容易被西班牙海軍所切断，不能从美洲大陆得到任何支持<sup>5</sup>。而且，有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美国早在一八〇九年就表明，当其急于并吞古巴时，它深怕一个会落入欧洲国家手中的独立的古巴的建立；它宁願古巴控制在軟弱的西班牙王国的手里，而不願冒古巴轉屬欧洲头等海軍强国如英国和法国的危險。

二、西班牙政府对于任何有同情美洲大陆叛变移民者的嫌疑的人都加以惩办。它实行了严厉的檢查制度，除官方的报刊外，禁止出版任何刊物；外国书籍都被沒收，古巴社会处处都有告密者。古巴的共济会尤其受到怀疑，因为它的原則可能向古巴人逐漸傳播灌輸美国、法国和南美洲革命的理想<sup>6</sup>。人們仅仅由于有嫌疑而被关起来，連审讯的形式也沒有，并被当做革命阴谋分子受到监禁或終身流放。一八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省軍事委员会 (Junta Provincial) 的一个委员会关于哈瓦那監獄情形的一份报告說：“在卡瓦尼亚，当他們找到潮湿不卫生的土牢时，他們都吓得发抖。这些地牢一直被用来折磨人类。他們看到了沒有定罪的在深牢里关了許多年的犯人，这些人只是因为官方认为他們有不忠于新西班牙政府的嫌疑而被监禁的。”<sup>7</sup>

三、从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二六年，有两万逃避美洲大陆上的革命的移民在古巴定居。这些人，連同从海地来的难民以及在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以后从新奥尔良迁来的西班牙人，大大地加强了对于維持旧秩序有兴趣的、狂热地亲西班牙这一派人的力量。的确，在革命时期，西班牙其他殖民地沒有这么多反对革命的人，这些人以自己是一个“絕对的西班牙人”<sup>8</sup>为光荣，他們在到古巴以前，参加过反对独立运动的斗争和散布革命分子沒收和搶夺财产

的流言。

四、在拉丁美洲，一般來說，大多數反對西班牙統治的革命開始時都得到很大一部分下級教士的支持。在巴西尤其是這樣。一八一七年巴西的革命被稱作為“教士的革命”<sup>9</sup>。在阿根廷，一八一六年宣布阿根廷獨立的圖庫曼議會，它的二十九個成員中就有十六個是教士。在墨西哥它的革命史上充滿着伊達爾戈和莫雷洛斯這種名字，這些教士都是革命運動的領袖<sup>10</sup>。相反地，古巴大多數教士是半島人，他們極端同情西班牙政府。有一個研究這個島的教會的古巴歷史家說：“可以說，西班牙的教士，一般而言，都是反對革命的，有的是用武器，有的是用言論。”<sup>11</sup>

但是，以上四種因素對於古巴不能參加美洲大陸的獨立運動只是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絕大多數克利奧爾地主的經濟利益依靠奴隸制度，因此他們不願支持可能產生解放奴隸的結果的革命運動。他們害怕緊隨脫離西班牙和取得獨立所可能帶來的後果。西班牙大臣卡拉特拉瓦說得很中肯：“古巴人對黑人的恐懼是保證西班牙繼續統治古巴的最可靠的手段。”<sup>12</sup>

我們在上文看到，一七九〇年以後，古巴發生了一次強有力的改良運動。德阿蘭戈-帕雷尼奧和一些領導團體的全部工作，其目的是要獲得自治而不是獨立，德阿蘭戈和領導團體所代表的克利奧爾地主只想改良。西班牙其他殖民地的克利奧爾地主認為西班牙在國內外遭到困難時是擺脫西班牙統治的機會，但是古巴的克利奧爾地主則認為這是實現他們三種基本要求的機會。這三種要求是：自由貿易、維持奴隸制度和奴隸貿易以及擴大政治權利。

而且，在古巴的西班牙當局和美洲大陸各殖民地的西班牙當局不同，他們十分聰明，一方面強調由於古巴是一個島，脫離西班牙的願望不會實現，那些陰謀實現這種願望的蠢人一定將遭到死亡、監禁和流放；一方面又利用克利奧爾人的上述三種希望。古巴總督馬克斯·德索梅魯埃洛斯深知美洲大陸上的叛變精神已經傳到古巴，他很狡猾地採取懲罰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於任何有

独立傾向的嫌疑的人采取懲罰政策；對於只想實現經濟、社會和政治改良的克利奧爾地主採取寬大政策。他告訴他們說，古巴如果忠於西班牙，馬德里會予以酬勞，一旦法國人在西班牙被趕出去，西班牙政府會對古巴做出特別讓步。

克利奧爾地主不久就有了一試德索梅魯埃洛斯的話是否確實的機會。在一八一〇年，西班牙政府是由代表國王行使行政權力的攝政會議和一個一院制的“議會”（the Cortes）組成的。古巴的改良主義者沒有能夠說服攝政會議允許古巴貿易自由，但是德索梅魯埃洛斯向他們保證過西班牙政府會給予他們這種自由的。當德索梅魯埃洛斯接到西班牙的命令，規定古巴只能和伊比利亞半島進行貿易的時候，他由於急於要保持有勢力的古巴甘蔗和咖啡種植園主的支持，拒絕遵守這個命令。他允許自由貿易，特別是古巴和美國的貿易<sup>13</sup>。

當改良派聽到攝政會議給予西班牙各殖民地以派遣代表出席將在卡迪斯舉行的議會的權利的時候，他們的希望又重新抬頭。克利奧爾改良派通過代表古巴的兩個議員貝爾納多·德奧加瓦恩和唐安德烈斯·德豪雷吉又得到了一個提出他們的要求的機會。他們曾經向攝政會議提出過這些要求，但是沒有結果。

一八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西班牙議會開幕以後不久，西班牙美洲和菲律賓議員以及古巴議員帶頭發表了一個聲明，要求改革殖民制度。這些要求的第三項規定：“（西班牙）南北美洲享有最廣泛的自由，可以把它們天然和工業產品輸出到伊比利亞半島、同盟國家和中立國家，並且允許它們輸入它們所需要的任何商品或產品，用本國船或外國船裝運均可。因此，現在宣布開放南北美洲的港口。”<sup>14</sup>但是，像過去一樣，西班牙的商人和他們在殖民地的代理人都極力反對這個建議，這個建議被西班牙議會擱置起來。這些改革要求實際上是完全被置之不理了。

從西班牙傳來的消息使德索梅魯埃洛斯感到不安。他曾經保證，如果古巴忠於西班牙，改良派就會得到一七九〇年以來所要求

的改良。他的这种保证看来只是主观願望而已<sup>15</sup>。以后在一八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西班牙議會討論西班牙王国的宪法时，墨西哥議員米格尔·古里奇-阿尔科塞尔提出了西班牙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廢除奴隶制的計劃。他的八項建議規定立即廢除奴隶貿易（这是一八〇七年以来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已經同意的）；女奴所生的子女享有自由；对奴隶付給工資；奴隶有贖回自由的权利；以及改善仍处于奴隶制度下的人的待遇<sup>16</sup>。一八一一年四月二日，西班牙著名自由主义政客唐阿古斯丁·阿圭列斯提出了另一个建議，要求立刻廢除奴隶貿易；他还建議立刻通知英国，以便英国和西班牙可以协力合作廢除这种可恶的人类肉体买卖<sup>17</sup>。

古巴議員德豪雷吉劝議會里的保守派暫緩討論这两項建議得到了成功；然后，他又以公开討論会在蓄有大量奴隶的殖民地产生危險的后果为理由，劝他們在秘密會議中討論这两項建議。但是后来議會又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并且决定对这些动議进行公开討論<sup>18</sup>。

关于这两項建議以及同意对它們进行公开討論的消息在古巴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克利奥尔奴隶主知道，西班牙当时依靠英国来驅逐拿破侖的軍隊，英国正在对西班牙議會施加压力，要它通过廢除奴隶貿易的建議，因此，他們害怕連保守派的議員也无法抵制英国的势力。美国駐哈瓦那領事威廉·謝勒报告美国国务院說，从西班牙議會傳来的消息在克利奥尔种植园主中“引起了极大的关心和焦虑”；他們都十分气愤，因为曾經答应过他們，由于他們效忠西班牙，對他們将予以特別照顧；他們相信，廢除奴隶貿易的动議威胁到古巴的整个經濟<sup>19</sup>。

馬克斯·德索梅魯埃洛斯知道，現在一切处于危險之中。他在給西班牙議會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在一八一一年七月七日向議会的秘密會議宣讀）中，強調这两个建議在古巴引起了普遍惊慌，人們深恐海地的災难会在古巴重演。他要求西班牙政府极其慎重地处理這個問題，“以免失去这个重要島屿”<sup>20</sup>。

哈瓦那市政府、爱国会、皇家农商諮詢局和經濟学会都对西班牙議會提出了同样的劝告，強調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个島的經濟和妨碍它对母国的忠誠的重要性。在哈瓦那市政府和皇家农商諮詢局及經濟学会联名提出的备忘录中，对公开討論廢除奴隶貿易的問題表示抗議，它們說古巴奴隶主对于該島存在奴隶制度不負任何責任。备忘录說：“黑人来到这里和留在这里对我们是不幸的。这不能归咎于我们，只能归咎于最初以法律和宗教的名义开始实行和鼓励这种办法的人。”在西班牙議會提出的建議确是給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摆脱他們的“不幸”的机会，但是备忘录不顾这个合理的論点而接着爭論說古巴的兴隆依靠奴隶制度，因此必須允許奴隶貿易繼續一个时期<sup>21</sup>。

但是提出反对廢除奴隶制度建議(特别是廢除奴隶貿易)的最刻薄的理由的，是奴隶主集团的卓越代言人德阿兰戈-帕雷尼奥。他承认奴隶制度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坚持，在宪法通过以前卡迪斯的西班牙議會沒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合法权力；在听取經濟生活处于危险的殖民地集团的意見以前采取这种步驟也是不公平的；而且，英国和美国經過二十年才能取消奴隶貿易，議會也應該同样逐步进行。他又指出，古巴的庄园缺乏足够的奴隶，特別缺乏可以生殖的女奴，因此，在考虑这种措施以前，应当給奴隶主一个促进白种移民的机会<sup>22</sup>。

德索梅魯埃洛斯和古巴各种社团以及德阿兰戈-帕雷尼奥所提出的論据产生了效果。西班牙議會停止对这两个建議的繼續討論<sup>23</sup>。

继克利奥尔地主这一胜利之后，又傳来了在卡迪斯通过一八一二年宪法的消息。这部宪法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件，古巴的議員和新世界的其他发言人对于制訂这部宪法起了主要作用。这个宪法除了規定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大权掌握在議會手里之外，还第一次宣布伊比利亚半島和殖民地的所有西班牙人都享有平等权利；而且西班牙議會的一半議員由海外选举，同样地，供



諮詢的国务會議成員至少应有十二人来自海外<sup>24</sup>。

在古巴，对于实行新宪法曾举行庆祝；今后軍事执行机构的民政权力将移交給三个州长，州长对駐在哈瓦那的地方长官負責，这件事情的宣布更增加了人們的欢欣鼓舞<sup>25</sup>。

德索梅魯埃洛斯也可以感到高兴。誠然，西班牙商业集团的压力曾經阻止西班牙政府放松限制性的貿易办法；但是他用繼續不理西班牙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的手段使这些限制得到放松。母国給予了古巴人一部新宪法，对克利奥尔地主的忠誠也用他們最寶貴的礼物来酬答，这个礼物就是从奴役成千上万的人类中繼續获得巨大的利益的权利。

克利奥尔地主完全同意对西班牙的形势的这种估計。其他西班牙美洲人对西班牙議會所做的工作感到不滿，特别是当他們看出，很多让步由于西班牙有势力的保守商业集团的反对而只是一紙空文的时候。但是古巴的克利奥尔人已經得到了許多他們希望的东西，并且可以摆脱該島当局所規定的貿易限制。击败关于奴隶制度和奴隶貿易的建議就是一种够大的胜利！

当然，古巴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主是和西班牙其他殖民地的克利奥尔地主同样地渴望得到政治权力。他們有些人同情波利瓦尔的主張和他要建立西班牙-美洲共和国的希望。由于他們是克利奥尔人，在古巴生长，他們不能成为“絕对的西班牙人”了。不过奴隶制度对他們的利害关系战胜了所有其他的考虑，他們害怕独立比害怕西班牙統治更厉害。

主要由于其他殖民地都沒有古巴那样繁荣的奴隶經濟特点，大陆上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克利奥尔地主都欢迎黑奴参加反对西班牙的革命斗争，尽管他們也設法控制独立运动和降低群众要求<sup>26</sup>。至少他們并不由于害怕会引起黑人自由这个危險問題和可能的叛变而对提出白人自由問題感到迟疑。肯定地說，古巴大多数克利奥尔地主不是这样；他們深怕爭取独立的革命斗争会喚醒奴隶和破坏他們財富所依靠的制度；他們知道大陆上有些独立运

动认为奴隶制度是違反自然法則的，因而要求取消奴隶制度<sup>27</sup>①；一旦要求独立的革命冲击力量被发动起来，这种爭論在古巴一定也会发生。

古巴历史家拉米罗·格拉-桑切斯指出，“独立意味着廢除奴隶制度，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奴隶主——他們在这个时代中是古巴人数最多和最有势力的階級——一致反对独立。”<sup>28</sup>另一个古巴历史家何塞·德阿烏馬达进一步發揮这个論点說：

“凡是有助于轉移政府当局对种植园的警戒和利用国家扑灭政治陰謀的武装力量来控制奴隶的一切政治运动、制度，都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促使奴隶制度削弱的力量，因为，奴隶受到廢奴主义挑撥者所傳播的当代革命宣傳的鼓动，会利用白人意見的分歧为他們造成的任何机会，使在建立海地共和国时所特有的那种荒蕪和破坏的景象在古巴重新出現。”<sup>29</sup>

克利奥尔种植园主当然記得海地的事情。他們从古巴本身也很早地看出独立运动的革命热情如何威胁这个島上的奴隶制度。

古巴历史上的第一次爭取独立的叛变活动是在一八〇九年开始发动的，这一次是由哈瓦那富有的共济会會員罗曼·德拉卢斯和巴亚莫律师华金·因方特領導的。他們两个人努力爭取克利奥尔种植园主的支持，向他們保证，独立运动不会触动奴隶制度。在因方特草拟的宪法（这个宪法将在独立运动成功时实施）中，尽了一切努力爭取克利奥尔种植园主。独立的古巴共和国将由富有的地主統治，实行以财产为根据的限制普选制；奴隶制度的保存有了保证；天主教定为国教；共和国的軍隊只能由“富人”(Personas Pudientes)統率<sup>30</sup>。

不过，即便做出这些让步也沒有得到古巴地主的支持，因为，罗曼·德拉卢斯的爭取独立的叛变活动尽管在奴隶制度問題上采取保守的立場，但是它立刻得到了自由黑人和奴隶的支持。自由

① 阿根廷在一八一六年廢除了奴隶制度；哥倫比亞和智利在一八二一年，秘魯、危地馬拉和烏拉圭在一八二八年和墨西哥在一八二九年都廢除了奴隶制度。

黑人和奴隶了解到，如果他们参加反对西班牙的革命斗争，他们就可以要求自己的自由。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黑人一样，他们指出奴隶制度和争取自由、摆脱母国压迫的革命斗争是互相矛盾的<sup>①</sup>。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所任命的驻哈瓦那领事威廉·谢勒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很清楚地说明，克利奥尔种植园主为什么拒绝支持罗曼·德拉卢斯领导的叛变活动。一八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他由哈瓦那发出的报告写道：

我到各地去过。当我不在哈瓦那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革命阴谋，结果大致有十五个人被逮捕，其中有些人是有相当地位和门路的人，但是大部分是有色的人，自由黑人、奴隶和无业游民。对他们的阴谋作了最丑恶的渲染，据说推翻奴隶制度、抢劫和谋杀是这一阴谋的主要特征，虽然它最初是作为脱离西班牙的运动开始的。由于对他们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除了政府愿意发表的消息外，公众对此事毫无所知。同时，对于奴隶叛乱的可疑情况普遍加以警惕防范，每天夜里，街上都有强大的巡逻队<sup>31</sup>。

德阿兰戈-帕雷尼奥所领导的克利奥尔地主拒绝参加这个第一次独立运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在一八一〇年这次叛变活动被西班牙总督德索梅鲁埃洛斯发现和扑灭的时候，他们欢欣鼓舞，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罗曼·德拉卢斯被判处十年劳役，释放后又被长期流放。其他参加叛变活动的人也受到同样的惩罚。不过，华金·因方特逃到了美国，他从美国到委内瑞拉，然后又去墨西哥<sup>32</sup>。

---

① 在独立战争期间，有一个在美国的“自由黑人”记者说：“自然的权利是不是在一个黑人要享受到的时候就不存在呢？还是一个非洲人的爱国思想会引起叛变呢？”（菲利普·方纳（Philip S. Foner）：《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纽约1950年版，第1卷，第29页。）关于这一方面和黑人在美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其他证据，请参阅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美国革命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纽约1940年版。

一八一二年发生了使克利奥尔奴隶主更加惊慌的事情。因为他们害怕关于在西班牙议会提出立刻禁止奴隶贸易和逐渐废除奴隶制度的建议的谣言已经传到了古巴黑人的耳里，这些古巴黑人正怀着越来越大的希望等待西班牙的消息。古巴黑人也深受墨西哥议员阿尔科塞建议的序言的影响，这个序言说奴隶制度违反自然法则，违反西班牙现政府的自由准则，并且注定不久将被文明国家的民法所废除<sup>33</sup>。古巴黑人在听到这一切建议都在西班牙议会里被否决的时候，感觉到他们势必要用武力来获得自由的自然权利，他们不再能希望用别的方法来得到这种权利<sup>34</sup>。于是年轻的自由黑人何塞·安东尼奥·阿庞特从事范围很广泛的叛变活动。

阿庞特是哈瓦那的一个木匠和木雕工人，他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深受曾经领导他的人民脱离奴役的莫塞斯的范例的影响；阿庞特认为他自己对于十九世纪古巴遭受奴役的同胞负有同样的任务。有一个西班牙教士是他的朋友和忏悔人，这个教士经常告诉他西班牙议会讨论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情况。阿庞特虽然受的教育有限，但是他也知道当时的革命发展，并且和海地的一个黑人将军海恩·弗朗索瓦建立了联系<sup>35</sup>①；因为海地答应帮助他，于是阿庞特就向许多自由黑人和奴隶提出组织叛变活动的問題。他谈到西班牙议会关于奴隶制度問題的辩论，并且坚持说古巴的种植园主和島上的当局正在企图禁止发表关于奴隶即将解放的消息。古巴当局自己承认他的这种号召产生了效果：

他们(奴隶)被假消息和诺言所诱惑。这些假消息和诺言说，西班牙特别议会已经宣布给予他们自由，而本島政府向他们隐瞒了这样一件重要事情。这是他们能够改变奴隶过去的

---

① 关于阿庞特受到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深刻到什么程度有一些争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只受到圣经的影响；另外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吸收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革命思想。（埃利亚斯·恩特拉尔戈（Eliás Entralgo）：《奴隶制度問題和阿庞特的叛变活动》（Los Problemas de la Esclavitud. Conspiración de Aponte），哈瓦那1934年版，第223-228页。）

順从态度的主要方法，他們已經有效地把一些糖厂鼓动起来，他們沒有任何先例，而只依靠黑白混血种人何塞·安东尼奥·阿龐特愚昧激昂的头脑和一些同他一起活动的人。因此必須使他們对信以为真的取消奴隶制度的事情失望，并且向他們表明，現在和将来都不会有这样一道命令，而且如果真的有这种所說的恩典的話，隱瞞是不可能的<sup>36</sup>。

阿龐特不仅希望解放黑奴，而且也希望改变这个島的經濟，使它不再需要奴隶制度。他計劃把甘蔗和咖啡种植园焚毁，这就会摧毁购买奴隶的財源，并且在同时結束奴隶主对古巴經濟生活的統治<sup>37</sup>。他相信进行暴动取得成功的时机已經成熟。由于西班牙相信古巴忠誠，把軍隊調去鎮压美洲大陆上的革命，阿龐特认为，叛变的奴隶在西班牙軍隊从大陆調回古巴以前可以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在海地人的帮助下，他們可以击退西班牙的援軍<sup>38</sup>。

一八一一年末，阿龐特在哈瓦那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员会，它的秘密代表在其他城市里建立了附屬軍事委员会，再由后者在較远的地区建立更小的組織。因此，叛变活动便发展到全国范围，力量最大的是現在的卡馬圭省和奧連特省（在太子港、巴亚莫、奥尔京、巴拉科阿），以及現在的哈瓦那省的瓜納巴科亚和哈魯科两地的主要糖厂。

但是，阿龐特并没有参加实际暴动。他的叛变活动有一天夜里被总督德索梅魯埃洛斯发觉。这个总督在哈瓦那听到两个黑人討論即将发生的暴动，提到時間和地点。在用“夹板”（“cepo”，这是一种把头頸和四肢夹起来的刑具）拷問之后，他們說出阿龐特是这次策划暴动的領袖。一八一二年二月中旬，阿龐特和他的八个主要合作者被逮捕和监禁起来。

尽管有这次挫折，猛烈的暴动还是在被阿龐特的軍事委员会組織起来的地区爆发；叛变的奴隶破坏了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以及其他种有农作物的地区。但是在他們的斗争还没有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島上的全部軍隊，包括白人种植园主所組織的民团都向奴隶

压来。抓到一个叛乱的人，不論死或活，都給予十比索的奖金。

阿龐特和他的八个同伴（五个自由黑人，三个奴隶）被判处絞刑。德索梅魯埃洛斯于一八一二年四月七日貼出的判决书最后一段說：

尚須向尊敬的公众宣布的是，我已經指定在本星期四（四月九日）清晨执行上述判决。阿龐特、胡安·包蒂斯塔·利松迪亚、克萊門特·查孔和胡安·巴布拉多的头顱将挂在最通达的地方示众，以警效尤。現在这样处理之后，曾遭伤害的公众和这些罪犯使安分人民遭到的耻辱就得到了洗雪……<sup>①39</sup>

四月九日上午九时三十分，用更加野蛮的手段执行了判决。第二天的哈瓦那《日报》(Diario)說：“根据上级的命令，公道得伸，使本地的居民們看到它进行教育和篤信宗教的新的证明。”<sup>40</sup>利松迪亚的头顱在特里尼达德的巴比埃尔地区示众，查孔的头顱在普恩特諾埃伏德奧康他居住的地方示众。阿龐特的头顱被装在一隻铁籠里，这只铁籠放在圣路易斯岡薩加公路的起点他所住的房子門前，他的手被釘在另外一条街上。有一个研究这一时期的古巴学者写道：“許多别的南美洲的英雄遭遇了阿龐特所遭遇的事情，其中有图帕斯·阿馬罗<sup>②</sup>。他們为了他們的独立思想献出了生命；他們的身体也被凌迟示众，作为对可能企图为他們的国家获得幸福的人的榜样。”<sup>41③</sup>

① 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姓名表明，有几个海地人参加了这次叛变活动的领导。参見克萊門特·柔奈尔(Clemente Lanier)：《古巴与1812年阿龐特的暴动》(Cuba et la Conspiration d'Aponte en 1812)，載《海地历史、地理和地質学会評論》(Revue de la Société Haitienne D'Histoire, De Géographie, et De Géologie)，第23卷，第86期，第26—27頁。

② 图帕斯·阿馬罗第二是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秘魯印第安土人反对西班牙統治的起义領袖。

③ 塞尔希奧·阿吉雷写道：“从一八一二年起，有人用‘你比阿龐特还坏’这句话来賞賜儿童。这就是为了討好奴隶主而編造的一个恶劣的故事。”(《古巴历史讀本》(Lecciones de Historia de Cuba)第一册，哈瓦那1960年版，第41頁。)

阿龐特領導的叛變活動現在是海地事件以外又一個使古巴的奴隸主感到苦惱的魔鬼。這次叛變活動的規模，它受到海地和大陸上西班牙殖民地革命思想影響的程度，使克利奧爾種植園主確信，“勞動的奴隸人群是會燃燒的材料，如果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力量一受到攻擊，它就會燃燒起來。”<sup>42</sup>因此，克利奧爾地主認為他們的利益和西班牙國王更加休戚相關<sup>43</sup>。

若干年來，克利奧爾地主從他們和西班牙的合作中獲得了很大的報酬。但是，一八一四年當反動的斐迪南七世重新登上王位，殘暴地廢除一八一二年憲法和把所有擁護憲法的人都監禁起來的時候，古巴擔心過去獲得的利益也會被取消。但是這種恐懼證明是毫無根據的。在古巴所取消的是形式而不是實際。在憲法取消以後，有許多根據憲法而實行的措施實際上仍然有效<sup>44</sup>。

原因很簡單。因為斐迪南一方面在西班牙實行恐怖統治，另一方面也在擬訂遠征西班牙美洲叛變的殖民者的計劃。因此他需要古巴作為他的作戰根據地，這就必需和克利奧爾甘蔗和咖啡種植園主保持良好關係，而這些種植園主對於由於改革而獲得的特權是戀戀不舍的，如果古巴處於繁榮狀態，斐迪南七世預料可以從古巴得到金錢和物資，以供他對美洲大陸殖民地採取軍事行動之用。

斐迪南從克利奧爾地主那裡得到了他所希望的東西——金錢、武器、火藥、食品和其他物品<sup>45</sup>①。斐迪南雖然以鐵腕統治西班牙，但是允許古巴地主保持他們根據已廢除的憲法得到的許多好處，這是他對他們的報酬。以後，在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一九年間，斐迪南國王對古巴作出一系列的讓步，作為他對古巴人民不參加當時正弥漫美洲大陸的叛變和給他幫助的感謝的表示。古巴歷史家

① 在西班牙對它在美洲大陸上的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進行鬥爭的整個努力中，古巴和波多黎各是西班牙海陸軍的軍火庫和作戰基地，古巴對付墨西哥和新格拉納達（哥倫比亞和巴拿馬）；波多黎各對付委內瑞拉。參見何塞·佛朗哥（José L. Franco）：《西班牙的美洲大陸政策在古巴的實施（1812—1830年）》（*Política continental americana de España en Cuba, 1812—1830*），哈瓦那1947年版，第329頁。

塞尔希奥·阿吉雷指出：“这就是給該島第五纵队的酬劳。”<sup>46</sup>

一八一六年，弗朗西斯科·德阿兰戈-帕雷尼奥在得到斐迪南国王的信任以后，被任命为印度群岛参事 (Consejero de Indias)，这是一个大臣级的职位。他担任这一职务，就可以在保护古巴奴隶主集团方面起重要作用。一年以后，斐迪南国王取消了烟草垄断公司 (Estanco de Tabaco)。一百年来这家公司使烟草贸易成为王室的一种垄断事业，使古巴种植烟草的人受到损害<sup>47</sup>。在同一年 (一八一七年)，由于古巴改良派的坚决要求，西班牙国王颁布了一八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的命令，鼓励信仰天主教的劳工移民该岛，借以减少一八一七年的人口调查中所表明的黑人在岛上人口中占有的多数<sup>①</sup>。一八一八年二月十日的命令最后同意了改良派希望已久的经济要求：永远准许外国船只开进来和同外国通商 的自由。虽然这种贸易仍然要缴纳很重的关税，一八一八年的命令确定开放港口，允许外国船只进来<sup>48</sup>。一八一九年的国王命令给予古巴人对他们占用的土地以完全合法的权利。在这时以前，古巴的土地依照法律仍然是国王的财产 [称为被恩赐的土地 (las tierras mercedadas)]，现在克利奥尔地主可以合法地把这些土地认为是他们自己的了，他们有权出售和分割土地，收取地租，他们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sup>49</sup>。

不过，就富有的克利奥尔地主而言，在这些乐观的发展上面笼罩着一片阴影，因为一八一七年的命令规定在一八二〇年以后结束奴隶贸易。但是，这不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而且那时这个问题也不能轻易解决。

在一八一四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利物浦勋爵内阁为了应

① 根据一八一七年的人口调查，古巴的白人为二十九万一千零二十一人 (占 45.96%)，黑人为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九人 (占 54.04%)。黑人中有十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一人 (占 18.32%) 是自由人，二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八人 (占 33.55%) 是奴隶。因此，黑人总数第一次超过白人。[乌皮阿诺·维加·科别利亚斯 (Ulpiano Vega Cobiellas): 《我们的美洲和古巴的演变》 (Nuestra América y la evolución de Cuba), 哈瓦那 1944 年版, 第 74—75 页。]



付韦尔伯福斯和其他主張廢除奴隶制度的人的不断要求，企图使各国发表联合宣言，立刻廢除奴隶貿易。但是当时受斐迪南七世統治的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反对这项建議，它們的理由是这种做法将严重地損害它們的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斐迪南特別想到古巴。斐迪南对于保持奴隶主对他的忠誠和他們的繁荣很关心——如果他要扑灭西班牙美洲的革命，这种忠誠和繁荣对他是必要的；因此，斐迪南只能同意接受一个冲淡了的決議。这个決議虽然譴責非洲的奴隶貿易是“違反人道和世界道德的原則”，但却允許各国自行決定廢除奴隶制度在什么时候方便<sup>50</sup>。

但英国並沒有因为維也納宣言中的保留規定而上当，卡斯尔雷勛爵立即設法劝签字国簽訂条約实施宣言；但是，西班牙不願受到束縛。斐迪南国王在和有关的殖民地集团，特别是古巴和波多黎各的集团商量以后，拒絕了英国的要求，不肯規定廢除奴隶貿易的日期<sup>51</sup>。英国的压力並沒有因此减少，卡斯尔雷达到了說服其他国家（葡萄牙除外）对西班牙施加同样压力的目的。西班牙的屈服只是一个時間問題。

同时，古巴的奴隶主並沒有袖手不动。一八一六年二月，当印度群島會議向斐迪南国王提出一个报告，要求立即廢除奴隶貿易的时候，作为古巴奴隶主的发言人德阿兰戈-帕雷尼奥草拟了一个代表少数派意見的报告，大声疾呼，反对輕率地廢除奴隶制度，并且指出英国所建議的取消奴隶貿易的鹵莽行动会削弱古巴对西班牙的忠誠，甚至引起殖民者公开抵抗的可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可能意味着西班牙失去古巴。

当然，这些理由曾經在一八一一年西班牙議會討論时提出过，但是在这个代表少数派意見的报告中，又加上了一个新的歪曲的理由。它指責說，英国的动机，是为了英屬西印度殖民地的利益而破坏古巴的繁荣。英国在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奴隶貿易以前，已經銳意增加殖民地的奴隶（在牙买加黑人和白人是十与一之比）。如果保持一对一比例，古巴在停止奴隶貿易之前，就可以有

更高度发展的奴隶经济。最重要的是，古巴对西班牙的忠诚，使母国抵抗英国破坏古巴经济生活的自私计划成为合理的，屈服就是使奴隶主集团不能得到作为爱国者所应有的报酬。

甚至古巴的改良派也知道，他们不能要求衰弱的西班牙抵抗大国的联盟，因此他们告诉斐迪南，他们同意赤道以北的奴隶贸易立刻取消，赤道以南的奴隶贸易在一八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取消。这个建议还要求英国对于由于取消奴隶贸易而受到的全部损失予以充分赔偿，以及西班牙政府采取措施鼓励自由劳工移入<sup>52</sup>。

斐迪南在确信向英国压力屈服而又不致严重削弱古巴种植园主的忠诚时——他们知道他已经尽可能地坚持抵抗了——，就签订了一八一七年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西班牙国王在一八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后禁止西班牙臣民在赤道以北的“非洲海岸根据任何借口或以任何方式从事奴隶贸易”；在一八二〇年五月二十日，所有西班牙领土上的奴隶贸易应当取消，在这以后，所有西班牙的臣民都不得在“赤道以南”非洲沿岸从事奴隶贸易；外国船只把奴隶运入西班牙领土也受同一法律的限制。它又规定，英国政府对于西班牙人由于实行这些条约而在“合法贸易”方面受到的损失付给赔款四十万英镑（一千万丕塞他），赔款将于一八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伦敦付给。

这个条约授权两国军舰，对于有充分根据怀疑为装载有奴隶的两国商船进行视察。如果船上查出有私运的黑奴，应将这些船只和船员扣留，送交为此专设的法庭。这些“混合法庭”由两国任命同等数目的法官组成，一个设在非洲的塞拉勒窝内，另一个设在哈瓦那。对它们的判决不能上诉，因此，这个条约规定双方都有互相搜查彼此的船只并在查出载有奴隶时予以没收的权利<sup>53</sup>。

古巴的开明人士的眼光虽然多少被白人优越的观点所蒙蔽，但是由于具有历史意义的条约的签订，他们认为古巴有了新的光明前途。例如古巴有一个居民从哈瓦那写道：

我认为这个岛将由于取消奴隶贸易得到很大的好处。古

巴島有权享有比仅仅生产蔗糖的殖民地更高的地位。古巴有各种类型的土壤，土地肥沃，使它能够在白人种植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生长其他农作物。如果把这个国家还没有开垦或者没有主的大片土地分为小农场或小田园(estancias)给予本地出生或外来的白种居民，就比在地面上种植甘蔗和咖啡更快地增加这个岛上的财富和人口<sup>54</sup>。

但是富有的克利奥尔种植园主有别的想法。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取消奴隶贸易的法律规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一法律。他们受到一八一八年允许古巴和所有国家更自由地进行贸易的国王命令的鼓励，计划增加糖的生产。因此正好是在英国和西班牙签订条约禁止奴隶贸易的时候，他们对奴隶劳动力的需要大大增加。克利奥尔种植园主深信，不管有没有条约，他们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会得到满足<sup>①</sup>。由于他们对于走私和用其他秘密方法逃避贸易限制已有很久的经验，因而不相信这个条约在实际上会使奴隶贸易消灭。他们预料从贪婪的西班牙当局（从最高级到最低级）所能得到的决不是别的，而是合作（当然要使点钱）。我们将看到，他们的这种信心是有充分道理的。

在快到一八二〇年的时候，马德里和古巴的西班牙当局同富有的甘蔗和咖啡种植者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切。以这些地主为共组成分子的古巴改良派所提出的许多要求都得到满足，作为他们对西班牙的忠诚的报酬——特别是开放古巴港口，允许进行无限制的对外贸易，这样就实现了他们最重视的目标之一，满足了他们提出已久的要求之一。总督争取克利奥尔人到西班牙一边来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古巴地主的财富大大地增加了。市场由

---

<sup>①</sup> 自然，奴隶主们利用暂缓执行的三年期间，以疯狂的速度输入奴隶：一八一七年输入了二万五千九百七十六人；一八一八年约输入一万七千人；一八一九年输入了一万四千六百六十八人。据费拉德尔非亚《奈耳斯纪事周报》报道，从四月三日 to 四月八日，有一千二百七十六个奴隶在哈瓦那上岸。

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商业改革而扩大了，糖的出口稳步增加，在这些年里达到每年出口二十万箱的平均数字。一八一七年的人口调查表明，从一七九一年调查以后，岛上人口已经增加了三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人。不到三十年人口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时候岛上有六百二十五个甘蔗种植园，七百七十九个咖啡种植园，一千六百零一个烟草种植园（vegas）和二千一百二十七個牧場<sup>55</sup>。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一九年五年內，古巴出口价值增加到五千六百二十二万四千零四十一比索，进口价值增加到二千六百零三万九千零三十比索。西班牙从对这些貿易征收的关税中得到的收入达到几百万比索，在古巴历史上第一次足敷島上行政費的需要，不必依靠墨西哥的援助；并且还有足够的剩余付給公使館和西班牙在美国的領事館人員的薪金<sup>56</sup>。

因此，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几乎都在进行爭取独立的激烈战争的时候，古巴却繁荣起来，它的繁荣使西班牙得以变本加厉地镇压解放运动。无怪乎西班牙政府在一八一九年吹嘘說，“沒有同半島<sup>①</sup>的利益分离这一件事与这个島上英雄的人民的 思想相去更远的了，尽管有少数无知的人竭力劝他們說，他們是和母国分离的。”<sup>57</sup>

在一八二〇年以后的十年內，这种“无知的人”（島上真正“英雄的人民”）增加了。他們建立独立的古巴的努力将达到很大的規模。

---

① 指伊比利亚半島。——譯者

## 第六章 独立运动

(1820—1830年)

一八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一艘商船把一份三月七日的《馬德里公报》带到了古巴。这份公报上刊载了一条关于西班牙发生反对斐迪南专制統治的暴动和国王被迫同意恢复一八一二年宪法的消息，这份公开在哈瓦那陈列让大家看的官方公报登載着国王的声明：“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沿着宪法的道路前进，我来带头。”

这个宪法将古巴从殖民地提高到西班牙的一个省的地位。当胡安·曼努埃尔·卡希加尔总督拒絕承认恢复这个宪法时，哈瓦那的人民采取了有力的步骤使他改变他的想法。他们集合在政府所在的阿馬斯广场，要求卡希加尔立刻公布宪法，并且宣誓遵守。卡希加尔总督宣了誓，其他的官员也都跟着宣誓。于是一八一二年的宪法在一八二〇年四月十六日在古巴恢复有效。

随后便开始了一連串的狂欢庆祝。《奈耳斯紀事周报》登載了一条从哈瓦那发出的题为“古巴的狂欢”的消息如下：

哈瓦那的钟都响了起来——人们拥挤在街头，高呼“宪法万岁”，士兵们也和他们在一起……成桶的酒和其他好吃的东西都免費分送給士兵和人民，在这里看到了普天同庆……軍民几乎同声一致地叫喊“宪法万岁”、“国家万岁”、“打倒迷信和虛伪”。在斐迪南国王（在一八一四年）回来的时候，曾經强使以宗教仪式把宪法燒掉的圣芳济教团的僧侶，現在却不得不做一件最不愉快的工作：整夜敲打修道院的大钟表示欢乐<sup>1</sup>。

第二天，人民釋放了所有囚禁在可怕的卡瓦尼亞要塞里的政治犯，并且更改一些街道的名字来庆祝新的宪法制度：费尔南多九世广场（Plaza de Fernando Séptimo）改名为宪法广场（Plaza de la Constitución）；皇家彩票（Real Lotería）改名为宪法彩票（La Lotería Constitucional）。他们赶走了所有在宪法廢止后委任的市政官員，恢复了在西班牙議會統治时期任职的官員的职务。正像过去实施宪法时期一样，整个殖民地的民政机构又重新建立起来<sup>2</sup>。

这种新的自由气氛在报刊方面反映出来。几星期之内，有十四种定期刊物和几十种单頁的出版品同时出現，它們刊登了歌頌恢复的宪法的詩歌和論文，“都充滿了关于旧政府統治时期的权謀和弊端詳情。”<sup>3</sup>

虽然克利奥尔群众在古巴恢复宪政的胜利斗争中是最积极的人，但是蓄养奴隶的种植园主集团继续代表古巴发言。一八二〇年的西班牙議會又有各殖民地的議員，在选举古巴議員的时候，关于投票的财产条件剥夺了大多数克利奥尔群众的选举权，这样选举出来的三个議員都是支持富有的地主的<sup>4</sup>。

这些富有的地主給这三个当选的議員发出明确的指示，要他們提出有利于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主的方案，降低美国同古巴貿易的关税，廢除禁止輸入奴隶的一八一七年条約，或者至少使这个条約延期六年实行。指示指出，奴隶貿易对西班牙帝国任何其他省份的利害关系都沒有像古巴那样重大。“因此，突然停止所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計的。所得到的賠款的数目远远不够……如果不能达到延期实行……債務和义务的沉重負担就将压在古巴人民的身上。”<sup>5</sup>

古巴三个議員之一胡安·貝尔納多·德奧加瓦恩代表奴隶主在馬德里发表了一篇以《論非洲奴隶的境况》（Observaciones sobre la condición de los esclavos Africanos）为題的文章，要求西班牙議會保护古巴的奴隶貿易，对付英国破坏古巴的阴谋。德

奧加瓦恩以一个教士的身分发言，他說他不是为奴隶制度辯护的人，但是“工作是上帝所命令的”；由于“非洲人是尽人皆知的最懶惰的人”，奴隶制度是使他們遵守上帝命令的一种方法；由于奴隶制度也是一种教化非洲人的方法，“如果真的了解人道主义的話”，明智的立法不仅要强迫黑人工作而且还要鼓励和保护把奴隶运往古巴。最后，德奧加瓦恩重复了当时人們所熟悉的老調，說由于古巴的奴隶主忠于西班牙，以及在和美洲大陆上的叛逆的斗争中他們对母国的帮助，他們應該受到特殊照顾<sup>6</sup>。

但是奴隶主失望地发现，他們在西班牙的影响不如一八二〇年自由主义者获得控制权以前的时期。举例來說，斐迪南被迫罢了同古巴改良派、特别是同德阿兰戈-帕雷尼奧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些大臣；另一个例子是新召开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西班牙議會决心廢除奴隶貿易。它拒絕了所有延期实施一八一七年条約的要求，并且为了制止違反条約的行为，宣布在新刑法里列入执行这个条約的規定<sup>7</sup>。

古巴的奴隶主还有其他感到失望的事情。古巴选出的西班牙議會三个議員的任期是从一八二二年到一八二三年。他們得到同样指示，要努力廢除一八一七年条約，或者使这项条約延期实施。但是作为議員之一的費利克斯·巴雷拉神父认为在古巴社会中奴隶制度是一种有害的力量，在这个制度廢除以前，古巴島絕不能有真正的进步。这个古巴自由主义的杰出領袖不仅不理睬要他要求廢除一八一七年条約的指示，反而建議逐步廢除在西班牙美洲的奴隶制度。巴雷拉說，在奴隶制度廢除以前，安的列斯群島將經常有发生奴隶暴动的危險。在白人兴高采烈地庆祝列在恢复的一八一二年宪法里的新得到的自由的时候，以及宪法恢复在全古巴所造成的自由气氛中，如果以为奴隶会安然不动和感到滿足，那是愚蠢的<sup>①</sup>。他宣称，“当野蛮人有人去領導时，他們是最好的战士”，海地已經证明領袖并不缺少。

巴雷拉劝告西班牙議會不要把奴隶主的利益和古巴的“真正

利益”混淆起来，他坚决认为“古巴人民的普遍願望是沒有奴隶，他們只希望找到某种其他办法滿足他們的需要”。巴雷拉提議釋放所有已經为同一主人服务十五年的奴隶，給予所有在这个命令公布后出生的人以自由地位，实行抽籤办法，凡是中籤的奴隶可以贖买他們的自由，以及組織慈善团体負責募款，保护奴隶的权利和指导廢除奴隶制度的工作。巴雷拉神父拟訂了廢除古巴奴隶制度的工作，他連最細小的地方也都規定了出来<sup>8</sup>。

当然，巴雷拉遭到了古巴奴隶主集团的严厉譴責。他們对他說，“如果一个古巴議員要求廢除奴隶制度，應該把他的舌头割掉。”<sup>9</sup>但是，西班牙議會却被他的建議所感动，拟訂了逐步廢除奴隶制度和促进小地主的生产的計劃。

但是，欧洲局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这种变化对西班牙的影响，使古巴的奴隶主安下心来。一八二三年四月，法国国王受“神圣同盟”<sup>②</sup>的委托，派了十万大軍开进伊比利亚半島。在这些军队刺刀的掩护下，暴君斐迪南七世解散了議會，廢除了一八一二年宪法，將成百的自由主义者送上断头台，同时有成千的人逃走流亡。廢除安的列斯群島奴隶制度以及严格执行一八一七年条約的建議都被放棄了<sup>10</sup>。

奴隶主們都感到很高兴，但是对整个古巴來說，“神圣同盟”推翻自由主义政权是一幕悲剧。古巴感到了专制复辟的全部压力。一八二三年五月，弗朗西斯科·迪奥尼西奧·比維斯总督开始执行严厉的鎮压古巴自由主义的計劃。同时，古巴島的財政負擔也增加了。由于墨西哥和秘魯財源的丧失，必須用加重安的列斯群

---

① 在这里，讀一下一八一二年宪法刚刚恢复以后由哈瓦那发出的一段消息是很有趣的：“看到这个規則繁多的城市怎样突然活跃起来，这是很奇怪的。奴隶好像被他們的周圍吹起的自由空气所振奋，对变化似乎也很高兴。”〔前引《哈瓦那来信》，第50頁。〕

② “神圣同盟”是俄罗斯、普魯士、奥地利和法兰西的反动君主在一八二二年組織的一个同盟，它的目的是阻止一切自由思想的发展，恢复任何国家已被推翻的君主专制政体。



島的賦稅的辦法來彌補<sup>①</sup>。

對所有單據憑證、財產和活動都規定要徵稅，從羅馬教皇的教諭、耶穌受難像直到斗雞和在家里招待朋友，以及除甘蔗外所有農產品都在徵稅之列。當時一位觀察者說，那時徵收的稅“在種類和範圍上都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府所徵的稅”<sup>11</sup>。一八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國王命令規定設立一個軍事法庭，稱為“常設軍事執行委員會”，它有权逮捕任何一個有陰謀叛變的嫌疑者。在一八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臭名昭彰的命令中，總督被授予差不多是專制的權力。這種稱為“包羅萬象的權力”(“*facultades omnímodas*”)，對總督授予了“充分和無限的權力，對於所有官員或人等(不論擔任什麼職務、屬於什麼級別和階級或情況如何)，只要是他留在古巴似乎對古巴有所不利，或者他的公私行為會引起你的懷疑，均可驅逐出古巴，送往伊比利亞半島……”<sup>12</sup>因此，總督可以拘留、懲罰、放逐任何人並且隨意將他的財物沒收。這種“包羅萬象的權力”從一八二五年一直繼續到一八七八年。在實施這種權力期間，古巴所有居民都失去了法律的保護，事實上由於總督已被授予“對被圍城市的長官所授予的全部權力”，古巴居民是在戒嚴令下生活的。在事實上，這就是島上的唯一的憲法<sup>13</sup>。

從一八二五年起，西班牙在古巴執行了嚴厲的政策。島上的政府又成為軍事寡頭政治。政府的首腦總督是民政和軍事統治者，他的權力便是絕對專制。

因此，在幾年之內，古巴改良主義的影響消失了<sup>②</sup>。斐迪南把西班牙美洲的喪失歸咎於一八一二年的改良。他之所以允許這些改良繼續在古巴存在，只是為了使這個島保持對西班牙的忠誠，并

---

① 在一八〇〇年以前很长久一段時間，古巴很难以維持自己，沒有期望它對西班牙的收入能有什么幫助。

② 在一八二五年德阿蘭戈-帕雷尼奧被免去了古巴財政部長的職務。代替他的是過去的改良派，被封為比利亞努瓦伯爵的克勞迪奧·馬丁內斯·德皮尼略斯。

在同时利用它作为镇压叛变的殖民地军事活动基地。但是，当西班牙当局放棄重新征服他們在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希望时，繼續对古巴让步的两个原因有一个已經不存在。一八二〇年以后的发展又使另一个原因不存在，因为这些发展证明：古巴并不是像改良派所描繪的那样“忠誠”。

在一八六八年十年战争发生以前古巴的历史上，独立运动从来沒有一个时期像一八二〇年以后十年內那么强烈有力。在研究支配这次运动的力量以前，值得提出的是古巴富有的种植园主并不在这些力量之內。

克利奥尔种植园主仍然为革命运动会使奴隶制度消灭的恐惧所支配。一八四九年古巴奴隶主拉蒙·德帕尔馬写道：“如果古巴人支持这种思想，古巴早就独立了……但是过去我們反对这一件事，現在我們还是反对它。”<sup>14</sup>

一八二二年有一支在紐約和費拉德尔非亚装备好的私人远征队从美国出发，它的公开目的是征服波多黎各，結束西班牙的統治和建立“博里夸共和国”，博里夸(Boriqua)一名来自博里盖(Boriquén)一字。在哥倫布发现以前，波多黎各島就称为“博里盖”<sup>①</sup>。这次企图虽然失敗，但是它在古巴引起了相当大的騷动，特别是因

---

① 这次远征是一群波多黎各人发起的。这些波多黎各人和波利瓦尔部下的一个軍官、当时正在庫腊索教书的杜庫德雷·奥尔斯特因接洽，并且答应給他錢來組織一支远征队，从美国出发进攻波多黎各和在該島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支持拉丁美洲独立的美国新聞記者巴普蒂斯·欧文参加了杜庫德雷·奥尔斯特因的活动。这支远征队得到了某些美国商人的帮助，参加者有几个美国人和当时住在美国的很多欧洲人。它在一八二二年八月十三日乘着两艘多桅帆船从紐約出发，一艘双桅帆船从費拉德尔非亚出发。远征队在海上遇到困难，被迫开到庫腊索，奥尔斯特因和欧文在該地被荷兰当局逮捕。

在波多黎各，已經拟訂了配合远征队到来举行暴动的計劃。暴动的領袖之一是黑白混血种人佩德罗·杜博依，他秘密地把自由黑人和奴隶組織起来。远征队在庫腊索失敗之后，波多黎各的暴动計劃也随之失敗。参加暴动計劃的黑人領袖被逮捕和枪杀。杜庫德雷·奥尔斯特因和巴普蒂斯·欧文經過审讯和被判決犯有扰乱治安罪之后，被驅逐出庫腊索。

为波多黎各的黑人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暴动计划，而且这次暴动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廢除波多黎各的奴隶制度，让黑人享有和白人平等的权利。一八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哈瓦那的《每日新聞》(Diario Noticioso)轉載了波多黎各暴动计划者的宣言如下：

但願从現在起我們共和国的全体人民只成为一个和同一个家庭的人；願白人和黑人并肩前进，以求实现他們的新祖国的幸福；願他們爭取政府文武官职的競争，只是根据他們的才能、廉洁和优良品德。优点最多的人将得到职位，无須考虑他的宗教、民族或肤色。

这家古巴报纸接着評論說：

从这里可以看出，波多黎各暴动计划的主要特点是鼓动黑人叛变，反对白人和把这个島变成一个新圣多明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就是所有企图实现脱离母国的煽动者的目标。我們知道，这也是他們在我們自己的美丽的島上的目标；他們所想的只是引起最可怕的混乱，破坏这个国家。所幸的是，我們社会上的忠誠人士都認識到这种顛复活动對他們的危險很大，因而不加以容忍。

所謂“忠誠”的古巴人当然是指富有的种植园主。从波多黎各傳来的消息使他們更加相信，不管結果怎么样，分立主义和廢除奴隶制度是互相关联的。《每日新聞》还強調說，他們也不必再找更多的证据。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古巴独立运动爭取和欢迎自由黑人和奴隶参加反对西班牙的斗争，并且答应后者在他們共同建立的共和国中他們很快可以从奴役的束縛中贖取自由<sup>15</sup>。正像曼努埃尔·比利亚諾瓦所說的：“在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的十年內，古巴革命經過的特征是……革命者一心一意地想爭取有色人的支持。”<sup>16</sup>

这种情况当然是足以使富有的种植园主脱离独立斗争；尽管在推翻西班牙自由主义以后政治制度的弊端层出不穷，他們仍然保持这种立場。但是也还有其他的原因。甚至在专制統治时期，种

植园主仍享有很多利益。糖和咖啡的生产不断增加，现在摆脱了政府壟断的烟草的生产也很兴旺<sup>①</sup>。尽管有一八一七年条约的规定，这些作物生产中对奴隶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仍然得到满足。

历任总督在采取措施镇压古巴人民的自由时行动迅速而有力，但是当他們执行禁止奴隶贸易的法律时，却表现得十分软弱拖沓。虽然西班牙政府为了敷衍英国经常命令古巴当局执行这种法律，人们却了解对这些命令不必认真对待。对古巴财富征收的税，特别是从蔗糖贸易得到的税收，毕竟是当时长期贫困的西班牙国库的生命线，而这项收入是从奴隶经济中得到的。此外，总督由于得到奴隶商人的贿赂而发财致富；他们和西班牙本国政府一样，也不愿杀掉下金蛋的鹅。

同时，奴隶劳动力不断流入古巴，有助于使有势力的商人和奴隶主阶级继续忠于西班牙。由于西班牙商人通过进口机器、开垦新地和增加劳动力，提供了发展蔗糖和（在较小的程度上）咖啡生产的资本，因而奴隶制度对西班牙商人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借款是对甘蔗和咖啡作物预付的款项，利率高达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六。如果断绝奴隶劳动力的来源，就会严重地影响这些贷款的收回。因此，克利奥尔种植园主和西班牙商人在维护奴隶制度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这就使在其他方面互相仇视的两个集团团结成反对独立的共同战线<sup>17</sup>。

总之，古巴的奴隶贸易甚至在一八二〇年以后还很发达，而这一年是奴隶贸易应该停止的一年。拉米罗·格拉指出：“一八一七年条约始终是一张废纸。”<sup>18</sup> 在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三一年期间，据

---

<sup>①</sup> 到一八二五年，蔗糖每年出口平均达到二十万箱，咖啡每年出口四十九万九千金塔尔。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三〇年共输出烟叶十二万八千六百四十四金塔尔，雪茄烟二千四百五十亿零九千七百万支。一金塔尔等于一百磅。〔亚历山大·洪波耳特(Alexander Humboldt)：《古巴岛》(The Island of Cuba)，纽约1856年版，第282, 289页。〕

估計有三百艘裝載奴隸的船隊將六十萬奴隸運到古巴<sup>19</sup>！

因此，甚至在專制時期，種植園主仍然獲得驚人的繁榮，在獨立思想正在古巴其他克利奧爾人中生根的時候，富有的古巴種植園主堅持反對獨立“改良”的立場，這就可以理解了。

古巴的其他階級並沒有享受富有的種植園主和商人所享有的驚人的繁榮。在古巴東端（奧連特省）、遠離哈瓦那商人資本家的地方，小種植園主感到應付蔗糖生產成本不斷上漲頗為困難。在這一時期，兩個種植園主階級發生了明顯的利害分歧，東部各省種植園主的不滿情緒有助於使古巴的這一部分成為獨立運動中的重要地區<sup>20</sup>。

這一時期另一種重大發展是在古巴出現了一個人數較多的中產階級，這是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一九年所採取的鼓勵白人移殖、取消煙草壟斷制度和提倡自由貿易等措施的結果。和受到優待的富有的種植園主不同，這個中產階級由於政治制度的弊端而獲得的補償很少。因此他們感到和古巴的下層階級比和富有的種植園主更接近。由於奴隸制度對他們的利害關係不大，他們並沒有被黑人羣眾提出獨立的口號所吓倒<sup>21</sup>。

知識分子和學生在獨立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知識分子中有古巴的第一個偉大詩人何塞·瑪麗亞·埃雷迪亞。埃雷迪亞一八〇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於聖地亞哥。他在年輕時便獻身古巴的獨立事業。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寫了第一首重要的詩，題為《古巴的星》。這一首詩表示他願意在必要時為古巴而死，把頭顱留在斷頭台上作為西班牙殘暴統治的標記。下面幾行詩表達了古巴人要求自由的願望：

古巴！在最後你將是  
自由而純潔的  
像你所呼吸的充滿光明的空氣……

暴君的殘暴是徒然的，

尽管有卖国贼  
为他們效劳。

存在于古巴和西班牙之間的  
汪洋大海  
不是不起作用<sup>22</sup>。

成群的学生，古巴富人的子弟，尤其是圣卡洛斯神学院的学生，都和埃雷迪亚同样渴望古巴独立。圣卡洛斯神学院的学生受到了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神学院院长何塞·奥古斯丁·卡瓦列罗神父和它的著名教师之一費利克斯·巴雷拉神父的影响。

巴雷拉虽然在一八一一年担任哲学讲座时对政治的兴趣不大，但是九年以后当他担任宪法問題讲座时，他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以后，在坚决维护一八一二年宪法的过程中，他唤起了学生对政治上自由主义的欽佩和对斐迪南七世的反动专制主义的仇恨。虽然直到几年以后，巴雷拉才放棄对改良主义的拥护，但是他深受在西班牙出版的何塞·馬里亞諾·門德斯教士所写的主張古巴和波多黎各独立的小册子的影响<sup>23</sup>。巴雷拉在他上課时公开討論这个独立宣言，使他的学生認識到改良主义的幻想。此外，巴雷拉还相信廢除奴隶制度对于古巴的幸福必不可少。他在西班牙議會中精辟地闡明了他的这种立場，不仅在学生中，而且在奴隶主集团以外的其他古巴人中造成了深刻的印象<sup>24</sup>。

在我們具体地研究独立运动之前，值得提一下独立运动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些运动受到美国和脫离西班牙新成立的共和国、尤其是墨西哥和哥倫比亚的启发和鼓舞的程度。自然，西班牙当局指責說古巴的独立暴动計劃是在美国、海地或哥倫比亚发展起来的，并且說北美、海地、玻利維亞的間諜来到古巴煽动奴隶叛变推翻政府。这种指責的目的当然是要掩飾古巴內部的情况以及独立运动是古巴人所組織的事实。不过，毫無疑問，有許多古巴人受到了美国和南美洲各共和国傳来的革命“瘟疫”的“感染”。但

是應該若重指出，傳播“瘟疫”的古巴人比外國間諜更多。

有錢的古巴人將他們的子弟送到美國去受教育，當他們回來時，把這個國家享受自由的情況帶了回來，並且把這些情況和古巴人生活在壓迫之下的情況加以對比<sup>25</sup>；同樣的，參加委內瑞拉叛變部队的古巴志願人員（其中有些在委內瑞拉叛變軍隊中已經升到很高的地位），他們在回到古巴時也帶來了克利奧爾白人和黑人并肩作戰和英勇鬥爭的激動人心的故事，並且指出這樣的團結也能使古巴獲得自由<sup>26</sup>。這些古巴人中，有一部分人的思想甚至比南美各共和國的革命領袖的思想還進步。南美各共和國的革命領袖害怕黑人和印第安人民羣眾，他們主要地依靠大地主和商人<sup>①</sup>；與此相反，有許多古巴革命領袖知道富有的地主和商人都堅決反對獨立，因此將他們的希望寄托在白人工農、自由黑人和奴隸的聯合上<sup>27</sup>。

從美洲大陸傳來的革命宣傳確是影響了古巴人。古巴的獨立運動確是受到島外的力量的鼓舞。但是這些力量不包括美國政府。我們將看到，華盛頓寧願古巴繼續是西班牙的屬地，如果它自己不能并吞古巴的話。鼓舞古巴獨立的主要力量來自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他們希望幫助古巴從西班牙統治下解放出來，以作為對古巴愛國志士曾參加他們的軍隊作戰的報答。除此之外，革命領袖還知道，這個島一天留在西班牙手中，它對解放事業就繼續是一個危險。古巴是斐迪南企圖在美洲重新征服新獨立國家的一個基地。因此，在這一時期，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努力鼓勵古巴叛變以反對西班牙，這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一八二〇年西班牙自由主義者取得勝利以後，古巴革命者的活動反映在秘密團體的迅速組織方面。雖然有很多秘密團體表面上是兄弟會的組織，但是却公開承認它們的真正目的是“推翻現政府和建立古巴的獨立”<sup>28</sup>。古巴的共濟會支部，由於和美國、墨西

① 墨西哥的革命先鋒米格爾·伊達爾戈是一個顯著的例外，他是替印第安人和白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種債務奴隸講話的。

哥和哥倫比亞的共濟會有聯繫，在獨立運動中特別活躍<sup>29</sup>①。（西班牙事實上指責費拉德爾非亞的共濟會通過島上和它們有關的共濟會來煽動古巴革命<sup>30</sup>。）到了一八二一年，組成被人們稱之為“電鎖鏈”（“Cadena Eléctrica”）的組織，在古巴進行地下活動的這種革命組織如此之多，以致久居該島並且幾度擔任美國駐古巴領事的美國商人文森特·格雷在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向國務院報告說：“我深深地認為，如果有一個國家願意出面和用一支有力的海軍來保護他們，這個島將在一個月或不到一個月以內就會宣布獨立。我將這種情況秘密地告訴您。很多有錢的人由於害怕這個島會在今年獨立，正在出售他們的產業，打算離開這個地方。”<sup>31</sup>

在這個古巴獨立暴動時期，最著名的革命組織是一八二一年成立的“波利瓦爾陽光與閃電”（Soles y Rayos de Bolívar）。這個組織，像它的名稱所表示的，受到了哥倫比亞的影響。哥倫比亞是在解放運動領袖波利瓦爾領導下第一個取得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古巴這一組織的創始人有哥倫比亞的革命家何塞·費爾南德斯·馬德里德和在哥倫比亞海軍中擔任很高職務的海地革命家塞維雷·科托斯。但是它是由哈瓦那本地人何塞·弗朗西斯科·萊穆斯領導的。萊穆斯是一個獻身於共和主義的人，曾經參加過哥倫比亞陸軍，升到陸軍上校的地位。他在一八二〇年回到古巴，發現古巴人民對恢復一八一二年憲法比對獨立更為關心。萊穆斯受哥倫比亞共和國的委派到西班牙去執行任務；在西班牙，他和波利

---

① 一個研究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古巴獨立運動的學者說：“古巴共濟會組織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活動，以及它們在古巴獨立暴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應過分夸大的。”〔羅克·加里戈（Roque E. Garrigó）：《“波利瓦爾陽光與閃電”暴動的历史資料》（Historia Documentada de La Conspiración de Los Soles y Rayos de Bolívar），哈瓦那1939年版，第1卷，第153頁。〕但是，在討論共濟會在任何革命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時，必須把作為一個組織的共濟會和它的會員的個人活動分開。不幸的是，有很多贊同共濟會的學者沒有這樣做。不過，共濟會的精神對主張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古巴中產階級特別有號召力，而這種運動在古巴獨立運動中很重要。



瓦尔的几个亲信会商討論，結果认为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回到古巴，从事爭取古巴独立的工作<sup>32</sup>。

一八二一年萊穆斯回到古巴后，組織了“波利瓦尔阳光与閃电”。这个秘密組織要在古巴全島建立小組。萊穆斯一再旅行古巴各地，不声不响地建立了小組，这些小組包括了致力于古巴独立事业的妇女<sup>①</sup>。他向古巴所有的階級呼吁，尤其是向学生和穷苦的古巴白人呼吁，号召他們为爭取独立同黑人联合起来。它又秘密印刷傳单，在自由黑人中分发，号召他們参加独立运动<sup>33</sup>。萊穆斯的秘密使者将消息傳到島上最遙远的角落，并且有效地利用到处流动的小販。西班牙当局的一个报告指出：“卖衣服的人……到处煽动，鼓动人們起来革命，以反对現政府。”<sup>34</sup>

到了一八二二年十月，組織工作的效果从在古巴所建立的小組网中可以看出來。有些小組的成員有当地社会上的主要人物（如法官、民兵队的队长、甚至市长）。其他一些小組中，巴雷拉神父的学生和像詩人何塞·瑪丽亚·埃雷迪亚之类的知識分子也都是成員。在农村不少的小組中，种烟草的农民、小甘蔗种植园主和自由黑人以及奴隶聚在一起；正像預料到的那样，富有的克利奥尔奴隶主、富有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主参加这个革命組織的为数极少<sup>35</sup>。

“阳光与閃电”組織的成員沒有制服，但是每个成員都有一个圓徽章，上面有像光芒的折痕（这个徽章是萊穆斯設計的）。每一成員必須佩带一把小刀，有少数人有手枪，手枪有的式样很新奇，例如在手枪的把上有一把小弯刀可以当作小刺刀用。他們还儲藏了一些步枪，准备在暴动时使用。但是，这次暴动主要地是依靠西班牙当局組織和装备的民兵来供給取得成功所必要的武器。萊穆斯制訂的計劃規定，派遣經過挑选的成員参加民兵，当暴动的信号发出时，他們就带着枪枝和彈药投到革命方面來<sup>36</sup>。另外，还从墨西哥和哥倫比亚获得一部分武器来加强爭取独立的战士<sup>37</sup>。

① 唐尼亚·索科罗·曼塞博是萊穆斯亲密同伴之一，她是一个古巴妇女，为了古巴的独立事业，常常与西蒙·波利瓦尔通信。

当古巴仍然根据恢复了的宪法进行治理的时期，这次暴动却迅速而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这显然表明，对独立的支持的广泛超过西班牙人的预料。当一八二三年四月西班牙自由主义被“神圣同盟”所粉碎以后，暴动得到了甚至更多人的支持。而且，正在这个时候，消息开始传到古巴说，西班牙政府打算把这个岛出售给英国，借以偿付未付清的债务和收买英国，使它在西班牙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暴动者利用这些关于反动派联合起来反对西班牙自由主义的消息，以及古巴即将割让给英国的消息，把它们传给岛上各地。他们警告岛上的居民说，他们的自由也像西班牙的自由一样，处于严重的危险中。下面所引的未署名的通知，就是“阳光与闪电”组织的一群成员夹在一份哈瓦那报纸里的：

西班牙人和古巴公民们，战争的火焰已经在欧洲燃烧起来。光辉灿烂的原则的发展、代议制政府的建立以及自由宪法的采纳，已经使不愿承认任何不受国王支配的权力的欧洲国家君主惊惶失措。除了君主自己放弃的权利，人民不准有任何权利，人民也不准有君主们没有规定的权利或适合于君主们爱好的特权。受到这种动机的支配，他们正在侵入西班牙，决心摧毁保障人民权利、恢复人民权力和权威，以及确定国家性质的宪法。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欧洲暴君这一次联合会有什么结果。也许他们能够摧毁这个宪法；给国王以无限权力，钉牢压迫人民的锁链。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征服人民的斗争精神。不能。佩拉约、希德和帕迪利亚<sup>①</sup>的子孙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祖先的光荣和爱国心。但是，古巴公民，这次战争

---

① 鲁伊·迪亚斯·德比瓦尔是西班牙一首著名抒情诗所描写的英雄，他得到了希德(意为首领。——译者)的称号。他是十一世纪后期的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领袖。——一五〇年的《我的希德的诗》(Poema de mio Cid)是西班牙的一首有名的抒情诗。

佩拉约是西班牙早期的一个英勇的国王。在他被推为统治者以前，他曾经率领西班牙军队击败穆斯林。

帕迪利亚是十六世纪西班牙的革命家。

能够扩大，西班牙政府已耗去了它的全部资源和力量来保护它自己的独立，将不能对它的殖民地，特别是我们，给予你们已经习惯的保护、照顾和注意。现在有一种谣言到处传播，而且似乎是有根据的，据说，为了收买英国在这次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且以偿还过去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对英国所负的债务为借口，西班牙已经把你们富饶而勇敢的岛屿割让给英国；谣言还说已经有一支具有相当力量的舰队准备执行这个条约，实现这次割让<sup>38</sup>。

尽管这份通知没有指明古巴人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保护他们的自由和完整，但是它暗示需要采取认真的行动。同时，在“阳光与闪电”的小组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把古巴割让给英国的消息，将是起义的信号。设计好了上面写着“不独立毋宁死”的口号的传单<sup>39</sup>。莱穆斯起草了三个通告，准备先后发表，第一个通告将在起义那天发表<sup>①</sup>。在这三个通告中，莱穆斯列举了革命的原因和目的。由于这些文件很重要，我们值得把宣布古巴纳康(Cubanacán)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通告的要点详细地转载于下：

世界人民：你们再也不会看到由于我们的冷淡和可耻的不关心而在你们面前造成的政治现象。我们已经开始走上自由和独立的道路，只有这一条道路才能把我们带到繁荣和光荣的圣殿。最高政权将属于快乐的古巴纳康独立自主的人民。从今天起，和平将是我们的唯一主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友谊以及对外贸易的管理者。正像勇敢和正义的巴拉圭、智利、利马、布宜诺斯艾利斯、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新共和国的幸运的儿女摆脱了旧的沉重的奴役桎梏一样，富饶的古巴纳康岛上的英雄人民为了事业和结束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同一可耻的凌辱和苦难，将使我们的国家获得它在世界国家中应有的地位，增加美洲共和国的数目。

---

<sup>①</sup> 莱穆斯计划宣布起义的日期无法准确地判定，但是他在1823年七月底准备三个通告的事实表明，革命将在八月某时发动。通告没有载明日期。

我的可愛祖國的合法兒女們：由於我的得到人們信任的愛國心和對獨立的熱愛，我已經把自己獻給我已經愉快地開始進行的光榮事業……在今天把我們所有的人從沉重的奴役鎖鏈下解放出來……為了我們的鄉村和田野，你們應該熱誠地努力尋求在議會里有資格代表我們的忠誠和具有愛國思想的人，議會將組成共和國，為我們永久的幸福制訂適合於我們的气质、性格和情況的法律……親愛的祖國：我們以多么小的代價可以使你得到如此巨大的好處，這個幸福關係到你的每一個兒女的前途……不，我的祖國，你的兒女沒有一個人會成為叛徒或者對你的信仰漠不關心。你賦與他們所有的人以生命——他們都希望得到獨立和自由，只要從你高尚的心胸中摒除不應有的復仇思想，所有的人都將把他們的劍插入企圖奪取你的應有權利的暴君的血泊里。

西班牙人：……從今天起我們看待你們就像其他的人一樣：在和平中是朋友，在戰爭中是敵人。我們不願意放棄和你們的友誼，也不願意斷絕語言、血統和宗教上美好的關係；但是我們絕不再回到依附你們的狀態，也不回到依附任何國家的狀態。因此，我們在宇宙偉大的上帝面前宣誓：我們不是把我們的祖國從外國統治下解放出來，就是犧牲我們的生命。

古巴納康的兒女們：把我們已經開始的光輝事業繼續下去吧！我們沒有什麼可以畏懼的。即使有些國家不再像現在這樣慷慨地給我們以大量的幫助和有力的保護，我們在人數上和精神上都強大有力。我們的國家一切都很富饒。住在我們國家里的西班牙人不會那麼愚蠢，冒着財產和生命的危險，使自己成為我們的敵人。他們和其他移居這裡的人一樣，將努力改善他們在我們中間的生活，因為沒有一個人會這樣愚蠢和無知，以致不能分別一個共和國的公平法律和一個專制帝國壓迫人民的殘暴法律的不同。暴君斐迪南又重新恢復對不幸的西班牙的專橫統治，在那裡可以聽到宗教法庭和皇

家地牢受难者的号泣。他将消灭任何敢于热爱自由的人。那么在这个(古巴)土地上的西班牙人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们由于热爱西班牙而不欢迎这个岛获得独立，但是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地遵守我们共和国的法律，他们就会得到我们的好感……

古巴納康：讓我們向全世界宣布，我們要取消荒謬的級別和特權階級，它會滋長傲慢和愚昧，並且是和自由人的高貴品格不相容的。在真正德才之外，我們不承認任何別的不同。讓我們親切地對待不幸的奴隸，緩和他們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命運，同時我們國家的代表提出恰當的贖身辦法，而不使個人利益遭到損害。他們是我們自己的上帝的兒女。

聖壇的牧師們：你們是我們國家全體居民中最值得尊敬的人。向大家宣傳福音的教訓、熱愛共和國、犯罪的可怕以及遵守法令。不要忘記仁慈的耶穌的法律是完全具有共和主義精神的……

時間已經到了。履行你們的諾言，並且宣誓：“不要希望會從共和國的刺刀下得到憐憫。”

瓜達魯佩軍事總司令部。一八二三年張貼在哈瓦那的牆上。古巴納康共和國政府印刷<sup>40</sup>。

這個文件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萊穆斯談到了古巴的奴隸制度問題。顯然，新共和國計劃廢除奴隸制度，對奴隸主予以賠償並且允許黑人在古巴政府中擔任職務。（“在真正德才之外，我們不承認任何別的不同。”）這樣，萊穆斯就推翻了奴隸主們認為奴隸是“無知的和墮落的”，根本不配享受自由和在古巴共和國中有個地位的借口。的確，萊穆斯在給奴隸的信中已經號召他們參加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答應他們說共和國將廢除奴隸制度<sup>41</sup>。至少，在這一方面，萊穆斯的綱領比西班牙前殖民地幾乎所有的獨立運動的綱領都進步<sup>42</sup>。

在他的第二個和第三個通告中，萊穆斯提到了關於西班牙已

經把古巴島賣給英國的消息，他警告西班牙國王說，企圖消滅古巴的獨立運動是徒勞的<sup>①</sup>，他又具體地列舉共和國的目標說：

古巴納康人：全世界都知道，我們的國家已經到了政治改變勢在必行的階段。這是恢復它的人民的道德風尚，改善國家行政管理，任命德才兼備的人，保證有足夠的收入和適當的分配，消除殘暴地壓在臨時工人、雇工和海員身上的負擔的唯一方法。必須使人民受到不包含錯誤思想的公共教育，對每個人宣傳真正的物質和道德原則……

我國的居民們：無論是我部下的軍隊，或者是我自己，都從來沒有受到任何自私野心的驅使，也沒有受到我們共同得救和共同幸福以外任何別的利益的驅使。我們渴望成立一個代議制政府，所有共和國的軍人和我都將服從它的命令。除去在內心上對高尚的本心感到快樂之外，我們不要求我們的犧牲得到任何報酬……他們——在這一光榮事業中和我站在一起的勇敢的人們——在軍神面前和我一起這樣……

“張貼在哈瓦那的牆上……何塞·弗朗西斯科·萊穆斯……古巴納康共和國政府印刷。”<sup>43</sup>

在萊穆斯和他的部下為發表這些通告的那一天進行準備的同時，西班牙當局也為粉碎暴動計劃進行準備。比維斯總督的密探混進了秘密革命組織。比維斯在給馬德里政府傳遞他們情報的一封信中，把這次暴動計劃說成是企圖在古巴挑起種族戰爭的國外間諜活動的結果。“他們用盡各種手段和秘密方法，只能引誘許多年輕人、農民和一些黑人，指望他們能發出獨立呼聲（el grito de independencia）。”他並沒有發覺有任何大種植園主和這個計劃有關。他說：“我不斷地從這些人<sup>②</sup>獲得忠於國家，服從陛下的政府和熱愛秩序的極可靠的證明。”“他們知道，如果稍微有一點不安寧，

---

① “我們準備在自由中生活，不隸屬於任何國家，不論西班牙的專制政府或立憲政府，不能希望再使我們成為他們的談判的不幸對象。”

② 指大種植園主。——譯者

就会使島上的繁荣告終，而这里的财富是以现状为基础的。虽然，在对美洲大陆上所建立的各个共和国的討論中提出了荒謬的学說和民主的原則，使許多冒失的人产生了錯觉，打动了古巴年輕人的野心，但是他們并没有影响古巴社会上多数人的忠誠。”<sup>44</sup> 从比維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次暴动計劃的規模很大，它得到知識分子、青年、貧苦階級和黑人的支持，唯一反对的是富有的奴隶主階級。

比維斯在认为暴动将发生的前几天就动起手来。二十四個領袖被捕，其中包括萊穆斯和一个自由黑人，但是許多参加暴动計劃的人逃到国外<sup>①</sup>。在这些人中有什么塞·瑪丽亚·埃雷迪亚，他先逃到美国，然后又去墨西哥，在那里度过了余生<sup>②</sup>。由于許多領袖被捕或被流放，这次暴动計劃失敗了<sup>45</sup>。

但是，比維斯知道，这次运动已經在古巴土地上生了根。他向西班牙政府指出，因为有这么多的奴隶和自由的黑人，古巴的局勢仍然很危險，“肯定地，在发生任何革命以后，其結果只能像圣多明各島发生的，两个种族中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要被消灭”。所幸的是他以他拥有的有限力量鎮压了“阳光与閃电”的暴动計劃，“但是如果政府不同意我提出的补救办法的話，我没有保全这个国家的必要手段，也許我不能再做到这一点”。比維斯要求对他赋予統治古巴人的特別权力，特別对被圍困的堡垒的司令所赋予的“包罗万象的权力”<sup>46</sup>。

虽然比維斯一直到一八二五年才得到无限的独裁大权，但是他在島上实行了严厉統治。报刊完全受到檢查；禁止持有自由主义作品和任何性质的政治論文。为了避免处死或坐牢，成百的自

---

① 在糖厂里曾发生了几次奴隶暴动，但是它們被很快地鎮压下去（前引加里戈所著一书，第2卷，第140頁）。

② 埃雷迪亚虽然流亡国外，但是通过他所写的革命詩歌，他仍然是古巴独立斗争中的象征。他在一八三九年五月七日死于墨西哥的托卢卡。他由于所写的《尼亚加拉頌歌》这一首詩而在美国最知名。这首詩是威廉·卡兰·布莱恩特譯成英文的他的三首詩中的一首。

由主义的古巴人都逃走了。被西班牙判处死刑的費利克斯·巴雷拉神父逃到美国避难,在美国过着流亡的生活,直到一八五三年他逝世时,他没有回过古巴,这时巴雷拉已經是一个坚决的贊成独立的人。一八二四年,他在紐約办了一个支持独立事业的报纸。这个报纸的名称是《哈瓦那人》(El Habanero),被运到古巴秘密地在島上散发<sup>47</sup>。

一八二四年,海軍少尉加斯佩尔·罗德里格斯所领导的暴动計劃被发觉和镇压了。比維斯于是強調在最近的一次暴动計劃中,奴隶被号召发动叛变,再一次請求給予无限的权力。这次西班牙政府考虑了他的要求。一八二五年比維斯被授予无限的独裁权力,同时又設立了常設軍事执行委员会以代替法院。現在,商业、旅行、社交、甚至完全屬於个人性质的活动都受到軍人的監視。对所有报纸上的言論都实行严格檢查;公共集会被禁止;不許提独立这个“煽动的字眼”,甚至討論奴隶制度的害处以及公开談到政治改革也都被禁止;此外,还用詳細审查的方法限制外国人入境。一八二六年四月八日又頒布了一个特別布告,禁止輸入“所有反对天主教、王室、君主的权力和特权、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为臣屬或民族叛乱辯护的书籍”<sup>48</sup>。

四万名富有經驗的西班牙軍隊对古巴实行恐怖統治。在軍隊中不准任用古巴人当軍官;在財政、海关和司法部門也不准有古巴人当职员。特务和告密者钻入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并且报告行迹可疑的人;对勒索敲詐抗拒的人常常被判在土牢里終身单独监禁,不加审讯,連他們的亲友都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很多革命領袖都被捕下獄,其中包括克利奥尔著名的和富有的貝坦科尔特、桑切斯和阿圭罗家族的人。比維斯甚至还派了一名刺客到費拉德尔非亚去刺杀巴雷拉。这次阴谋失敗了。但是巴雷拉害怕他喚起独立的号召会引起尊敬他的古巴青年发动輕率无益的暴动,而且現在深信决心保持他們奴隶的古巴富有的种植园主不会参加革命运动,因而在一八二六年停办《哈瓦那人》报,放棄



了政治活动<sup>49</sup>。

然而，另外一些人賡續巴雷拉和萊穆斯所留下的斗爭。虽然共济会小组已經被一八二四年的国王命令所禁止，它們繼續进行秘密的爭取独立的活動。它和別的参加斗爭的人受到从哥伦比亚偷偷地运到古巴来的这样一些傳单的鼓舞，要对恐怖統治进行抵抗：

哥伦比亚共和国

哈瓦那人

古巴島的弟兄們。哥伦比亚知道你們的光榮斗爭。它不久将竭尽全力来帮助你們。暴君的統治在美洲已經到了末日，古巴就会取得它在世界国家中必須享有的独立地位。哥伦比亚的解放者和他的士兵向你們致以友好的兄弟般的敬礼<sup>50</sup>。

一八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奈耳斯紀事周报》登載了一則簡短的消息：“两个在太子港出生的青年剛从哥伦比亚共和国抵达古巴島。他們由于企图帮助古巴革命，在上月十六日被判处死刑，并在太子港絞死。”<sup>51</sup>在这則消息中沒有提到名字的两个青年都是卡馬圭人，一个是自由黑人曼努埃尔·安德烈斯·桑切斯，另一个是弗朗西斯科·德阿圭罗-貝拉斯科。他們由于对古巴独立具有热情，他們到了外国，先到美国，以后又到哥伦比亚，他們的目的是为了打入古巴进行准备。他們在牙买加和两个哥伦比亚校級軍官以及哥伦比亚海軍中校海地人塞維雷·科托斯会晤，制定了一个計劃，規定由这两个古巴人在古巴发动革命暴动，哥伦比亚将派一支远征軍予以支持。

一八二六年二月十九日，桑切斯和德阿圭罗携带哥伦比亚供給的武器，在卡馬圭南岸、南圣克魯斯附近登陸。他們躲在太子港附近一家糖厂里，同秘密的革命組織以及附近种植园和糖厂里的自由黑人和奴隶建立了联系。他們的活動被比維斯的密探所发现，因而遭到逮捕。

現在比維斯有了一個機會，說明他為什麼需要特別權力。過去所有暴動計劃者都由民事法庭審訊，因而得免一死。但是在一八二五年常設執行委員會代替了法院，德阿圭羅和桑切斯是根據這個新制度最先受審訊的暴動計劃者，他們被處以死刑，並于一八二六年三月十六日在太子港執行。這兩個一白一黑的古巴青年成為古巴獨立鬥爭中最早的烈士<sup>52</sup>①。

在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這十年里，最後一次叛變活動就是“黑鷹團”(Gran Legión del Aguila Negra)事件。“黑鷹團”是在墨西哥和哥倫比亞流亡的古巴人組織的一個秘密組織，它在一八二七年開始策劃古巴獨立運動。在一年內，它在哈瓦那、瓜納哈、雷梅迪歐斯以及島上的其他地方建立了支部。由於吸取以往的教訓，這個運動設法防止比維斯的密探混進來。雖然這次叛變活動最後在一八三〇年被發覺，而且遭到橫暴的鎮壓，但是古巴當局始終不知道誰是它的真正領袖。哈瓦那一個著名律師曼努埃爾·羅雀被懷疑是這個運動的領袖，但是沒有確切的證據。常設執行委員會對六名叛變的策劃者處以死刑以及對其他很多被懷疑和這次運動有關的人判處監禁；大概是因為比維斯不能確定被判決的人的確切作用，他將死刑減為無期徒刑<sup>53</sup>。

雖然關於“黑鷹團”叛變活動的內容人們所知道的很少，但是有兩點似乎是肯定的。一點是奴隸參加了這次運動；另一點是儘管有些富有的克利奧爾人參加，但是古巴的種植園奴隸主集團並沒有支持這次獨立運動<sup>54</sup>。

西班牙當局在破壞每一次爭取獨立的運動方面雖然取得了成功，但是贏得這些勝利並不單靠他們自己的力量。這些計劃之所

---

① 當然還有別的人死在獄里。《奈耳斯紀事周報》在一八二〇年六月十七日登載了下面一則報道：“上月二十二日雷內瓦雷斯將軍死在莫羅城堡。他最近住在新奧爾良，但是在一得到西班牙最近發生的事件(自由革命)的消息以後，就前往哈瓦那。他和其他幾個軍官一起被捕，罪名是企圖進行暴動推翻現政府，建立古巴的獨立。”(第17卷，1820年6月17日，第286頁。)

以失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富有的种植园主——奴隶主阶级——的反对。只有通过暴动才能取得独立，但是由于任何革命暴动都会危及他们对奴隶的控制，因此尽管西班牙政府实行殘暴統治，这些阶级都主动或被动地和西班牙当局勾結合作。即使他們在专制之下也很憤憤不平；即使他們也同情新成立的西班牙美洲共和国中克利奥尔領袖的某些目标，但是他們不願意走革命的道路，因为革命会减少他們的利益，或使他們遭到經濟破产。他們不仅不支持这个时期的独立运动，反而要求西班牙当局采取强暴手段鎮压叛变活动。

奴隶主阶级的反对实际上几乎决定了这十年內每一次独立运动的命运。但是在不小的程度上，这种結果也是由于美国政府所起的反动作用。这种作用經常被美国历史教科书长期造成的神話所掩盖，这种神話把新世界第一个共和国的政府描繪成为拉丁美洲所有初期独立运动的同盟者。現在讓我們分析一下美国所起的作用。

## 第七章

# 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形成

(1800—1823年)

我們已經敘述了古巴和美国貿易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不顾西班牙对它們貿易的多方阻撓和严格限制而在商业上紧密联系的情况。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方面。从一八〇一年托馬斯·杰斐逊第一次执政时起，美国有势力的人物对这顆“安的列斯的明珠”就发生了超过单纯貿易关系的兴趣。他們认为，古巴位于墨西哥灣的入口处，从佛罗里达几乎就可以望得見，因此，如果古巴掌握在美国手中，它就可以成为美国的防御屏障；如果落入其他国家手中，它就构成一种危險。他們还认为，一个强国占有古巴，就能控制通商要道，切断美国和西印度群島的貿易，封鎖密西西必河和威胁美国的东海岸。为了防患于未然，美国应当现在就采取措施占有古巴<sup>1</sup>。

因此，古巴在地理上接近美国这一事实，从十九世紀初期起，就被用来作为一项有利于古巴的更强大的邻国控制这个島国的政策的借口。

早期，在所有覬覦古巴的美国人中，以杰斐逊最为突出。“他比任何其他美国人……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前途”<sup>2</sup>，并且作为民主的具有生命力的和永恒的象征而屹立着的托馬斯·杰斐逊的一生，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表現了一些污点。尽管他在“独立宣言”中所用的字眼鼓舞了全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的被压迫人民，但他絕不是古巴独立的朋友。相反，正如一九四七年古巴全国历史学家大会所說的：“提出要把我們的島屿并入美国的首倡者是

托馬斯·杰斐逊总统……(他)一直主張將古巴并入联邦。”<sup>3</sup>

早在一七九三年，杰斐逊就对西班牙限制美国和西班牙殖民地的貿易感到煩惱，越往后他越感到憤怒<sup>4</sup>。在一八〇三年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后不久，杰斐逊由于确信西班牙絕不会容許美国同古巴自由地无限制地进行貿易，便开始考虑用各种方法来得到这个島屿。根据他的主張，美国在古巴的人員奉命注意有政治意义的事件，以便发现有沒有对与美国联合表示兴趣的迹象<sup>5</sup>。一八〇五年十一月，杰斐逊告訴英国駐华盛顿公使說，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冒險同西班牙一战，夺取佛罗里达。如果这样，“东西佛罗里达，接着还有古巴……都垂手可得。”<sup>6</sup> 杰斐逊甚至乐于同西班牙开战的这种想法，是因为在那时，正如他对麦迪逊所說的，可以不費大勁就能拿下古巴<sup>7</sup>。

虽然杰斐逊不断通信和策划如何得到古巴<sup>8</sup>，但是在一八〇八年以前沒有采取以并吞該島为目的的行动。这一年春天，西班牙人民为了阻止法国約瑟夫·波拿巴做他們的国王而同法国交战，杰斐逊趁机派遣詹姆斯·威金逊將軍到古巴去試探总督德索梅魯埃洛斯將軍的口气。威金逊向德索梅魯埃洛斯表示美国同情西班牙，但是指出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之間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沟，并向德索梅魯埃洛斯暗示，如果他能促成古巴并入美国，他会得到最大的好处。

德索梅魯埃洛斯并沒有被他所誘惑，威金逊的使命失敗了<sup>9</sup>。但是，当时西班牙認識到，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野心并不就此告終。在西班牙駐美国代办給馬德里国务大臣的一份报告中（送至哈瓦那），曾表示了如下的意見：威金逊的使命是使“墨西哥王国、古巴群島和波多黎各在美利坚合众国之下联合起来的”<sup>10</sup> 重大計劃的一部分。

一八〇九年杰斐逊离开总统职务，但他繼續就美国如何能拿到古巴的問題献策。他曾同他的后任麦迪逊总统商議，准备同拿破侖进行一笔交易，拿破侖把古巴交給美国，作为拿破侖能自由行动

以实现他在西班牙美洲建立帝国的计划<sup>①</sup>的交换条件。杰斐逊在一八〇九年四月写道：“这会使我们付出一笔代价，但我可以立即在古巴的最南端竖起一个界碑，并且在上面刻上‘到此为止’，作为我们在那个方向的界限。”<sup>11</sup>换言之，古巴将成为美国往南推进的极限。我们在以后将看到，这个希望是落空了。

麦迪逊对于和拿破仑缔结这种协定并没有和杰斐逊相同的信心。（连杰斐逊也承认，拿破仑的政策“太狡猾了，真令人捉摸不定”。）麦迪逊认为，拿破仑可能拿出东西佛罗里达作为上述让步的交换品，但拿破仑本人对古巴也怀有野心，他当时正在计划利用从海地来的法国移民来实现这一目的<sup>12</sup><sup>②</sup>。其次，非常奇怪的是，杰斐逊虽然确信“我们没有海军也能守住古巴”<sup>13</sup>，而麦迪逊对这一点则比较现实。麦迪逊知道，如果美国占领这个岛，当时美国海军实力太弱，不能守住它以抵制英国，而英国自己要想得到古巴，它就绝不会同意为美国所得<sup>14</sup>。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上策就是维持一个像西班牙这样弱国对古巴的主权，不许任何强国占据古巴<sup>③</sup>，并维持美国在岛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这一原则，以待条件

① 割让佛罗里达也将是这笔交易的一部分，但是杰斐逊并不认为佛罗里达真正是拿破仑应当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因为“一发生战争，佛罗里达就是我们的”，（《托马斯·杰斐逊文集》（The Writting of Thomas Jefferson），安德鲁·李普斯康（Andrew A. Lipscomb）和艾伯特·埃勒里·伯格（Albert Ellery Bergh）合编，华盛顿1904年版，第12卷，第274页。）

② 一八〇九年三月，在古巴的法国居民爆动了一次小规模骚乱，但很快就被平息了。之后，一个拿破仑分子阿列曼·德佩尼亚在哈瓦那被捕，他带有约瑟夫·波拿巴在他的领地上签署的三十封信。他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胡斯托·萨拉戈萨（Justo Zaragoza）：《古巴的暴动》（Las insurrecciones en Cuba），马德里1872年版，第1卷，第190—191页。）

③ 这是美国对西印度和加勒比地区总政策的一部分。按照弗雷德·里皮教授的意见，这一政策是在一八一〇年开始形成的，“它是和这一原理符合的，即控制一个地区，至少要达到被认为足以防止任何其他第一流强国控制这一地区所必需的限度，这一原理几乎像数学和物理定律一样不可改变。”（勒德威尔·李·蒙塔古（Ludwell Lee Montague）：《1714—1938年的海地和美国》（Haiti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14—1938）一书前言，北卡罗来纳州达拉姆，1940年版，第5页。）

更有利时再起而夺之。一八一〇年，麦迪逊指示駐在倫敦的威廉·宾克內宣布說：

古巴的地位使美国如此深刻关切古巴島的命运，虽然美国可能还没有什么活动，但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坐視古巴落入任何欧洲政府之手，因为欧洲政府可能利用它作为据点来危害美国的貿易和安全<sup>15</sup>。

一九四七年古巴全国历史学家大会在評論麦迪逊这一訓令时写道：“从那时起，并且繼續不断地，美国佬对古巴的政策是在古巴島还不便成为北美联邦的一部分的时候，繼續支持西班牙的主权”<sup>16</sup>。

虽然麦迪逊比杰斐逊謹慎，但他并没有放棄并吞古巴的念头。一八一〇年威廉·謝勒被任命为美国駐哈瓦那的領事。他奉命宣布，美国政府将不容許任何西班牙領土落入任何其他外国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謝勒又奉命探听古巴人对于加入美国的看法<sup>17</sup>。从上述指示中可以看出，謝勒是被派到古巴去鼓动归并运动的<sup>18</sup>。

謝勒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擴張主义者，他抓紧时机同古巴的归并主义分子取得联系，以便策划一次要求归并美国的叛乱。最初他报告說获得了一些成功。种植园主“似乎认为同我們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他們的幸福和繁荣是必要的”<sup>19</sup>。有一部分克利奥尔种植园主由于廢除奴隶論者在卡迪斯西班牙議會提出的議案而感到恐惧，他們便授权何塞·德拉阿兰戈和努涅斯·德尔卡斯蒂略同謝勒商議美国兼并古巴的可能性。他們告訴謝勒說，富裕的种植园主宁願归并于奴隶制受到保护的美国，而不願意因为有可能通过的立法而冒喪失他們的財產的危險。美国也会得到好处，如果古巴“成为联邦的一个州。我們的地位保证密西西必河的航行，我們的港口，我們的土壤，我們的气候对貿易和农业提供难以相信的資源；我們的島屿所具有的这些有利因素一旦为你們这样的政府所利用，不但能使我們富裕和快乐，而且会无限地增加你們国家的財富，你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sup>20</sup>。

但是，結果並沒有發生叛亂。一方面是由于西班牙議會拒絕了廢除奴隸制的建議。其次是因為德拉阿蘭戈告訴謝勒說，種植園主害怕英國會利用古巴想歸併于美國所引起的叛變作為借口來占領古巴。這就會造成一種“無政府狀態”，因為英國占領古巴必然引起奴隸叛亂。叛變的種植園主如果要想避免混亂，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朋友來幫助他們，和他們一致行動，並使他們的行動有力和威嚴”。因此，種植園主在採取行動之前，要求美國保證，它將用足以打破英國對古巴封鎖的軍事力量來支持他們的叛變<sup>21</sup>。

謝勒做了這種保證。一八一一年十二月六日，他在從哈瓦那給國務卿詹姆斯·門羅的信上寫道：“我提到，萬一他（德拉阿蘭戈）所畏懼的情形發生，美國的政策將是對他們提供必要的援助。我還說，‘你們的朋友應當信任美國人民。我們能夠在一切情況下支持和保護你們，如果你們對你們自己忠實的話’。”<sup>22</sup>但是，麥迪遜政府由於同英國在其他方面有糾葛，不願意對謝勒的保證承擔責任。胆怯的克利奧爾種植園主得不到華盛頓的保證，只好放棄歸併的計劃<sup>23</sup>。

謝勒的活動引起了各方的懷疑。一八一一年十一月，他被逮捕，並要他離開古巴。謝勒在動身前通知德索梅魯埃洛斯說，美國對古巴繼續保持現狀——也就是繼續作為西班牙的屬地——感到滿意，並且說，美國絕不許古巴島落入別國的手里。只要面臨這種危險，西班牙官員應當請求美國政府予以援助與保護<sup>24</sup>。

謝勒的使命反映了這個時期美國對古巴的基本政策。人們還可以記起，謝勒曾經向華盛頓報告說，在古巴有一個鼓吹獨立、要求廢除奴隸制度的革命團體，它的成員有些是黑人。這就是羅曼·德拉盧斯和華金·因方特所領導的運動。但他們並沒有和這一運動建立聯繫，也沒有對它給予任何鼓勵<sup>25</sup>。相反地，歸併美國的主張卻得到了鼓勵。當這一主張證明是沒有實現的希望的時候，西班牙占有這個島嶼實際上就有了保證。

謝勒在離開古巴之後不久，向國務院提出了一個關於組織拉



了美洲国家邦联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是把加勒比海各岛分给英美两国，而佛罗里达和古巴则划归美国<sup>26</sup>。

谢勒的计划并不是把西班牙殖民地组织成为邦联的唯一计划。另一个计划是曾经当过西班牙议会議員<sup>①</sup>的古巴人何塞·阿耳瓦雷斯·德托莱多提出的。他由于和圣多明各的革命力量共同密谋而有被捕的危险，他逃到了美国。一八一一年十一月，德托莱多通知国务卿门罗，说他已经到了费拉德尔非亚，要求门罗接见。财政部长亚历山大·达拉斯接见了并且多次与他晤面，以后安排他在华盛顿会见门罗。

德托莱多指出英国和西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增长情况，打算在美国的帮助下回到古巴，并发动叛乱，以便建立一个起初是在贸易上、然后通过归并在政治上和美国联系的独立的古巴政府。德托莱多引人注目地说，“为了我本国和美国的幸福，我准备冒任何危险。”他还计划利用他的本国岛屿作为基础，组织一个包括古巴、波多黎各和圣多明各在内的安的列斯邦联，这三个地方最后都要归并到美国。他深信，一旦古巴不再归顺西班牙，波多黎各就会立即步古巴的后尘。

门罗的直接目的是阻止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取得贸易霸权，而最后的目标是并吞古巴。他得到麦迪逊的批准，鼓励德托莱多执行他的计划。德托莱多已经准备动身“执行这一计划”，但是一八一二年美英两国发生了战争，因而门罗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援。德托莱多却没有去古巴，而是参加墨西哥的革命党人，后者正在企图把得克萨斯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以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保皇党人，充当间谍为西班牙政府效劳，他获得了赦免，一八一七年回到西班牙<sup>27</sup>。

在美国所策划的种种阴谋与叛乱活动并没有逃出西班牙人的耳目。一八一二年四月一日，西班牙驻美公使（虽然尚未获得美国

<sup>①</sup> 当西班牙议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西班牙海軍军官德托莱多正在卡迪斯，他被选为圣多明各岛的代表，因为在卡迪斯城没有一个该岛的公民。

的正式承认)唐路易斯·奥尼斯报告新西班牙总督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共和国的野心勃勃的打算也越来越多了……(在政界人士中)已經准备好了一幅地图……这幅地图把古巴島包括在这些界限之内,作为这个共和国的天然領地”<sup>28</sup>。

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間,美国駐墨西哥灣沿岸指揮官建議襲击哈瓦那,以防止英国利用它作为基地。他认为有一支三千人的小规模海軍就足够了。但是,麦迪逊拒絕了这一建議,因为当时政府已經有够多的問題需要解决,不能卷入一場同西班牙的冲突<sup>29</sup>。

一八一二年战争后若干年里,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深受以下事实的影响,即这个島屿正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而西班牙美洲其他地方則由于爭取独立斗争的破坏,貿易衰落。西班牙禁止同叛变的拉丁美洲殖民地进行一切貿易,虽然西班牙的海軍不足以实行封鎖,但它委派一帮私掠船在波多黎各和古巴海面扰乱美国和西班牙美洲的貿易<sup>30</sup>。因此,美国和这些新成立的共和国的貿易大大下降,它同古巴(在較小的程度上和波多黎各)正在日益增加的貿易从而加倍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凡从事古巴貿易的商业、航运业和其他行业都坚决主張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触怒西班牙,从而冒限制和这个島屿的貿易的危險,这便不足为奇了。在具体警告不要采取的行动中有:承认西班牙美洲新共和国的独立(尽管公众輿論叫嚷要求这样做);为了佛罗里达問題同西班牙作战;鼓励古巴的归并分子和独立运动。

承认新西班牙美洲各国的独立是一个有爭論的問題。从一八一〇年叛变开始时起,美国大多数人民就要求政府支援摆脱西班牙的独立斗争和承认新成立的共和国。在紐約市塔馬尼学会(当时是一个进步的組織)一八一〇年七月四日举行的国庆庆祝会上,人們举杯祝賀說:“南美洲人民——他們正从事自由的事业,并誓以他們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尊严来支持这一事业,就像一七七六年的大陆會議<sup>①</sup>一样——願我們不久就可以對他們欢呼,庆祝他們組成一个自由的、拥有主权的、独立的共和国。”<sup>31</sup>这仅仅是年复一

年在全国各城镇所发表的成百件贺词中的一个<sup>②</sup>。这些贺词通常要求美国政府承认这些新共和国。到一八一二年三月,《奈耳斯纪事周报》(一个鼓吹承认南美诸共和国的主要刊物)报道说,“群众赞成承认的情绪正对华盛顿发生影响。”这家杂志写道:“从这件事的现状来看,很可能美国在不久即将承认这些南美共和国为自由的、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sup>32</sup>

但是这证明了是一种主观愿望。直到过了十年以后,美国才给予正式承认。南美各共和国的朋友们要求改变官方的政策,即从严守中立的政策(严守中立的政策是在反对西班牙的叛乱爆发时采取的)改为给予承认的政策,但没有效果<sup>③</sup>。

进步的编辑威廉·里奇曾经问道:“难道我们能眼看他们继我们之后,蒙受比我们不知大多少的损害吗?难道我们眼看他们进行斗争而不希望他们获得成功并决心助以一臂之力吗?——不能,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事业,我们自己的斗争和我们自己的成功,我们对我们的成果不能无动于衷。我们的人民应该是最不会对委内瑞拉和伯南布哥<sup>④</sup>当地人的事业表示冷淡的人民。我们诚

① 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在一七七六年举行第三次大陆会议,宣布独立。——译者

② 以下是另外三个典型的贺词:

“南美洲。我们以友好的兄弟般的眼光注视着它的斗争。愿它不久可以在世界各国中取得它的平等地位。”

“西班牙美洲。愿华盛顿在天之灵保护它的军队,鼓舞他们不屈不挠的勇气,但愿所有反对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人们在他们的武器的雷鸣声中倒下来。”

“南美各共和国——愿它们蓬勃发展的自由精神有像富兰克林那样的人来指导,像华盛顿那样的人来维护 and 像托马斯·潘恩那样的人来激励,以便壮大它们的力量。”

(《费拉德尔非亚国民通讯报》(Philadelphia National Intelligencer), 1811年7月16日;《路易斯安那(密苏里州)公报》(Louisiana (Missouri) Gazette), 1811年7月25日;《费拉德尔非亚曙光报》(Philadelphia Aurora), 1813年10月5日。)

③ 从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二二年三月八日最后给予承认时,美国一直实行严守中立的政策。

④ 巴西东部的一个州。——译者

攀地祝他們成功。”<sup>33</sup>

但是不幸的是，有一些公民，他們“不希望这些人成功”，有些美国的保守分子认为南美人民“不配自由”，认为他們太愚蠢无知、过分沉溺于宗教迷信，是永远不能治理他們自己的<sup>34</sup>。有人竟指責說，拉丁美洲的革命是受“英国人收买的耶穌会會員”指使的。他們的根据是，这些耶穌会會員因为在十八世紀被驅逐出西班牙領土而深感不滿，他們受英国雇用在西班牙美洲鼓动叛乱<sup>35</sup>。保守报刊大肆宣傳，說什么西班牙人惨遭“凶恶的巨兽波利瓦尔及其一伙凶手和盜賊屠杀”<sup>36</sup>。还有一些人說，“有色人种在这整块不幸的地区到处搶劫、屠杀、破坏和制造恐怖”，并且警告說，对西班牙进行反抗的革命一旦成功，它就会喚起美国黑奴进行叛变<sup>37</sup>。因此，美国政府絕不應該承认南美洲新成立的政府。《南方爱国者报》硬說，“我們非常担心这些（南美）省份的人民尚未充分准备好来享受那个偉大的恩惠和福澤——有条不紊的自由。”<sup>38</sup>

这些对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他們的斗争类似使我們国家获得独立的斗争”——的攻击，使美国的进步人士感到憤慨<sup>39</sup>。《費拉德尔非亚曙光报》的一位开明出版人威廉·杜安曾譴責“敌視南美独立的气氛弥漫着我們的許多报刊”。他指出，“对它們（南美各共和国）妄加評論，应当被认为是对每一个共和国发动的預謀的进攻，是敌視全体人类的事业。”<sup>40</sup> 赫济凱亞·奈耳斯（他主办的《奈耳斯紀事周报》一貫拥护南美各共和国）<sup>①</sup> 指責美国报刊被用来替欧洲的西班牙人服务……他們的軍隊获得胜利，就被称为光荣的新聞……既然如此，那么对美洲西班牙人表示悲观沉默，而报刊上只是零星片断地刊载他們的新聞，这又如何解釋呢<sup>41</sup>？《紐約哥倫比亞人报》在一篇題为《南美独立的敌人》的文章中解釋了这一矛盾。文章指出，美国人民贊成南美独立，并且希望他們的政府

① 《奈耳斯紀事周报》第10卷，1816年3月—9月。这一卷的扉頁背面写有下列詞句：

“《紀事周报》編者謹以本卷献給爭取自由和独立的墨西哥和南美洲的爱国者，献給所有其他为爭取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而斗争的人們……”

采取合理的措施，特别是通过承认这些新共和国的措施，来帮助这一事业。不幸的是，人民的愿望，既没有在大多数报刊上，也没有在政府中——政府的中立政策是取悦西班牙的反动君主——得到反映。这反映了美国奴隶主的影响，他们由于有黑人参加如此靠近美国的斗争而惊骇；反映了同古巴和波多黎各做生意的商人的影响，他们想要姑息西班牙的斐迪南，希望他会同意增加这种贸易来往；也反映了华盛顿当局的影响，它准备牺牲南美各共和国的事业，以期保持有利于美国为了从西班牙手里得到佛罗里达而进行谈判的气氛<sup>42</sup>。

对历史的研究揭露了这些指责都是相当符合事实的<sup>43</sup>。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谈一谈《纽约哥伦比亚人报》所提到的各种影响之一，即商业利益集团所起的作用。西蒙·波利瓦尔在叙述美国政府对西班牙美洲革命实行的中立政策时称之为“商业上的打算”<sup>44</sup>，特别可以用来说明这一作用。

一八一八年，在费拉德尔非亚出版了一本无名氏写的小册子，书名为《西班牙美洲与美国，一个费拉德尔非亚商人对美国 and 西班牙殖民地积极贸易的看法》。这本小册子直接了当地说，同西班牙和它的忠顺的殖民地，特别是同古巴进行贸易，对确定美国政策应该起决定性作用。作者（詹姆斯·亚尔德）指出，每年有八万到十万桶<sup>①</sup>面粉输往古巴，从古巴进口糖蜜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九大桶<sup>②</sup>，糖七万八千大桶。他问道，敌视西班牙，因而危及这种贸易，特别是在同西班牙美洲独立地区的贸易这样无关重要，而在美国已经开始发生的经济萧条使继续维持同西属西印度的贸易如此紧要的时候，这样做是明智的吗<sup>45</sup>？

亚尔德的这种论调得到很重要的有钱人的赞同。费拉德尔非亚有一位保守商业银行家尼古拉斯·比德耳一八一八年三月写信给门罗总统说，他曾帮助亚尔德写那本小册子，他虽然承认“美国

① 每桶合三十六加侖。——譯者

② 每大桶合五十二加侖。——譯者

在心里”贊成承认叛变的西班牙殖民地，但是为了保持同西班牙忠順的殖民地的貿易，他极力主張繼續执行中立政策。不論承认叛变者有什么“高尚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理由”，“如果认为(南美)解放在商业上可以希望得到很大的利益，这完全是幻想……”在商业上得到利益的唯一希望在于执行严守中立的政策<sup>46</sup>。

在国会討論中立法案时，也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見解。一八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馬里兰州議員史密斯(巴尔的摩面粉工业与航运业的代言人)声称，承认会使我們卷进一場同西班牙的战争，从而“会使我們失去我們最好的主顾”。他詳尽地闡述美国对西班牙忠順的省份的貿易，特别是同古巴的面粉貿易，单凭这种貿易就证明我們严守中立是合理的<sup>47</sup>。

一八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巴尔的摩出版的《馬里兰督导》公开指責門罗总统和国务卿約翰·昆西·亚当斯仍然拒絕承认西班牙美洲的独立共和国<sup>①</sup>，是因为政界人士害怕：

美国承认南美洲的独立省份会引起同西班牙的战争，這場战争会破坏美国同古巴、馬尼拉（原文如此）、波多黎各、圣多明各的一部分以及仍属于西班牙君主的其他地方的貿易往来。

該刊物称，由于西班牙单凭自己的力量是絕對无法同美国作战的，这种恐惧也就沒有存在的根据了；至于西欧的其他海上国家，它們沒有一个会在一場可能产生恢复西班牙对壟断西半球貿

---

① 这是指国会中支持政府的力量击败肯塔基州参議員亨利·克莱所提出的議案，这个議案要求总统承认拉普拉塔(指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亚和巴拉圭四国。——譯者)的独立作为第一步。議案以一百一十五票对四十五票被否决。(《国会年鉴》，第15届国会第1期會議，第2卷，第1500, 1590—1591頁。)在肯塔基州累克辛頓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与会者为这“四十五人”举杯祝賀，因为他们投票贊成克莱的动議。肯塔基州議會通过決議，要求承认西班牙过去的殖民地，決議中有一段說：“……本州人民以极其激动的心情注視着他們南美共和国的兄弟为了摆脱和粉碎西班牙专制主义的桎梏所展开的爱国斗争……”(《奈耳斯紀事周报》，第14卷，1818年6月20日，第371頁)。

易的結果的戰爭中幫助西班牙。這個刊物然後指責“胆怯而自私的政治投機分子”低估西班牙的忠順的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願望。它說：

上述島嶼的居民依然呻吟于我們的大陸同胞所遭受的同樣的暴政之下，並且由於他們所處的地理位置，比大陸同胞一定更能珍視自由和同世界自由來往的幸福，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他們會對大陸發生的事情採取漠不關心的旁觀態度嗎？不會的，他們也同樣強烈地渴望獨立……可靠的事實是，正是在上述島嶼上已經有時燃起了叛變的火焰……

這篇文章最後要求政府執行一項新的政策說：

現在撇開所謂“清醒的統計標準”，因為咖啡業主的某些冷酷而教條主義的聖人可能以這種標準作為他們對得失的狹隘估計的根據。顯然，美國同西班牙屬地的貿易不會由於愛國者的成功或可能利於和促成這種成功的措施而受到損失；相反地，這種貿易會由於較開明的政府和貿易制度的實現而得到很大的好處。一切殖民地一旦擺脫西班牙的束縛和壟斷的操縱，是一定會採取這種制度的<sup>48</sup>。

但是，從事古巴貿易的商業利益集團更願意珍視已經拿到手裏的東西，而不願把希望寄托在未來的貿易關係上。正如阿瑟·惠塔克教授所指出的，大部分船主和商人反對美國承認西班牙美洲各共和國的獨立，“理由是，這樣做會引起同西班牙作戰。這種戰爭會破壞美國同忠順的古巴之間的有價值的貿易，使整個商船隊會遭到英國和受西班牙委任進行活動的私掠船搶劫。”<sup>49</sup>簡言之，為了保護這種“有價值的貿易”，他們贊成採取姑息西班牙的政策。同情南美各共和國的人，堅持認為這正是美國政府所實行的政策。惠塔克教授說：

一八一九年威廉·杜安曾問道，“誰能夠設想，華盛頓內閣的玩弄權術詭譎的政策不是馬德里宮廷所能接受的；美國政府間接和直接地敵視南美人的行動不是被斐迪南七世的背

信棄义的議會充分賞識和喝采的嗎？……在馬德里，有些人完全知道，只要独立的北美共和国像三十年前（即美国独立战争期間）的法国君主政府那样慷慨和尊重人类自由，在六個月內南美的独立一定可以确定。”<sup>50</sup>

看来，門罗有一个时期准备采取不仅是要促成南美的独立，而且要促成西班牙美洲其他屬地的独立的立場。据国务卿亚当斯說，一八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門罗“突然地要我去見巴格特先生（英国駐美国公使），要我通过他向英国政府建議，美英两国立即进行合作，以促成南美的独立”。当亚当斯問及是南美洲哪一部分的独立时，門罗回答說，“整个南美、墨西哥，島屿也包括在內。”亚当斯劝告总统說，他认为英国尚未准备好来直接考虑这一建議，“现在就討論細節，我立即发现是一种很露骨的主張。总统馬上放棄了这一主張。”<sup>51</sup>

由于当时亚当斯正参与执行一項他所贊成的計劃，即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佛罗里达，他对总统的建議撥冷水，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姑息西班牙的政策收到了效果，一八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簽訂了佛罗里达或橫貫大陆条約，美国同意由它出款偿付美国公民对西班牙的賠償要求（以五百万美元为限），作为取得佛罗里达的交換条件。虽然西班牙当时并没有得到美国“对南美不采取行动的保证”，但是門罗和亚当斯曾暗示，条約的簽訂将使美国不采取敌視西班牙的行动<sup>52</sup>①。

---

① 西班牙駐华盛顿代办馬特奧·德拉塞尔納并不放心。一八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佛罗里达条約簽訂后的几个月，他写信給馬德里的国务大臣，述及他称之为美国对西班牙的“冷酷的敌視”，他写道，“我敢奉告閣下，即便在国王陛下同意做出商定的割让和牺牲之后，这种（敌視）也不会消失，只要西班牙在巴拿馬地峽以北有一呎的土地，無論从不应有的野心，或从已經完全支配这个联邦的居民的貪得无厭地追求黄金的思想看来，这种敌視都不会减弱。”（赫罗尼莫·貝克尔（Jerónimo Becker）：《十九世紀西班牙对外关系史》（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España durante el siglo XIX），馬德里1924年版，第1卷，第479頁。）



在談判佛羅里達問題期間，古巴問題就突出起來。美國邊界即刻要推進到差不多從古巴海岸可以看得見的地方，這引起了英國報刊的一片叫囂。英國新聞記者要求英國立即占領古巴，以便對美國最近占有的土地有所平衡，只有這樣才能制止美國支配加勒比地區的推進<sup>53</sup>①。由於當時西班牙和英國正就古巴和西印度問題進行秘密談判，美國報刊認為，談判的結果把古巴割讓給英國是理所當然的<sup>54</sup>（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英西兩國談判實際上同割讓古巴或其他任何西屬西印度島嶼給英國無關，談的是禁止奴隸買賣問題）。許多報刊立即大聲疾呼，說美國應當先發制人拿下古巴，以應付英國的陰謀<sup>55</sup>。

當西班牙拒絕批准佛羅里達條約時，這種叫囂越發響亮了。但是，同古巴貿易有利害關係的商人立即表示反對對西班牙採取冒進的政策。他們認為，同古巴的貿易比佛羅里達更有價值<sup>56</sup>。

在佛羅里達和古巴問題上呈現緊張局勢的這一期間內，美國得到消息，說西班牙發生叛亂。《奈耳斯紀事週報》在一八二〇年三月四日指出，再也不用擔心會同西班牙發生戰爭了。“佛羅里達不費吹灰之力就會落到我們手中；我們相信古巴將取得獨立。我們雖然十分反對締結同盟，但是我們應當幾乎立即保證古巴獨立。古巴對我們利害關係如此重大，所以這個寶島仍應保持它目前的虛弱狀態，或由一個朋友來占有。”<sup>57</sup>兩個月後，該報更加積極：“鑒於西班牙新近發生了變化，我們害怕這個寶島會落到別人手裡的恐懼也就消除了。西班牙議會不會放棄它的主權；根據它的居民目前的傾向、它的气候條件和防禦手段，要用武力拿下古巴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sup>58</sup>

① 關於這一類大驚小怪的作品的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弗里曼·賡頓伯里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論佛羅里達讓予美國以及英國有取得古巴島的必要》。賡頓伯里認為，美國不久將威脅英國在海上的優勢。英國占領古巴將是唯一防止美國野心的保證。如果英國不拿這個島，不久這個島就會落入美國手裡，那時就會威脅英屬西印度。（《小冊子》（The Pamphleteer），第15卷，第262--280頁。）

到了一八二〇年秋天，在古巴作战的这一整个问题已成空論。关于英国即将从西班牙手中得到古巴的謠傳已經证明毫无根据。一八二〇年十月，西班牙正式批准了佛罗里达条約。

在談判佛罗里达問題期間，美国的某些集团曾一直抑制着他們要兼并古巴的希望。因为他們害怕得罪西班牙会破坏有利可图的貿易<sup>59</sup>。現在割让条約已經批准，于是他們就設法和古巴贊成归并的人建立联系。

美国奴隶主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們知道古巴要求独立的情緒正在高漲，也了解到島上奴隶制的廢除所帶來的危險。其次，他們害怕，如果古巴为英国或法国所得，它們会立即解放奴隶<sup>60</sup>。古巴奴隶制的廢除会对美国的奴隶制发生革命性的影响。奴隶主所以如此渴望得到佛罗里达，其原因之一是，美国占有它，“就可以永远使外国間諜不能煽动……黑人叛变。”<sup>61</sup>但是，如果古巴廢除奴隶制，这一道堤壩就会被破坏。在这一方面，記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八一九年以后的时期的特点是，在美国，奴隶叛变次数很多，規模很大，在一八二二年春，丹馬克·維西在南卡罗来納州領導的一次叛乱达到了高潮<sup>62</sup>。美国兼并古巴，就可以阻止島上廢除奴隶制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險，正如一位美国南方人所說的，“古巴廢除奴隶制会严重損害南方各州的利益。”<sup>63</sup>

我們已經看到，从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期間，古巴要求独立的情緒很强烈。的确，在一八六八年以前要求独立的情緒从来没有比这一时期更强烈。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贊成归并的古巴人想加入美国，特别是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早期。

实际上，这两种发展是密切联系着的。由于独立运动的开展有引起奴隶解放的危險，克利奥尔种植園主就指望有一个国家来保护他們的利益。在一八二〇年叛变时期建立的开明政权統治下的西班牙不是这样一个国家；而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古巴的西班牙官員还没有具备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对付种植園主-奴隶利益集团所面临的危險。最初，有些种植園主曾經作过由英国

或法国兼并古巴的考虑，但是他们因为英法两国的反对奴隶制的力量决心要废除奴隶制而有所犹豫。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反对奴隶制的事业获得了进展，这同样地使归并主义分子放棄这方面的活动。

因此，在古巴种植园主看来，美国就成为他们唯一合乎理想的选择对象了。在美国，不仅存在着奴隶制度，而且奴隶制度对美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古巴种植园主知道，美国南方奴隶主和他们一样，急于要阻止古巴的奴隶获得解放。最后，在一八二〇年正式禁止向古巴贩卖奴隶，虽然还未付诸实施，却使古巴奴隶主认为同美国合并有特别好处，因为美国同古巴不一样，美国国内的奴隶买卖很盛行，奴隶是由培育奴隶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州供应的<sup>64</sup>。

在一八二二年初，也正是策划独立的“波利瓦尔阳光与闪电”组织——该组织呼吁与黑人团结——在古巴取得进展的时候，赞成归并的分子活跃起来了。一八二二年二月，德拉华州参议员罗德尼收到了美国驻哈瓦那商业代理人约翰·华尔纳的一封信，这封信对美国的兼并分子是很大的鼓舞。华尔纳的商业合伙人卡斯蒂略先生——“他是岛上最重要的政客之一”，——告诉华尔纳说，“约占岛上白种居民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的当地人决心赞成隶属于美国——作为一个州而不是作为一个殖民地”。华尔纳认为同古巴归并主义分子领袖建立联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目的，他认为派遣一支海军部队和能胜任的谈判者到古巴去是适宜的。派军舰到古巴海面可以以当时反对美国贸易的海盗抢劫活动作为理由<sup>65</sup>。

从华尔纳的信（这封信后来转交给了门罗总统）中，美国官员们对于愿意归并美国的古巴人的人数有一种夸张的想法。这些美国官员被鼓励同古巴的归并主义分子取得联系。一八二二年夏天，停泊在古巴附近的美国“马其顿”号巡洋舰的舰长詹姆斯·比德耳就是这样做的。比德耳在八月报告门罗说，由“若干有名望和

有势力的古巴人”組成的代表团将前往华盛顿，請求会见总统，以便“了解我們政府对該島的看法”。

比德耳解釋道，这些人所代表的克利奥尔集团“本来很久以前就可以仿效他們在大陆上的同胞”领导一次反对西班牙的叛乱，沒有这样做是因为克利奥尔的“任何革命运动”都会遭到在古巴的欧洲西班牙人的反对；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类白人发生内战会促成奴隶制的結束和造成“黑人的优势”。归并美国是唯一合理的出路，因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能使古巴的两类白人联合起来。英国对奴隶制的政策使古巴同英国合并根本不可能，而欧洲西班牙人强烈反对大陆上的叛变的殖民地的情緒又使古巴同墨西哥或哥伦比亚建立任何联系成为不可能。“毫无疑问，同我国政府建立联系会是两类白人所大大欢迎的。”最后，比德耳向門罗建議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以慢慢地行动，而不要在古巴人一提出这种要求时立即接受<sup>66</sup>。

九月，有一个古巴代理人到达华盛顿，他的假名是“桑切斯先生”<sup>①</sup>，比德耳曾保证此人是可靠的。桑切斯以克利奥尔种植园主的名义建議把古巴归并美国<sup>67</sup>。門罗召集內閣會議，研究他的計劃。約翰·昆西·亚当斯的日記記載了內閣討論的要旨。所有閣員一致认为，把这个島交給英国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是他們对于应当采取什么途徑感到为难。

討論的問題是应当怎么做。卡耳豪恩先生极其希望古巴島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他說杰斐逊先生也有同样意見。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当避免两种危險，一种危險是这个島落入英国手里；另一种危險是黑人在这个島上发动革命。卡耳豪恩称，杰斐逊在两年前曾告訴他說，我們应当一有可能就把古巴拿过来，即使同英国一战也在所不惜；但是，由于对这一点我們还未准备好，而且由于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贏得時間，他认为，

---

① “桑切斯”究竟是誰还不得知。

我們对这一建議的答复應該是：劝他們放棄他們当前的打算，敦促他們在目前維持同西班牙的关系。

亚当斯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引起同英国的战争的行动。他建議告訴古巴人說，就眼前而論，美国总统无权答应接納古巴加入联邦成为一个州，即使这是在总统权限范围之内；“这个建議的性质也是我們同西班牙的友好关系所不許的。”官方的答复是根据亚当斯提出的拒絕归并理由的建議，但同时另外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答复。曾要求替古巴人提出上述建議的人提供更具体的情报，尤其是关于当前古巴归并主义运动的力量以及这种运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情报<sup>68</sup>。

从內閣的討論和決定中可以看出內閣大多数成員贊成取得古巴，但同时承认，在目前有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sup>69</sup>。人們对美国在古巴的間諜送来的說得天花乱墜的报告和桑切斯对島上归并运动的規模和成熟程度的估計，頗为怀疑。很显然，在此时采取任何以兼并这个島为目的的行动，可能造成美国极力要避免的一种情况：即欧洲国家抱着恢复和肯定西班牙在那里的統治这一公开的目的进行干涉，而干涉在最后会导致英国或法国对这个島的控制。

卡耳豪恩之所以最热衷于兼并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个南卡罗来納州人表示了南方奴隶主的意見，卡耳豪恩正是南方奴隶主的主要代言人。南方害怕古巴的革命运动結果会使奴隶得到解放，卡耳豪恩主張兼并的理由明白地反映了这一恐惧心情。但是連他也同意，采取这一行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兼并計劃並沒有放棄，只是推迟而已。代替的办法是暫時让古巴留在現在是欧洲的一个小国西班牙的手里；千方百計地阻止西班牙把这个島出賣或割让給任何一个欧洲海上强国——英国或法国。美国对古巴的各项政策集中于实现这一目标：維持西班牙的統治，直到条件成熟时再取得該島。

最后，意义重大的，在內閣會議中沒有注意国务院收到的报告里談到的越来越多的古巴爭取独立活动发展的证据<sup>70</sup>。鼓励古

巴独立，在当时并不构成美国政策的一部分。

当一八二三年，法国军队受“神圣同盟”委派开进西班牙以消灭自由主义和制宪主义的时候，美国被迫重新审查它对古巴的政策。当时面临两种危险：一方面是害怕法国会强索古巴作为恢复西班牙专制主义的代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以借款和其他方法援助西班牙的自由主义同法国和欧洲其他专制主义分子对抗，英国可能要求以古巴作为报酬。英国舰队在加勒比海出现——表面上说是来镇压海盗——只是向美国报刊证实，英国和西班牙的自由主义分子正在进行勾搭。尽管英国通过它的驻华盛顿公使正式否认英国对该岛怀有任何野心，美国也并不完全感到满意<sup>71</sup>。

一八二三年三月和四月，当英国的野心最受到怀疑的时候，内阁又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古巴问题。卡耳豪恩对于英国有可能得到古巴，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废除该岛奴隶制的行动的危險，尤其感到焦躁。从上次内阁讨论以来，他主张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现在主张同“英国作战，如果它真打算拿古巴的话”。亚当斯则认为，“他们不能维持自己的独立，而且，如果英国想拿古巴的话，美国不会也不可能以战争来阻止它取得古巴”，这是势所必然的。当时有人主张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一局势，但亚当斯驳斥了这种想法，认为这样做是荒谬的。他在他的日记上摘记道：“备忘录——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冷静。”<sup>72</sup>

对于采取什么行动没有作出决定，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应当设法搜集更多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情报。为此目的，托马斯·朗戴尔被派到古巴去搜集有关该岛政治局势的情报。他对任何问题不应表示态度，只是说“(美国)政府主要的希望是古巴继续维持它同西班牙的政治关系，坚决反对把这个岛交给任何其他国家”。他不得赞同任何主张美国予以合作以改变当地人民的政治状况的建议，而且要把这种建议报告亚当斯<sup>73</sup>。朗戴尔之行的官方托辞是，他必须得到一八一九年条约所规定的某些有关佛罗里达的文件。

当亚当斯告诉内阁说，美国不会冒险作战来阻止英国取得古

巴这句话时，他是否表示了政府的既定意见，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月之后，亚当斯在给新任驻西班牙公使休·纳尔逊的训令中写道：“把古巴交给英国将是有损联邦利益的不祥事件……我们是否有权利和力量，在必要时用武力来阻止这一事件的问题，我们的会议已经不得不加以讨论。政府为了履行它对国家的职责，已经被要求至少利用在它权限范围之内的一切手段来提防这一事件的发生。”<sup>74</sup>

由于纳尔逊将在法国军队进军推翻西班牙制宪主义者的同时到达西班牙，亚当斯谨慎地指示纳尔逊在即将发生的冲突中应采取什么立场。亚当斯趁此机会详尽地表明了美国关心古巴的动机以及美国为将来的兼并留有后路的决心。这一历史性文件包含了以后许多年中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基本要点，因此值得在此详细引述：

西班牙在南北美洲的统治权已经无可挽回地丢掉了，这一点可以认为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但是，古巴和波多黎各这些岛屿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它并且到目前还真正地依赖于它，西班牙仍有权把它对这些岛屿的统治权和对它们的占有权交给其他国家。这些岛屿是北美大陆的天然附属物，其中有一个岛（古巴）几乎从我们的海岸就可以望得到。从许多方面来考虑，古巴对我们联邦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已成为超越一切的重要目标。古巴处于控制墨西哥湾和西印度海的地位；位于我们南方海岸和圣多明各岛之间；有安全而广阔的哈瓦那港，我们在它对面有一条很长的海岸线，但缺乏上述有利条件；古巴的生产和它的需要的性质，能供应物资和需要一种对双方极其有利的商业往来，总之，从我们的国家利益讲来，这些使它具有一种非任何其他国外领土所能比拟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下于使联邦各州结合在一起的那种重要性。

上述一切确实是形成了该岛和我国利益之间的地理、商业、道义和政治关系，在瞻望未来短短半个多世纪形势的可能

发展方向的时候，几乎难于抵制这种信念，即古巴归并联邦共和国将是联邦本身的继续生存和完整所不可缺少的……。不仅有物理引力定律，而且还有政治引力定律。如果由于暴风雨而被从树上打下来的苹果只能落在地上，别无选择，那么被强迫脱离它同西班牙的不自然的关系而又不能自己维持的古巴，也只能倒向北美联邦；而根据同一自然规律，北美联邦不能把它从自己的怀抱中扔出去……

但是，亚当斯指示纳尔逊在马德里这样说：“美国政府希望古巴和波多黎各能继续保持同独立的立宪的西班牙的关系。你还可以说，美国对于在这个岛上可能订出来的任何脱离西班牙的计划没有表示赞同。”亚当斯在结束这个洋洋一万余言的冗长的备忘录时，提出了让美国领事进入古巴和波多黎各的要求<sup>75</sup>。

这就是几乎所有古巴人都嘲笑为“熟果”（“La fruta madura”，即“the ripe fruit”）的政策，用一九四七年古巴历史学家大会的话来说，这一政策的含义是美国“决心兼并这个岛，但愿耐心等待，直到古巴由于其本身的需要而自动投入北美国家的怀抱，届时，就不能不把它纳入美国的怀抱了”<sup>76</sup>。

然而，亚当斯并不是这个时期美国唯一主张“熟果”政策的主要政治家。一八二三年四月，在一次讨论古巴问题的内阁会议上，有人提出向英国建议，双方声明放弃兼并古巴的意图。但是卡耳豪恩和亚当斯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在将来束缚美国，结果他们的反对意见胜利了。杰斐逊赞同这一决定。杰斐逊从和一位名叫米拉利亚的古巴人的谈话中，了解到克利奥尔人反对同英国发生任何关系，因此他感到，美国没有义务白白地奉送给英国一种它不曾拥有的利益，同时又束缚美国的手足。他用反映“熟果”政策的话写信给门罗说：“因此，最好是静坐等待准备接受古巴自己所要求的那种有趣的合并。肯定的是，古巴加入我们的联邦，正是实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最大利益的力量所需要的。”<sup>77</sup>

门罗在答复中甚至更干脆地说：



我和你的情緒一直是一致的，那就是不能过分強調这个島的重要性。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應該趁最有利的时机把它并入我們的联邦，但願这种时机到来，使这件事可以完成而不致同西班牙或任何其他国家发生破裂<sup>78</sup>。

因此，当由双方声明放棄兼并意图的建議提出时，这一建議是由英国提出的。一八二三年夏天，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向美国駐倫敦公使理查德·腊希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建議，这一建議的結果是宣布門罗主义。坎宁在一封密信中建議英美发表联合声明，大意是說，西班牙要想恢复南美的殖民地是沒有希望的，英美两国都不打算为它自己占有任何这些領土；两国对于把这些領土的任何一部分轉交其他任何国家不能熟視无睹。虽然在建議中沒有具体地提到，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在两国政治家心目中，古巴前途問題依然隱約存在<sup>79</sup>。

門罗总统征求杰斐逊的意見，杰斐逊勉强地主張接受坎宁关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議，因为他看出，除非付出战争的代价，否則古巴是拿不到手的。但他又多少有点黯然地說：“坦白地說，我一直把古巴看做是能增加到我們各州体系中的最有趣的一块地方。”麦迪逊也主張接受这个建議，但他有一个問題，即“这样做是不是就不能再有获得古巴以及波多黎各等地的希望？”他的問題表明了这一希望，即仍有可能把这个建議只适用于业已叛变的殖民地<sup>80</sup>。

但是，亚当斯确信英国将反对欧洲干涉西班牙美洲，并且相信，不管怎么样，“神圣同盟要恢复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統治权的可能性不比琴博腊索(美洲的最高峰之一)沉入海底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拒絕用和坎宁一起发表自我克制的声明的办法来丢掉兼并的希望。正如他在他的日記上所写的，古巴或得克薩斯的居民都“会行使他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同我們联合”。他們对英国是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因此，如果和英国共同发表它所建議的声明，我們就是向英国作出一种對我們自己不利的而且也許是不方便的保证，并且实际上得不到任何东西作为交換……我們应当至

少使我們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自由行动，而不应当使我們束縛于可能立即被用来对付我們的任何原則”<sup>81</sup>。用更明显的話說，就是为了替将来兼并留有后路，門罗政府必須拒絕坎宁的建議。

亚当斯的意見占了上風，于是就告訴坎宁說，由于两国都了解到有发表声明反对欧洲国家用武力干涉南美的必要，因此最好是两国单独采取行动<sup>82</sup>。每一国单方面宣布它的政策。根据威廉·曼宁教授的解釋，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是想“避免做出任何事情致使当政治引力定律把古巴島投入美国的怀抱时美国却不能接受古巴”<sup>83</sup>。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門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了現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主义。这篇宣言一开始就声明：“南北美洲由于已經取得和維持的自由与独立状态，今后不应被认为是欧洲任何国家可以在将来进行殖民的对象”；宣言又說美国不会干涉欧洲的事务。最后，宣言在談及当前的危机时称，如果欧洲国家有“向西半球任何部分推行它們的制度”的任何企图，均将被美国认为是“危害我們的和平与安全的”。宣言称：

我們沒有并且也将不会干涉任何欧洲国家現有的殖民地或屬地。但是，对于已經宣布和維持独立，而我們已經……承认其独立的政府，我們对于欧洲任何国家为了压迫它們而进行的任何干涉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其命运的行动，除了认为是对美国的不友好的表示外，不能有其他的看法<sup>84</sup>。

門罗的咨文并没有提到“不得轉让”的原則——即美国将不承认或默认把美洲領土由一个非美洲国家轉让給另一个非美洲国家——但这一原則不久就和門罗主义联系起来<sup>85</sup>。提出这一原則不仅是为了防止英国或法国取得古巴，而且是为了防止該島的地位发生任何变化。

虽然門罗主义是由美国单方面宣布的，并且也从未載入法律、条約或国际协定，但是門罗主义曾經帮助已經获得解放的西班牙殖民地維持独立。同时，它还保证古巴将暫時留在西班牙手中。

（“我們……也將不會干涉任何歐洲國家現有的殖民地或屬地”）因而門羅主義關閉了英國或法國企圖得到這個島的野心的大門，而美國則準備等待時機，深信“政治引力定律”一定會使古巴落到聯邦的懷抱。

到一八二三年，美國政府只得接受這一事實，即眼前沒有什麼兼併古巴的希望。但它表明，它將不允許該島從西班牙轉入美國以外的任何其他國家手里。根據這些事實產生了一項明確的政策，即一方面竭盡一切努力保持古巴在西班牙的手里，同時避免承擔有朝一日，當亞當斯的“政治引力定律”開始起作用時，可能束縛美國手足的義務。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這個時期，從美國政策得到好處的主要是西班牙。現在我們將看到，主要的受害者是爭取本國獨立鬥爭的古巴人民。

## 第八章

# 美国与古巴的独立

(1823—1830年)

一八一〇年以后,来自古巴的革命分子一直在美国进行活动,以寻求对他們的独立运动的援助。这些革命分子和古巴的归并主义分子的代理人不同,他們沒有被邀請到白宮去,他們的計劃也沒有在內閣會議上討論过。給予他們以鼓励的是进步报刊、共济会組織和力量在不断增长着的要求承认南美各共和国的运动<sup>1</sup>。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sup>2</sup>,在一八二二年五月四日美国“很胆怯地”正式承认这些共和国的时候,古巴革命者产生了新的希望。但是以后就在同一年,由于到波多黎各去建立一个独立共和国的命运不幸的远征队遭受挫折,这种希望也就大大减少了。因为美国曾經被支持远征队的波多黎各人利用作为他們的基地,报刊譴責这一冒險行为,并警告美国人不要接近古巴革命分子,說他們“正在設法在美国获得支持,以便进行一种类似的解放古巴的冒險”<sup>3</sup>。紐約《晚郵報》就這一問題設法把全国报刊調动起来,其理由是,远征波多黎各激起了西班牙的憤怒,会对同古巴的“广泛的貿易”发生严重的影响。反对这种罪恶的冒險事业,不要让我国缺乏戒心和沒有經驗的青年受到西屬西印度其他革命分子的欺騙和参加他們的运动……这难道不是美国每一个主笔的職責嗎<sup>4</sup>?南方的报刊对泄露波多黎各黑人参加叛乱以及領導人企图解放奴隶的意图的消息表示震惊;有些报刊警告說,在美国的古巴革命分子对古巴也有类似的計劃。南卡罗来納州的《查理斯頓公報》在一八二二年十二月二日——在丹馬克·維西領導該州奴隶叛乱事件发

生后只有几个月——宣称：

古巴的阴谋叛变者正在试图步波多黎各狂人的后尘，德惠黑人叛变，反对古巴的白人。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实现这些计划，不仅是对那个美丽的岛，而且是对最近还由于上述狂人的行为受到危害的本州的利益和对整个美国的一种犯罪行为<sup>5</sup>。

对古巴革命者想得到美国援助的希望的最后的一棒是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保证美国不干涉西半球“任何欧洲国家的现有的殖民地或属地”，因而也就是告诉古巴的革命人士，他们不能期望在美国得到任何援助。门罗主义的这一棒特别凶猛，因为这是发生在西班牙专制制度恢复和比维斯总督建立的暴虐政权扑灭古巴一切革命活动的时期。人们可以记得，到了一八二五年，在古巴岛上已经建立了完全的军事独裁。在美国，担忧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仅有九十英里的独立的古巴会危及美国南方奴隶制度的人，并不认为这种军事独裁对美国制度是一种危险；相反，他们高呼比维斯是“西属西印度的一种具有建设作用的力量”<sup>6</sup>。门罗的继任者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对比维斯极为敬佩，亚当斯是在任西班牙公使时认识他的，认为他的政权——古巴历史上最专横的政权之一——颇值得赞美：

他（比维斯）正是能安定和使岛上的人民顺从他们的旧政府的人，而他这样有成效地达到了这一目的，以致在门罗先生执政的剩余时间内和我的整个任期内，美国政府没有再听到古巴打算叛乱的消息<sup>7</sup>。

亚当斯因此暴露了赞成“熟果”政策的人准备对古巴人民所遭到的恐怖毫不在意，只要那政策能使他们留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直至美国兼并古巴的时机成熟为止<sup>①</sup>。但是，亚当斯的话有一方面是不正确的，那就是，在比维斯统治期间，门罗和亚当斯两届政府不仅听到许多关于“古巴打算叛变”的消息，而且他们实际上和西班牙一起进行镇压。

古巴革命者的事业由于美国拒绝支持而遭到打击，在从这次打击中恢复以后，他们就转向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要求援助<sup>8</sup>。古巴的革命分子一直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活动，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得到了鼓励，得到了关于组织工作的建议和用以进行斗争的供应品。但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虽然本身也需要使这个岛不能成为反对它们的活动基地，但是却不能给予更多的援助。当时，两国都忙于同西班牙军队作战，无法腾出更多的爱国部队远征古巴；其次，两国都急于要赢得美国的承认。在争取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它们已经碰到了足够多的困难，更不能再得罪这个决心要使古巴留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政府，致使困难增加<sup>9</sup>。

甚至在赢得美国承认和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的统治实际结束之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也还不能对古巴的独立运动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一八二三年当古巴革命者的一个代表团抵达哥伦比亚并会见哥伦比亚陆军的桑坦德将军和瓜耳上校的时候，西班牙军队仍然坚守秘鲁。哥伦比亚领导人对古巴的事业深表同情，但他们明白地指出，“在波利瓦尔将军正在从事的解放秘鲁的战斗之外”，政府无力“顾到任何别的事情”<sup>10</sup>。古巴代表团成员之一何塞·奥古斯丁·阿兰戈<sup>②</sup>和开往秘鲁的哥伦比亚军队一起出发，终于会见了波利瓦尔本人。波利瓦尔重复了桑坦德和瓜耳已经告诉过古巴代表团的活。但他告诉阿兰戈说，他早已决定援助古巴人，部分是由于希望报答革命的古巴的拉斐尔·埃拉斯对哥伦比亚的英勇

---

① 亚当斯的事业在许多方面是以执行进步政策著称的，但是他对古巴的政策却是其中的一个污点。以后，他在任众议员期间，成为反对南方奴隶主的主要人物，而且是对美国奴隶制进行斗争的公民自由力量的一名战士。（参阅鲁塞尔·奈（Russel B. Nye）：《受到束缚的自由：公民自由与奴隶制的争论（1830—1860年）》（*Fettered Freedom: Civil Liberties and Slavery Controversy, 1830—1860*），密歇根州东蓝辛1949年版，第12、35—39、52、119、225、229页。）

② 大家会记得，阿兰戈本来是一个主张归并美国的人，但是当美国的政策使归并主义的事业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就积极地参加了独立运动。

貢獻(埃拉斯是哈瓦那本地人,他加入哥倫比亞軍隊,在同西班牙作戰中犧牲),但是,派遣遠征隊去解放古巴的時機還沒有成熟<sup>11</sup>。

甚至在一八二四年十二月阿亞庫喬決戰,秘魯獲得解放之後,“解放者”也還沒有準備以直接軍事援助幫助古巴的事業。他反而打算以入侵古巴和波多黎各相要挾,以便進行討價還價,迫使西班牙撤出它在大陸上的殘余部隊和承認南美各共和國政府。波利瓦爾於一八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利馬寫信給桑坦德將軍說:

依我看來,政府應當讓西班牙知道,如果在一定時期內哥倫比亞沒有得到承認和締結和約,我們的軍隊將立即開到哈瓦那和波多黎各。締結和約比解放這兩個島更為重要。“我有我自己的政策”——一個獨立的哈瓦那會給我們帶來許多麻煩,而威脅會比叛變更有價值。這筆交易如果進行得當,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如果西班牙人頑固的話,我們將採取行動<sup>12</sup>。

但是,在幾個月之後,波利瓦爾表明他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還是希望和平,但是表明“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將去哈瓦那”<sup>13</sup>。由於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遭到的困難和痛苦,波利瓦爾才漸漸地、也許甚至是勉強地,作出了援助古巴的革命事業的決定。

與此同時,墨西哥政府也作出了和哥倫比亞一起“到哈瓦那去”解放古巴和波多黎各,以便把西班牙從西半球完全趕出去的類似的決定。墨西哥總統維多利亞批准成立“古巴自由促進委員會”(Junta Promotora de la Libertad de Cuba),由在墨西哥的古巴人和墨西哥的志願人員組成<sup>14</sup>。這個委員會成立後不久,它的成員就包括了“墨西哥軍隊的主要軍官和國會兩院中最傑出的議員”<sup>15</sup>。

維多利亞總統對在墨西哥的古巴革命流亡分子答應予以有效援助以解放他們的國土之後,派遣了一個密使到波哥大,“建議墨西哥和哥倫比亞把它們的力量聯合起來並採取一致行動,使古巴在它們的共同保護下實現獨立”<sup>16</sup>。美國報刊開始登載墨西哥和

哥倫比亞的軍隊不久就要在古巴登陸的消息。費拉德爾非亞的《國民公報》在《入侵古巴》的標題下刊登了一個哥倫比亞海軍軍官的一封信，說有一萬人和一支強大的艦隊準備解放古巴<sup>17</sup>。《奈耳斯紀事週報》預言，“迫使西班牙放棄它對古巴的占有的遠征工作將是輕而易舉的，因為該島人民準備歡迎接待預期不久將由墨西哥和哥倫比亞來的入侵部隊。”<sup>18</sup>

在華盛頓，再也沒有別的新聞比這個新聞更不受歡迎了。以亞當斯的“政治引力定律”為根據的政策有破產的危險，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的兵力聯合起來，在該島的革命力量的支援下，顯然將結束西班牙在古巴的統治。同時，如果這個島解放，古巴的奴隸制度也將壽終正寢，因為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兩國政府以及古巴的革命運動都是贊成解放奴隸的。要想使在兩個西班牙美洲共和國的援助下獲得解放的獨立的、自由勞動的古巴趨向於併入保持奴隸制的美國（它曾拒絕一切要求幫助這個島取得獨立的呼喚），這種希望如此微小，可說是根本不存在。

無怪乎亞當斯總統的政府感到震驚，並且設法阻止解放古巴。亞當斯的國務卿亨利·克萊清楚地說出了亞當斯的動機。克萊曾從扮演支持南美各共和國獨立的戰士這一角色中得到政治資本，他曾經為了這些共和國發表了有力而動人的言論。一八一七年一月他在參議院要求承認南美各共和國時宣稱：“有人可能指責我在這一次輕率地表示我的感情，但是我不在乎。”他說：“當全體人民的幸福和自由處於危險；當居住在同一大陸的一部分的人民，我們的鄰邦，我們的同胞，仿效我們的榜樣，並和我們具有同樣的感情的時候，我將大胆地直言不諱地表示同情他們的情感和願望，即使冒這樣毀謗的危險，也在所不惜。”<sup>19</sup>但是，當一八二五年，古巴和波多黎各人民的“獨立、幸福和自由”“處於危險”時，他便隨意地忘記這些話了。克萊以後在給美國駐國外公使的一系列信件中，首先承認，由於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對古巴和波多黎各的聯合進攻會得到這兩個地方人民的支持，它的結果將是該兩島獲得獨立，這種



結果將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克萊說：

这一冒險事業获得成功絕不是不可能的。它們（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在地理上靠近這兩個島，兩國極其適應水土的軍隊將使兩個共和國的聯合行動有很有利的條件。如果在这一切之外再把重要而且盡人皆知的事實估計進去——即這兩個島上的居民的很大一部分將願意脫離西班牙，並且成為這兩個共和國軍隊的強有力的輔助力量——它們的成功几乎是肯定的<sup>20</sup>。

克萊接着指出了古巴廢除奴隸制度對南方各州的危險，並且提出這個島會成為第二個海地的“吓人”的說法：

如果古巴宣布獨立，那末，從它的人口之多寡和人民的特性來看，古巴似乎是不能維持它的獨立的。這種過早地宣布獨立或許會再度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況，古巴的一個鄰島曾經由於發生這種情況而成為遭受折磨的場所<sup>21</sup>。

美国的政策是明确的，克萊写道：“我国宁願古巴和波多黎各繼續隸屬於西班牙。我国政府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政治上的变化。”<sup>22</sup>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亚当斯政府采取了三个主要行动：

第一，让墨西哥和哥倫比亞了解，美国不能容忍西屬西印度的地位发生任何变化。当乔耳·波因塞特<sup>①</sup>被派遣到墨西哥城任駐墨西哥第一任公使时，克萊指示他立即通知墨西哥政府說，美国对远征队离开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前往解放古巴和波多黎各一事不能

① 波因塞特是南卡罗来納州人，一八二三年他曾在古巴住过几天。他离开时深信，美国当前应当以“古巴繼續屬於西班牙为滿足。”他还深信，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的入侵会引起島上大規模的奴隸暴動，因此美国应不遺余力地阻止这一“禍害”。（乔耳·波因塞特（Joel R. Poinsett）：《1822年秋……美国一公民写的墨西哥札記》（Notes on Mexico, made in the Autumn of 1822... by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費拉德尔非亚1824年版，第203—223頁；《国务院特使：波因塞特备忘录》（Memorandum of Poinsett, State Department, Special Agents）第3卷，第24頁起，存國家档案局。）

“置之不理”，“它(美国)的貿易、它的安宁和它的安全同古巴島盛衰兴亡的关系太密切，它不会漠不关心地目睹古巴島的情况和政治关系发生任何变化。”<sup>23</sup>

亚当斯—克莱战略的第二个行动是试图使西班牙相信，西班牙只有和它的叛变的殖民地讲和并承认它們的独立，才能保住古巴和波多黎各。如果西班牙承认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独立，这两个国家也就没有什么要侵略古巴的动机了。美国新任駐西班牙公使亚历山大·埃弗雷特被指示，要以尽可能的和解的态度来同西班牙政府打交道，但是一定要闡明美国的观点。克莱指出，如果没有讲和，大陆上的叛变军队也就不能遣散，而必然会被用来对付島上的西班牙部队。这种入侵肯定会成功，因为島上的人民会发动群众起义配合入侵，他們如饥似渴地久已想“摆脱西班牙的統治”。但是，克莱提醒西班牙注意，“美国理所应当地声明它一贯拒絕容忍这种傾向”<sup>24</sup>。

西班牙拒絕华盛顿的建議，从而打乱了亚当斯—克莱計劃。西班牙外交部首席部长唐弗朗西斯科·德塞亚明确地答复說：“陛下政府从未考虑把古巴島和波多黎各島割让給任何国家。本此目的，陛下政府坚决决定保持这些島屿在陛下政府合法的主权統治和管理之下。”他接着說，陛下政府十分諒解美国公使所表达的心情，但是，如果美国真正关心要使古巴繼續屬於西班牙，美国就应当保证馬德里政府对古巴的所有权。作为交换条件，美国駐哈瓦那的領事館将获得承认<sup>25</sup>。

美国政府断然拒絕做这种意味着放棄兼并該島的希望的保证。但是，埃弗雷特設法消除西班牙对美国意图的顾虑。他說，美国不承认“对那个地区的一切擴張……扰乱該島的对外安宁，和使西班牙帝国瓦解的計劃”。但是，西班牙仍然不肯让步<sup>26</sup>。

美国計劃的第三个行动是向被认为能够对馬德里发生影响的欧洲各国呼吁，請它們对西班牙施加压力，迫使西班牙让它的正在叛变的殖民地独立。克莱写信給美国駐俄国、法国和英国的公使，

指示他們要求这些国家支持这一計劃。他們应当強調指出，西班牙承认这些新国家的独立会有好处，因为如果繼續企图收复这些国家，就会使西班牙再丧失古巴和波多黎各。古巴获得独立的結果会是廢除奴隶制度和引起一場像海地发生过的种族战争。要应付这种局势，就需要在島上駐扎“大量外国军队”。欧洲国家可以促使西班牙现在就讲和，以免发生上述情况。最后，美国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看”古巴和波多黎各这两个島落入任何其他国家手中而置之不顾<sup>27</sup>。

这一行动也同样失敗了。法国政府表示，它对于劝西班牙这个“得意忘形或狂热的”政府讲和或面对实现，不抱有任何希望。俄国作出不起作用的劝说西班牙的姿态，这主要是为了敷衍美国公使，但是它报告說沒有获得成功。

英国則提出了一个反建議。坎宁认为对西班牙繼續保持古巴的最严重的危險不是美洲的新国家，而是海上列强。因此，他建議，美、英、法三国共同或单独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有占領古巴的任何意图，并且反对其中任何一国占領古巴。”西班牙对古巴的統治如果得到这样的保证和它对該島的忧虑解除以后，它就可以同它的叛变的殖民地讲和<sup>28</sup>。

坎宁的反建議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克莱宣称，这一建議不能阻止墨西哥或哥倫比亚入侵古巴，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問題。而且美国也沒有必要答应“不利用目前把古巴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的战争所可能产生的事件来謀取利益”。克莱一本正經地又說，“这是因为，美国的和平政策，美国的尽人皆知的溫和适度，以及美国为了实现和平已經自願采取的措施，都是美国能够克制的充分保证。”<sup>29</sup> 克莱的这个答复沒有讲出他拒絕坎宁的反建議的真正原因：美国希望能自由行动，取得古巴！

在暫時撇开美国根据亚当斯—克莱战略在欧洲进行的活动不談以前，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虽然宣布了門罗主义，但它却十分願意欧洲国家参加阻止一个美洲地区获得独立的运动。亚当斯—克

萊政策就是要求歐洲幫助阻止墨西哥和哥倫比亞援助古巴和波多黎各取得獨立和最後使美洲大陸擺脫西班牙君主的統治。正如研究門羅主義的最著名權威德克斯特·佩金斯所指出的，這一政策在很早以前就向拉丁美洲揭露出美國的自私自利的目的<sup>30</sup>。

同時，在墨西哥，波因塞特也竭力阻止入侵古巴。他利用“墨西哥忌妒哥倫比亞的心理”，告訴克萊說，如果認真“培植”這種忌妒心理，它會造成美國所希望的結果<sup>31</sup>。在波因塞特進行這一工作的同時，克萊為了拖延時間，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向墨西哥和哥倫比亞駐華盛頓公使遞交了內容相同的照會，要求“在一段有限的時期內，不派遣遠征隊進攻古巴和波多黎各”，以便讓俄國能夠繼續努力說服西班牙對叛變各國予以完全獨立<sup>32</sup>。這個照會也抄送美國駐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的公使，指示他們推行這一政策。

兩國對克萊請求拖延的要求都表示非常冷淡。在一八二六年初，在墨西哥國會中有人提出了一項提案，譴責美國的這一要求，並建議“授權政府和哥倫比亞政府一起派遣遠征隊進攻巴古島，以便保護古巴脫離西班牙而獨立並援助有許多證據表明他們希望獲得自由的居民”<sup>33</sup>。克萊對於他的要求遭到這種反應感到震驚，他拋棄了外交辭令，指示波因塞特警告墨西哥政府：美國將不允許把西班牙從古巴驅逐出去。波因塞特親自把這一警告送交維多利亞總統，維多利亞對於美國反對古巴獨立表示驚訝。波因塞特回答說，他的政府害怕墨西哥企圖兼併古巴。維多利亞總統於是向美國公使保證：

墨西哥政府既無意征服也無意占有該島。它打算派遣遠征隊的目的是幫助革命者把西班牙人攆走，萬一他們成功的話，就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

美國代表對於沒有更早一點發表這一聲明表示遺憾，因為墨西哥保持沉默，曾使美國對墨西哥的意圖有了不同的印象。但是，當維多利亞總統提議，如果美國撤回反對以建立古巴的獨立為唯一目的的入侵的主張，他願意把上述的話另寫成書面文字時，波因

塞特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波因塞特告诉克莱说：“虽然从这个政府得到这一保证肯定是好的，但是根据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来看，我反对由我国政府承担在将来保证古巴独立的义务。”<sup>34</sup>

美国代表对墨西哥的意图的担忧只是表明美国自相矛盾。从墨西哥国会的讨论中，波因塞特已经知道，入侵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古巴。但是他害怕入侵，不管入侵的目的是什么。他曾经写信给克莱说：“我最害怕的是，黑人可能被武装起来，并且被一方或双方利用作为辅助力量。”<sup>35</sup> 真实情况是，美国政府既反对以把古巴归并墨西哥或哥伦比亚为目的而入侵古巴<sup>①</sup>，也反对以实现古巴的独立为目的而入侵，上文所引克莱的通信透露出，他所反对的是以实现古巴的独立为目的的入侵。他坦白地说，鉴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入侵部队的实力和它们将从古巴革命者得到的援助，古巴取得独立实际上将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结果。

克莱不但拒绝了维多利亚总统所提出的保证古巴独立的要求，而且利用维多利亚总统的声明来再次对西班牙施加压力，要求西班牙承认它的叛变的殖民地。埃弗雷特奉命告诉西班牙，墨西哥是一心要使古巴获得独立，但是如果承认这些叛变的殖民地，入侵就可以被制止住，而“(古巴)居民所怀有的一切有关独立的想法将随着激起他们的战争状态的结束而消失”。但是当西班牙再次提出美国保证该岛属于西班牙这一建议作为对策时，国务卿再次加以拒绝<sup>36</sup>。于是西班牙也不理会美国要它承认它的叛变的殖民地的一切恳求。

亚当斯—克莱的卑鄙外交在欧洲失败了，西班牙拒绝了他们的主张，英国和法国不愿意劝西班牙改变它的主意，而俄国对此则

---

① 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墨西哥驻英国的代表向美国驻英公使詹姆斯·加勒廷建议，古巴在美国和英国的共同保护下实现独立。加勒廷把这一建议转达给克莱，但迅即遭到克莱的拒绝，因为这样做会使美国得到该岛的希望成为泡影。（1826年12月16日加勒廷(Gallatin)致克莱函，载《英国的来文》第33卷，存国家档案局。）

无能为力。但是，美国对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警告产生了效果，因为这些警告也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为了避免同英国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在还不知道拟议中的将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会议的意见之前，不得不把派遣墨西哥—哥伦比亚远征队去解放古巴的时间往后推迟一下。正如波利瓦尔将军在加拉加斯会晤古巴革命代表团时沉痛地向代表团所说的：

我们不能反抗同英国政府联合在一起的、决心维持西班牙对古巴和波多黎各等岛统治的美国政府；尽管美国这种决心将使我們经常处于警觉状态，并且为了击退我們的頑固敌人夺取这个岛的任何企图，将使我們支出很大費用<sup>37</sup>。

在巴拿马（当时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举行的美洲国家会议是西蒙·波利瓦尔所发起的。波利瓦尔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魯和玻利维亚的解放者。他发起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想成立一个由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共和国组成的邦联，来保卫这些国家新近取得的独立。正如波利瓦尔在一八二四年十二月七日召集会议的“宣言”中所写的：

为了美洲的自由而牺牲奋斗十五年，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将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保护我們新命运的保证制度。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那就是：使美洲各共和国（即从前的西班牙殖民地）彼此团结起来的利益和关系应当有一个根本的基础，它将使这些新政府能够永远的（如果可能的話），生存下去<sup>38</sup>。

起初，美国不在被邀请国家之列。但是一八二五年春，曾经探听过美国对参加这次会议的态度。亚当斯总统对此没有兴趣；早在一八二〇年，他就认为：“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既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也没有共同的原则”<sup>39</sup>。他现在依然保持这一看法。但是当一八二五年秋，他接到正式邀请书——邀请书中列举了将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时，他又有了別的想法。在哥伦比亚提出的议题中，有一项是建议会议“考虑各共和国共同派兵把古巴和波多

黎各等島从西班牙桎梏下解放出来是否适宜，并且如果认为是适宜的話，考虑各共和国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应提供的部队”<sup>40</sup>。当时波因塞特正在密切注視事态的发展，政府接到波因塞特的报告警告說，这一提案可能通过，因此建議派遣代表。代表可以表示美国的强烈反对意見，从而阻止會議接受这一計劃<sup>41</sup>。

这一情况使亚当斯总统改变他的意見并要求国会派两个代表到巴拿馬去<sup>42</sup>。他在一八二六年三月十五日致国会的特別咨文中着重指出，有派代表出席會議照顾美国在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利益的必要。咨文說：“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联合部队对这两个島的入侵，明显地是参加巴拿馬會議的交战国所要周密考虑的問題之一。”亚当斯強調說，古巴靠近南方各州，有为数很多的奴隶，一旦这些新国家确定古巴独立，这些奴隶肯定会获得解放，以及因而造成的对南方各州的威胁，这一切使政府必須对巴拿馬所計劃的事情参加意見。他向国会保证說，美国代表将利用他們的影响来約束新成立的国家，不让它們襲击古巴和波多黎各。“在这一方面，我們的全部努力将是为了維持現狀，維持島上的稳定和島上居民的安宁与安全，除此以外，对这个問題沒有詳談或說別的話的必要。”<sup>43</sup>①

亚当斯的咨文在报刊上和国会里引起了广泛的討論。《奈耳斯紀事周报》贊成派人参加會議，作为从英国的竞争中保护美国商业利益的一种手段<sup>②</sup>，但是它不同意为了阻止派遣远征队解放古巴而派遣代表。“使西班牙丧失古巴(西班牙残余殖民地中最富裕的一个)是正义之举，并且肯定地說，古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各新共和国并肩存在，将是最合美国人民的心意的。”<sup>44</sup>但是，南方的报刊几乎一致认为，这种會議是对奴隶制度的一种威胁，首先是因为拟議中的計劃是要对占有古巴的西班牙发动入侵；其次是因为新成立的拉丁美洲共和国廢除了(至少在紙面上)奴隶制度；最后是因为也将在巴拿馬會議上提議廢除奴隶貿易。《南方使者报》最后說，“因此，我們看不出派遣使节参加巴拿馬會議有任何好

处”<sup>45</sup>。甚至有些北方的报刊所提出的,美国派人出席巴拿馬會議參加有关古巴問題的討論对奴隶主是最有利的論点,也沒有能打动南方的报刊<sup>46</sup>。

参議院外交委员会否决了总统所提出的派遣代表参加会议的建議。該委员会认为,美国在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利益不允許同計劃“侵犯这一利益的新共和国”討論它們的命运<sup>47</sup>。但是在国会辯論中,北方的发言人正是以这种利益为理由,敦促派代表去說明美国的意見。紐約的伍德呼吁說:“难道我們不該……派遣使节參

---

① 亚当斯的咨文中提到的另一个加勒比海国家是海地。亚当斯反对承认海地,而承认海地又是巴拿馬會議即將討論的問題之一。亚当斯这一立場激起了这个黑人共和国对美国的极大憤慨。安德魯·阿姆斯特朗从費拉德爾非亞写信給亨利·克萊說:“四月二十六日我收到来自太子港的信件,告訴我,那里已經收到了总统关于派代表参加巴拿馬會議的咨文:这个咨文引起了人們對我們的极大惡感,以致在一次大規模宴会上,当有人提議为‘美国的繁荣’干杯时,竟沒有人举杯祝賀,这一件事是和咨文有关的。人們认为在这种祝賀时应当喝冷水。”[1826年6月1日阿姆斯特朗致克萊函,載《領事书信集》,海地角第5卷,存国家档案局。]

亚当斯在承认海地問題上的立場,得到了国会中蓄奴各州議員的喝采贊揚。米苏里州参議員本頓解釋南方各州对承认問題的看法:“我們对海地、即原来的圣多明各的政策已經确定了……三十三年了。我們同海地有貿易来往,但是我們之間沒有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为了十一个州的安宁,不允許把黑人叛变成功所获得的果实在十一个州公开展覽出来。不允許黑人領事和大使駐在我們的城市里,在我們国家里夸耀,并向他們在美国的黑人同胞证明,如果他們进行类似的努力得到成功,荣誉将等待着他們。”(托馬斯·本頓(Thomas H. Benton);《国会辯論实录》(Register of the Debates in Congress),第8卷,第469頁。]

② “……这些国家对美国有无法估計的重要性,而且理应害怕我們的大敌(英国)在……(制造业)和(商业)方面可能成功地造成一种有利于它的强有力的情緒,而我們要消除这种情緒将是很困难的。”(第28卷,1826年3月18日。并請參閱弗朗西斯·萊霍耳特(Francis L. Reinhold);《对一八二六年在巴拿馬举行的第一届泛美會議的新研究》(New Research on the First Pan American Congress Held at Panama in 1826),載《西班牙美洲历史評論》(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8卷,1938年8月,第342—344頁。]



加这个会议，以便警告我们的同胞不要做（像入侵古巴）这种事吗？”<sup>48</sup>

南方議員拒絕了这一恳求，并且一致反对派遣代表。他们极力强调不要卷入“混乱的同盟”，但是《匹兹堡水星报》正确地评述这次争论说：“南方反对（派遣代表）的人夸大了混乱的同盟可能带来的危险，但是现在人们都知道，他们利用这一点来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保护奴隶制度。”<sup>49</sup>

反对亚当斯建议的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黑恩斯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奴隶主的立场，认为巴拿马会议对美国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是一种威胁。他警告说，南方“不会允许我们的姊妹州或联邦政府把它（奴隶问题）提出来讨论”<sup>50</sup>。南方各州的議員劝告说，美国与其派代表到巴拿马去警告反对入侵古巴，还不如以毫不含糊的言词让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立即知道，美国不会赞成以任何行动解放古巴，使它脱离西班牙，从而建立“第二个海地，以它不祥的黑暗阴影笼罩我们的海岸。如果真要派遣远征队，美国将使用它的海軍和陸軍，强使强盗和黑人屈服”<sup>51</sup>。

这一荒谬绝伦的建议引起緬因州参议员约翰·霍姆斯站起来表示抗议。他同意古巴和波多黎各“必须维持现状”<sup>①</sup>，但是，如果入侵发生而且奴隶叛乱随之爆发，美国在任何情形下一定不能干涉“叛变者”。他说：

我可以发誓，你们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的——公众舆论

---

① 但是，霍姆斯承认，拉丁美洲共和国对亚当斯—克莱阴谋阻止解放古巴的诡计感到痛心是有理由的。他说，“我们的亲爱的朋友，西班牙美洲人很可能这样告诚和埋怨说：‘你们曾经劝我们不要入侵古巴，以免妨碍俄国进行调停。我们确实没有入侵；西班牙得到了喘息时间，恢复实力，调停成为幻想！……试问你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竭尽全力破坏我们对古巴和波多黎各的每一计划呢？’”（《1826年3月緬因州（约翰）霍姆斯先生（Mr.（John）Holmes）在美国参议院关于派代表参加巴拿马会议问题的演说》，第18页。）国会曾经要求亚当斯总统在国会公布美国政府和美洲新国家就巴拿马会议和有关事项的往来信件，因此，人们得知亚当斯—克莱阻止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远征队解放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大致情况。

不会支持你们。这是一场在美国国界之外的战争，一场对外战争，是把人类淪于奴役的战争！在波托馬克河<sup>①</sup>以北，不会为你们提供一兵一卒，几乎没有人会为你们说话。如果有一个政府胆敢一試，这就是它自取灭亡。不，先生，北方的开明而谨慎的政治家同情他们保持奴隶各州的同胞。我们有一句格言：这是一种我们无法医治的病。我们能够给他们的唯一安慰是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如果加以干涉，只会使情形更坏。我们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派遣我们的军队、自由人的儿女到一个外国，为了镇压奴隶叛乱而成为刀剑疫癘的牺牲者，这是一种我们将永远反对的措施——我们绝不会服从这种措施的。即使想这样做，我们也做不到的——自由的信徒和人类解放的提倡者将大声疾呼，斥责这一支持奴隶制度的战争。甚至在奴隶居住的贫困地区也能听到他们的呼声，不久你们就会感到必须（从古巴和波多黎各）撤出你们的军队，以便维持国内的安宁<sup>52</sup>。

经过几个月的辩论（众议院连续讨论了四个月，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较短）最后通过派代表参加巴拿馬会议。除马里兰和路易斯安那两州外，梅森和迪克逊线<sup>②</sup>以南各州均投票反对<sup>53</sup>。《匹兹堡水星报》评论道：“反对参加巴拿馬会议的南方人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地方性的奴隶党。”<sup>54</sup>

克莱在给出席巴拿馬会议的代表指令中，再次声明美国“不允许该岛（古巴）政治控制权发生任何变化”的坚定决心，不论是把它转交另一个欧洲国家，还是“被一个西班牙美洲共和国兼并”。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古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岛上居民倾軋不和”，如果反对西班牙起义成功，以后不可避免地发生“悲惨情况，这种情况以前曾经在一个邻近的岛上出现过”。那时古巴解放了的黑人将设法煽动美国的奴隶叛变，争取自由。根据古巴已经取得独

① 流经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条河。——译者

② 即美国南北分界线。——译者

立这一事实，难道他們“不会想利用地理接近，种族来源和感情相同可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助长和鼓励叛乱 以便最后增强他們的事业的力量嗎？”

怕受古巴解放了的奴隶的感染的心理，使美国必須反对哥倫比亚和墨西哥任何入侵古巴的行动。出席會議的代表奉命提出美国有和欧洲国家站在一起反对南美两个共和国的可能，借此使派遣任何軍事或海軍远征队一事中止进行。我們值得用克萊自己的話把这个最后通牒詳加叙述如下：

古巴的命运对美国利害关系太大，以致不容許美国坐視以破坏方式进行入侵战争，或者坐視为了进行这一战争而使居民中的一个种族去反对另一个种族。采取这样的原則和动机，最后必将导致不是一方消灭一方，就是最駭人听闻的极端行为。美国的人道观念以及它有責任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战争感染和反对造成危险的先例，都迫使它(甚至冒失去墨西哥和哥倫比亚的友誼的危险，尽管它很重視这一友誼)不得不使用为維護它的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手段<sup>55</sup>。

古巴的学者长久以来就认为，美国坚决反对派遣解放远征队对巴拿馬會議所起的影响，使古巴的解放事业遭到挫折。一九四七年古巴全国历史学家大会举行會議并宣称：“美国佬反对派遣远征队，是巴拿馬會議未能就古巴和波多黎各独立問題达成明确協議的首要原因。”<sup>56</sup>

但是替亚当斯—克萊政策辯护的人却爭辯說，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場沒有产生影响，因为美国代表是在會議宣告休会后才到巴拿馬的(有一个代表在途中死亡)。因此，巴拿馬會議不能就解放古巴問題作出决定这一事实同美国所起的作用絲毫无关<sup>57</sup>。

这种看法忽視了这一事实：虽然美国代表沒有在會議上发表美国反对古巴独立的意見，但是美国的立場在巴拿馬是尽人皆知的。波因塞特当时同大会的討論情况保持密切接触，他着重指出，“各国全权代表对这个极重要的問題未能采取行动，可能是因为受

到总统(美国)有关这些岛屿的话的影响”<sup>58</sup>①。波利瓦尔本人也说过，美国反对墨西哥—哥伦比亚派遣远征队的态度在会议召开时已经昭然若揭，以致成为“几乎不可克服的事情”<sup>59</sup>。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当时被波利瓦尔委派去领导这一远征队（如果实现的话），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美国的反对使这次冒险事业不可能实现。他接着说，“我沉痛地说，美国政府就这样阻挠了古巴的独立。”<sup>60</sup>最后，克莱的后任、国务卿马丁·范布伦指示范内斯公使向西班牙政府解释，在巴拿马会议召开前和会议期间，西班牙能够保住古巴和波多黎各，主要地是靠美国的力量：

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邻国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把这两个地方看成是陆海军的兵工厂，它在任何时候都使西班牙能够威胁两国的贸易、甚至危及两国政治生存。这两个国家以忌妒的眼光觊觎着西班牙在美洲力量的这些最后残余，它们曾经一度把它们兵力和武装联合起来，准备进行攻击，如果攻击成功，就将永远消灭西班牙在地球那一部分的势力。这次攻击主要由于美国政府的适时干预而被制止住了。美国政府本着对西班牙的友好精神，和为了维持一般贸易，因而帮助天主教陛下政府保存了它的殖民地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sup>61</sup>。

埃维利欧·罗德里格斯·伦迪安在他的《巴拿马会议与古巴的独立》(El Congreso de Panamá y la Independencia de Cuba)

---

① 这是指上面谈到的一八二六年三月十五日亚当斯的咨文。亚当斯在咨文里表示了美国反对墨西哥—哥伦比亚派遣远征队的立场。很有意思一提的是，比维斯总督在古巴大量散发这一咨文，以期阻止革命活动。《奈耳斯纪事周报》在报道这一事实时指出：“这些事情是我们南方兄弟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记住，虽然他们所怕的事可能不会现在就发生，但应当估计到。”（第30卷，1826年5月13日，第186页）关于比维斯害怕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入侵的证据，见何塞·佛朗哥(José L. Franco)编：《古巴国家档案中有关委内瑞拉的历史的文件》(Documentos Para la Historia de Venezuela existentes en el Archivo Nacional de Cuba)，哈瓦那1960年版，第100—102页。

的論文中写道：“解放古巴这一伟大事业就这样遭到了挫折。如果美国沒有干涉的話，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解放部队已經把古巴建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就会使我們提早七十年独立……也会使我們几代免于残酷和长期的斗争、破产和殉难、在断头台上牺牲和死亡。”<sup>62</sup>

美国一直实行这一可耻的政策，竭力阻撓改变古巴的地位，这一政策不仅使古巴人和美国疏远，而且也使拉丁美洲的新国家和美国疏远。在巴拿馬會議以后，英国駐哥伦比亚公使道金在一八二六年十月十五日报告乔治·坎宁說，整个拉丁美洲都疑心美国。“我认为，对美国的一般影响是用不着害怕的。在哥伦比亚，美国确实有影响，但由于美国反对攻击古巴，因此即便在那里，美国的影响也大大削弱了……。”<sup>63</sup> ① 拉丁美洲国家看到，当美国政府想破坏一项有利于西班牙美洲国家的計劃时，它就会毫不犹豫地 toward 欧洲寻求援助，同时也看到，这不过是美国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其美洲邻国的利益而已<sup>64</sup>。

因此，可以說，古巴人对美国一长串的抱怨不滿早在一八二〇——一八三〇年就开始了。一八四九年，有一个古巴人在紐約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美国政府伤害了古巴人民的自由》。作者承认，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爭取解放的偉大斗争期間，并不是所有的古巴人都贊成他們的島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克利奥尔种植园主害怕独立会結束島上的奴隶制度而反对古巴独立，这只是古巴仍处在西班牙的統治之下的一部分原因。但是他接着說：

古巴人之所以沒有粉碎压迫他們的鎖鏈和沒有上升到自由人的行列（所有的古巴人都渴望这样做），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牢牢地釘死了这一鎖鏈。沒有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是不

---

① 对美国的敌視使坎宁有机会以牺牲美国来加强英国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在墨西哥的势力。（里皮(J. F. Rippey):《英美在拉丁美洲的競争(1808—1830年)》(Rival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over Latin America, 1808—1830), 巴尔的摩 1929 年版, 第 172—175 頁。)

知道这一点的……。一八二三年，在一次規模很大的叛变計劃（“波利瓦尔阳光与閃电”組織）由于缺乏經驗而失敗之后，全国奋发地繼續从事这一事业，并請求哥倫比亚和墨西哥給予援助，利用这种援助准备在一八二六年发动攻击，以期使古巴和波多黎各获得自由。当美国政府知道了这一計劃的时候……总統便在一八二六年三月十五日向国会提出特別咨文，說明这一計劃，并且保证，他将不遺余力帮助任何有助于維持西班牙在这个命运不佳的古巴和波多黎各两島統治的努力。……这样，这一計劃便遭到挫敗……。自由的事业、人道的事业、文明、西方的总利益、美国的便利，这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淨；華盛頓內閣公然反对使美洲能够完全贖身的圣战，并且不許英—美人民自己英勇燃起来的洗淨罪孽的火焰的新生火花傳到西印度群島<sup>65</sup>。

一八五四年七月，《新奥尔良小日报》駐哈瓦那記者报道，他对古巴人民普遍仇視美国的情緒感到驚訝。在对这一問題进行調查之后，他承认这种情緒是有其根本原因的：

其实，它（古巴）靠近你們的政府，对它至少不是一种幸福。讓我們回顾一下历史。在一八二六年，哥倫比亚和墨西哥准备派遣远征队入侵这个島，赶走西班牙人。美国政府正式通知这两个国家，美国不同意古巴的政治状况发生任何变化，这一計劃因而放棄了。古巴人以憤怒的心情回忆这一段历史，这难道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嗎<sup>66</sup>？

## 第九章

# 第二次改良运动

到了一八三〇年，积极努力为争取古巴独立的十年已成过去。西班牙当局依然指责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继续策划入侵该岛，但是这种指责在事实上没有什么根据。美国的反对态度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由于一八三〇年法国反动的波旁政府失败和路易·菲利浦登极，斐迪南七世已经完全失去法国援助他收复他的前殖民地的可能性。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由于不再受到西班牙的威胁，也停止了对古巴争取独立活动的援助，而一八三六年西班牙正式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使古巴人没有再从这一方面得到援助的一切希望。

获得独立的希望被新的努力所代替，这种努力是要在西班牙专制主义现有范围内实现改良。自从一八二五年总督被授予“包罗万象的权力”以来，西班牙的专制主义就变本加厉了。第二次改良运动的杰出领袖是何塞·安东尼奥·萨科、何塞·德拉卢斯-卡瓦列罗和多明戈·德尔蒙特。他们是年轻的自由主义者，受到革命时期的思想感染。他们以及其他和他们合作的人是十九世纪前几十年注意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产物。经济学会和大学（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改良运动的产物）传播关于政治经济学、哲学、化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新改良运动的领袖就是从这些学会和大学涌现出来的。萨科以后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作家；德拉卢斯-卡瓦列罗成为一个大教育家；德尔蒙特则以古巴文坛上的文学批评家和鼓舞者著称<sup>1</sup>。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改良运动的领袖，由于他们的社会出身和家庭关系，是富裕种植园主阶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意识大

体上反映了这一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他们提出的纲领，和一七九〇——一八二〇年第一次改良运动时期的纲领一样，包括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要求。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早期的改良者在一八一八年赢得了他们的基本经济要求——贸易自由，当时斐迪南七世开放古巴港口，允许外国船只进来，不受垄断性的限制。但是关税很高，对外国贸易仍然肩负沉重的负担。第二次改良运动企图取消或降低这种很高的关税。同西班牙的贸易现在确是比过去自由些；但是古巴贸易大部分是同美国和在较小的程度上同英国进行的（输往美国的糖和咖啡超过输往西班牙的）。到了一八三三年，大部分出口贸易和比例愈来愈大的进口贸易（即面粉）是同美国进行的<sup>2</sup>。

当然，美国和古巴改良者一样，也希望取消对古巴和北美贸易的歧视性关税。一八三二年九月，国务卿勒文斯顿写道：“我国政府对古巴的重要目标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而不受束缚的贸易，减轻歧视性关税……”<sup>3</sup>。美国对西班牙施加压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在这一年，对古巴港口外国舰只征收的吨税从二元五角美元减到一元五角美元<sup>4</sup>。

但是这种好处为时不久。西班牙商人和官僚政客如果要控制古巴的贸易，就需要征收更高的关税，因此他们极力反对降低吨税。他们得到了需要关税收入的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一八三二年末期，对美国的进口货规定了新的歧视性税率。两年后，西班牙把美国船运到古巴的美国面粉的关税提高到每桶九元五角美元，而西班牙船运来的面粉的关税每桶提高到八元五角美元。国会提高对来自古巴的西班牙船的吨税并对古巴的咖啡征收特别关税作为报复。古巴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受到严重损害，古巴的咖啡生产几乎被毁灭了，尽管在一八三四年的时候，美国人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古巴和美国之间的运输业，几乎处于垄断地位<sup>5</sup>。

古巴的改良者代表着受到这种关税战影响的最大的利益集团，因此他们要求结束这种关税战和取消一切阻碍同美国进行直



接貿易的障礙。古巴的改良者要求美國出口商有權把他們的貨物直接運往古巴，改變以往的做法，即西班牙船在美國裝上面粉、豬油和其他貨物運到西班牙，然後再運往古巴，這樣古巴人就要付出額外關稅和不必要的運費，使成本大大提高<sup>6</sup>。

在政治方面，改良者提出了二十五年前提出過的要求作為最後目標，即實行同化或自治，或兩者一併實行，也就是說，古巴人享有半島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包括在西班牙議會有代表的權利。但是，他們要求立即取消“包羅萬象的權力”，根據這一權力，該島實行戒嚴法，就像是處於被包圍狀態，“甚至最無害的活動也要受軍事檢查，嚴格審查報刊上的一切討論，禁止舉行公共集會，不僅不許使用獨立和廢除奴隸制度這一類的煽動性字眼，連公開提到政治改革也在所不許”<sup>7</sup>。改良者要求限制總督的權力，限制他目前對軍隊、郵政、報刊、奴隸貿易、監獄和島上各種活動的絕對控制權。

在社會方面，這一次運動的要求同先前的不一樣。第一次改良運動不僅要求繼續維持奴隸制度而且要求擴大奴隸貿易。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年輕改良者雖然贊成維持奴隸制度，但是反對繼續奴隸貿易。

為什麼有這種改變呢？

像我們已經指出的，改良者基本上代表古巴強有力的甘蔗和咖啡種植園主的利益。在第一次改良運動期間，所有甘蔗和咖啡都是靠奴隸的雙手勞動生產的。但是，在一八一九年採用了蒸汽機壓榨甘蔗。這對整個糖業的性質還沒有發生很大的影響；在一八三〇年，只有少數糖廠（主要是在馬坦薩斯和卡德納斯附近的糖廠）有蒸汽機。此外，咖啡種植園的勞動和過去沒有絲毫不同；它依然完全依靠奴隸勞動。因此，古巴絕大多數的生產者認為奴隸制度仍然是他們的繁榮所必需的。但是在古巴出現了為數不多的但很有勢力的較有遠見的種植園主，他們認識到採用蒸汽機生產蔗糖預示有一天目不識丁的非洲人將被一種新的工人所代替，這種新工人是工資勞動者，他們識字，因而能夠操縱用機器產糖的技

术。他們虽然在一八三〇年还不能确切預言这一变化将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这些少数人了解到,当有迹象表明糖业的未来需要将要求有一种不同的劳动进行生产时,增加非洲奴隶将是愚蠢的。他們认为,对古巴來說,正确的計劃应当是維持奴隶制度,但停止繼續进口奴隶<sup>8</sup>。

較有远見的种植园主还确信,尽管西班牙統治者自己的法律禁止奴隶貿易,但是他們却鼓励这种貿易,是有一种阴險动机的。增加奴隶人口,直到大大超过白人,这就会使白人更要依賴西班牙的統治。古巴白人会紧紧靠攏西班牙以求保护,防止“野蛮的黑人”叛变,从而保证西班牙对该島的絕對統治<sup>9</sup>。因此,希望摆脱这种专制主义的种植园主必然要反对奴隶貿易。

但是,在这里所說的,不应造成这种印象,以为这代表了有奴隶的种植园主階級多数人的观点。希望停止各种違法的奴隶貿易的种植园主主要是来自老的克利奥尔人,他們的种植园有足够的奴隶,他們和經營新的种植园劳动力不足的人不同,不感到有得到新劳动力的迫切需要。老的种植园主反对奴隶貿易,也是因为这种貿易使他們已有的奴隶的价值不能提高。停止奴隶貿易必然增加現有的奴隶劳动力的价值,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使这些种植园主的資本增加一倍。他們支持改良运动所提出的停止奴隶貿易的要求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sup>10</sup>。

但是,促使改良者要求廢除奴隶貿易的最迫切的动机,是由于害怕島上黑人的多数增加的结果,会引起像席卷海地的那种革命。甚至早期改良运动領袖和奴隶貿易拥护者德阿兰戈-帕雷尼奥,在他的晚年也害怕这种危險。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二年,他再三地写信給西班牙政府,要求消灭奴隶貿易。这些信件都被擱置起来,官方以外的人物都不知道有这些信件<sup>11</sup>。但是,《古巴双月杂志》(Revista Bimestre Cubana)一八三二年六月号刊载了何塞·安东尼奥·薩科以《剖析巴西》为題的文章,这是第一次对奴隶貿易問題的公开討論。

薩科并不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談这个问题的，“因为在发生利害关系时，这种观点是不会得到尊重的”，但是他指出，繼續奴隶貿易会危及古巴的将来，并且提到通过移民办法增加白人人人口的好处。他說，古巴一定不要成为第二个海地，并且描繪在人数占优势的黑人革命騷乱之后会出现一幅“民族生存悲惨的景况”<sup>12</sup>。

薩科絕不是鼓吹廢除古巴的奴隶制度的。他也絕不是預料在古巴的未来中黑人将有一个地位。他只不过是提醒人們注意繼續奴隶貿易所含有的危險。尽管如此，他的小册子激起了西班牙官員、商人和古巴大多数种植园主的忿怒。西班牙政府从古巴甘蔗种植园主的財富中得到很大的收入，因此西班牙政府无意考虑薩科的要求。总督从每一个偷运进古巴的奴隶身上，得到一份錢，在古巴的西班牙商人从这种非法奴隶貿易中获得暴利，因此他們都无意考虑薩科的要求。古巴的种植园主同西班牙商人一起縱容奴隶貿易，他們联合起来反对薩科的建議。只有眼光看得更远的島上最开明的人和年輕的克利奥尔人，“忠心贊揚(薩科的)有启发作用的思想”<sup>13</sup>。

一八三三年，在西班牙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古巴的改良者有了一定的希望。这些改良者认为，在西班牙統治下情况可能改善。斐迪南七世去世，他的女儿伊薩貝尔二世在瑪丽亚·克里斯蒂娜的摄政下继承王位。为了巩固她的女儿的王位，瑪丽亚·克里斯蒂娜不得不和自由派表示一致。她重新开放大学，宣布政治大赦，使数以千計被斐迪南流放国外的人回国。这一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变革以制定新宪法而达到高潮，这一新宪法虽然比一八一二年的宪法更为保守，却規定成立立宪政府，并且宣布举行議會选举。

古巴改良者的乐观想法很快地就被粉碎了。有一点是专制派和立宪派所一致同意的，那就是西班牙只有行使专制权力才能保持它的残余的殖民地。一八三四年六月，米格尔·塔康被派到古巴担任总督，以便推行这一政策。塔康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保王派，

曾在殖民戰爭中遭到失敗。他將成為古巴殖民史上所有總督中最被人厭惡的一個。他的前任比維斯和瑪麗亞諾·里卡福爾特雖然不以自由主義著名，但是他們曾經設法求得富裕的克利奧爾種植園主階級的支持。這兩個人認為，如果鼓勵種植園主使他們的利益同母國的利益一致，他們就會抵抗任何革命趨勢。

在一八三四年塔康到古巴以後，對種植園主寬大的政策就突然告終了。塔康認為，所有的古巴人，不論屬於什麼階級，都是把古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他認為這些利益基本上是和母國的利益對立的。他懷疑所有的古巴人，在他的周圍只有半島人和少數外國政府的代表。在西班牙對古巴的殖民政策中一直起重要作用的克利奧爾種植園主階級，現在由於塔康不分青紅皂白地憎惡所有古巴人，因此對他們的意見也就充耳不聞了。

塔康是古巴所受到的軍事專制的象徵。他是第一個充分利用一八二五年賦予總督的無限權力（里卡福爾特把他的絕對權力很大一部分交給下級官員）。引起賦予這種權力的緊急情況已經過去，但是這些權力仍然可以隨意援用。塔康證明這些權力可以成為多么可怕的權力。他的四年統治期間的特点是無情排斥違抗他的意志的人和監禁或流放懷疑現狀的人。改革的意見，不論是關於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方面的，都被禁止了<sup>14</sup>。

首先感到塔康的專橫的統治壓力的是何塞·安東尼奧·薩科。在比維斯統治最後幾年和在比維斯的后任里卡福爾特的整個統治期間，薩科一直發表文章，揭露西班牙統治的罪惡。在薩科的指責中包括：古巴的政府職位用來酬報朝廷的政治寵臣。但是薩科在觸及最危險的問題（奴隸貿易問題）之前，並沒有因為他的意見而遭到打擊。我們已經看到，薩科反對繼續進行奴隸貿易的小冊子激起普遍敵視。像多明戈·德爾蒙特所指出的，塔康本人也受到了影響，因為每有一個奴隸在古巴非法登陸，他就可以得到半盎斯的黃金<sup>15</sup>。因此，小冊子被沒收就不足為奇了。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七日，薩科從哈瓦那被流放到特里尼達德，又從那里被驅逐到

西班牙。薩科在西班牙獲得富有的改良派朋友的支持，攻擊塔康並要求廢除專橫的“包羅萬象的權力”。

在一八三六年，在塔康的暴虐統治的極盛時期，古巴改良者得到了他們長期希望的機會，把他們的主張向西班牙政府提出。西班牙的自由主義分子最後成功地恢復了一八一二年的憲法，這個憲法規定古巴在西班牙議會有代表權。在古巴的三個城市，違背了塔康的願望，舉行了選舉。在被流放中的薩科當選為聖地亞哥的議員時，塔康兩次宣告選舉無效，因此薩科到第三次才當選。另外兩個議員是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改良者，他們是分別從哈瓦那和太子港選出的。

這兩個代表到西班牙去會見薩科，他們同薩科一起起草了一個向西班牙議會提出的宣言，要求實行關稅改革，有效地實施禁止奴隸貿易的法律，結束塔康的統治，取消“包羅萬象的權力”，以及着手制定一個最後使古巴獲得自治的計劃。但是他們一直沒有提出這個備忘錄的機會。古巴的議員甚至沒被允許取得議會席位。唐阿古斯丁·阿圭列斯（一八一〇——一八一二年時期偉大的自由主義者）解釋說，他們被排斥的理由是，在一八一〇年和一八一二年准許美洲議員進入議會，結果導致喪失了大部分西班牙美洲。

憤怒的薩科帶領他的兩個來自古巴的議員同僚起草了一個著名的抗議書。抗議書是一八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在馬德里發表的，題為《當選為國家議會議員的古巴島代表的抗議書》（*Protesta de los Diputados electos por la Isla de Cuba a las Cortes generales de la nación*）。抗議書措詞坦率。它警告說，採取這種反動的政治行動只會加深古巴人和西班牙人之間的裂痕，除非立即加以改變，這種行動會激起對西班牙政府的空前激昂情緒<sup>16</sup>。

但是這一抗議書根本沒有發生作用。一八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頒布的國王命令，宣布現在將根據“特別法”<sup>①</sup>（*leyes especiales*）

---

① 關於將為古巴制定特別法的謠言從未履行。

来治理古巴島，古巴島各省不再派議員出席西班牙議會。命令的措辞暴露出对古巴人的輕蔑态度。命令承认这个命令可能“……为邪恶不义的人所不喜爱，这些人假装渴望自由，其实他們并不了解自由，他們是要实现別的一些目标，而这些目标對他們本身的安全和利益是有害的……”換言之，改良主义只是要求独立和廢除奴隶制度的一种托辞。在命令禁止出版自由的明文規定中也反映出这种輕蔑的态度。它对总督赋予了檢查一切书面文件或印刷品的自由決定的权力，特别是監視其他国家印刷品进口的权力<sup>17</sup>。

这样，古巴就被剝夺了在西班牙的代表权，擯除于宪法之外，甚至更牢牢地被置于軍事政府的严酷統治之下。在西班牙实行立宪主义而同时在古巴实行专制主义，这种有諷刺意味和荒謬的情况，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sup>①</sup>。

由于古巴的改良者无法向西班牙議會申訴他們的苦楚，他們多数放棄了一切政治活动。薩科既不能回到古巴，又不願意留在西班牙(即使允許他留在那里的話)，于是就在法国住下，写他那部关于奴隶史的不朽著作。在他开始度永离古巴的流亡生涯以前，他从馬德里向他本国的克利奥尔种植园主提出一个新的警告，敦促他們完全停止奴隶貿易。他指出，这种貿易正在繼續增长，廢除奴隶貿易不像克利奥尔业主所害怕的那樣，会破坏或危及島上的农业。薩科分析了奴隶主替他們的奴隶貿易辯解的最通常使用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只有非洲奴隶才能忍受甘蔗种植园的艰苦劳动；第二个理由是，只有非洲奴隶才能抵抗热带气候和各种

---

<sup>①</sup> 在奴隶問題上表現自相矛盾的另一例子，是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頒布的國王命令。这个命令規定取消半島上所有殘存的奴隶制度；但是当有人提議在議會討論和通过这一命令时，这一提案被否決了，理由是：尽管这一命令是关于半島的而不是关于殖民地的，但是如果討論，只会惊动波多黎各和古巴的奴隶主。(何塞·安东尼奥·薩科(José Antonio Saco):《新世界特别是西班牙美洲国家的非洲种族的奴隶史》(Historia de la esclavitud de la raza Africana en el Nuevo Mundo y en especial en los países Americano-hispanos), 哈瓦那 1933 年版, 第 2 卷, 第 156 頁。)

疾病；第三个理由是，在古巴雇用自由劳动太昂贵。他对这些理由逐一予以驳斥，并且举出具体实例。白人已经习惯于种植园的劳动；生长在岛上的白人能够而且事实上是經得住炎热气候和各种疾病；如果同奴隶的死亡率和奴隶劳动的維持費比起来的话，雇用白人证明并不那么昂贵。此外，他警告种植园主說，在世界輿論的压力下，奴隶貿易是注定要消灭的，奴隶主应当觉悟到这一事实，并以先見之明立即作出必要的調整<sup>18</sup>。

薩科的主張沒有引起克利奥尔种植园主的多大反应。尽管如此，他仍繼續用他的笔杆去影响古巴的局势，他成为公认的古巴流亡国外的精神領袖。

不是所有的古巴人都同意剝夺他們的宪法权利而不表示抗議的。在奥連特，发生了由东部地区长官洛倫索將軍領導的叛乱，宣布要在島上恢复一八一二年宪法。起初，暴动获得奥連特的克利奥尔种植园主的支持，眼看就要控制整个地区，在圣地亚哥（叛乱的中心），西班牙的統治已經告終了<sup>19</sup>。

塔康組織了一支軍事远征队去扑灭叛乱。但是他不光是依靠武装力量来粉碎对西班牙統治的威胁。他十分了解古巴种植园奴隶主階級的情况，所以他預料，当这些奴隶主認識到奥連特的革命形势会引起奴隶叛变时，他們对洛倫索將軍的支持就会减少。正如古巴历史学家曼努埃尔·比利亚諾瓦所指出的，塔康指靠“一批古巴种植园主，他們認識到立宪体制对奴隶制度的存在是一种威胁”<sup>20</sup>。塔康为了給种植园主以時間重新考虑他們对洛倫索將軍的支持，他沒有把他的軍隊赶紧开往奥連特。

塔康对形势的估計证明是正确的。当种植园主看出叛乱将引起全面战争时，便放棄叛乱，并且要求洛倫索采取“他认为有助于使我們和島上其余地区的現有政府和睦相处的步驟”。他們解釋他們脫离叛乱的理由是：“在当局內部不和諧一致时，人民的意見也会有分歧，政党动乱不安，財產处于危險，安全得不到保证，生命受到危害，一言以蔽之，有发生无政府状态的危險。”<sup>21</sup> 无怪乎西班牙

公使卡拉特拉瓦說，古巴奴隶制度的存在对于維持古巴对西班牙的忠順，其价值相当于十万大軍<sup>22</sup>。

富有的种植园主再次表明，他們宁願接受西班牙的暴虐統治，而不願冒在革命中失掉他們的奴隶的危險。

薩科明白地指出整个問題的癥結所在，他写道：

在古巴，不是生存就是死亡，別无其他选择，絕不要想发动革命，除非革命就像数学演算一样一定会获得胜利。在我們当前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政治革命，必然同时发生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就意味着古巴种族的毀灭<sup>23</sup>。

甚至在奥連特因宪法問題爆发的叛乱发生分裂之后，塔康在鎮压叛乱方面也并不感到很輕松。但是他从一种有趣的发展中获得了重要支持，这一个有趣的发展預示古巴历史的未来情况。美国人所有的种植园和糖厂、胡拉古阿铁公司的矿藏和英国人所有的銅矿都位于圣地亚哥附近。美、英、法三国領事官員由于害怕叛乱会損害他們的財產并且担心叛乱会扩大和推翻西班牙在全島的統治，便請求他們本国派遣軍艦开进圣地亚哥港来支持塔康。三国海軍的支援大大有助于鎮压奥連特的內部叛变。三国表明，它們虽然是互相竞争的，但当西班牙在古巴的統治面临內部威胁时，它們可以全心全意地实行合作。自一八三三年以来即担任美国駐古巴領事的尼古拉斯·特里斯特在給国务卿福賽思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了这一点。报告說：

我們(美、英、法)过去对各自在这个島上究竟应起多大作用这一問題上可能有过分歧，但我愉快地向您报道，当政府面临危机——它的权力所面临的危險要比您从华盛顿接到的报告所了解的更大——的时候，我們都沒有想过利用这一形势来謀得特別利益，唯一考虑是維持該政府的权力，以确保西班牙能繼續統治該島。幸运的是，这一目的已經达到了。

特里斯特在他的报告的末尾称贊古巴的塔康政府。他說：“該島旺盛发展，我深信，只要塔康仍旧当权，該島將繼續在各个方面



得到改进。”<sup>24</sup> 古巴人的自由沒有“旺盛发展”，这一点，并未使美国領事感到煩惱！

如果古巴的自由主义分子讀到特里斯特的报告，他不会对这位領事称赞塔康政权感到惊奇。从塔康到达古巴开始他的反动統治之时起，特里斯特就一直同他进行热烈合作，使古巴的自由主义分子深为厌恶。当指责特里斯特同塔康勾結一起参加奴隶貿易和成立一个辛迪加同西班牙皇太后瑪丽亚·克里斯蒂娜分肥的抗議书开始送到华盛顿时，人們就更容易了解特里斯特对这个专橫的总督这样热情的原因。

一八三五年八月，西班牙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勉强地批准了一項新条約，該条約本来是要进一步加强实施一八一七年廢除奴隶貿易的法律。西班牙答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禁止它的臣民参加奴隶貿易。但是，一八三五年条約的結果只是改变了奴隶貿易的性质，而沒有根本上减少奴隶貿易（在一八三五年，即批准新条約的一年，据估計有一万九千个奴隶被非法运进古巴島，在一八三七年，增加到四万二千二百四十个<sup>25</sup>）。船只不再公开地在古巴港口装載航海用品。装运奴隶的船只只扯下了西班牙国旗，換上了美国国旗。由于英国不能搜查美国船只——美国是当时唯一拒不承认搜查权的国家——装运奴隶的船只就在非洲海面上使用美国国旗（在較小范圍内也使用葡萄牙国旗）。一位研究非洲奴隶貿易的学者指出，“从一八三六年秋天起，西班牙装运奴隶的船只悬挂美国国旗驶往非洲的越来越多，这些船上还有美国合法的船舶文件……，到了一八三九年，在所有駛往古巴的装运奴隶的船只中，这一类船只占很大一部分。”<sup>26</sup>

特里斯特充分利用星条旗使奴隶贩子享有豁免权这一事实，并且正如关于他的案件的大量证据所表明的<sup>27</sup>，他也利用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来默許、援助、慫恿塔康和西班牙国王参加的奴隶貿易辛迪加。这个辛迪加购买美国船只（在巴尔的摩制造的），把这些船只开往非洲，船上只有一个美国公民作为形式，然后装上黑

人。在归航中，每逢遇到英国巡洋舰时，这些船只的所有权就轉移給美国人。特里斯特为这些船只签署空白的船舶文件；他甚至还給許多进出哈瓦那港到非洲的葡萄牙船开具证明文件。在一八三八年，在已經知道的駛进古巴港口的七十一艘装运奴隶的船只中，特里斯特为它們开具证明文件的就有六十一艘<sup>28</sup>。

美国公众对于使用美国国旗来保护奴隶貿易的做法感到憤慨。因此，对特里斯特进行了調查。这个被告領事用轉移問題的办法来替自己辯解。他指責英国利用奴隶貿易問題作为烟幕以期取得对古巴的控制和廢除奴隶貿易<sup>29</sup>。当然，这种指責得到了国会中拥有奴隶的势力的同情和注意。美国前任駐西班牙公使亚历山大·埃弗雷特<sup>①</sup>在哈瓦那进行的調查证实特里斯特是有罪的。特里斯特被調回国，但是他被調回是基于一般性的理由。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日，給了特里斯特一封信，通知他說，泰勒总统虽然对于特里斯特所提出的具体指責沒有作出任何判断，但是决定哈瓦那的情形应有所改变。这样，官方对他使用美国国旗来帮助古巴奴隶貿易就沒有加以譴責<sup>30②</sup>。

到了古巴历史的这个阶段，第二次改良运动已成为过去的事了。改良的事业停頓了，事实上，停頓到这样程度，以致改良事业差不多到二十年后才再兴起。第二次改良运动虽然失敗了，但它

---

① 埃弗雷特的报告实际上还是輕描淡写的。他在总结时写道：“該領事本应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制止非法使用美国国旗，这样做并非不合适，而且是在充分执行他的职责……他没有这样做，不是由于不关心此事，或出于任何更坏的动机；而是由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他认为他为了實現上述目的所能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将是根本无效的，因为无法获得在法院所能得到的证据。（1840年7月21日埃弗雷特致福赛思函，第36届国会第2期會議，众議院行政文件第116号，第471—495頁。）关于特里斯特的說服力不强的答辯，見弗雷德·里皮（Fred Rippey）：《尼古拉斯·菲利浦·特里斯特》（Nicholas Philip Trist），載《美国人名辭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第18卷，第645—646頁。

② 特里斯特以后被任命为国务院高級官員。在墨西哥战争結束时，他被派往墨西哥商談和平。

并不是沒有长远的重要意义的。古巴人想分享西班牙自由主义紀元的希望被不怀好意地粉碎了，再加上塔康的殘暴专制統治，这就更加加深了古巴人和西班牙人之間的裂痕。虽然古巴有許多重要人物由于对減輕西班牙的压迫已失去希望而跟随薩科流亡国外，但其他一些人仍留在島上繼續进行斗争。馬坦薩斯的何塞·哈辛托·米拉內斯<sup>①</sup>在他的一首詩中傾吐出那些在古巴坚持战斗的人們的情感：

我是古巴的儿子  
強有力的命运把我同它联結在一起。  
我和它一起走，我必須  
跟着它走，  
不論道路是危險的，还是平坦的。

为了它，我去，  
不怕障碍，也不停留；  
或是在桎梏的束縛下，  
或是等待着复仇。  
我将和它一起走，我哭泣  
是因为它是一个奴隶；  
我将和它一起走，直到我  
可以歌唱它的自由<sup>31</sup>。

---

<sup>①</sup> 何塞·哈辛托·米拉內斯(1814—1863年)，在患精神病之前担任馬坦薩鐵路公司秘書。他靠自學而掌握了几种外國語。

## 第十章

# 古巴的奴隶社会

在塔康統治的后期发生了一件事。这一件事預示以后十年大部分时期中的主要发展。一八三七年,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哈瓦那人俱乐部”(Club de los Habaneros)策划了“三重枷鎖与自由太阳叛乱”(Conspiración de la Cadena Triangular y Soles de la Libertad),以期廢除奴隶制度和解放古巴島。塔康的告密者告发了这次叛变計劃,因而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是在这以后的八年里,古巴进入了一个以反对奴隶貿易和奴隶制度的斗争为主的时期。

虽然被动員参加这一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古巴人,但英国要求完全禁止奴隶貿易和修改古巴国内劳动制度的压力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英国在古巴进行鼓动,乃是英国廢除奴隶的主張和帝国利益的产物。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英国国会应各种反对奴隶制度的社团的繼續不断的請求,最后通过了黑奴解放法,廢除英帝国内的奴隶制度<sup>①</sup>。

这个法律虽然本来是打算逐步实施的,但是到了三十年代末期,它的目标已經在英屬西印度群島完全实现<sup>1</sup>。

产糖的英屬西印度群島奴隶的解放提高了这些島屿的生产成本。过去从英屬牙买加购买主要商品的北美和欧洲商人,现在都来哈瓦那买古巴的糖了<sup>2</sup>。要使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經濟得到复兴,唯一希望在于立即停止奴隶貿易和尽速地在古巴廢除奴隶制度。一个英国委员会在四十年代直言不諱地宣称,如果古巴的奴隶貿易

<sup>①</sup> 西印度群島的英国种植园主得到了二千万英鎊的补偿金。所有奴隶都成为学徒。农奴的学徒期限是六年,其他奴隶是四年。学徒期限不得延长。

易繼續下去，英屬西印度群島“將立即完全破產”<sup>3</sup>。在這同一時期，古巴的總督對他本國政府報告說，英國不僅正在要求完全禁止奴隸貿易，而且要求完全解放該島的奴隸。英國的動機是要破壞古巴在糖的生產方面勝過英屬西印度的有利條件<sup>4</sup>。

儘管英國盡了一切力量限制古巴的非法奴隸貿易，但由於種種原因，一八三五年條約訂立之後，奴隸貿易實際上是增加了。首先，新條約同一八一七年條約沒有什麼不同。誠然，根據表面確凿的證據，對形迹可疑的船隻加以搜查和扣留的權利是進了一步；從前，這種船隻只有在船上發現奴隸時才能被扣留。但是，正如戴維·特恩布爾在訪問古巴之後所指出的，要處理像水桶和船塢安排之類的表面確凿的證據是很容易的。“……任何一個普通的船上木匠都能在極短時間內完成這種工作……”<sup>5</sup>事實上，一八三五年條約僅僅改變了奴隸貿易的性質，而沒有減少奴隸貿易；美國船和葡萄牙船代替了西班牙裝運奴隸的船隻。美國在一八四二年韋伯斯特—阿希伯頓條約中同意禁止使用美國國旗從事奴隸貿易，但是美國船隻繼續裝運奴隸到古巴。這筆買賣利潤非常之大，因而美國投機商人，特別是富有的紐約人，甘願為此一冒風險<sup>6</sup>。

只要看一看古巴的經濟結構，就可以了解為什麼這種非法貿易能繼續下去，甚至還有所增加。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海地革命所開始的古巴繁榮時期，由於英屬西印度群島廢除了奴隸制度又得到了新的鼓舞。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糖成為古巴繁榮的基礎（到了一八五一年，糖占古巴出口的百分之八十四<sup>7</sup>）。由於大部分咖啡種植園或者被放棄，或者改為產糖，咖啡就不再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了。一八四三和一八四五年造成重大破壞的颶風的襲擊確實影響了咖啡的生產，但是古巴咖啡逐步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一八三四年美國為報復古巴對美國面粉實行歧視性關稅而規定的關稅。此後，美國大部分咖啡是從巴西購買的<sup>8</sup>。

煙草工業也很興旺，未加工的煙葉和製成的雪茄煙的出口都是如此。但是小煙農使用奴隸不多。古巴糖業是促使非洲奴隸不

断流入的唯一原因。甘蔗种植园的数目从一八二七年的五百一十个增加到一八四六年的一千四百个，种植园的规模也在扩大，当时的趋势是建立较大的种植园，对土地、蒸汽机和奴隶投入大量资本<sup>9</sup>。资本和信贷可以从古巴、西班牙和美国得到，但是古巴国内没有同美国南部边疆各州相比的奴隶来源，而奴隶人口的自然增殖很低，因为从非洲运来的妇女不多（一个在该岛的旅行家指出，“在种植园里碰不见一个女人”<sup>10</sup>）。因此，为了增加奴隶劳动力以满足日益扩大的糖生产的需要，唯一办法就是在非洲招募奴隶<sup>11</sup>。奴隶的费用固然在不断增加，但是糖价增加得更多，上涨的糖价不仅可以偿付增加机械化的费用，而且还使克利奥尔大种植园家族发了大财<sup>12</sup>①。

当一八四二年美国制定的关税引起糖价下跌的时候，种植园主就用生产更多糖的办法来应付。因此，无论是在糖价上涨或下跌的时期，糖的生产都在增加，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sup>13</sup>。古巴种植园主对奴隶劳动的这种需要太大——只有少数种植园主是例外，因为他们的种植园奴隶充足，他们希望在奴隶贸易停止后他们的资本就可以加倍——不是萨科所提出的停止奴隶贸易的切实主张所能影响的；这种需要也太强烈，也不是英国为停止这种贸易的努力所能压服的。

西班牙不顾它同英国签订的条约，不肯有效地制止输入新的非洲人到古巴来。西班牙当局事实上也公开默许这种贸易。在马德里的贪污腐化的皇太后同一个奴隶走私公司有经济上的关系，

① 不仅从财富来看，而且从社会威望来看，古巴主要是一个产糖国家。许多“糖业贵族”是以二万五千美元的标准价格从西班牙国王处买来贵族头衔的。甚至负债累累的甘蔗种植园主——许多人确实是如此——也在古巴社会占有重要地位。（沃尔迪曼（F. Wurdiman）：《一个医生的……古巴的杂记》（Notes on Cuba...By a Physician），波士顿1844年版，第149页；李兰德·詹克斯（Leland H. Jenks）：《我们的古巴殖民地》（Our Cuba Colony），纽约1927年版，第25页；马图林·巴路（Maturin M. Ballou）：《古巴史》（History of Cuba），波士顿1854年版，第140—141页。）

西班牙在古巴的总督每放进一个奴隶到古巴就可以得到一盎斯的黄金(約五十美元),而他們手下的官員也可以分得“一点油水”,作为對他們的“合作”的獎賞<sup>14</sup>。

因此,有很多的利益集团都和古巴奴隶貿易的加速发展有关。有要求不断补充他們的劳动力的古巴甘蔗种植园主;有对駛往非洲的装运奴隶的船只投了資本的西班牙和美国投資者,他們在古巴得到了巨額利潤;有同經營奴隶貿易的辛迪加分肥的西班牙国王;有在倫敦銀行里存款数十万的总督,这些錢是由于在哈瓦那任职时纵容奴隶貿易而賺到的<sup>①</sup>;有許許多多薪金微薄的官員,他們的主要收入是来自奴隶販子的賄賂<sup>15</sup>。

当然,受到損失的是工人階級,包括黑人和白人。一八四六年对古巴劳动力的估計表明,在全国总人口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九十四人当中,劳动人口为四十三万一千二百五十八人,其分类如下:

劳动人口	城市	乡村	城乡合計
白 人	58,806	54,504	113,310
自由黑人	47,162	18,252	65,414
奴 隶	44,951	207,583	252,534
总 計	150,919	280,339	431,258 <sup>16</sup>

上述白种工人人数并不意味着他們在古巴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古巴的經濟主要地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这就减少了自由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并且使他們无法組織到工会中来以改善他們的境况<sup>②</sup>。一方面,只有农业可以雇用許多白种工人,而农业主要用

① 龙卡尼总督在古巴任职不久之后就在倫敦存了大約五十万比索的存款。[埃米尼奧·波尔特耳·比拉(Herminio Portell Vilá):《古巴同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史》(Historia de Cuba en sus relaciones con los Estados Unidos y España),哈瓦那1938—1941年版,第1卷,第477—478頁。]

② 查尔斯·艾伯特·佩季在所写《古巴有組織的劳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ed Labor in Cuba)一篇論文中指出,十九世紀中叶,古巴的白种自由工人“完全没有建立組織的基础”(一篇未发表的博士論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丛书,1952年,第16頁)。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似乎在努韦維塔斯曾組織了一个“漁夫与水手同业公会”(同上,第179頁)。

的是奴隶。另一方面，实行奴隶制度产生了一种鄙视劳动的心理，并且造成一个不尊重劳动的社会。特恩布尔指出，“在古巴岛就像在存在着奴隶制度的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奴隶制度的存在使人人都以从事劳动为耻辱<sup>①</sup>。因为奴隶的命运就是劳动。自由人出于自尊心，惟恐他和奴隶之间的界限不够分明，因此他根本就不参加劳动。”<sup>17</sup>他指出，“结果是，牧师、律师、医药、饲养家畜、参加军队，是吸引我们青年人的仅有的事业和职业。由于许多人不能找到职业，相当多的人闲着无事，这是必然的结果。”<sup>18</sup>

二十年之后，白人流浪者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了。胡安·雷耶斯在他的一八五一年关于古巴流浪者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失业的白人流浪各省，偷东西，不依土地为生。只要这些工人“不仅以厌恶的眼光，而且以恐怖的眼光看待在习惯上通常把它和奴隶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劳动的话”，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只要奴隶制度存在，“就必须承认，使人流浪的道路是确定了的，而且往往是不可避免的”<sup>19</sup>。

大多数甘蔗种植园是由管家（mayordomos）代表在外的地主经营管理的。管家的唯一目的是要显出能挣得巨额利润，因此管家得到了种植园主的鼓励。残酷剥削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在收获季节，收成好坏取决于日夜紧张劳动，奴隶往往被累死<sup>20</sup>。特恩布尔叙述了古巴奴隶制度的两个方面。家里使用的奴隶的待遇较好，这就是访问者在哈瓦那看到的情况；但是，在田间工作的奴隶则听凭管家任意摆布，待遇十分恶劣，“根据亲自调查和详细观察的结果……”，他可以这样断言<sup>②</sup>。他在一八四〇年写道：“也许除了我还没有去过的巴西外，没有一个地方的奴隶的情况比目前这

---

① 一个到过巴西的旅行家托马斯·尤班克在报告中用图表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要问一个出身下层家庭、人品端正的当地青年人，为什么他不学一种手艺和独立谋生，十个人中有九个会气得发抖，并质问你是否打算侮辱他！一个人尖声喊叫：‘劳动！劳动！我们有黑人劳动！’”〔托马斯·尤班克：《生活在巴西》（Life in Brazil），纽约1856年版，第184页。〕



个西印度甘蔗种植的皇后、远近馳名的古巴島更悲慘了。”<sup>21</sup>

和特恩布尔一样，大多数深入古巴內地的旅行者报道說，甘蔗种植园的奴隶的衣、食、住很恶劣。这些奴隶的平均活命期不超过十年。旅行者对奴隶发生自杀事件之多感到毛骨悚然（上吊、勒死，或者作为最后一着的倒折舌头等自杀方法似乎是司空見慣的）。旅行者在看到許多奴隶由于微小的不服从行为就被帶上洋铁面具、鐐铐和有尖的項圈（尽管法律禁止給奴隶帶鐐铐）的时候，就可以明白所以有这种情形的原因<sup>22</sup>。

古巴黑人分为以下几种：波薩耳人(Bozales)，是新到这个島的黑人；拉迪諾人(Ladinos)，是在一八二〇年法律禁止奴隶貿易（虽然实际上并没有禁止）之前运进来的黑人；解放的黑奴(Emancipados)；还有克利奥略人(Criollos)，即土生土长的黑人。在所有古巴黑人当中，也許要以解放的黑奴的命运最为悲慘。解放的黑奴是从被捕获的装运奴隶的船只接受过来的非洲人。根据一八一七年条約第七条的規定，应当由混合委员会发給他們一張解放证书，然后把他們交給混合委员会在其領地上宣判的国家的政府。因此，如果解放的黑奴是在古巴海岸被英国或西班牙船只捕获，就应当把他們交給古巴政府，而古巴政府有責任把他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让他們作为僕人或自由劳动者工作五至七年，期满后保证他們享有自由。作为对解放的黑奴劳动的报酬，种植园主应当供給他們衣食，向他們傳授教义，教他們学一种手艺，并且在劳动期满后釋放他們<sup>23</sup>。

但是，当一八二四年在古巴海岸捕获了第一批奴隶、并由混合委员会宣布他們自由和把他們置于古巴政府保护之下以后，立即开始傳出他們受到殘酷虐待的消息。奉命执行条約所定义义务的英

---

② 除去要造成一种关于古巴的奴隶的真正情况的錯謬印象外，在哈瓦那給在外地主充当僕人的男女奴隶待遇較好，也是另一种控制奴隶的手段。这种做法助长奴隶的分裂，使奴隶主可以有密探和叛徒，用他們来偵察推翻奴隶制度的图謀。

國駐哈瓦那領事指責總督把解放的黑奴賣給奴隸主；指責種植園主沒有教他們學手藝，也沒有依法把他們作為自由人來使用，反而把他們和奴隸一樣看待。據薩科說，解放的黑奴比奴隸還不如，因為奴隸主對於在他們控制下的解放的黑奴，要在五至七年內，榨取所有能榨取的勞動。七年勞動期滿後幸存的少數解放的黑奴，在得到他們的“自由”的時候，健康已經受到摧殘，在古巴社會中無法維持自己的生存了<sup>24</sup>。

不久，一種賺錢的買賣發展起來，這種買賣就是用解放的黑奴來頂替死去的或失蹤的奴隸，關於七年後解放的黑奴應被釋放的规定是被忘記了。大多數解放的黑奴又成為終身的奴隸了<sup>25</sup>。英國會施加壓力，要求終止這種違反一八一七年條約的惡劣行為，並無結果。西班牙願意做的，至多是在一八二四年四月十四日表示它的虔誠的希望，期望能把解放的黑奴交給品行良好的人，這樣他們也許更肯定能學會一種手藝，使“他們可以在以後自食其力”。種植園主負有好好地對待解放的黑奴的責任，並且被指示置備一個登記簿，在登記簿上記載解放的黑奴和種植園的名字。這樣，政府就可以對他們的情況進行檢查<sup>26</sup>。

不久，就聽到有人指責說，登記簿上登記了假姓名和假情況。實際上，種植園主繼續把解放的黑奴當做奴隸而保持，並且可以在他們勞動期滿後把他們轉賣出去。英國人建議在捕獲到奴隸時，立即把黑人釋放，企圖用這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古巴當局拒絕了這一建議。古巴當局認為，增加島上自由黑人會破壞奴隸制度，而立即允許來自非洲的奴隸自由“會為島上的其他奴隸樹立一個危險的先例”。當英國建議把所有解放的黑奴送回非洲時，古巴政府表示反對，認為這樣做花費太大，並且強調指出這種建議不符合基督教的本性，因為這樣做，將意味着把他們重新送回給“異教的黑暗深淵”。一個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寫道：“真正原因是，把解放的黑奴交給奴隸主為期七年，可以從中獲得一筆相當大的收入。由於這種辦法是當局的一種生財之道，也是業主的一個奴隸來

源,因此,在古巴,絲毫沒有要把解放的黑奴運回非洲的要求。”<sup>27</sup>

儘管一八三五年條約保證解放的黑奴在服務七年之後可以獲得自由,但是這一保證對於改善他們日益惡劣的境遇沒有起什麼作用。載有全部解放的黑奴姓名的登記簿應當保存在總督辦公室,簿上載有一切詳細情況。登記簿每六個月可以由混合委員會檢查一次,以便確定解放的黑奴的人數、所在地和情況,並且努力使條約得到實施。但是混合委員會中的英國委員埋怨說,他們很少能夠說服總督把登記簿交給他們,而且登記簿通常沒有把最近的情況登記上去,要不然就是把登記簿保存得連其中記載的什麼也不能清楚地分辨出來<sup>28</sup>。

不幸的是,古巴黑人中記載他們被奴役的兄弟姊妹的生活和為他們的權利申訴的作家很少。但是,這種作品確實有過一部,它是一八四〇年在倫敦出版的。書名是《一個新解放的古巴島奴隸的詩集》[醫學博士馬登(R. R. Madden)譯,附譯者所寫的這個黑人詩人的早期生涯]<sup>29</sup>。馬登是“英國與外國反對奴隸制度協會”的一個領袖。他在序言里談到一八三八年他在古巴時這部詩集和自傳怎樣送到他的手里。有些詩曾在島上發表過,但是這些詩只限於“在像古巴這樣一個國家可以發表的詩。在古巴,奴隸制度受到特別保護,消息被新聞檢查員禁止發表”<sup>①</sup>。馬登曾經把許多在古巴沒有發表、“或者不能發表”的詩以及敘述奴隸制度下生活的故事譯成英文(西班牙原文由“英國與外國反對奴隸制度協會”秘

① 當然,這是古巴黑人自己沒有著書描述奴隸生活的主要原因。在美國,逃到北方和獲得自由的奴隸能夠發表敘述奴隸生活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就是一個逃跑的奴隸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寫的。但是,在古巴,這樣做是辦不到的,因為在古巴,除了山野荒地之外,沒有逃亡奴隸可以藏身之處。

最近在古巴發生了一樁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說明在奴隸制度下的情況。在向三千五百個識字者(alfabetizados)——在革命政府掃除古巴文盲運動期間學會讀書寫字的男男女女——頒發文憑時,瑪麗亞·德拉克魯斯·森馬納特是領到文憑的人當中的一個。在這次值得注意的典禮上,不尋常的一點是,這位婦女已經一百零六歲,生於一八五五年五月三日,生下來就是一個奴隸。菲德爾·卡斯特羅在舉行典禮時同她談了話。這次談話曾在電

书保存)。馬登虽然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但他提到作者当时四十二岁,生于古巴,父母当了一辈子的奴隶。作者曾在一个甘蔗种植园劳动过,在三十八岁那一年,用八百美元贖回了自由。作为一个自由黑人,他住在哈瓦那,依靠当临时僕人維持生計。在紐約公立图书馆所存的一本这个詩集上有用鉛笔写的这个黑人作家的名字——胡安·弗朗西斯科·曼薩諾。

关于自傳的材料很有意思,因为它帮助說明了奴隶所受的殘酷待遇和他們对自由的渴望。作者在描述甘蔗种植园主(他就是这个种植园的奴隶)怎样告訴他不管他工作多么勤劳都不能希望贖回他的自由以后,写道:“至于我,从我失去希望的时刻起,我不再是一个忠实的奴隶了,我从一个低声下气唯命是听的人变成人类中最不滿的人了。但願我能展翅飞离那个地方,飞到哈瓦那去,从那一天起,我所想到的只是計劃如何逃跑和远走高飞。”

他的詩生动地描繪了古巴奴隶制度的情况。一首题为《奴隶商人》的詩有以下几节辛酸的詩句:

古巴商人做着他的买卖  
对于他的买卖  
使穷苦人遭到的損害,  
絲毫沒有表示不安或責备自己。

\*                     \*                     \*

---

視台广播,下面是談話的摘录,很有意义:

“你知道奴隶制度时代的事情嗎?”

“我当然知道。我是生在哈瓦那省北圣克魯斯的森馬納特糖厂的。当我想向把我从糖厂带到哈瓦那的那家雇的馬車夫学讀書写字的时候,管家发现了一块上面有字的硬紙板。我常常把这块硬紙板藏在我經常坐在上面綉花的座位底下。我坐在这个座位上时常想念仍然在糖厂老板家里劳动的母亲。那管家常常問我,这个字是什么?当有色的人被发现是在学习时,他們要受到处罰,被叫做‘狗’,并且被关进牲畜圍栏里……”

卡斯特罗劝告这个过去的奴隶把她的一生經過写下来。她答应这样做。

卡斯特罗說:“現在記住,你是和人民約定,要写你的一生經過的”。

瑪丽亚·德拉克魯斯·森馬納特說:“我一定要写。”(《革命报》(Revolución), 1961年6月19日。)

在他看来，只要买卖好，这有什么关系。  
多少人死在血泊中！  
多少和平村庄遭到攻击！  
可怜的没有防御力量的村庄遭到劫掠！  
在每一个市镇，多少不幸的生命，  
在屠杀中成为残废，在逃亡中送了性命！  
多少婴儿从母亲怀中夺去，  
疯狂的母亲孤独地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开！  
在他看来，船装得满满的，  
几百个人挤在船仓里，  
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  
地方是多么小啊！下面的呼号多么凄惨！  
在这充满苦难的洞窟里的喧嚷是多么可怕！  
当狂风来临，  
舱口都被钉严，好像一切希望都完了；  
挣扎着的双手在那里是如何徒劳地举着，  
干枯的嘴唇如何不断地祷告，  
还是疯狂而又可怕地喃喃地咒诅，  
四周都是垂死的和已死的人；  
商人对拥挤在一起的人所关心的是，  
如果奴隶有一半卖出去，这次航程就合算了<sup>30</sup>。

一首题为《甘蔗种植园》的长诗描写了一个主张废除奴隶的英国人访问古巴一个种植园的情形。种植园主在家里等他，而不是像平常一样住在哈瓦那<sup>①</sup>，并且亲自迎接他。种植园主向这位英国人保证说，他可能听到的有关奴隶的情况是完全不符事实的。

你看见他们在那边的甘蔗田里，

---

① 在诗中，一个奴隶宣称：  
我们的暴君不住在庄园里。

相信我，他們沒有理由抱怨；  
他們除了要工作——這並不很缺乏，  
什麼也不要，在世界上並不懷有希望，  
我只希望其他地方的窮苦人，  
受到這兒所有奴隸受到的待遇的——半。  
看呀——甘蔗田並不遙遠——  
我們的黑人是多麼愉快歡樂！  
他們的樣子多麼好！工作起來多麼快樂！  
你看到就是奴隸也能成為多麼快樂的家伙！  
是的，我們費盡苦心來使他們這樣快樂，  
毫無疑問，我們這樣做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  
而且，你知道，人道本身  
向我們提出這樣要求，而與金錢完全無關。

在沒有人伴隨的情況下，這位英國人考察了甘蔗種植園，他發現奴隸的情況同他的東道主所做的富有詩意的描寫大不相同：

在我們西印度群島充滿殘酷和罪惡的  
“過去的好時光”，牙買加的奴隸，  
不論老少，工作勤勞異常，  
但是這兒從古巴奴隸  
榨取的勞動量，正好是我們的一倍，  
工作時間卻將近兩倍；

---

他喜歡城市，在那裡他享受着  
其他愚癡的人所享受的歡樂，認為所有大人物  
都應當過奢侈安逸的生活。  
他發現哈瓦那充滿着邪惡，  
可以滿足他的奢欲或者吸引他。  
在那裡，在他的卑鄙的豪華中，他可以活動，  
可以盡量發泄情欲，幻想愛情；  
他以笑容粉飾他的傲慢的貧困，  
娼妓的欺騙，可以使他耗去一次收成。

因为这儿贪婪的主人还必须  
从每一个奴隶劳动力身上整整榨取三倍的生产。

\* \* \*

只要种植园主发财，有多少生命  
在劳动中丧失，这又有什么关系。  
可喜的是，波萨耳奴隶市场很近，  
在那里，种植园主找到新的供应。  
据说，购买新的奴隶远比  
继续榨取精疲力尽的人或者保留老年人更为便宜；  
购买女奴或者养育奴隶，  
并不符合种植园主省钱的打算。

这位英国人和管家谈话后，清楚地了解奴隶制度运用的情况。

我们购买奴隶耕种我们的原野，  
我们用不着圣人或学者来割甘蔗，  
我们买黑人，要的是他的肉和骨，  
他一定要有力气——他不需要头脑，  
但是，你问我，可怜的老奴隶现在在哪儿？  
他们还能在哪儿呢？当然，是在他们的坟墓里！  
在他们的时代过去之前，我们不把他们送进坟墓，  
当他们壮年已过，就让他们死去。  
日夜辛勤的人们，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不能活到头发灰白，  
由于精疲力竭而衰弱——病倒——枯萎，最后死去，  
让侯爵再去购买一批；  
奴隶市场供应充足，  
这一切都得感谢星条旗！  
你不能想像，由于睡眠不足

他們的體力多麼快就會消耗完畢，他們是多麼不值錢，  
在收穫季節，四小時的休息，  
經過漫長的五、六個月，很少人能夠健康地活下去。

二十小時不間斷地勞動，  
十二小時在田里，八小時在室內，  
煎煮或壓榨甘蔗，相信我，很少人能活到老，  
但是生命是微賤的，糖，先生——却是金子<sup>31</sup>。

“但是生命是微賤的，糖，先生——却是金子。”這位黑人詩人用一句話就概括了古巴的整個奴隸制度。無怪乎他在一首題為《致古巴》的詩中寫道：

古巴，如果可憐的兒子還眼看你同樣遭到  
奴役的痛苦，成千的人在病中掙扎，  
你就是很美麗，  
是海上的珍珠，安的列斯的驕傲，  
這又有什麼用處！  
即使有你的翠綠山河，那又有什麼用處？  
種植咖啡的平原上開著一片美麗的花朵，  
你的甘蔗生長繁盛，它們耕種  
填滿默默死去的受害者的墳墓，比飢餓，或者刀劍  
殺害的更多得多。

古巴，啊，古巴，當他們夸奖你洁白！  
富饒而美麗，萬島的王后！  
西方的明星，海洋里最稀有的瑰寶！  
啊！告訴他們，這是用詭計在嘲笑你，  
手拿著鮮花，却眼看花朵  
在那裡受到死的摧殘，  
在蒼白冷漠的臉頰下面，



却企图寻求生命的欢颜，  
美丽不寄身在死亡的怀抱中  
奴役不是以它的有毒的呼吸来傳染<sup>32</sup>。

馬登在翻譯和发表这些詩的时候，希望他“所作的工作足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黑人知識分子的本质。至少，这种努力给了我一个表述我的信念的机会，那就是：要使非洲土著能够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媲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需要的只是教育和賢明政府的帮助”<sup>33</sup>。在这个时期，古巴悲剧一部分誠然是它的居民沒有得到这种帮助的证据。但是，正如我們即将看到的，当一个偉大的黑人詩人，由于发出了激烈程度差得多的憎恨暴政的呼声而在古巴被处死时，这个“新近解放的”奴隶的杰出詩章和自傳不能在他本国发表，簡直沒有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当然，如果发表这些詩，就会使控制奴隶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即培养一种认为黑人天生下等的看法）遭到破坏。为富有的甘蔗种植园主服务的思想家——所謂人种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硬說黑人并不真正是人，而是一种能够說話的兽类，黑人因具有天生下等的种族特征，不能把自己提高到和白人相同的水平，不能行使一个有組織的社会所要求的权利和义务。黑人的唯一作用是履行上帝規定要他当白人的奴隶的任务。正如德阿兰戈-帕雷尼奥所說的，“过去在世界上一直有奴隶，将来也永远有奴隶”。他坚持认为，黑人是劣等人。黑人要为优秀的种族当奴隶，乃是出于上帝坚定的意志，只要有黑皮肤的人，就会有奴隶制度<sup>34</sup>①。

认为黑人是劣等种族的神話，成为十九世紀古巴社会的一种固定的信条。这种神話得到島上主要社会思想家的支持。这种神

---

① 德阿兰戈认为，黑人要摆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让黑人和下层階級白人通婚，使“黑人白种化”。这样，經過一段時間以后，劣等黑人种族特征就会消失，黑种人就有可能摆脱他們注定的要当奴隶的状态，因为他們不再是黑人了。（弗朗西斯科·德阿兰戈-帕雷尼奥文集，哈瓦那1888年版，第2卷，第338, 340, 376, 654頁。）

話还认为,黑人由于他的肤色,在所有社会制度中都被判定属于社会的比較低的和受到剝削最厉害的阶层。单是他的肤色就使他不可能享受自由的成果。由于他永远不能摆脱劣等地位而上升,因此给他自由,就等于把他拖向毁灭。华金·苏亚雷斯是一个改良派的古巴地主,他的思想意識反映了富有的种植园主的阶级利益。他坚持认为黑人的肤色使黑人当一辈子的奴隶。他写道:“除非把黑人和白人置于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奴隶和主子的境地,否则这两个种族絕不能生活下去,因此,任何一种解放计划,对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是极其不利的,这是已經成为不容争辯的原則的一点。”<sup>35</sup> 古巴历史学家佩德罗·古特拉斯在所著《古巴島历史》(Histoia de la Isla de Cuba)一书贊許地总括奴隶主的种族主义思想如下:

由于主人的慈悲而被宣布为自由的黑人,并不就是同社会的群众一样的。黑人的肤色是永久不变的,这一点将继续是使他們和白人分开的一个因素,因为尽管有种种意見和仁爱之情,但是这种不能消除的种族标志依然是持久不变的,根据当时的意見——無論是在奴隶制度存在的地方和已經消灭的地方——黑人光凭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上升到白人的地位的,不管他个人有什么优点……。真实的情况是,解放的黑人是无法实现爱好人道的人所抱有的希望的<sup>36</sup>。

在这些种族主义思想家看来(在古巴,为奴隶主阶级讲话的人在一八六八年以前一般都是种族主义者<sup>37</sup>),在古巴社会中沒有黑人的地位。“古巴的国民”,薩科反复地強調說,“是由白人組成的。”<sup>38</sup> 在为地主阶级讲话的种族主义者中,唯一的分歧是,黑人将作为被剝夺了人所固有的一切权利的、被奴役的劣等生灵留在古巴呢,还是将被从古巴国上上完全排除出去呢?比較保守的维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采取前一种看法,有些改良主义者則主張后一种看法。例如,改良主义者多明戈·德尔蒙特写道:“所有有人情的、高貴的并具有庄严爱国主义精神的古巴人的任务,首先是应该

停止奴隶貿易，其次是逐步地禁止奴隶制度，而不要引起动乱和訴諸暴力，最后是清除掉古巴的非洲种族。这就是理智所了解的理由，也是自我利益、政治、宗教和哲学，簡言之，也就是古巴爱国主义精神所要求的。”<sup>39</sup> 薩科充分地闡述了这一論点。他反复地說，“我希望，不用暴力或革命手段，而是用溫和及和平的手段，来减少，如果可能的話，来消灭古巴的黑种人”<sup>40</sup>。

这种要把黑人从古巴生活中排除掉的反动想法，根本上是从恐惧中产生的。为奴隶主服务的思想家日日夜夜地爭論說，黑人不是人，而是上帝和自然注定要他們为优秀的白种人当奴隶的馱兽。但是他們内心知道黑人毕竟是人，而且像其他人一样渴望自由，只是在等待时机为爭取其实现而斗争。薩科認識到这一点。他的解决办法是把黑人全部驅逐出去，因为“自从古巴島实行奴隶制度以来，在这个島上总是有发生奴隶叛变的危險”<sup>41</sup>。

但是，奴隶主拒絕了这种解决办法。他們企图用一套大規模而錯綜复杂的控制制度来解决这一問題。这个控制制度的一部分是要向奴隶本人宣傳他从小到死天生就是劣等的，結果是奴隶往往接受了全体黑人都是低人一头的观念。像殉难的黑人詩人“普拉西多”<sup>①</sup> 在譴責这种控制奴隶制度的恶劣作法时所写的：

黑人出生了，从那时起，  
因为缺乏文化  
在苦难的混乱中  
成为受到折磨的和愚昧的人<sup>42</sup>。

这个制度的核心是西班牙警备队。这个警备队准备随时血腥地鎮压奴隶解放自己的每一行动。此外，还有守卫队和警察、巡邏队和在各地奔驰的騎兵，作为这一軍事力量的补充。为奴隶制定的行为規則，使奴隶无法采取联合行动。一个劳动队的奴隶不准

---

① 西班牙文的原意作安祥解。 — 譯者

与另一个劳动队的奴隶发生接触。他們被限制在他們劳动所在的种植园和农場里,彼此隔离。管家不受任何司法上的限制,对任何違反和抗議这些規則的个人或集体,均予以惩治。簡言之,在奴隶时期的古巴社会,同所有蓄奴社会一样,是处于經常为国内战争进行軍事准备的状态。古巴历史学家拉米罗·格拉-桑切斯曾經精辟地分析这种情况如下:

事实上,奴隶制度使白人和黑人永久处于战争状态,因为白人剝夺了黑人固有的自由权利,而在发生抗議或叛变时,白人可以毫不容情地惩罚黑人,直到用鞭子把黑人打死的地步。奴隶制度基本上就是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白人认为权利是在他們这一边,这个权利受到傳統法律的庇护——他們得到了命里注定要屈服、服从、劳动和死亡的奴隶的财产。黑人尽管可能是愚昧和野蛮的,他們的想法却迥然不同。黑人对主子的敌視是带有自卫性的,因而是公正的。問題的結局是剝夺了奴隶一切得到解放的希望,而主子却保存了他的权力。黑人除了設法毁灭白人之外,別无他法。在历史对全部事实作出公正的判断而不帶任何种族偏見的时候,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从本(十九)世紀初起,在古巴产生了两种要求解放的願望:一种是奴隶和古巴白人要求得到政治和經濟自由的願望,一种是奴隶和自由黑人要求公民自由和社会平等的願望。把白人要求政治自由的願望放在黑人要求公民自由的願望之上,是既沒有道义上的理由,也沒有任何其他理由的。古巴白人的敌人是母国的压迫者。奴隶則把白人当做他們的敌人,不論这些白人是西班牙人还是古巴人,因为两者在維持奴隶制度方面是意見一致的。只是白人的种族偏見和許多黑人由于奴隶制度、法律和习惯而产生的自卑感,才把奴隶为了消灭主人和解放自己所进行的叛变视为罪行的态度能够繼續下去<sup>43</sup>。

尽管建立了一套周密的控制机器,但是古巴的蓄奴階級仍然

經常生活在恐怖之中，并且往往由于不相信自己有保持自己的权力的能力而感到惊慌。这两种恐惧心情都是有充分根据的。一八三二年、一八三五年、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三八年，在好几个地区都发生了局部性的自发的奴隶起义。所有这些起义一如既往，遭到了恐怖镇压。但是，正如美国驻特里尼达德领事格雷 (T. R. Gray) 在叙述一八三八年镇压该城的奴隶叛变的情形时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人能预言经过多久奴隶叛变会再起”<sup>44</sup>。

奴隶主的末日为期不远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反对奴隶制度斗争的浪潮日益高涨，达到空前的高峰。

## 第十一章

### 反对奴隶制度的高潮

在整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古巴历任总督都因为英国领事在解放黑奴计划和对一八一七及一八三五年两个条约实施问题的其他方面的活动向西班牙当局表示不滿意。他們指責說，这些活动危及公共秩序，引起奴隶的不安。黑奴由于受到“英国自由观念”的感染，每当他們为爭取自由而斗争的时候，总期望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的支持。这种“荒唐的想法”鼓励了奴隶叛变<sup>1</sup>。

这些抗議如果和一八四〇年秋天的抗議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三日，英国著名的廢奴主义者戴維·特恩布尔到哈瓦那任英国领事。他促进了一連串的古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

特恩布尔从他在反对奴隶貿易混合委员会工作的年代起，就已经十分熟悉古巴的情况。他有許多朋友是古巴自由主义者，其中包括何塞·德拉卢斯，馬丁內斯·塞兰諾、多明戈·德尔蒙特、比森特和拉斐尔·卡斯特罗。一八三八年，特恩布尔成为哈瓦那皇家爱国-經濟学会的会员。恩里克·何塞·巴罗納形容他是“一个罕見的剛强、活跃而机警的人，他知道在古巴发生的一切事情”<sup>2</sup>。

特恩布尔早以《西古巴旅行記(附有波多黎各見聞和奴隶貿易的札記)》这本书的作者而聞名，这本书是以作者担任英国反对奴隶制度协会的代表所看到的情况为根据，一八四〇年初在倫敦出版的。它毫不隱諱地表示了作者主張廢除奴隶制度的情感。特恩布尔指出，古巴奴隶的地位“极为悲惨”，解放了的黑奴所处的地位“比普通奴隶更糟”，“尽管为了廢除奴隶貿易作了种种努力，但是

奴隶貿易仍在增加”<sup>3</sup>。当然，他的这些言論使他成为古巴奴隶主和靠非法的奴隶貿易发财致富的古巴島当局所不欢迎的人。他的书中有一段直率地說：“在哈瓦那的英国当局應該齐心协力，明确禁止奴隶貿易和反对奴隶制度。”<sup>4</sup> 这一段話尤其使他們感到惊駭。特恩布尔还指責說，西班牙政府保护奴隶貿易，把它作为“一种日益有力的制止众所周知的克利奥尔人要求独立的願望的手段”，以便可以更容易地使古巴人民忠順于天主教陛下。他的这一指責也激怒了西班牙当局<sup>5</sup>。

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通勋爵认为，特恩布尔这本书說明他可以胜任在古巴的这一职务<sup>6</sup>。他被任命为英国駐哈瓦那領事和解放的非洲人 (Negros libertos) 监督<sup>①</sup>。特恩布尔以另一个英国廢奴主义者弗朗西斯·罗斯·柯金为副領事而与他同行。

塔康总督一听到特恩布尔被任命的消息，馬上写信給西班牙首席国务大臣表示不同意。他要那个大臣注意特恩布尔来到古巴島的危險，“他的思想是这样一种改良派的思想，这些改良派为了維持保护黑人的原則，肯定会牺牲白人”。塔康敦促西班牙立即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把他撤換。这个文件后来轉送到西班牙駐倫敦的公使，并且命令他在口头上和帕默斯通勋爵談这个問題，要求另任命一个領事代替特恩布尔<sup>7</sup>。帕默斯通粗暴地拒絕了这一建議。

就在那个时候，特恩布尔和柯金到了哈瓦那，受到奴隶主及其党羽的冷淡接待。奴隶主集团极为震怒。皇家农商促进委员会在給总督的一封信上警告說，特恩布尔所主張的原則將傳到“自由黑人，再由自由黑人傳到奴隶，以致在一个国家里造成困难因素，这

① 西班牙和英国的任何外交条約都沒有承认这个职位。特恩布尔本人指出，这个职位是“新近設立的，这是由于必須照顾被我們的巡洋艦所捕获并随将被沒收的奴隶船送到哈瓦那的黑人在目前的生活和将来的自由”。〔《西古巴旅行記(附有波多黎各見聞和奴隶貿易的札記)》，(Travels in the West. Cuba: with Notices of Porto Rico, and the Slave Trade), 倫敦1840年版,第42頁。〕

个国家由于其居民天性寬厚，允許城市里的奴隶享受家庭安逸的生活，并且在这些命中注定要耕种土地的人中間放松了紀律”。在难于获得自由的地方向希望听到自由学說的人进行宣傳，会“像在附近的圣多明各爆发的黑人血腥叛变的情形一样引起不可挽救的禍害”。这个半官方的商人組織最后要求把特恩布尔驅逐出古巴，认为他是一种对古巴繁荣和安全的威胁。塔康总督虽然沒有采取这种激烈的做法，但是由于眼看他从奴隶貿易得到的丰厚收入受到威胁，他拒絕承认这位新任英国領事<sup>8</sup>。

但是，特恩布尔是威吓不了的。他知道他对奴隶貿易和奴隶制度的思想得到帕默斯通的支持，于是他着手进行活动来实现这些想法。他剛一上任，就坚持古巴政府应当立即实施一八一七年和一八三五年的条約，停止奴隶貿易。他的第一步是建議西班牙正式同意加强混合委员会的权力<sup>9</sup>。特恩布尔其次提議对奴隶进行一次普查，以便查明哪些奴隶是在一八二〇年以后进入古巴的，并且明白地指出，由于这些黑人是非法运入古巴的，应该命令奴隶主釋放他們。

这两个建議如果被采納，实际上就会結束島上的奴隶制度。甘蔗田和咖啡种植园奴隶的平均活命期很少超过二十年，而大部分奴隶又都集中在这些生产方面，因此很明显，在一八二〇年之前运进古巴的奴隶在一八四〇年差不多都死了。所以，如果一八二〇年以后运进的奴隶获得解放，关于奴隶貿易的条約得到有效实施的話，那么古巴的奴隶制度实际上就会消灭。在古巴只会剩下少数老奴隶和极少数土生的奴隶<sup>10</sup>。

西班牙拒絕了特恩布尔的两个建議。西班牙国务會議憤然否认反奴隶条約沒有实施的說法，并且坚持說，古巴奴隶的增加不是由于非洲的奴隶貿易，而是由于“像美国一样”奴隶結了婚，生了新奴隶——这显然是假話。至于特恩布尔的第二个建議，国务會議认为，如果一八二〇年以后运入的黑人得到解放并被允許自行活动的話，那末，古巴就会像过去的海地和牙买加一样，为愚昧、懶惰



和淫蕩所籠罩，從而“會破壞糖的生產”。國務會議最後說，“我們懷着忧伤的心情來看待我們的老盟國和老朋友的這一建議”<sup>11</sup>。

在古巴，僅僅提出要對一八二〇年以後非法運入的奴隸進行普查，就引起了震動。在馬德里拒絕英國的建議的消息傳來之前，促進委員會警告說，“由於這個國家的大小財富都決定於維持他們的勞動的人數，因此從特恩布爾先生的那一套制度建立之時起，生產就會全部停頓，從而使這個地方陷入普遍悲慘不幸之境和引起黑人反對白人的騷亂。”<sup>12</sup>哈瓦那市議會（Ayuntamiento）警告說，如果西班牙答應英國有權設立法庭，法庭有權決定被非法運進的奴隸的身份，叛變就可能發生，母國將無可挽回地失去這個島。這是沒有其他辦法的，因為“我們為了自己的便利，一直使自由黑人處於愚蠢無知的狀態<sup>①</sup>，他們就自然而然地會回到野蠻狀態，而不久古巴島將會遭到日斯巴尼亞島（海地）所遭到的同樣命運”。白人不會袖手旁觀和聽任西班牙“為了執行一種措施而犧牲四十萬白人，這種措施甚至會使五十萬有色人種更為不幸”<sup>13</sup>。

奴隸主和他們的黨羽對英國的建議遭到拒絕一事固然感到高興，但是他們擔心軟弱的馬德里仍可能被迫接受特恩布爾有關廢除奴隸制度的激烈措施。當一八四一年赫羅尼莫·巴爾德斯接任塔康的職務時，他們對母國政府的不信任看來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巴爾德斯雖然不是一位廢奴主義者，但是他認為實施關於奴隸貿易的條約和鼓勵中國人和白人移民是逐步廢除奴隸制度的第一步。巴爾德斯在古巴剛一上任，就正式承認特恩布爾為英國領事，這一件事激怒了奴隸主和他們的黨羽。第二步，他聲明他打算嚴懲任何犯有把奴隸運入古巴的罪行的人，並且宣布，任何賄賂都不能動搖他<sup>②</sup>。最後，他通知奴隸主說，奴隸法典中過去遭到忽視的有關保護奴隸免除凌辱的條款，現在將付諸實施<sup>14</sup>。

① 在這個恐慌的時刻，真相就大白了。奴隸主承認，黑人並不是天生劣等的，而是為了奴隸主集團的利益被置於愚昧的狀態。

② 據說巴爾德斯是這個時期唯一沒有由於奴隸貿易而發財致富的總督。

巴尔德斯的政策对古巴的发展发生了双重影响。奴隶主和他們的党羽认为这些措施是西班牙将屈从英国的要求的前奏。因此，維持奴隶制度的唯一方法是由美国兼并，在美国，奴隶制度由于得到政府的保护而兴旺发展。同时，美国国会的南方議員对特恩布尔的活动和逐步解放古巴奴隶的运动的日益壮大感到惊慌，他們大声疾呼，要求美国采取行动对付特恩布尔和巴尔德斯<sup>15</sup>。在巴尔德斯当政的最初几个月，要求古巴归并美国的叛变阴谋在全国发展，关于这一点，我們将在本书第二卷里談到。

巴尔德斯政策的另一影响是鼓励古巴的黑人采取行动。島上的反对奴隶制度分子(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黑人)由于看到西班牙在英国的压力下正在屈服，便加强了他們的活动。一八四一年夏天，在糖厂和咖啡种植园爆发了大規模的奴隶起义，但是沒有获得成功。一八四一年十月，有五十名奴隶在哈瓦那建造了一座大房屋，枪击西班牙軍隊<sup>16</sup>。

狠狠的奴隶主把这些起义归咎于特恩布尔为廢除奴隶制度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在他們讀了一八四一年七月十四日一期的《英国与外国反对奴隶报道者》杂志以后更是如此。这一期刊載了特恩布尔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以下的一段：

我很高兴地向你报告，廢除奴隶制度的原則正在这个城市和马坦萨斯生根。目前很有希望获得一些有利于人道和自由的結果，虽然有一些我們必須与之进行斗争的反对势力(从事黑人貿易的有害势力)，但是只要謹慎从事，这些原則一定会产生良好的結果。因此，我可以不怕有人反对地說，所有女王陛下任命在这个島上担任职务的人应当贊成廢除奴隶制度。这也是这个城市所有贊成廢除奴隶制度的人的意見和普遍願望；这些人为数不多，但是由于富有而頗有势力。人們似乎不能相信所有这些人能作出这許多好成績。他們的榜样可以增强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的廢除奴隶的原則；他們建立在原則基础上的精力和活动，会随时随地找到方法去阻止奴隶貿

易在这个市場上的可怕的進展。本城混合委員會的法庭需要这样的人<sup>17</sup>。

這篇文章是包括在為了要求把特恩布尔驅逐出古巴而提出的文件之內。英國被責以利用它駐哈瓦那的領事作為代理人，來破壞古巴的繁榮，以便恢復牙買加的經濟，牙買加由於“反對奴隸制度組織的狂熱活動”已經成為一片荒蕪了<sup>18</sup>。巴爾德斯雖然拒絕了把特恩布尔驅逐出境的請求，但是他同意一般意見，認為特恩布尔對最近發生的奴隸暴動負有責任。巴爾德斯向奴隸主保證說，他們用不着害怕西班牙會屈服於英國所提出的釋放一八二〇年以後非法運進的奴隸的要求。事實上，馬德里已經通知他說，西班牙絕不會同意任何危及古巴奴隸制度存在的措施<sup>19</sup>。

奴隸主集團還來不及慶賀，西班牙就已經屈服於英國冷酷無情的壓力。西班牙向巴爾德斯發布命令，要他準備解放所有在一八二〇年以後以欺詐方式運進來的奴隸。巴爾德斯不敢公布這一命令。相反，他懇求馬德里重新考慮，並且警告說，如果硬要他執行這一命令，西班牙將會使古巴落入美國手中<sup>20</sup>。

與此同時，帕默斯通採取行動，實施西班牙勉強作出的決定。他已經拒絕了西班牙駐倫敦公使所提出的撤換特恩布尔的請求。他直截了當地說：

西班牙政府無權因女王陛下政府駐古巴領事履行了他的職責而要求英國政府免除他的職務，但英國有權要求西班牙罷免從總督本人起所有在古巴的人員的職務，因為他們都聲名狼籍地和明目張膽地保護所有奴隸商人，違反西班牙國王所簽訂的條約的義務。……一八三五年英國同西班牙簽訂的條約隨時地和公然地遭到西班牙國王的人員的破壞，英國政府對於它和一個外國簽訂的條約竟如此遭到踐踏，不能熟視無睹<sup>21</sup>。

英國派遣了兩艘滿載軍火的輪船加入英國安的列斯艦隊。這兩艘輪船帶著支持特恩布尔強迫巴爾德斯對奴隸進行調查的命令

到了哈瓦那。但是总督劝海軍中将帕克說，任何实行奴隶登記的企图都会在該島引起危险的騷乱。这件事就被暂时擱置，等待新的指示<sup>22</sup>。

关于馬德里和哈瓦那前前后后交涉的消息被泄露了。不久就产生了后果。归并主义分子猖狂地加紧他們的活动。半島人在维护奴隶制度方面的利益既然受到了威胁，他們就准备和克利奥尔人一起进行归并运动。但是从英国傳来的消息使这种发展緩慢下来。英国內閣改組了，积极的廢奴主义者帕默斯通由阿伯登勋爵替代。一八四二年二月十二日，阿伯登答应西班牙，英国目前不拟强行要求对非法获得的奴隶进行登記。阿伯登虽然拒絕免去特恩布尔的职务，但是指示他不要在古巴繼續进行这一件事<sup>23</sup>。

特恩布尔对情况的变化深感愤怒，于是开始策划反对西班牙的叛乱，并以廢除奴隶制度作为古巴的新独立政府的第一批措施之一。有一个特恩布尔曾經和他接洽的富有的克利奥尔人作证說：

說話算話，如有必要我願最庄严地发誓，英国領事特恩布尔先生曾經对我有所恳求。他告訴我說，以艾伯特亲王为首的英国各种强大而有势力的廢除奴隶团体，对这个島的当地人民提供他們为摆脱西班牙而独立可能需要的金錢、武器、船只和人力，但是他們必須同时答应解放奴隶。当时我拒絕了这一诱人的建議，理由是：虽然人人享有自由的这一原則是以神圣不变的自然法則为依据的，但是不幸的是，在我們当前情况下，这个原則和另一个同样神圣的自然原則即自保原則抵触；我在最后建議，如果上述团体的慈善原則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这些团体可以运用它們的力量先把白人从西班牙的暴虐統治下解放出来，然后再以有利于两个种族的逐步和慎重的方式解放奴隶。……我知道，这位領事曾經訪問过这个国家的好几个人，并向他們提出过类似的建議，他认为这些人有势力，并且会願意接受他的迷惑人的建議，但是这个建議却被所

有的人拒絕了<sup>24</sup>。

但是，特恩布尔确实找到了一些贊成廢除奴隶制度的古巴白人，这些白人并没有由于害怕奴隶有解放的可能而願意放棄解放他們的机会。特恩布尔也得到以自由黑人何塞·米格尔·密契尔为首的大批黑人的支持。特恩布尔留在哈瓦那，他的副領事柯金和密契尔到內地旅行了几次，招募追随者。古巴种植园主改良者多明戈·德尔蒙特报告說，特恩布尔和柯金“答应克利奥尔人独立，条件是他們要和有色人种联合起来，实现奴隶的普遍解放，并且把这个政府变成一个在英国保护下的黑人軍事共和国”（把廢除奴隶制度同“黑人軍事共和国”这两种想法联在一起，这甚至在古巴改良者中間也是很典型的）。他还报告說，他們“曾經向住在牙买加島金斯敦城的委內瑞拉將軍馬里亚諾建議由他来指揮一支入侵部队。这支部队将……有得到白种克利奥尔人支持的奴隶和有色自由人的叛变予以配合”。据說特恩布尔已經和牙买加的英国官員商妥，对这支大部分由黑人組成的远征軍不加干涉<sup>25</sup>。

德尔蒙特企图鼓动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反对特恩布尔的計劃。他的話虽然夸大了叛乱計劃的規模，但是证据表明，这次叛乱計劃規模很大。可是，正像在古巴历史上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叛乱还没有发动，就被破坏了。自由黑人何塞·米格尔·密契尔被捕并被常設軍事执行委员会判处死刑（判決減为在非洲監禁十年）。对特恩布尔和柯金沒有提出控訴，这大概是因为西班牙当局不希望公布这次叛乱的規模，但是巴尔德斯要求撤換这位英国領事。他給西班牙首席国务大臣的信写道：“我认为由于我的地位所負的神圣义务，必須极力恳求閣下，設法使他撤換，因为我已經掌握了证据，证明他散布他的叛变阴谋，不仅劝告黑人爭取自由，而且在白人中間进行工作，誘劝他們爭取独立，他告訴白人必須努力……”他指責特恩布尔在一八四一年煽动奴隶叛乱，鼓动解放了的黑奴常常到英国領事館去，并以其他方法濫用他的权力促进独立事业，而以解放黑奴作为他的第一个目标<sup>26</sup>。

阿伯登同意了巴尔德斯通过西班牙公使提出的請求撤換了特恩布尔。特恩布尔并没有气馁，但是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在一八四二年六月八日离开了古巴<sup>①</sup>。一八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特恩布尔在給巴尔德斯的告辞信上表明他仍然坚持他的原則；他虽然承认他对“自由事业的热情”可能使他的行动“严厉，因而有时成为激起反抗的原因”，但是他“沒有走錯道路，这条道路在不远的将来是一定还要走的”。

但是，我必須指出，除了美国以外，古巴、波多黎各和巴西是仅有的还可以繼續看到这种可耻的奴隶制度現象的地方。如果容忍这些卑鄙的做法以致这种新信念的力量增加的話，結果将是奴隶制度和奴隶貿易不久就被不可抗拒的群众激憤的洪流席卷而去<sup>27</sup>。

巴尔德斯在复信中对于英国对特恩布尔所称的“世紀精神”所采取的态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

我只要說，如果这种精神是人道主义的和具有鮮明自由主义性质的話，那么这种精神可以用它的有益的洪流来改变爱尔兰不幸的人民和印度殖民地人民的处境……<sup>28</sup>。

当特恩布尔所坐的船駛离哈瓦那港时，古巴的全体奴隶主都松了一口气。西班牙听到这一消息时，也同样欢欣鼓舞。“我們最后是把特恩布尔搞走了”，西班牙駐倫敦公使高兴地写道<sup>29</sup>。

这种欢欣鼓舞为时不久。特恩布尔并没有长期远离古巴。他在被任命为“英葡混合委员会”的委員之后，先到新普罗維登斯<sup>②</sup>，然后去牙买加。他又从那里到巴哈馬的首府拿騷，召集了許多英国自由黑人，在一八四二年十月十六日乘了一艘由黑人駕駛的船回到古巴。这次来古巴的表面目的是参观英国公民經營的种植园，

---

① 六月五日新任領事約瑟夫·塔克·克勞福德接任特恩布尔的职务，他被授权在全島行使职权。特恩布尔的职权仅限于哈瓦那。但是特恩布尔繼續担任“解放的非洲人監督”。

② 巴哈馬群島的一个小島。——譯者

这些英国公民是从新普罗維登斯携带家屬和奴隶迁居古巴的。特恩布尔指責說，有些奴隶在离开新普罗維登斯之前已經解放了，但是在古巴又淪为奴隶。由于特恩布尔还是“解放的非洲人監督”，他就負有使他們获得自由的職責。同时，特恩布尔也計劃为了廢除奴隶事业周游全島，并且帶了許多反对奴隶制度的著作<sup>30</sup>。

这一次巴尔德斯就不再煩心去向英国提出請求。当特恩布尔到达卡德納斯的时候就被逮捕，他的黑人伙伴被打死。特恩布尔从監獄被武装押送上一艘英国輪船，并且不仅被通知說，他是被驅逐出境的，而且“今后不論以任何借口均不得再来古巴島”<sup>31</sup>。英国答应了西班牙的要求，取消了“解放的非洲人監督”这一职位。

古巴奴隶主非常憎恨特恩布尔，竟至开除他在哈瓦那皇家爱国-經濟学会中的会籍。但是奴隶主集团只是贏得了暫时的胜利。有些以何塞·德拉卢斯-卡瓦列罗为首的反对奴隶貿易的古巴自由主义分子，要求撤消这一决定。使奴隶主大为憎恨的是，这个英国廢奴主义者又恢复了会籍<sup>32</sup>。

尽管特恩布尔这个障碍被除掉了，他的重要黑人伙伴或者被杀，或者被監禁，但是奴隶主集团仍然忧心忡忡，害怕特恩布尔播下的种子会成熟。一八三八年以后发生的叛变事件的次数（虽然这些叛变是孤立而沒有連系的），证明奴隶确实是动荡不安的，特恩布尔的鼓动必然会影响他們。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頒布的新奴隶法典，表现了奴隶主的这种忧虑心情。

新法典有关奴隶的宗教教育、休息和照顾的規定同一七八九年的法典类似<sup>①</sup>。尽管有許多证据表明奴隶主很少履行他們的义务，但是一八四二年法典也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規定来强迫奴隶主遵守这些义务。新法典中真正新的規定是，加强对奴隶的活动和运动的控制。新法典規定，一个种植园的奴隶未經許可和未持

① 和一七八九年法典的規定一样，对奴隶应当讲授天主教教义，供应他們适当的衣食和住所，以及給予他們休息時間。一个平常的工作日規定为十小时，但逢收获季节，劳动十六小时。和过去一样，凡虐待自己的奴隶的主人，必須将被虐待的奴隶卖给另一个主人。

有他們主人或管家的书面許可证，不得訪問另一个种植园的奴隶；任何人均有权扣留未帶許可证的奴隶；它規定黑人必須溫馴地服从被任命的当局，必須尊重白人；任何一个奴隶发现并报告一次暴动，便給予自由和五百比索的奖金<sup>33</sup>。

但是新的奴隶法典对于消除不断存在的暴动恐怖起的作用不大，特别是在卡德納斯和馬坦薩斯这些奴隶人数大大超过白人的地区<sup>①</sup>。奴隶主集团害怕，有朝一日各个孤立的庄园发生的叛乱会汇合成为一次大暴动。由于在巴尔德斯統治时期西班牙军队都駐在哈瓦那，这种大暴动如果蔓延，可能成为无法控制<sup>34</sup>。因此，奴隶主集团請求西班牙派遣军队駐在产糖区的中心，以便奴隶叛变一发生即可采取行动。

但是这一請求沒有必要，因为西班牙已經任命利奥波德·奥当納耳接替巴尔德斯。奥当納耳立即調集武装部队扑灭一切暴动。这个反动家伙在到达該島后不久，就得到了推行他的铁拳政策的机会。附带提一下，奥当納耳不仅接受奴隶商人的賄賂，而且也接受奴隶主的賄賂。当一八四八年他下野不再当总督时，他已經拥有五十万美元的财产<sup>35</sup>。

一八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奴隶总暴动的可怕前景几乎成为事实了。这次暴动发生在当时古巴最富庶的产糖区，

① 很难确定黑人人数超过白人的百分比，因为西班牙有意隱瞞确切数字。西班牙当局对于普查材料加以篡改，以便掩飾非法的奴隶貿易仍在增加这一事实。同时，西班牙当局作为使白人更加紧密地和西班牙道系在一起的政策的一部分，发表了表明黑人人数超过白人的数字。妨碍提出正确数字的另一因素是对奴隶主的征稅。奴隶主为了逃稅，他們报告的奴隶数字比他們实际所有的奴隶要少一些。

一八五〇年古巴人口普查的結果表明，全国人口有一百二十四万七千二百三十人，其中白人为六十万零五千五百六十人，自由黑人为二十万零五千五百七十人，奴隶为四十三万六千一百人。一八四三——一八四四年黑人对白人的比率可能要大得多。〔波尔特耳·比拉(Portell Vila):《古巴》(Cuba), 第1卷, 第476頁; 理查德·达納(Richard H. Dana):《往返古巴》(To Cuba and Back), 1859年波士頓版, 第221—222頁; 《亨特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s' Magazine), 1850年, 第38卷, 第735頁。〕



即相当于现在的馬坦薩斯省的地方。暴动开始于卡德納斯的“阿耳卡尼亚”(Alcania)糖厂,全部二百五十名奴隶参加了暴动。叛变者接着向“拉卢伊薩”(La Luisa)、“拉特里尼达德”(La Trinidad)和“曙光”(La Aurora)三个糖厂推进,号召这三个糖厂的奴隶和他们一起爭取自由,这样,一个厂接一个厂,所有的奴隶都参加了暴动。然后,奴隶侵入了附近一个“莫斯庫”(Moscu)咖啡种植园和“兰丘埃洛”(Ranchuelo)饲养馬匹的农場。当夜,正在建造卡德納斯—胡卡罗铁路的奴隶,好像是按照事先約定的信号一样,也都参加了叛变。但是,在这两伙奴隶汇合之前,有一营迅速动員起来的军队攻击了装备拙劣的奴隶。許多黑人惨遭屠杀,数以百計被怀疑和叛变有默契的奴隶遭到鞭打,叛变失败了<sup>36</sup>。

但是同年十一月又爆发了一次奴隶总暴动。这次暴动是在馬坦薩斯的“特里溫維拉托”(Triumvirato)糖厂开始的,和三月发生的暴动一样,这次暴动也随着奴隶入侵附近的糖厂而扩大,它吸收了那些厂的奴隶参加叛变。叛变者也受到军队的攻击,这次暴动再次被残酷的报复手段所粉碎<sup>37</sup>。

一八四三年十二月,再一次使用了奥当納耳的恐怖手法。一个奴隶出卖了馬坦薩斯的“拉特里尼达德”糖厂的叛变計劃。奥当納耳立即进行了調查,結果是在糖厂把十六名奴隶处死,并且迫使附近糖厂的奴隶来看这一次行刑<sup>38</sup>。

镇压“埃斯卡萊拉叛变”(Conspiración de la Escalera)使恐怖的浪潮达到了高峰,写下了古巴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頁。

## 第十二章

### 埃斯卡萊拉事件

一八四四年一月，在馬坦薩斯破獲了大規模的陰謀叛變計劃。在將近三年中，自由黑人、奴隸和少數古巴白人一直舉行秘密集會，策劃旨在改善自由黑人社會境遇和解放奴隸的革命暴動。暴動原定在馬坦薩斯開始，叛變者將率領哈瓦那各種植園的奴隸來和首都的自由黑人和奴隸會師。暴動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廢除奴隸制度、黑人享有與白人完全平等權利的共和國<sup>1</sup>。

暴動沒有超出準備階段。當暴動計劃被人告發以後，奧當納耳總督便利用這一事件來恐嚇要為奴隸謀求自由的人，使他們永遠不敢再冒頭。僅僅根據謠言就逮捕了成千的人，其中包括外國人，他們甚至在提交審訊以前就受到了殘酷的虐待。單在馬坦薩斯一地，常設軍事執行委員會就“審判了”三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自由黑人。被捕者共達四千零三十九人，其中有二千一百六十六人列為自由黑人；九百七十二人列為奴隸；七十四人列為白人；未被分類的有八百二十七人<sup>2</sup>。

准許刑訊來逼取口供。黑人嫌疑分子被綁在梯子上，用鞭子抽打，直到他們招認為止——“埃斯卡萊拉”（梯刑事件）這個名稱就是這樣來的。目擊這次野蠻刑罰的富有的古巴奴隸主米格爾·阿耳達馬深被受害者的英勇不屈的精神所感動。他在譴責這次叛變是很可怕的和認為懲罰是必要的以後，接着描寫當局是“歹徒”，黑人是“自由的真正殉難者。黑人万众一心，他們發誓：不獲勝利毋寧死去，他們這一誓言甚至連殘酷的鞭打也壓服不了”<sup>3</sup>。

軍事委員會判處七十八個人死刑，一千二百九十二個人監禁，

四百多人流放。从来没有断定有多少人死于鞭下，不过根据保守的估计，死于鞭下的有三百人<sup>4</sup>。当局发表了公开报告，为拷问的人洗刷，并且硬说许多被害者是死于“痢疾”。塞尔希奥·阿吉雷指出，“因此，他们转移人们视线的手法使他们罪上加罪”<sup>5</sup>。

一八四四年六月九日，即叛变计划被破获之后六个月，美国领事罗伯特·坎贝尔从哈瓦那写道：“政府仍在搜捕企图叛变的嫌疑分子”<sup>6</sup>。六个月以后，还在继续捕捉和审讯黑人。混合委员会的英国法官肯尼迪在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写道：“听到了去年一年对这个不幸阶级的人们所施加的残酷待遇和压迫的报道，确实令人悲痛。”<sup>7</sup>

这个起端于扑灭奴隶叛变的运动，不久就波及自由黑人、甚至敢于反对奴隶制度或奴隶贸易的白人自由分子。这是恐怖心理的必然后果，因为奴隶主集团知道自由黑人支持并领导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而来自自由职业和小农阶级的古巴白人则同情这一运动。到“埃斯卡莱拉”叛变事件结束的时候，自由黑人的优秀领袖被清除了，不是被处死，就是被递解出境<sup>①</sup>，许多白人自由分子被监禁或流放<sup>②</sup>。

在被处死的自由黑人中，有牙医师安德烈斯·道奇、音乐家何塞·米格尔·罗曼和以“普拉西多”闻名的富有才华的诗人加夫列尔·德拉孔塞普西翁·巴尔德斯。“普拉西多”是一个自由黑人，他以所写的庆贺节日和生辰的诗篇而著名，从表面上看，他的这些诗篇并没有任何革命气味，但诗的深处总是含有憎恨暴君、酷爱自由的思想。“普拉西多”在祝贺伊莎贝尔二世的诗中写道：

---

① 在一八四四年叛乱之后，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把所有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有色的自由人驱逐出境。

② 何塞·德拉卢斯·卡瓦列罗和多明戈·德尔蒙特被控有共谋罪。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国外，但是德拉卢斯回国后同告发他的人对质，最后被宣告无罪。不过，应当指出，尽管德拉卢斯反对继续奴隶贸易，但他对奥当纳耳惨无人性地镇压埃斯卡莱拉叛乱一事却备加赞扬。

在古羅馬主神的聖壇前  
哈斯德魯寶起誓  
憎恨羅馬人  
向他們顯示出戰神的暴怒  
在上帝面前，我發誓  
永世憎恨一切暴君<sup>8</sup>。

在古巴，因害怕叛變而神經緊張到這種程度，以致連黑人這種崇高的表示也不能容忍。“普拉西多”竟因被控為特恩布尔的間諜和曾經被選為叛變者所要建立的共和國總統這一莫須有的罪名而被逮捕。雖然關於他的證據是用酷刑得到的，他還是被處死了。

三十年後，美國黑人領袖亨利·海蘭·加內特在紐約庫柏協會舉行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是紐約黑人為了聲援古巴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而召開的）上發表演說時宣稱：

古巴人，你們不能忘記你們國家一位勇敢而英雄的黑白混血種的不朽詩人普拉西多。你們知道，他和你們一樣，熱愛自由，為了這一神聖事業，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被控參加一次預謀的叛變，他以叛國罪被判处死刑。當他被押赴刑場的時候，他高呼：

呵！自由呀！我聽到你在向我召喚  
在那遙遠的北方冰凍地區的深處，  
你的聲音宛似上帝的聲音，你的眼光亮如明星<sup>9</sup>。

西班牙當局歸罪於特恩布尔，說他是陰謀叛變的主要鼓動者，煽動了那些本來是心滿意足的奴隸和自由黑人進行叛變。有一個調查了這次陰謀的軍事委員會認為，他的“顛復活動”不僅是叛變的起因，而且他親自出謀和策劃這次叛變，他甚至安排了一支黑人遠征軍，只要叛變一開始，便從牙買加開來支援叛變<sup>10</sup>。

大多數古巴歷史學家同意軍事委員會的判斷<sup>11</sup>。此外，西班牙歷史學家馬里奧·埃爾南德斯·桑切斯-巴瓦在他最近寫的《戴維·特恩布尔和古巴奴隸問題》(David Turnbull y el Problema

de la esclavitud en Cuba) 一文中也同意它的判断。埃尔南德斯对西班牙档案中有关“有色人种叛变”一案的三厚本证据进行了研究，断定叛变计划是特恩布尔在哈瓦那担任领事职务期间就开始了。特恩布尔曾经派遣他的个人代表黑人米格尔·弗洛雷斯和路易斯·吉戈特参加叛变策划者的会议，并且帮助拟定最初的叛变计划<sup>12</sup>。

但是，同有关这次叛变的其他每一情况一样，要断定特恩布尔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不可能的。说实在的，就是在这一事件以后一个多世纪，也仍然很难确定一八四四年的叛乱实际上是否组织过，或仅是奥当纳耳和奴隶主集团所捏造的，他们想借此撵走岛上可能领导反对奴隶制度运动的人。有些古巴历史学家，其中有比达耳·莫拉莱斯和弗朗西斯科·岡薩雷斯·德尔巴列，他们把这次叛变说成是西班牙当局的疑心病所引起的一种幻想。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如佩雷斯·卡夫雷拉则认为作出任何结论都是根据不足的；还有第三派人，其中以何塞·曼努埃尔·西梅诺最富有代表性，他们赞扬这次叛变，认为它是到那时为止在古巴所策划的最重要的一次叛变，而且是“古巴第一个带有脱离母国性质的重要叛变，共影响遍及全岛”<sup>13</sup>。

毫无疑问，许多无辜的人民在这次暴虐镇压中被杀害了。马坦萨斯和卡德纳斯地区的奴隶群情激昂地参加了叛变，自由黑人和反对奴隶制度的古巴白人同奴隶建立了联系，这也是没有疑问的<sup>14</sup>。特恩布尔在被驱逐出境以前，他已经在古巴留下一个组织继续领导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sup>15</sup>，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当然，倘把这次的整个叛变归因于这位有胆量的人道主义者，那也未免低估了黑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愿望。最后，不论叛变是否准备发动，也不论是否把叛变过度夸大以便为镇压叛乱进行辩解，“埃斯卡莱拉”事件对古巴历史有着决定性影响，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在“埃斯卡莱拉”事件期间，人们把古巴正确地称为一个“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军事专制”<sup>16</sup>。但是，奴隶主却感到心满意足。尽

管奧当納耳以不能相信古巴人能够發揮必要的坚决性为理由，免除了古巴人所担任的一切公职，但是他的政策却博得古巴奴隶主和他們的党羽的喝采。有一件給馬德里的上面有几百名哈瓦那地主、商人和公民签名的呈文，对总督查出奴隶叛变計劃和“非常彻底地”歼灭了叛变者一事备加贊揚。他所做的事情使人感到“十分滿意”，并且“拯救了国家，免遭空前浩劫”。这个呈文要求让他繼續統治該島<sup>17</sup>。

这次叛变成为了解这个时期古巴历史的关键。在許多問題上，克利奥尔种植园主和半島商人的利益显然是相互冲突的。种植园主怨恨他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們反对执行有利于西班牙商人而阻碍古巴自由发展貿易的政策。把克利奥尔种植园主和半島商人联合在一起的是，他們維護奴隶制度的共同利益和害怕奴隶叛变获得成功的共同忧虑。正如給馬德里的呈文所表明的，两个階級在这方面的一致比使它們分离的对立冲突更有力量<sup>18</sup>。西班牙駐华盛顿大使警告說，古巴总督的包罗万象的权力一定不能縮小，并且必須拒絕接受为該島提出的一切改变办法：“如果不能維持现行制度，这个島就会丧失，有色人种就会取得胜利。”<sup>19</sup>古巴奴隶主无疑是同意这位大使的警告的。

“埃斯卡萊拉”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制訂了更苛刻的奴隶管理条例。一八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命令，对奴隶的行动規定了更多的限制，并且对于犯有騷扰活动的嫌疑的人处以更严厉的懲罰<sup>20</sup>。古巴当局現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願意根据条約的規定釋放解放的黑奴。英国政府一再地指責奧当納耳，說他在解放的黑奴服役期滿后又把他們卖出去当奴隶。从一八四六年八月三日帕默斯通勋爵給英国駐馬德里公使亨利·利頓·布耳沃爵士的信件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恶劣的做法：

根据最近收到的女王陛下駐哈瓦那委員的報告……看来，轉卖解放的黑奴的做法已成为公众議論的話題。这种做法在古巴总督的认可和指导下已經在过去实行了一段时间

了……

报告还指出，这种不幸的人有五千人以上，是以五到九盎司不等的黄金价格轉卖出去的（例如，有五个解放黑奴被卖给哈瓦那煤气公司当点灯人，为期五年），这就是說，总督府人員得到了六十万美元以上的好处……有四百个解放的黑奴被轉交给混合法庭庭长、該島最大的奴隶主馬克斯·德拉斯德利西亚斯，由他替奥当納耳將軍的妻子格雷加伯爵夫人保管这些黑奴……这是直接和粗暴地違反条约义务的行为……。

請你（向西班牙政府）表示坚定的希望：西班牙政府会对奥当納耳將軍发出断然的强制命令，要他为这些名义上获得解放的黑人获得……充分而完全的自由……<sup>21</sup>

奥当納耳沒有否认这些指責；他认为他的行为是对的，他說一八四四年的叛乱計劃证明增加自由黑人的数量是多么危險<sup>22</sup>。

因此，古巴奴隶的境遇正是在廢除奴隶制度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更加恶劣了。“埃斯卡萊拉”事件的遭到鎮压，向奴隶表明，进行大規模解放运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許多年以后他們才敢于試图发动下几次暴动。广大的自由黑人群众和反奴隶制度斗争的古巴白人領袖，在这次鎮压中損失如此惨重，以致需要用将近二十年時間才能恢复元气。

但是，“埃斯卡萊拉”事件的一个后果是，輿論第一次起来大声疾呼地反对繼續奴隶貿易。古巴半島人的代表拉蒙·德拉薩格拉在一八四五年指出，虽然十二年来各方面对他为反对奴隶貿易所进行的鼓动表示“沉默和漠視”，但是在“埃斯卡萊拉”事件以后，他的意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奴隶人数大大超过白人的乡村地区更是如此<sup>23</sup>。因此，有一群馬坦薩斯种植园主指出，他們担心这个地区至少有六十万奴隶受到来自海地和牙买加的解放观念的感染，因此請求停止这种違禁的貿易，因为它威胁“我們对安全和未来的幸福所抱有的一切希望”<sup>24</sup>。

这一要求得到流亡国外的薩科的支持。薩科在一八四五年发

表了他所写的《廢除古巴島的奴隶貿易》(La Supresión del tráfico de esclavos en la Isla de Cuba)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再次指出繼續奴隶貿易所造成的內外危險，并且又一次建議有通过移民增加古巴白人人数的必要。他以銳利的洞察力指出最近的奴隶叛变和陰謀的意义。他說，“以往的各个期間都发生过奴隶暴动，但是这些暴动始終是局部性的，只限于一两个农場，既沒有計劃，也沒有产生政治上的后果……。但是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三年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发生的暴动性质却迥然不同；从它在奴隶和自由黑人中蔓延之广来看，从它的起源和目的来看，最近破获的叛乱計劃是在古巴所曾策划的最可怕的一次。”在将来，黑人不必同时全体叛变，因为“在各地不时一再发生的”局部活动，就足以破坏信任和信心，迫使古巴白人离开首都和迁居国外。古巴經濟所遭的破坏将一年比一年严重，“直到发生奇災大禍”。

他預言，“如果奴隶貿易繼續下去，古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安全……古巴为了将来，不仅必須立即永远停止一切奴隶貿易，而且有保护白人进行殖民的义务”<sup>25</sup>。

虽然有些奴隶主指責薩科“受到英国收买”，但是他的这本小册子比他以前为了廢除奴隶貿易而发出的任何呼吁都更使人感动。

同时，英国也加紧对西班牙施加压力。英国公众对于“埃斯卡萊拉”事件所引起的大規模逮捕和处決的消息感到震惊。許多英国公民被当作嫌疑分子逮捕，对于憤怒的英国公众是火上加油。英国报刊强烈攻击奧当納耳；倫敦《广告晨报》要求英国出面干涉，以肃清这个“人血泛濫的屠宰場”。英国政府迅速地采取了行动。阿伯登勳爵通知西班牙說，如果必要的話，英国将使用武力来实施一八三五年条約中禁止奴隶貿易的条款<sup>26</sup>。

这些反应为制定禁止奴隶貿易的新措施創造了有利气氛。一八四五年三月四日，西班牙議會批准了“廢除和禁止奴隶貿易法”，該法規定对于从事奴隶貿易的領港員、船長、貨主和其他人員得处



以六年監禁，如果他們違抗的話，得處以八年監禁；這個法律還規定，對於已確悉有奴隸登岸而不採取行動加以制止的國家官員，也應予以懲罰。不幸的是，第九條又禁止追究在甘蔗種植園或煉糖廠內的非法奴隸，因此上述這一重要進展也就不起作用了。當官員獲悉有奴隸正在準備登陸或已經登陸時，必須採取行動，“但採取的行動在任何情形和任何時候決不能以奴隸的來源為借口控訴或妨礙奴隸主占有奴隸”；當然，這就是說，一旦奴隸被非法運進了種植園，就沒有合法的途徑可以搜出奴隸或對奴隸占有者進行控訴。因此，儘管一八四五年條約的直接作用本來是要多多少少地減少奴隸貿易<sup>①</sup>，但是第九條的漏洞為以後進口奴隸打開了大門<sup>27</sup>。

西班牙一方面向英國和古巴要求改革的壓力屈服，另一方面又向奴隸主們保證任何人都不得觸動非法運到他們的種植園的奴隸，這是西班牙的典型做法。實際上，西班牙轉彎抹角地使奴隸主相信，一八四五年條約並沒有賦予英國更大的干涉古巴的奴隸貿易的權力。西班牙洋洋得意地告訴他們說，英國已答應減少英國領事的干涉。西班牙還認為，新法律完全是為了奴隸主集團的安全，因為它將消除奴隸叛變的危險<sup>28</sup>。

儘管有了這些保證，西班牙議會的行動仍舊激起了許多古巴

---

<sup>①</sup> 實際上，奴隸貿易的減少，與其說是由於制定了新法律，還不如說是由於奴隸主因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叛變和一八四四年的叛變計劃而更加感到恐懼。向英國議會提出的文件表明，在“埃斯卡萊拉”事件之後幾年中，奴隸貿易確實有了顯著的減少。據報告，一八四五年有一萬名波薩耳人（bozales）到了古巴，但是一八四六年這個數字減少到一千三百五十人；一八四七年減少到一千七百人；一八四八年減少到一千五百人。（《赫特先生向英國議會提出的文件》（Documents presented to the British Parliament by Mr. Hutt），轉引自阿馬斯-塞斯佩德斯（Armas y Céspedes）：《論古巴奴隸制度》（De la esclavitud en Cuba），哈瓦那1921年版，第120—122頁；休伯特·埃姆斯（Hubert S. Aimes）：《1511—1868年古巴奴隸制度史》（A History of Slavery in Cuba, 1511—1868），紐約1907年版，第170頁。）因此，可以說，雖然“埃斯卡萊拉”事件使古巴廢除奴隸制度運動嚴重削弱，它的領袖不是被消滅，就是被迫轉入地下，但是整個廢除奴隸制度運動的努力並不是沒有結果的。

奴隶主和贩卖奴隶商人的反对。奥当纳耳为这些奴隶主的利益——也是为他本人的利益——說話，他在給馬德里的一系列信件中，表示了这种看法：一八四五年法律会破坏古巴的經濟，而使該島脱离母国。他預料，在十年內，古巴会感到非常缺乏劳动力，因为没有办法可以补充目前正在种植园劳动的奴隶<sup>①</sup>。不久白人就会超过黑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保存这块領地和維持它对母国的依賴的保证就告終結”<sup>29</sup>。

奥当纳耳的警告使西班牙政府惊慌起来，它指派了一个委员会——皇家委员会殖民地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会贊同奥当纳耳的这一意見：西班牙要維持对古巴的統治将取决于黑人对白人保持較高的比率（合适的比率是六个黑人对四个白人）。委员会建議，为了保持这一比率，应仿效美国的做法，制定一种繁殖奴隶的制度。为了鼓励繁殖奴隶，凡是增加种植园中女奴隶的奴隶主可以免繳奴隶人头税的全部或一部。它也建議对家用奴隶征收更高的稅，以便鼓励把他們放在农場上劳动。“为了使奴隶的寿命和健康維持一个較长的時間”，应当减少奴隶法典中所規定的劳动時間，但是这种修改應該暗中進行和保守秘密，只在口头上通知奴隶主，“因为，如果奴隶了解到必需抑制他們主人的貪婪，那將是十分危險的，而且各种主張廢除奴隶制的团体会对这些章程进行对它們最有利的解釋。”委员会还提議，应更多地依賴东方劳工，并且指出，“中国人的长处已經在菲律宾得到证明。”委员会最后建議，所有五十岁以下的自由黑人應該流放国外，或强迫他們在甘蔗种植园里劳动。把他們流放国外，将能消除古巴社会的一个“潜在的危險因素”，而且把自由黑人赶到种植园里，可以增加劳动力，并

---

① 奥当纳耳确信，白人移民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而繁殖更多的奴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甚至在有四百到七百名奴隶的种植园里，連一个女奴隶都沒有。（阿瑟·史密斯(Arthur F. Smith):《1817—1873年西班牙与古巴奴隶制問題》(Spain and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Cuba, 1817—1873), 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論文, 第112—113頁。)

把他們置于監督之下<sup>30</sup>。

对提出这些建議的人來說，这些建議對他們的殘酷的心腸是怎么样的一种批評呵！当欧洲別的国家正在向廢除奴隶制度的方向前进的时候，西班牙政府为了保持它对古巴的控制，竟提出維持和加强它的奴役人类制度的方法，甚至采用駭人听闻的手法来繁殖奴隶！关于減輕奴隶劳动的建議应当秘密执行，这对古巴奴隶制度的本质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批評！最后，对那些粗魯地提議重新奴役自由黑人的人，又有什么可說的呢？

实际上，上述建議只有一个建議在古巴被采用了，那就是使用黑人奴隶以外的其他劳动力。在“埃斯卡萊拉”事件以前，薩科和別的少数人曾經着重指出逐步以自由白人劳工代替黑人奴隶劳工的重要性，但沒有为人们所注意。在一八四三年奴隶起义和一八四四年的暴动阴谋引起恐怖統治之后，对这一問題开始进行更认真的討論。一八四五年薩科譴責奴隶貿易、贊成使用自由白人劳工的小册子发表之后，又出版了其他涉及同一問題的刊物。一八四五年二月，发布了一道国王命令，指示西班牙駐在国外的領事代表准备对到古巴的移民发給通行证。一年之內，有五百个从十八岁到四十岁的西班牙和欧洲农业殖民者由政府出錢送到古巴，殖民者在找到工作后三年內偿还一半費用；作为交換条件，殖民者将簽訂合同，同意在这个时期內留在古巴。当时认为，这些殖民者可以用于种植烟草和咖啡，以及蔗糖生产的工业方面，諸如在种植园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当技工等<sup>31</sup>。

有少数白人农业契約劳工被运进了古巴，但是他們对农业制度沒有产生什么影响<sup>32</sup>。因此，寻求方法以防止将来发生奴隶叛变的人，便向其他地方打主意。一八四七年，运进了第一批中国契約劳工。合同期限是八年，期滿可以自动延长。有許多著名的种植园主征购劳工。一八四九年，有一百三十五名从尤卡坦来的印第安人抵达哈瓦那。每一个中国劳工的价格定为一百二十五比索，尤卡坦的印第安人大約为一百比索。

中国和尤卡坦工人像奴隶一样，可以买卖和轉让，他們的待遇也和奴隶一样。这两类人备受虐待，以致有許多人自杀，墨西哥政府为此停止了移民<sup>33</sup>。

中国人和尤卡坦印第安人被证明同白人移民一样令人失望（許多人在合同期滿前就病死或因过度劳动而身死）。但是这些代替黑人劳工的措施表明，古巴奴隶主集团对一八四二——一八四四年的各次事件是多么的恐惧。

感到恐惧的不仅仅是他們，一股歇斯底里浪潮瀰漫到蓄养奴隶的美国南方。南方在政府中的发言人反映了这一恐惧。一八四三年初，国务院从“一个十分为人尊重的来源”、即古巴种植园主多明戈·德尔蒙特那里接到了一份紧急报告，大意是說，英国打算夺取古巴，解放黑人，建立一个“在英国保护下的黑人軍事共和国”。他恳求美国阻止这种活动。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对这一报告大吃一惊，把它轉送給美国駐哈瓦那領事罗伯特·坎貝尔进行調查，并且要他密切注意，“对所有关于你奉命进行調查的事项必須絕對保守秘密”。韦伯斯特接着說，如果这个报告证明屬实，西班牙当局可以“放心地信賴美国全部海陆軍力量会帮助……保全古巴”，因为：

据指出，如果这一阴谋得逞，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将是无限的。据說，英国如果有了古巴的六十万黑人和西印度群島的八十万黑人，就可以对美国奴隶制度的存在予以致命的打击……，并且甚至还可以阻止美国貿易自由通过巴哈馬海岸和佛罗里达海峡<sup>34</sup>。

坎貝尔虽然把英国主張廢除奴隶的人在古巴的活动說成是“討厭的”<sup>35</sup>，但是他报告說，上述的消息是沒有根据的。約翰·昆西·亚当斯对这一桩事情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沒有任何人比他更了解美国对古巴的意图。他认为，所有这一切更明确了这一事实：决心廢除奴隶貿易的英国正在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要它履行条約，在这些条約中，它曾承担了禁止奴隶貿易的义务；但是美

国有些利益集团，特别是奴隶主和他们在北方的盟友，想要利用这一局势，和利用“黑人共和国”这一妖魔，来阻止英国对古巴的野心的实现。亚当斯现在是奴隶主统治的顽强的敌人，他把韦伯斯特给坎贝尔的指示说成是“被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玷污了的”。他认为，关于“黑人共和国”的骇人听闻的传说反映了美国的侵略意图。他在日记上写道：“为了人类的自由事业，我的心感到消沉失望。”<sup>36</sup>

坎贝尔的安定人心的报告并没有消除华盛顿的恐慌。国务院接到美国领事哈里逊(R. M. Harrison)从牙买加寄来的定期报告，他警告说，自由黑人想同海地的黑人联合起来夺取古巴，然后袭击美国南部，以期解放那里的被奴役的黑人，他唤起人们注意，在英国浸礼会教士主持下，在牙买加成立了一个团体，其宗旨是把解放古巴奴隶作为第一步，来获得“美国奴隶的全部解放，只要能够成功，就不选择手段”。尽管国务院一些官员认为这些报告是“大惊小怪的”，但是美国南方各州的人却认真地对待这些报告。哈里逊在一八四三年六月十四日发出的报告尤其使他们感到惊慌，他在这个报告中说，“臭名远扬的特恩布尔”——总督已下令着其离开古巴——来到了牙买加，表面上是作为为夺回的非洲人而设的英荷委员会的首脑而来到这里，但是他的真正意图是从牙买加煽动古巴奴隶叛变<sup>37</sup>。同时，来自古巴的报告谈到特恩布尔的部下何塞·米格尔·密契尔被逮捕，因为他是牙买加自由黑人入侵古巴以援助古巴叛变的阴谋的煽动者。

泰勒政府现在确信，英国准备竭其全力废除古巴的奴隶制度，因此它也就下定同样决心要尽一切力量阻止英国的这个企图。当西班牙驻美国公使阿盖斯要求泰勒总统、国务卿和海军部长派遣舰队到古巴领海举行海军示威以表明美国支持西班牙当局时，美国立即答应照办。海军准将昌西被派率领一支海军舰队到古巴去，以便确保传说中的英国计划不能实现。驻哈瓦那领事坎贝尔也向总督表示予以合作，以“保卫该城”，应付来自牙买加的侵

略<sup>38</sup>。继韦伯斯特之后担任国务卿的埃伯耳·阿普休尔劝告阿盖斯說，“西班牙当局应该处决任何一个图謀在古巴发动叛变的人；或者，如果有一个外国政府保护这种人（像英国保护特恩布尔那样），古巴人民应把这个人处以私刑，那时，看看那些胆敢反对的人的样子，才是有意思的”<sup>39</sup>。

美国駐西班牙大使华盛顿·欧文通知西班牙外交大臣說，美国駐在古巴附近的海軍准备保卫古巴以反对一切外国干涉，并且保证島上奴隶制度的安全，欧文得到了一个充滿感激心情的答复：

这位著名的作家<sup>①</sup>写信給阿普休尔說道：“岡薩雷斯·布拉沃先生表示，他很清楚，在大多数和黑人奴隶制度有关的問題上，西班牙和美国两国政府的利益和感情是一致的；他也清楚，就西班牙在它的西印度殖民地而言，我們对西班牙的政策是公平和友好的。我表示我国政府决心帮助西班牙保持对古巴的占有（如果必要的話使用武力），任何其他国家企图为自己占有这个島屿，将被认为是引起战争的原因，布拉沃对我的声明似乎很感激。他对古巴的現状沒有表示不安，相反地，他深信，西班牙政府即将采取的有力措施，将会有效地使該島处于安全状态。”<sup>40</sup>

当然，“有力措施”就是奥当納耳总督所制定的措施。奥当納耳不只听从了阿普休尔的劝告，处决任何企图煽动奴隶叛变的人，并且連有这种企图的嫌疑分子也加以处决。这种做法使阿普休尔放了心，但并没有使南方蓄奴者放下心来，因为后者被“埃斯卡萊拉”事件中发生的大規模暴动吓得胆战心惊。巴茲耳·罗赫指出，“‘埃斯卡萊拉’事件，使一个在英国保护下和危險地靠近种植棉花各州的黑人共和国的出現，好像是很现实，并且迫在眼前。”<sup>41</sup>

人們預料到，奴隶制度的杰出理論家約翰·卡耳豪恩，在一八四四年三月六日就任国务卿时，会在他的对古巴政策中反映出奴

---

① 指华盛顿·欧文。——譯者

隶主的态度。卡耳豪恩认为，阿普休尔在挫败英国廢除古巴奴隶制度的企图方面做得还不够。他在一八四三年八月給阿普休尔的信里写道：“危險很大，而且咄咄逼人，其后果将影响联邦的安全和南方真正的生存。”他希望国务卿和法国接洽，并且建議“我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締結条約，保证西班牙对它（古巴）的占有，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干涉”<sup>42</sup>。

当卡耳豪恩就任国务卿时，他对英国的企图越发感到恐慌。他在国务院看到了英国駐美国公使帕肯汉的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传达了阿伯登勋爵的一份文件，大意是說，英国政府无意扰乱联邦蓄奴各州的内部安宁，但是，“英国希望并且一贯努力使全世界普遍廢除奴隶制度”。卡耳豪恩在对帕肯汉的答复中通知英国說，只要：

英国的政策仅限于在它自己的領地和殖民地廢除奴隶制度，其他国家无权表示不滿……。但是，假如英国超出这个范围，并且声言它是以廢除全世界的奴隶制度为它的既定政策和不断努力的目标，它就使所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安全与繁荣可能要受到英国政策的威胁——都有责任采取它們认为保护它們自己所必要的措施<sup>43</sup>。

“埃斯卡萊拉”事件这一轰动一时的新聞，证实了卡耳豪恩和他所代表的奴隶主的严重恐惧。他們現在确信，英国“实现普遍廢除奴隶制度”的企图已經在古巴起作用。在等待“苹果”成熟落到美国手中的时候，支持西班牙占有古巴的做法是不行了。采取措施以兼并古巴的时机即将到来。但是这一时刻也还没有完全来临，因为首先有得克薩斯和俄勒岡需要兼并，墨西哥还有很大一片土地有待于夺取和并入美国。一旦这些問題解决，兼并古巴就成为下一步的工作。

因此，“埃斯卡萊拉”事件是古巴历史和古巴同它的北美邻国关系的轉折点，在古巴和美国出现了要求归并和兼并的高潮，其共同目的是保护和保持对人的奴役。

# 引 文 注

## 第一章 古巴的征服

- 1 維尔賈默·斯特芬森 (Vilhjalmur Stefanson) 和奧利夫·腊恩本·威耳科克斯 (Olive Rathbun Wilcox) 合編:《偉大的冒險和探險》(Great Adventures and Explorations), 紐約 1947 年版, 第 195 頁。
- 2 同上。
- 3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印度群島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 墨西哥 1951 年版, 第 1 卷, 第 45 章。
- 4 奧耳登·梅森 (J. Alden Mason):《烟草在墨西哥和南美洲的用途》(Use of Tobacco in Mexico and South America), 芝加哥 1924 年版, 第 3 頁。
- 5 馬里烏斯·安德烈(Marius André):《哥倫布》(Columbus), 紐約 1928 年版, 第 139 頁。
- 6 科内利斯·奧斯古德 (Cornelius Osgood):《古巴雷唐多島西波內人的文化》(The Ciboney Culture of Cayo Redondo, Cuba), 紐黑文 1942 年版, 第 26 頁。
- 7 費尔南多·波图翁多(Fernando Portuondo):《古巴史教程》(Curso de Historia de Cuba), 哈瓦那 1941 年版, 第 62 頁。
- 8 安东尼奧·巴契雷-莫拉萊斯 (Antonio Bachiller y Morales):《原始的古巴》(Cuba Primitiva), 哈瓦那 1883 年版, 第 52—110 頁; 艾琳·賴特 (Irene A. Wright):《古巴早期史》(The Early History of Cuba), 紐約 1916 年版, 第 8—13 頁。
- 9 引自前引馬里烏斯·安德烈书, 第 142 頁。
- 10 欧文·布莱克 (Irwin R. Blacker) 写的緒言及注解、哈里·罗森 (Harry M. Rosen) 編:《覓取黄金的征服者》(The Golden Conquistadores), 印第安納波利斯 1960 年版, 第 98 頁。
- 11 塞薩尔·罗德里格斯·埃斯波西托 (César Rodríguez Expósito):《阿多欧——古巴的第一个解放者》(Hatuey, El Primer Libertador de Cuba), 哈瓦那 1944 年版, 第 98 頁。
- 12 前引《覓取黄金的征服者》一书的序言。
- 13 何塞·馬蒂 (José Martí):《黄金时代》(The Age of Gold), 哥斯达黎加圣約瑟版, 第 150 頁。
- 14 前引埃斯波西托书, 第 84 頁。



- 15 前引德拉斯卡薩斯書,第1卷,第62—64頁;前引埃斯波西托書,第95—98頁。
- 16 前引埃斯波西托書,第112—120頁。
- 17 前引賴特書,第48頁。
- 18 喬治·愛德華·伊利斯(George Edward Ellis):《德拉斯卡薩斯和西班牙人對印第安人的關係》(Las Casas and the Relation of the Spaniards to the Indians),載賈斯廷·溫索爾(Justin Winsor)編:《美洲史述評》(Narrative and Cr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紐約1884年版,第319頁。
- 19 同上,第305、327頁;前引賴特書,第32—34頁;赫德遜·斯特麥德(Hudson Strode):《古巴的賽會》(The Pageant of Cuba),紐約1936年版,第34—35頁。
- 20 韋利斯·弗萊徹·約翰遜(Willis Fletcher Johnson):《古巴史》(The History of Cuba),紐約1920年版,第1卷,第73—74頁。
- 21 西耳維奧·阿圖羅·扎范拉(Silvio Arturo Zavala):《對西班牙在美洲殖民的新觀點》(New Viewpoints on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America),倫敦1943年版,第25頁。
- 22 西耳維奧·阿圖羅·扎范拉:《印第安人的監護制》(La encomienda indiana),馬德里1935年版,第26—35頁。
- 23 西耳維奧·阿圖羅·扎范拉:《論西班牙美洲某些地區的監護制和土地所有制》(De encomienda y propiedad territorial en algunas regiones de la América española),墨西哥1940年版,第30、85頁。
- 24 同上,第77頁;麥里·納爾遜(Lowry Nelson):《古巴土地制度的演變》(The Evolution of the Cuban Land System),《土地經濟》(Land Economics)第25卷,1949年11月,第365—370頁;前引賴特書,第38—48頁。
- 25 貢薩洛·費爾南德斯·德奧維埃多-巴爾德斯(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印度群島通史和自然史》(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馬德里1851—1855年版,第164—168頁。
- 26 同上,第168—179頁。
- 27 費爾南多·奧爾蒂斯·費爾南德斯(Fernando Ortiz Ferrández):《原始的古巴》,哈瓦那1922年版,第65—67頁。
- 28 前引賴特書,第146—147頁。
- 29 同上。
- 30 瑪麗亞·比爾圖德斯·莫蘭(María Virtudes Morán):《古巴的教會和國家》(Church and State in Cuba),1950年5月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寫未發表的碩士論文,第9頁。
- 31 前引賴特書,第178頁。
- 32 戴維·威克斯(David Weeks):《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土地制度》(The Agrarian System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Colonies),載《土地和公用事業經濟雜誌》(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第22卷,1947年2月,第153—168頁。

- 33 前引賴特书,第 137—140 頁;又前引約翰遜书,第 1 卷,第 126—127 頁。
- 34 前引賴特书,第 140 頁。
- 35 前引奥尔蒂斯书,第 151 頁。
- 36 前引賴特书,第 188 頁。
- 37 《一八二〇年哈瓦那来信,其中有关于古巴島目前情况的叙述以及对奴隶貿易的看法》(Letters from the Havana, During the Year 1820,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Island of Cuba,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Slave Trade),倫敦 1821 年版,第 6 頁。
- 38 拉米罗·格拉-桑切斯(Ramiro Guerra y Sánchez):《古巴經濟、社会和政治史要覽》(Manual de la historia de Cuba, económica, social y Política),哈瓦那 1938 年版,第 44—45,53—54 頁。

## 第二章 古巴的經濟发展 (1520—1790 年)

- 1 唐哈科沃·德拉佩苏埃拉-洛沃(Don Jacobo de la Pezuela y Lobo):《古巴島地理、統計、历史辞典》(Diccionario geográfico, estadístico, histórico de la Isla de Cuba),馬德里 1863—1866 年版,第 2 卷,第 26 頁(以后注文中提到德拉佩苏埃拉的这本书时簡称为《辞典》。——譯者)。
- 2 前引《覓取黄金的征服者》一书,第 98 頁。
- 3 前引德拉佩苏埃拉《辞典》,第 2 卷,第 63—64 頁。
- 4 同上。
- 5 弗里德兰德(H. E. Friedlander):《古巴經濟史》(Historia económica de Cuba),哈瓦那 1944 年版,第 67—75 頁。
- 6 同上,第 84—89 頁。
- 7 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费尔南德斯:《古巴的两种产品:烟草和糖》(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紐約 1947 年版,第 280—281 頁。該书由阿里埃特·德奥尼斯(Harriet de Onís)譯自西班牙文。以后注文提到奥尔蒂斯的著作时就是指的这本书。
- 8 同上,第 218—219 頁。
- 9 前引德拉佩苏埃拉《辞典》,第 2 卷,第 242 頁。
- 10 威廉·阿特金森(William C. Atkinson):《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历史》(A History of Spain and Portugal),倫敦 1960 年版,第 166—169 頁。
- 11 克拉倫斯·哈維(Clarence Harvey):《西班牙和印度群島之間的貿易和航运》(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the Indies),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 1918 年版,第 34—62 頁。
- 12 前引賴特书,第 211—212 頁。
- 13 前引奥尔蒂斯书,第 216—217 頁。
- 14 前引約翰遜书,第 2 卷,第 21 頁。

- 15 前引賴特书,第 258 頁。
- 16 唐哈科沃·德拉佩苏埃拉-洛沃:《古巴島史》(Historia de la Isla de Cuba),馬德里 1868—1878 年版,第 1 卷,第 543 頁。
- 17 前引德拉佩苏埃拉《辞典》緒言。
- 18 前引弗里德兰德书,第 82—83 頁。
- 19 前引奥尔蒂斯书,第 217 頁。
- 20 同上。
- 21 前引弗里德兰德书,第 63—74 頁。
- 22 埃利亚斯·恩特拉尔戈(Eliás Entralgo):《烟草的壟断:烟草种植者的暴动》(Monopolio del Tabaco: Sublevación de los vegueros),載《古巴历史入門教程》(Curso de introducción a la historia de Cuba),哈瓦那 1938 年版,第 115—122 頁。
- 23 前引弗里德兰德书,第 180—185 頁。
- 24 納尔逊·万斯·魯塞尔(Nelson Vance Russell):《英国和美国对一七六二年攻夺哈瓦那的反应》(The Reaction in England and America to the Capture of Havana, 1762),載《西班牙美洲历史評論》(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 9 卷,1929 年 8 月,第 312 頁。
- 25 前引弗里德兰德书,第 79 頁。
- 26 同上,第 95—99 頁;埃米尼奥·波尔特耳·比拉(Herminio Portell Vilá):《古巴同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史》(Historia de Cuba en sus relaciones Con Los Estados Unidos y España),哈瓦那 1938—1941 年版,第 1 卷,第 79 頁。
- 27 前引德拉佩苏埃拉《辞典》,第 2 卷,第 56 頁。
- 28 前引奥尔蒂斯书,第 55—60,67—70,77 頁。
- 29 休伯特·埃姆斯(Hubert H. S. Aimes):《1511—1868 年古巴奴隶制度史》(History of Slavery in Cuba, 1511 to 1868),紐約 1907 年版,第 35 頁。
- 30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 1 卷,第 77 頁。
- 31 罗伊·尼科耳斯(Roy F. Nichols):《1779—1809 年貿易关系和西班牙美洲美国領事館的建立》(Trade Rela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ted States Consulates in Spanish America, 1779—1809),載《西班牙美洲历史評論》第 13 卷,1933 年 8 月,第 290 頁。
- 32 美国国会:《1774—1789 年美洲大陆會議汇报》(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904—1937 年版,第 20 卷,第 693 頁。
- 33 路易斯·馬里諾·佩雷斯(Luis Marino Pérez):《古巴档案中美洲史材料指南》(Guide to the Materials for American History in Cuban Archives),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907 年版,第 29—32 頁。
- 34 前引尼科耳斯书,第 291 頁。
- 35 阿图罗·莫拉萊斯·卡里翁(Arturo Morales Carrión):《波多黎各和非西屬加

勒比地区：对西班牙排外主义的衰退的研究》(Puerto Rico and the non-Hispanic Caribbean: A Study in the Decline of Spanish Exclusivism), 波多黎各皮耶德腊斯 1952 年版, 第 67—70 頁。

36 前引弗里德兰德书, 第 112—114 頁。

### 第三章 古巴的社会结构(1520—1790 年)

- 1 前引埃姆斯书, 第 37 頁注。
- 2 《1817 年 12 月 19 日费尔南多七世(疑为斐迪南七世之誤。——譯者)的道歉书》, 引自 1817 年 9 月 24 日与英国签订的条约的序言, 載何塞·瑪利亚·薩莫拉-科罗纳多(José María Zamora y Coronado): 《海外立法丛书》(Biblioteca de legislación ultramarina), 馬德里 1845 年版, 第 3 卷, 第 126—127 頁。
- 3 阿瑟·史密斯(Arthur F. Smith): 《1817—1873 年西班牙和古巴奴隶制度問題》(Spain and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Cuba, 1817—1873), 1958 年在芝加哥大学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論文, 第 7—8 頁。
- 4 前引約翰遜书, 第 2 卷, 第 55 頁。
- 5 前引賴特书, 第 195—196 頁。
- 6 同上, 第 151 頁。
- 7 同上, 第 197—198 頁。
- 8 前引奥尔蒂斯书, 第 84 頁。
- 9 《黑人史杂志》(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 14 卷, 1929 年 1 月, 第 63、71、84、99 頁。
- 10 前引薩莫拉书, 第 3 卷, 第 130—136 頁。
- 11 参看前引史密斯书, 第 43 頁。
- 12 前引約翰遜书, 第 2 卷, 第 212 頁。
- 13 参看弗朗西斯科·德阿兰戈-帕雷尼奥(Francisco Arango y Parreño)文集, 哈瓦那 1888 年版, 第 1 卷, 第 127 頁。
- 14 同上, 第 132—133 頁。
- 15 前引史密斯书, 第 48 頁。
- 16 前引《哈瓦那来信》一书, 第 37 頁。
- 17 前引奥尔蒂斯书, 第 57—58 頁。
- 18 同上, 第 287 頁。
- 19 何塞·安东尼奥·波图翁多(José Antonio Portuondo): 《古巴文学史大綱》(Bosquejo Histórico de las letras Cubanas), 哈瓦那 1960 年版, 第 11 頁。
- 20 劳尔·塞佩罗·博尼利亚(Raúl Cepero Bonilla): 《糖与廢除奴隶制度: 廢除奴隶制度思想批判史簡記》(Azúcar y Abolición: Apuntes para una historia crítica del Abolicionismo), 哈瓦那 1948 年版, 第 18—20 頁。
- 21 前引史密斯书, 第 50—52 頁。

- 22 賴孟多·卡夫雷拉-博什 (Raimundo Cabrera y Bosch):《古巴和古巴人》(Cuba and the Cubans),費拉德尔非亚 1896 年版,第 64—67 頁。
- 23 薩尔瓦多·德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Empire),紐約 1947 年版,第 160—165 頁。
- 24 前引卡夫雷拉书,第 69—71 頁。
- 25 同上。
- 26 前引波图翁多书,第 12 頁。
- 27 同上。
- 28 同上,第 12—13 頁。
- 29 前引約翰遜书,第 2 卷,第 254 頁。
- 30 同上,第 3 卷,第 243—244 頁。
- 31 埃米尼奧·波尔特耳·比拉:《胡安·德米腊雷斯——乔治·华盛顿的一位哈瓦那朋友》(Juan de Miralles, un habanero amigo de Jorge Washington),哈瓦那 1947 年版,第 12—19 頁。
- 32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古巴同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史》一书第 2 卷,第 36—75 頁。以后注文提到波尔特耳·比拉的著作就是指的这本书。
- 33 阿瑟·惠特克(Arthur P. Whitaker)編:《拉丁美洲与启蒙》(Latin America and the Enlightenment),紐約 1942 年版;伯納德·摩西斯(Bernard Moses):《1810—1824 年南美洲革命的思想背景》(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of the Revolutions in South America, 1810—1824),紐約 1926 年版。
- 34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 2 卷,第 64—76 頁。
- 35 菲利普·方納編:《托馬斯·潘恩全集》(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紐約 1945 年版,第 1 卷,第 448—449 頁。

#### 第四章 大觉醒时期(1790—1808 年)

- 1 参看《哈瓦那皇家促进委员会和皇家经济学会年表和記事》(Anales y memorias de la Real Junta de Fomento y de la Real Sociedad Económica de la Habana),哈瓦那 1856 年版,第 2 卷,第 203—287 頁。
- 2 前引德拉佩苏埃拉:《古巴島史》一书第 2 卷,第 256 頁;拉斐尔·蒙托罗(Rafael Montoro):《经济学会史》(Historia de la Sociedad Económica),哈瓦那 1936 年版,第 23—30 頁;前引弗里德兰德书,第 130—131 頁。
- 3 前引卡夫雷拉书,第 47—59 頁。
- 4 《1837 年 12 月 17 日、18 日和 19 日举行的国家之友皇家经济学会全体會議记录》(Actas de las Juntas Generales de la Real Sociedad Económica de Amigos del País, celebrada en los días 17, 18 y 19 de diciembre de 1837),第 19—35 頁。

- 5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285頁。
- 6 梅达尔多·比铁尔(Medardo Vitier):《古巴政治、哲学与評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观念》(Las ideas en Cuba proceso d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filosófico y crítico en Cuba),哈瓦那1938年版,第1卷,第47頁;赫拉多·加西亚·加斯特利亚諾斯(Gerardo García Castellanos):《历史概覽:1492—1933年古巴大事記》(Panorama histórico, ensayos de cronología cubana, desde 1492 hasta 1933),哈瓦那1934年版,第220頁。
- 7 勒德威尔·李·蒙塔古(Ludwell Lee Montague):《1714—1938年的海地和美国》(Haiti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14—1938),北卡罗来納州达勒姆1940年版,第5頁。
- 8 亚历山大·洪波耳特(Alexander Humboldt):《古巴島》(The Island of Cuba),特拉秀(J. S. Thrasher)譯,紐約1856年版,第271頁。
- 9 前引弗里德兰德书,第121—122頁。
- 10 前引埃姆斯书,第59頁。
- 11 罗伯特·考德威尔(Robert G. Caldwell):《1848—1851年洛佩斯对古巴的远征》(The López Expeditions to Cuba, 1848—1851),新澤西州普林斯顿1915年版,第21頁。
- 12 塞尔希奥·阿吉雷(Sergio Aguirre):《古巴历史讀本》(Lecciones de Historia de Cuba. Primero Cuaderno)第一册,哈瓦那1960年版,第85—86頁。
- 13 《黑人史杂志》第14卷,1929年1月,第96頁。
- 14 何塞·安东尼奥·薩科(José Antonio Saco):《古巴奴隶制度和西班牙革命》(L'Esclavage à Cuba et la Revolution d'Espagne),引自莱昂-皮埃尔·阿德里安·蒙特洛(Leon-pierre Adrien Montlue)所写的緒言第6頁;前引阿吉雷书,第85頁;前引埃姆斯书,第60頁。
- 15 前引格拉书,第188頁。
- 16 何塞·安东尼奥·薩科:《非洲种族在新大陆,特别是在西班牙美洲各国的被奴役史》(Historia de la esclavitud de la raza Africana en el Nuevo Mundo y en especial en los países americano-hispanos),哈瓦那1938年版,第3卷,第17頁。以后注文中提到薩科的这本书简称为《……历史》。
- 17 同上,第18—20頁;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36—37頁。
- 18 多明戈·阿穆納特吉·索拉尔(Domingo Amunátegui Solar):《西班牙美洲的解放》(La emancipación de Hispano América),智利圣地亚哥1936年版,第1—9頁。
- 19 前引佩雷斯书,第56頁;前引尼科耳斯书,第293—294頁。
- 20 佩德罗·吉特拉斯(Pedro J. Guiteras):《古巴島史》(Historia de la isla de Cuba),紐約1865—1866年版,第1卷,第64頁。
- 21 前引尼科耳斯书,第294—295頁。
- 22 同上,第296頁。

- 23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125頁。
- 24 前引尼科耳斯书,第297頁。
- 25 1799年4月30日邱奇(J. B. Church)致賈科·摩頓上校(Col. Jacob Morton)函及1801年4月21日乔治·摩頓(George C. Morton)致国务卿麦迪逊(Madison)函(哈瓦那),載《領事书信集》(Consular Letters),哈瓦那第1卷;1799年5月13日約西亚·布累克利(Josiah Blakely)致皮克林(Pickering)函及1801年5月14日布累克利致麦迪逊函,載《領事书信集》,圣地亚哥第1卷,存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家档案局。
- 26 前引尼科耳斯书,第301頁。
- 27 1799年11月16日汉弗莱斯(Humphreys)致皮克林函(馬德里),載《外交文件集(西班牙)》(Diplomatic Despatches, Spain),存国家档案局;前引尼科耳斯书,第301頁。
- 28 1802年1月9日、20日、3月17日、5月24日摩頓致麦迪逊函,載《領事书信集》,哈瓦那第1卷,存国家档案局。
- 29 前引尼科耳斯书,第305頁。
- 30 1803年12月5日格雷(Gray)致麦迪逊函,載《領事书信集》,哈瓦那第1卷,存国家档案局。
- 31 1805年11月1日希耳(Hill)致美国国务院函,載《領事书信集》,哈瓦那第1卷,存国家档案局;前引尼科耳斯书,第311頁。
- 32 前引洪波耳特书,第271頁;本杰明·艾倫(Benjamin Allen):《阿特金公司的发展和古巴制糖工业史》(A Story of the Growth of E. Atkins & Co., and the Sugar Industry in Cuba),1925年版(未注明出版地点),第8頁。
- 33 1801年4月21日乔治·摩頓致美国国务卿麦迪逊函,載《領事书信集》,哈瓦那第1卷,存国家档案局。
- 34 前引洪波耳特书,第218—219頁。
- 35 前引尼科耳斯书,第293—294頁。
- 36 洛思罗普·斯托达德(T. Lothrop Stoddard):《法国革命在圣多明各》(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an Domingo),波士頓1914年版,第122—164頁。
- 37 参看何塞·安东尼奥·薩科在《反对归并》(Contra la anexión)一书的序言,哈瓦那1928年版,第1卷,第XV頁;何塞·安东尼奥·薩科:《古巴的奴隶制度和西班牙的革命》(La Esclavitud en Cuba y la revolución en España),馬德里1868年版,第2—15頁。
- 38 对整个十九世紀古巴政治思想中这三种思潮的詳細分析,見路易斯·埃斯特維斯-罗梅罗(Luis Estévez y Romero):《分离主义、归并主义和自治主义》(Separatismo, Anexionismo, y Autonomismo),紐約1898年版。
- 39 前引阿吉雷书,第34—37頁。

## 第五章 “永远忠诚的島”(1808 - 1820 年)

- 1 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西班牙美洲外交的开始》(The Beginnings of Spanish-American Diplomacy),紐約1910年版,第236頁。
- 2 豪尔赫·吉拉伯特·梅格雷特(Jorge Gelabert Megret):《独立战争时期的古巴(1810—1824年)》(Cuba during the Wars of Independence, 1810—1824),1957年在紐約大学所写未发表的碩士論文(西班牙文),第26—28頁。
- 3 前引卡夫雷拉书,第395頁。
- 4 前引吉拉伯特·梅格雷特书,第34—35頁。
- 5 同上,第32—33頁。
- 6 弗朗西斯科·龐特·多明格斯(Francisco J. Ponte Domínguez):《古巴独立时期的互济会》(La Masonería en la independencia de Cuba),哈瓦那1944年版,第5—13頁。
- 7 前引《哈瓦那来信》,第48—49頁附注。
- 8 前引吉拉伯特·梅格雷特书,第32—33頁。
- 9 約翰·麦凱(John A. Mackay):《另一个西班牙基督》(The Other Spanish Christ),紐約1933年版,第60頁。
- 10 同上,第61頁。
- 11 岡薩雷斯·德尔巴列(Gonzalez del Valle):《古巴革命时期的教士》(El Clero en la Revolución Cubana),載《現代古巴》(Cuba Contemporanea)第18卷,1918年10月,第191頁。
- 12 何塞·佛朗哥(José L. Franco):《安东尼奥·馬塞奧生平簡史》(Antonio Maceo: Apuntes para una Historia de su Vida),哈瓦那1951年版,第1卷,第28頁。
- 13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148頁;前引吉拉伯特·梅格雷特书,第38—39頁;前引阿吉雷书,第38—39頁。
- 14 何塞·阿尔瓦雷斯·德托萊多(José Alvarez de Toledo):《卡迪斯議會的一位議員向全体善良的欧洲西班牙人民和美州人民发表的声明和誠实的道歉书》(Manifiesto o satisfacción pundonorosa a todos los buenos españoles europeos y a todos los pueblos de la América por un diputado de las cartas reunidas en Cádiz),費拉德尔非亚1811年版,第35—37頁。
- 15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48頁。
- 16 拉斐尔·瑪丽亚·德拉夫拉(Rafael María de Labra)著:《美洲与一八一二年西班牙宪法》(América y la Constitución Español de 1812),馬德里1914年版,第127—129頁;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3卷,第83—85頁。
- 17 前引埃姆斯书,第64頁。
- 18 拉米罗·格拉-桑切斯(Ramiro Guerra y Sánchez):《古巴——加勒比海国际竞争的中心》(Cuba, Centro de Rivalidad Internacional en el Caribe),哈瓦那



- 1952年版,第3卷,第30頁。
- 19 1811年6月5日謝勒(Shaler)致史密斯(Smith)函,載《領事書信集》,哈瓦那第2卷,存國家檔案局。
- 20 前引薩科:《……歷史》一書第3卷,第90頁(重點是作者加的。——方納注)。
- 21 前引埃姆斯書,第67-68頁。
- 22 前引薩科:《……歷史》一書第3卷,第90—112頁。
- 23 同上,第115—118頁;前引埃姆斯書,第70—71頁。
- 24 前引卡夫雷拉書,第398—400頁;又前引阿特金森書,第264—265頁。
- 25 前引卡夫雷拉書,第399頁。
- 26 威廉·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綱》,馮明方譯,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178—180頁。
- 27 前引薩科:《……歷史》一書第3卷,第83—85頁。
- 28 拉米羅·格拉-桑切斯:《1868年戰爭的經過及其意義》(Antecedentes y Significación de la Guerra de 1868),哈瓦那1942年版,第6頁。
- 29 何塞·德阿烏馬達(José de Ahumada):《古巴島政治史記事》(Memoria Histórica Política de la Isla de Cuba),哈瓦那1918年版,第255頁。
- 30 前引波爾特耳·比拉書,第1卷,第163頁;前引阿吉雷書,第75-76頁。
- 31 1810年10月24日謝勒致史密斯函,載《領事文件集》(Consular Despatches),哈瓦那第2卷,存國家檔案局。
- 32 前引波爾特耳·比拉書,第1卷,第163—164頁。
- 33 前引薩科:《……歷史》一書第3卷,第83-85頁。
- 34 前引吉拉伯特·梅格雷特書,第46頁;前引卡夫雷拉書,第397頁。
- 35 埃利亞斯·恩特拉爾戈:《奴隸制度問題和阿龐特的叛變活動》(Los Problemas de la Esclavitud. Conspiración de Aponte),哈瓦那1934年版,第46—47頁;克萊門特·累奈爾(Clemente Lainer):《古巴與1812年阿龐特的暴動》(Cuba et la Conspiration d'Aponte en 1812)。載《海地歷史、地理和地質學會評論》(Revue de la Société Haitienne d'Histoire, de Géographie et de Géologie),第23卷,第26—27頁。
- 36 羅格·加里戈(Rogue E. Garrigó):《“波利瓦爾陽光與閃電”暴動的历史資料》(Historia Documentada de la Conspiración de los Soles y Rayos de Bolívar),哈瓦那1939年版,第1卷,第108—109頁。
- 37 前引恩特拉爾戈書,第48—64頁。
- 38 同上,第78—96頁。
- 39 同上,第102—105,227頁。
- 40 見前引吉拉伯特·梅格雷特書,第59—60頁引用。
- 41 同上,第47頁。
- 42 前引塞佩羅書,第32—33頁。
- 43 同上。

- 44 何塞·佛朗哥:《西班牙的美洲大陆政策在古巴的实施(1812--1830年)》(*Política continental americana de España en Cuba, 1812—1830*), 哈瓦那1947年版, 第34—36頁。
- 45 同上, 第329頁。
- 46 前引阿吉雷书, 第41頁。
- 47 前引埃姆斯书, 第91頁。
- 48 前引格拉·桑切斯:《古巴經濟、社会和政治史要覽》一书, 第239頁; 前引德拉佩苏埃拉《古巴島史》一书第4卷, 第50頁。
- 49 前引阿吉雷书, 第42—43頁。
- 50 韦伯斯特(C. K. Webster):《1812—1815年卡斯尔雷的对外政策, 英国与欧洲的重建》(*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1812—1815,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倫敦1931年版, 第413—423頁; 前引薩科:《……历史》, 第3卷, 第122—124頁。
- 51 前引薩科:《……历史》, 第3卷, 第125頁。
- 52 前引德拉佩苏埃拉《辞典》, 第2卷, 第285頁; 前引薩科:《……历史》, 第3卷, 第307—319頁。
- 53 前引史密斯书, 第92—95頁; 前引埃姆斯书, 第77—78頁。
- 54 前引《哈瓦那来信》, 第132—133頁。
- 55 前引洪波耳特书, 第280頁。
- 56 前引吉拉伯特·柯格雷特书, 第59—60頁。
- 57 前引《哈瓦那来信》, 第52頁。

## 第六章 独立运动(1820—1830年)

- 1 《奈耳斯紀事周报》(*Niles Weekly Register*), 第18卷, 1820年5月6日, 第176頁; 1820年5月27日, 第263頁。
- 2 前引《哈瓦那来信》, 第50—51頁; 前引卡夫雷拉书, 第403—404頁。
- 3 前引《哈瓦那来信》, 第51頁。
- 4 《奈耳斯紀事周报》, 第18卷, 1820年8月5日, 第415頁。
- 5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3卷, 第144頁。
- 6 胡安·貝尔納多·德奧加瓦恩(Juan Bernardo de O'Gavan):《論非洲奴隶的境况》(*Observaciones sobre la condición de los Esclavos Africanos*), 馬德里1821年版。
- 7 前引埃姆斯书, 第97頁;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3卷, 第43—44頁。
- 8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3卷, 第1—31頁。
- 9 同上。
- 10 前引史密斯书, 第50頁。
- 11 菲利波(J. M. Phillippo):《美国与古巴》(*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倫敦

- 1857年版,第413頁。
- 12 弗倫奇·查德韋克(French E. Chadwick):《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外交》(The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Diplomacy),紐約1909年版,第224—225頁。
  - 13 理查德·金包耳(Richard B. Kimball):《古巴与古巴人:包括古巴目前社会、政治和国内情况;古巴与英国和美国的关系》(Cuba and the Cubans; Comprising a History of Its Present Social, Political, and Domestic Conditions; also Its Relation to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紐約1850年版,第56頁。
  - 14 詹姆斯·摩頓·卡拉汉(James Morton Callahan):《古巴与国际关系》(Cub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巴尔的摩1899年版,第15頁。
  - 15 《真相》(La Verdad)杂志,1849年6月15日。
  - 16 前引塞佩罗书,第33—34頁。
  - 17 曼努埃尔·比利亚諾瓦书,第34頁引用。
  - 18 拉米罗·格拉·桑切斯、何塞·佩雷斯·卡夫雷拉(José M. Pérez Cabrera)、胡安·雷莫斯(Juan J. Remos)、埃梅特里奥·桑托維尼亞(Emeterio S. Santovenia)合編:《古巴民族史》(Historia de la Nación Cubana),哈瓦那1952年版,第3卷,第80頁。
  - 19 前引德拉佩苏埃拉《辞典》,第2卷,第285—287頁。
  - 20 前引史密斯书,第41—42頁。
  - 21 前引吉拉伯特·梅格雷特书,第62—64頁。
  - 22 前引約翰遜书,第3卷,第319頁;前引何塞·安东尼奥·波图翁多书,第17—18頁。
  - 23 何塞·佛朗哥編:《古巴国家档案局有关委內瑞拉的历史文件》(Documentos para la Historia de Venezuela Existentes en el Archivo Nacional de Cuba),哈瓦那1960年版,第xcv頁(以后注文中提到佛朗哥的这本书簡称为《……历史文件》。——譯者)。
  - 24 前引阿吉雷书,第77—79頁。
  - 25 前引吉拉伯特·梅格雷特书,第70—71頁。
  - 26 前引何塞·佛朗哥編:《……历史文件》一书第xcv—xcvi頁。
  - 27 前引塞佩罗书,第32—37頁。
  - 28 《奈耳斯紀事周报》,第17卷,1820年6月17日,第286頁。
  - 29 普尔加罗恩(O. Pulgarón):《古巴共济会历史簡記》(Apuntes Históricos Sobre la Masonería Cubana),古巴瓜納巴科阿1933年版,第12—15頁。
  - 30 1822年11月20日福賽恩(Forsyth)致亚当斯(Adams)函,載《外交文件集》,西班牙第21卷,存国家档案局。
  - 31 1821年10月31日格雷致丹尼尔·布倫特(Daniel Brent)函,載《領事文件集》,哈瓦那第3卷,存国家档案局。
  - 32 前引加里戈书,第1卷,第153頁。

- 33 前引加里戈书,第2卷,第165頁。
- 34 同上,第171頁。
- 35 同上,第165—169頁。
- 36 同上,第173頁。
- 37 同上,第174頁。
- 38 同上,第176—178頁。
- 39 同上,第246頁。
- 40 同上,第68号文件(重点为原文所有。——方納注)。
- 41 同上,第1卷,第108—109頁;前引塞佩罗书,第33頁。
- 42 前引何塞·佛朗哥編:《……历史文件》一书第xcv—xcvi頁。
- 43 前引加里戈书,第2卷,第68、69号文件。
- 44 前引何塞·佛朗哥編:《……历史文件》一书第xlvi頁。
- 45 前引加里戈书,第2卷,第190—210頁。
- 46 前引何塞·佛朗哥編:《……历史文件》一书第xcvi頁。
- 47 前引阿吉雷书,第77—79頁。
- 48 《奈耳斯記事周报》,第30卷,1826年5月13日,第186頁。
- 49 前引約翰遜书,第3卷,第1章。
- 50 前引何塞·佛朗哥編:《……历史文件》一书第xcvi頁,第224頁。
- 51 第30卷,第159頁。
- 52 前引何塞·佛朗哥編:《……历史文件》一书第c頁;前引阿吉雷书,第78—79頁。
- 53 胡斯托·薩拉戈薩(Justo Zaragoza):《古巴的暴动》(Las Insurrecciones en Cuba),馬德里1872年版,第1卷,第534頁。
- 54 前引塞佩罗书,第33頁;前引阿吉雷书,第80頁。

## 第七章 美国对古巴政策的产生(1800—1823年)

- 1 梅里耳·彼德逊(Merrill D. Peterson):《美国人心目中的杰斐逊》(The Jefferson Image in the American Mind),紐約1960年版,緒言。
- 2 參看第35届国会第2期會議、參議院报告第351号,第1頁。
- 3 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門尼斯(Antonio Nuñez Jiménez):《島屿的解放》(La Liberación de las Islas),哈瓦那1959年版,第458頁轉載。
- 4 第35届国会第2期會議參議院报告第351号,第1頁。
- 5 1807年1月14日麦迪逊致安德逊函,載《給領事的指示》(Instructions to Consuls),第1卷,第208号,存国家档案局。
- 6 1805年11月3日安东尼·梅里(Anthony Merry)致馬耳格雷夫(Mulgrave)函;里皮(J. F. Rippey):《1808—1830年美英在拉丁美洲的競争》(Rival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over Latin America, 1808—1830),第72頁引用,巴尔的摩1929年版。

- 7 1807年8月16日杰斐逊致麦迪逊函,载《托马斯·杰斐逊文稿》(Thomas Jefferson Papers),存国会图书馆手稿室。
- 8 安德鲁·李普斯康(Andrew A. Lipscomb)和艾伯特·埃勒里·伯格(Albert Ellery Bergh)合编:《托马斯·杰斐逊文集》(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华盛顿1904年版,第9卷,第327页。
- 9 艾萨克·柯克斯(Isaac J. Cox):《1790—1813年西佛里达的争执》(The West Florida Controversy, 1790—1813),巴尔的摩1918年版,第290—292页;艾萨克·柯克斯:《杰斐逊和威金逊的泛美政策》(The Pan American Policy of Jefferson and Wilkinson),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1卷,1914年,第222—223页。
- 10 前引莫拉莱斯·卡里翁书,第68页。
- 11 前引李普斯康和伯格合编一书,第12卷,第274页。
- 12 1809年4月24日麦迪逊致杰斐逊函,载《詹姆斯·麦迪逊文稿》(James Madison Papers),存国会图书馆手稿室。
- 13 前引李普斯康和伯格合编一书,第12卷,第277页。
- 14 1810年9月17日詹姆斯·加勒廷(James Gallatin)致麦迪逊函,载《詹姆斯·麦迪逊文稿》,存国会图书馆手稿室。
- 15 盖拉德·亨德(Gaillard Hunt)编:《詹姆斯·麦迪逊文集》(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纽约1900年版,第8卷,第121—122页。
- 16 前引努涅斯·希门尼斯书,第458页转载。
- 17 罗伊·尼科耳斯(Roy F. Nichols):《威廉·谢勒——新英格兰的自由的宣传者》(William Shaler, New England Apostle of Liberty),载《新英格兰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第4卷,1933年,第76—77页。
- 18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167页。
- 19 1810年10月24日谢勒致史密斯函,载《领事文件集》,哈瓦那第2卷,存国家档案局。
- 20 1810年6月11日和14日谢勒致史密斯函,载《领事文件集》;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167页。
- 21 1811年12月6日谢勒致门罗(Monroe)函(哈瓦那),附1811年12月1日的“照会”,载《领事文件集》,哈瓦那第2卷,存国家档案局;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162—163页。
- 22 1811年12月6日谢勒致门罗函(哈瓦那),载《领事文件集》,哈瓦那第2卷,存国家档案局。
- 23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161—167页。
- 24 1811年12月8日和27日谢勒致门罗函,载《领事文件集》,哈瓦那第2卷,存国家档案局;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170页。
- 25 约翰·克伦·潘恩(John Crane Pine):《1810—1822年美国特务人员在制定西班牙—美国政策中的作用》(The Role of United States Special Agents in

- the Development of a Spanish-American Policy, 1810—1822), 1955 年在科罗拉多大学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論文, 第 109—110 頁。
- 26 約瑟夫·洛基 (Joseph B. Lockey): 《一个早期的泛美計劃》(An Early Pan American Scheme), 載《太平洋历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第 2 卷, 1933 年, 第 440—447 頁。
- 27 卡洛斯·特里列斯-戈文 (Carlos M. Trelles y Govín): 《何塞·阿尔瓦雷斯·德托萊多——古巴独立的先驅》(Un Precursor de la independencia de Cuba, José Álvarez de Toledo), 哈瓦那 1926 年版, 第 8—13, 153—160 頁; 艾薩克·乔斯林·柯克斯 (Isaac Joslin Cox): 《門罗和早期的墨西哥革命分子》(Monroe and the Early Mexican Revolutionary Agents), 載《1911 年美国历史协会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11), 华盛顿 1913 年版, 第 1 卷, 第 203 頁; 1811 年 11 月 25 日, 12 月 23 日达拉斯 (Dallas) 致門罗函, 載国务院《杂类书信集》(Miscellaneous Letters); 1812 年 1 月 4 日、7 日德托萊多致格雷姆函, 同上; 1812 年 1 月 7 日德托萊多致門罗函, 同上; 1811 年 11 月 23 日門罗致达拉斯函, 載国务院《国内书信集》(Domestic Letters), 第 16 卷, 第 38 号; 1811 年 11 月 16 日德托萊多致門罗函(墨西哥), 載《1811—1816 年阻撓反西班牙政府的远征軍》(Filibustering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Spain, 1811—1816), 国务院, 均存国家档案局。
- 28 何塞·佛朗哥: 《1812—1830 年西班牙的美洲大陆政策在古巴的实施》, 哈瓦那 1947 年版, 第 16 頁。
- 29 威廉·肯尼思·邦斯 (William Kenneth Bunce): 《1783—1850 年美国在加勒比海島屿的利益》(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Caribbean Islands, 1783—1850), 1939 年在俄亥俄大学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論文, 第 88 頁。
- 30 《美国国家文件》(American State Papers), 对外关系部分, 第 408—430 頁。
- 31 《哥伦比亚哨兵报》(Colombian Centinel), 1810 年 7 月 11 日。
- 32 第 2 卷, 1812 年 3 月 28 日, 第 71 頁。
- 33 《里奇蒙訊問报》(Richmond Enquirer), 1817 年 6 月 3 日。
- 34 《华盛顿国民通訊报》(Washington National Intelligencer), 1816 年 7 月 24 日。
- 35 《里奇蒙訊問报》, 1810 年 6 月 22 日; 《路易斯安那(米苏里)公报》(Louisiana (Mo.) Gazette), 1817 年 8 月 2 日, 12 月 2 日; 布倫登·麦克納利 (Rev. Brendan C. Mc Nally) 收师: 《1810—1825 年美国报刊对西班牙美洲独立运动的报道和态度》(Coverage and Attitude of U. S. Press Relative to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the Spanish Americas, 1810—1825), 1949 年在圣路易大学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論文, 第 250 頁。
- 36 《华盛顿国民通訊报》, 1814 年 4 月 19 日。
- 37 《自由人杂志》(費拉德尔非亚) (Freeman's Journal), 《紐約先驅报》(New York Herald), 1814 年 4 月 28 日轉載。
- 38 《华盛顿国民通訊报》, 1817 年 5 月 24 日轉載。

- 39 《华盛顿国民通讯报》，1816年7月24日。
- 40 《费拉德尔非亚曙光报》(Philadelphia Aurora), 1817年11月10, 22日。
- 41 《叛国、叛变与革命》(Treason, Rebellion, Revolution), 载第2卷, 1812年3月21日, 第58—59页。
- 42 《费拉德尔非亚曙光报》，1817年8月7日转载。
- 43 参看肯尼思·波特尔(Kenneth Porter):《1817—1828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西班牙美洲政策》(The Hispanic Policy of John Quincy Adams, 1817—1828), 193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又查尔斯·卡罗尔·格里芬(Charles Carroll Griffin):《1810—1822年美国与西班牙帝国的瓦解》(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Spanish Empire, 1810—1822), 纽约1937年版; 阿瑟·惠塔克:《1800—1830年美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1800—1830), 巴尔的摩1941年版。
- 44 前引格里芬书第257页引用。
- 45 费拉德尔非亚1818年版, 第10页起。这个小册子目前只有三本, 分别保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古书学会图书馆。
- 46 1817年12月11日, 1818年3月15日尼古拉斯·比德耳(Nicholas Biddle)致詹姆斯·门罗函, 载《詹姆斯·门罗文稿》, 存国会图书馆手稿室。
- 47 第14届国会第2期会议《国会年鉴》(Annals of Congress), 第30卷, 第738页。
- 48 《马里兰督导》(The Maryland Censor), 第1卷, 第1号, 1818年8月19日(该报现保存在国会图书馆报纸室)。
- 49 前引惠塔克书, 第212页。
- 50 《费拉德尔非亚曙光报》，1819年7月30日。
- 51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编:《约翰·昆西·亚当斯回忆录, 包括1795—1848年他的部分日记》(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 Comprising Portions of His Diary from 1795 to 1848), 费拉德尔非亚1874—1877年版, 第4卷, 第118页。
- 52 同上, 第4卷, 第8—10, 20页; 前引格里芬书, 第187—188页。
- 53 《贝尔伦敦使者报》(Bell's London Messenger), 《华盛顿国民通讯报》, 1819年8月28日转载; 特塔姆(E. H. Tatum, Jr.):《1815—1823年美国与欧洲》(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1815—1823),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1936年版, 第16—18页; 前引里皮书, 第76—80页。
- 54 《奈耳斯纪事周报》, 第13卷, 1819年5月22日, 第60页;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 第1卷, 第191页。
- 55 《奈耳斯纪事周报》, 第13卷, 1819年5月22日, 第62页。
- 56 前引格里芬书, 第215页; 1819年8月25日威廉·麦科克耳(William McCorkle)致詹姆斯·门罗函, 载《詹姆斯·门罗文稿》, 存纽约图书馆手稿室。
- 57 第17卷, 1820年2月12日, 第13页。

- 58 《奈耳斯紀事周报》，第 18 卷，1820 年 3 月 4 日，第 1、2 頁。
- 59 約翰·巴塞特·穆尔 (John Bassett Moore): 《国际法汇编》(A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华盛顿 1906 年版, 第 1 卷, 第 583 頁。
- 60 1822 年 11 月 20 日福賽思致亚当斯函 (馬德里), 載国务院《外交文件集 (西班牙)》, 第 21 卷, 存国家档案局。
- 61 《华盛顿国民道訊报》, 《奈耳斯紀事周报》, 第 16 卷, 1819 年 2 月 27 日第 3—4 頁引用。
- 62 赫伯特·阿普特克 (Herbert Aptheker): 《美国黑奴的起义》(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紐約 1943 年版, 第 264—278 頁。
- 63 前引 1822 年 11 月 20 日約翰·福賽思致亚当斯函 (馬德里)。
- 64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 第 1 卷, 第 178—182 頁。
- 65 1822 年 2 月 20 日約翰·华尔納 (John Warner) 致罗德尼 (C. A. Rodney) 函, 載《詹姆斯·門罗文稿》, 存国会图书馆手稿室。
- 66 1822 年 8 月 3 日詹姆斯·比德耳 (James Biddle) 致門罗函, 同上。
- 67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 第 1 卷, 第 215—216 頁; 前引里皮书, 第 80—82 頁。
- 68 前引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书, 第 6 卷, 第 70—74, 111—112 頁; 1823 年 5 月 7 日波因塞特 (J. R. Poinsett) 致門罗函, 1823 年 4 月 16 日何塞·德卡斯蒂略 (José de Castillo) 致波因塞特函, 載《詹姆斯·門罗文稿》, 存国会图书馆手稿室。
- 69 前引邦斯书, 第 128 頁。
- 70 參看 1821 年 10 月 31 日文森特·格雷 (Vincent Gray) 致丹尼尔·布伦特 (Daniel Brent) 函 (哈瓦那), 載国务院《領事文件集》, 哈瓦那第 3 卷, 存国家档案局。
- 71 《奈耳斯紀事周报》, 第 24 卷, 1823 年 3 月 15 日, 第 25—26 頁; 1823 年 4 月 5 日, 第 72—73 頁; 1823 年 4 月 26 日, 第 113 頁; 1823 年 5 月 24 日, 第 130 頁; 1823 年 8 月 9 日, 第 356 頁; 波士頓《美国政治家》(American Statesman), 1823 年 1 月 23 日; 巴納德將軍 (General Barnard) 致門罗函, 載《詹姆斯·門罗文稿》, 存国会图书馆手稿室。
- 72 前引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所編一书, 第 6 卷, 第 138 頁。
- 73 1823 年 4 月 29 日亚当斯致朗戴尔 (Randall) 函, 載国务院《給領事的指令》, 第 2 卷, 第 283 号, 存国家档案局。
- 74 1823 年 4 月 28 日亚当斯致休·納尔逊 (Hugh Nelson) 函 (华盛顿), 載国务院《給美国公使的指令》, 第 9 卷, 存国家档案局。
- 75 同上。并見《美国国家文件》, 对外关系部分, 第 5 卷, 第 408 頁起。
- 76 前引努涅斯·希門尼斯书, 第 459—460 頁。
- 77 前引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所編一书, 第 6 卷, 第 138 頁; 前引李普斯康和伯格合編一书, 第 15 卷, 第 436—437 頁。
- 78 汉密尔顿 (S. M. Hamilton) 編: 《詹姆斯·門罗文集》(The Writings of James Monroe), 紐約 1898—1903 年版, 第 6 卷, 第 311—312 頁。



- 79 德克斯特·佩金斯(Dexter Perkins):《門罗主义(1823—1826年)》(The Monroe Doctrine, 1823—1826), 馬薩諸塞州肯布里季 1932 年版, 第 200—202 頁。
- 80 前引李普斯康和伯克合編一書, 第 15 卷, 第 478—479 頁;《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的書信和其他著作》(Letters and other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Four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費拉德爾非亞 1865 年版, 第 3 卷, 第 340 頁。
- 81 前引查爾斯·佛朗西斯·亞當斯所編一書, 第 6 卷, 第 178 頁。
- 82 1823 年 11 月 29 日和 30 日亞當斯致賈希(Rush)函, 威廉·曼寧(William R. Manning)編:《美國有關拉丁美洲國家獨立問題的外交通信》(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cern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Nations), 紐約 1925 年版, 第 1 卷, 第 210—213 頁。
- 83 威廉·曼寧:《美國和墨西哥的早期外交關係》(Early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巴爾的摩 1916 年版, 第 98—99 頁。
- 84 詹姆斯·理查遜(James D. Richardson):《1789—1897 年期間美國歷任總統咨文與文件匯編》(A Compilation of Message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789—1897), 華盛頓 1900 年版, 第 2 卷, 第 217—218 頁。
- 85 前引佩金斯書, 第 202—204 頁。

## 第八章 美國和古巴的獨立(1823—1830 年)

- 1 《奈耳斯紀事週報》, 第 18 卷, 1820 年 5 月 27 日, 第 239—240 頁; 1820 年 8 月 5 日, 第 415 頁。
- 2 查爾斯·韋伯斯特(Charles K. Webster):《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Alliance), 印度加爾各答 1929 年版, 第 76 頁。
- 3 《奈耳斯紀事週報》, 第 20 卷, 1822 年 11 月 23 日, 12 月 7 日;《華盛頓國民通訊報》, 1822 年 11 月 1 日。
- 4 《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 1822 年 11 月 26 日。
- 5 見《華盛頓國民通訊報》, 1822 年 12 月 9 日。
- 6 《奈耳斯紀事週報》, 第 22 卷, 1824 年 11 月 27 日, 第 204 頁。
- 7 前引波爾特耳·比拉書, 第 1 卷, 第 244 頁引用。
- 8 埃梅特里奧·桑托維尼亞(Emeterio Santovenia):《波利瓦爾和西班牙安的列斯》(Bolívar y las Antillas Hispánicas), 馬德里 1935 年版, 第 66—145 頁; 前引波爾特耳·比拉書, 第 1 卷, 第 197—212 頁。
- 9 前引桑托維尼亞書, 第 120—144 頁。
- 10 埃維利歐·羅德里格斯·倫迪安(Evelio-Rodríguez Lendián):《巴拿馬會議與古巴的獨立》(El Congreso de Panamá y La Independencia de Cuba), 載《哈瓦那大學文理學院評論》(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Revista de la Facultad de Letras y Ciencias), 第 12 卷, 1911 年, 第 15—16 頁。

- 11 同上,第 17 頁。
- 12 前引佛朗哥編《……历史文件》一書,第 xcvi 頁。
- 13 同上。
- 14 曼宁:《美国和墨西哥的早期外交关系》,第 129 頁。
- 15 1825 年 9 月 13 日波因塞特致克萊函,載国务院《墨西哥來文》(Despatches from Mexico),第 1 卷,存国家档案局。
- 16 曼宁:《美国和墨西哥的早期外交关系》,第 99—101 頁。
- 17 《国民公报》(National Gazette),1825 年 12 月 16 日。
- 18 《奈耳斯紀事周报》,第 29 卷,1825 年 12 月 24 日,第 259 頁。
- 19 第 14 届国会第 2 期會議《国会年鉴》,第 724—743 頁。
- 20 1825 年 5 月 10 日克萊致密德尔頓 (Middleton) 函,載国务院《給美国公使的指令》,第 10 卷,存国家档案局。
- 21 同上。
- 22 1825 年 4 月 27 日克萊致埃弗雷特 (Everett) 函 (華盛頓),同上来源 (重点是作者加的。——方納注)。
- 23 1825 年 3 月 26 日克萊致波因塞特函,載国务院《給公使的指令》,第 10 卷,存国家档案局。
- 24 1825 年 4 月 27 日克萊致埃弗雷特函,同上来源。
- 25 1825 年 7 月 13 日弗朗西斯科·德塞亚·貝穆德斯 (Francisco de Zea Bermúdez) 致納尔逊函,載《西班牙來文》(Despatches from Spain),第 25 卷,存国家档案局;第 32 届国会第 1 期會議《行政部門文件》(Executive Document),第 12 号,第 14—16 頁。
- 26 1825 年 10 月 10 日埃弗雷特致弗朗西斯科·德塞亚·貝穆德斯函,載《西班牙來文》,第 25 卷,存国家档案局。
- 27 1825 年 5 月 10 日克萊致密德尔頓函、1825 年 5 月 11 日克萊致腊夫斯·金氏 (Rufus King) 函、1825 年 5 月 13 日克萊致詹姆斯·布朗函,載国务院《給公使的指令》,第 10 卷,存国家档案局。
- 28 1826 年 3 月 12 日布朗致克萊函 (法国),載《外交文件集 (法国)》,第 13 卷;1825 年 9 月 8 日密德尔頓致克萊函 (俄国圣彼得堡),第 10 卷,同上来源;1825 年 8 月 21 日坎宁 (Canning) 致金氏函 (英国),同上来源,第 32 卷,存国家档案局。
- 29 1825 年 10 月 17 日克萊致金氏函,載《給公使的指令》,第 10 卷,存国家档案局。
- 30 前引佩金斯书,第 202—207 頁。
- 31 1825 年 6 月 15 日波因塞特致克萊函,載国务院《墨西哥來文》,第 1 卷,存国家档案局。
- 32 曼宁:《美国有关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問題的外交通信》,第 1 卷,第 263—264 頁。
- 33 1826 年 1 月 28 日波因塞特致克萊函并附決議,載《墨西哥來文》,第 1 卷,存国家档案局。
- 34 1826 年 2 月 1 日波因塞特致克萊函,同上来源。

- 35 1825年10月29日波因塞特致克莱函,同上来源。
- 36 1825年4月13日克莱致埃弗雷特函,载《给公使的指令》,第11卷,存国家档案局。
- 37 《美国政府损害了古巴人民的自由》(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Injured the Liberty of the People of Cuba),纽约1849年版,第19页引用。
- 38 约瑟夫·洛基(Joseph B. Lockey):《泛美主义与其开端》(Pan Americanism, its Beginnings),纽约1920年版,第312—320页。
- 39 前引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书,第5卷,第176页。
- 40 《1826年巴拿马会议(美洲国际大会)》(The Congress of 1826 at Panam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第4卷,历史部分附录,第24—34页。
- 41 1826年5月31日,6月23日波因塞特致克莱函,载《墨西哥来文》,第1卷,存国家档案局。
- 42 曼宁:《美国和墨西哥的早期外交关系》,第155页。
- 43 前引理查逊书,第2卷,第329—340页。
- 44 《奈耳斯纪事周报》,第27卷,1825年4月30日,第132页;第29卷,1826年1月7日,第294页。
- 45 前引麦克纳利书,第356—362页引用。
- 46 《国民公报》,1825年11月24日;《里奇蒙讯问报》,1825年12月2日。
- 47 《美国国家文件》,对外关系部分,第5卷,第863页。
- 48 本顿:《国会辩论摘要》(Benton's Abridgement of Debates in Congress),第13卷,第421—424页。
- 49 《匹茨堡水星报》(Pittsburgh Mercury),1826年10月11日。
- 50 本顿:《国会辩论摘要》,第13卷,第421—424页。
- 51 《1826年4月26日南卡罗来纳州汉密顿先生在众议院关于派代表参加巴拿马会议的演说》(Speech of Mr. Hamilton of South Carolina on the Panama Mission, delivered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26, 1826),华盛顿1826年版,第22—24页。
- 52 《1826年3月缅因州(约翰)霍姆斯先生在美国参议院关于派代表参加巴拿马会议的演说》(Speech of Mr.(John)Holmes of Maine, Delivered in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Mission to Panama, March, 1826),第19页。
- 53 索耳(H. B. Saul):《巴拿马会议及其对美国各地区的影响》(The Panama Congress and the Sectional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192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写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第17页。
- 54 《匹茨堡水星报》,1826年4月26日。
- 55 1826年5月8日克莱致安德逊和隆京特(Sergeant)函(华盛顿),国务院《巴拿马会议文件(1826—1827年)》(Panama Congress, 1826—1827),第1卷,存国家档案局。
- 56 前引努涅斯·希门尼斯书,第461页;又埃米略·罗伊格·德留契逊林(Emilio

- de Leuchsenring);《美国一向是古巴独立的敌人》(The American State Has Always Been an Enemy to Cuban Independence),哈瓦那版(未注明出版日期),第56頁。
- 57 参看伯頓(E. Furton):《亨利·克莱》(Henry Clay),載塞繆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編:《美国历任国务卿和他們的外交》(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s and Their Diplomacy),紐約1928年版,第4卷,第148-149頁。
- 58 1826年9月23日,10月21日波因塞特致克莱函,載《墨西哥来文》,第1卷,存国家档案局。
- 59 比达尔·莫拉莱斯-莫拉莱斯(Vidal Morales y Morales):《古巴革命的首創者和最初的牺牲者》(Iniciadores y Primeros Mártires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哈瓦那1931年版,第1卷,第97頁。
- 60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將軍备忘录、自傳》(Memorias del General José Antonio Páez, Autobiografía),馬德里版(未注明出版日期),第455-456頁。
- 61 1829年10月2日范布倫(Van Buren)致范內斯(Van Ness)函,載国务院《給美国公使的指令》,第13卷,存国家档案局。
- 62 同上,第24頁。
- 63 坦伯萊(H. W. V. Temperley):《坎宁晚期对美政策》(The Later American Policy of Canning),載《美国历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1卷,1906年7月,第793頁。
- 64 弗雷德·里皮为曼努埃尔·烏加特斯(Manuel Ugartés):《一个大陆的命运》(The Destiny of a Continent)一书所作的序言,紐約1925年版,第XX頁;阿拉貢(R. F. Arragon):《巴拿馬會議》(The Congress of Panama),1923年在哈佛大学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論文,第620-645頁。
- 65 紐約,1849年版,第18-19頁。
- 66 《新奥尔良小日报》(New Orleans Daily Picayune),1854年7月10日。

## 第九章 第二次改革运动

- 1 格拉-桑切斯:《古巴經濟、社会和政治史要覽》,第296-324頁。
- 2 同上,第230-231頁。
- 3 1829年9月1日勒文斯頓(Livingston)致謝勒函,《特別代表团》(Special Missions),第1卷,第92号,存国家档案局。
- 4 1832年5月11日范內斯致勒文斯頓函,載《西班牙来文》,第30卷,同上来源。
- 5 第32届国会第1期會議《參議院报告》(Senate Reports),第318号,第1-3頁。
- 6 前引波尔特坪·比拉书,第2卷,第131頁。
- 7 前引約翰遜书,第3卷,第13-17頁。
- 8 前引塞佩罗书,第9-10頁。

- 9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477-478頁。
- 10 前引埃姆斯书,第14頁;阿吉萊拉(F. V. Aguilera):《古巴杂录》(Notes About Caba),紐約1872年版,第6-7頁。
- 11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3卷,第150頁。
- 12 同上,第151頁。
- 13 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费尔南德斯为薩科:《反对归并》一书所作的序,哈瓦那1928年版,第1卷,第xliv頁。
- 14 前引卡夫雷拉书,第411-413頁。
- 15 多明戈·德尔蒙特(Domingo del Monte):《古巴島就是这样》(La Isla de Cuba tal cual está),这本小册子是1936年在哈瓦那写的,在紐約或馬德里出版,薩科所著《……历史》一书第4卷,第269-297頁轉載。
- 16 弗朗西斯科·德阿馬斯(Francisco de Armas)、胡安·蒙塔尔沃(Juan Montalvo)、何塞·安东尼奥·薩科三人簽署的《关于古巴和波多黎各的改良的新聞》(Información: reformas de Cuba y Puerto Rico),紐約1867年轉載。
- 17 前引薩拉戈薩书,第1卷,第413頁。
- 18 何塞·安东尼奥·薩科:《首要的問題是:取消非洲奴隶貿易将破坏还是拖延古巴的农业?》(La primera pregunta: La abolición del comercio de esclaves africanos arruinará o atrasará la agricultura cubana?),馬德里1837年版。
- 19 前引何塞·德阿烏馬达书,第115-116頁。
- 20 前引比利亚諾瓦书,第339頁。
- 21 前引塞佩罗书,第36頁。
- 22 前引卡拉汉书,第173頁。
- 23 薩科:《反对归并》,第1卷,第47頁。
- 24 1836年11月29日德里斯特(Trist)致福賽思函(哈瓦那),載国务院《領事文件集》,哈瓦那第2卷,存国家档案局。
- 25 前引埃姆斯书,附录Ⅱ,《运入古巴的奴隶》(Slaves imported into Cuba)。
- 26 华倫·霍华德(Warren S. Howard):《美国政府与非洲奴隶貿易(1837—1862年)》(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1837—1862),1959年7月在洛杉磯加利福尼亚大学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論文,第121—124頁。
- 27 尤其請見国务院《領事文件集》,哈瓦那第13—16,18卷,存国家档案局,和第26届国会第2期會議《众議院行政部門文件》,第115号。
- 28 1840年7月21日埃弗雷特(Everett)致福賽思函,載国务院《領事文件集》,哈瓦那第14卷,存国家档案局。
- 29 1840年2月20日、11月22日特里斯特致福賽思函,載国务院《領事文件集》,第13、15卷,存国家档案局。
- 30 1841年6月22日韦伯斯特致泰勒(Tyler)函;1841年7月15日韦伯斯特致特里斯特函,載《給領事的指令》,第10卷,第40、50号,存国家档案局。

31 前引波图翁多书,第23頁。

## 第十章 古巴的奴隶社会

- 1 娄厄耳·腊加茨(Lowell J. Ragatz):《1763—1833年英屬加勒比地区种植园主阶级的没落,社会与经济史的研究》(The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1763—1833, a Study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紐約1928年版,第454—455頁。
- 2 亨利·墨莱上尉(Captain Henry A. Murray):《古巴、美国和加拿大:奴隶与自由人的国家》(Lands of the Slave and the Free: or Cub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倫敦1857年版,第179—180頁;約翰·泰勒(John G. Taylor):《美国和古巴:八年的变迁与旅行》(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Eight years of Change and Travel),倫敦1851年版,第196—197頁。
- 3 前引埃姆斯书,第172頁。
- 4 《致国务大臣》(Al Ministro de Estado),哈瓦那1849年9月9日,載《全国档案公报》(Boletín del Archivo Nacional),哈瓦那,第16卷,1917年,第278頁。
- 5 戴維·特恩布尔(David Turnbull):《西古巴旅行記(附有波多黎各見聞和奴隶貿易札記》(Travel in the West. Cuba; with Notices of Puerto Rico, and the Slave Trade),倫敦1840年版,第388頁。
- 6 菲利普·方納(Philip S. Foner):《商业与奴隶制度:紐約商人和不可压制的冲突》(Business and Slavery: The New York Merchants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北卡来罗纳州小教堂山1941年版,第165—167頁。
- 7 李兰德·詹克斯(Leland H. Jenks):《我們的古巴殖民地》(Our Cuban Colony),紐約1927年版,第19—24頁。
- 8 同上,第23頁;沃尔迪曼(F. Wurdiman):《一个医生的古巴見聞……》(Notes on Cuba...By a Physician),波士頓1844年版,第144—145頁;理查德·达納(Richard H. Dana):《往返古巴,一个假期的旅行》(To Cuba and Back, A Vacation Voyage),波士頓1859年版,第117頁。
- 9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350—351頁。
- 10 前引《美国政府損害了古巴人民》一书的緒言。
- 11 烏尔瓦諾·费霍·德索托毛雷(Urbano Feijóo de Sotomaure):《古巴島》(La Isla de Cuba),巴黎1852年版,第32—35頁。
- 12 前引埃姆斯书,第157頁。
- 13 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1卷,第350—351頁。
- 14 同上,第477—478頁;前引墨莱书,第173頁;前引泰勒书,第414頁;《美国与外国反对奴隶制度年报》(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and Foreign Anti-Slavery Society),1851年5月6日,第102頁。

- 15 馬里亚諾·托倫特(Mariano Torrente):《古巴島的奴隶制度并附对英国报刊論奴隶貿易的意見的評論》(Slavery in the Island of Cuba with remarks on the statements of the British press on the slave trade),倫敦1863年版,第47頁;罗伯特·貝尔德(Robert Baird):《1849年对西印度与北美的印象与經驗》(Impression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West Indies and North America in 1849),倫敦1850年版,第1卷,第179頁。
- 16 查尔斯·艾伯特·佩季(Charles Albert Page):《古巴有組織的劳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ed Labor in Cuba),1952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論文,第4頁。
- 17 前引特恩布尔书,第266頁。
- 18 何塞·安东尼奥·薩科:《古巴的流浪者問題》(La vagancia en Cuba),哈瓦那1946年版,第72—73頁。
- 19 胡安·雷耶斯(Juan J. Reyes):《对古巴島产生流浪問題原因的報告》(Memoria sobre las causas de la vagancia en la Isla de Cuba),哈瓦那1851年版,載前引埃姆斯书第262頁。
- 20 前引沃尔迪曼书,第144—149頁。
- 21 前引特恩布尔书,第47—48頁。
- 22 馬登(R. R. Madden):《古巴島》(The Island of Cuba),倫敦1849年版,第56—62頁;前引沃尔迪曼书,第149—155頁;前引泰勒书,第197—202頁;昂佩尔(J. J. Ampère):《美洲漫游:美国—古巴—墨西哥》(Promenade en Amérique, Etats Unis-Cuba-Mexique),巴黎1867年版,第200—201頁;《民主評論》(Democratic Review),第43卷(新編号),1859年,第28頁。
- 23 米格尔·埃斯托契(Miguel Estorch):《1853年12月3日至1854年9月21日德拉佩苏埃拉侯爵統治古巴島……历史割記》(Apuntes para la historia sobre la administración desde 3 de diciembre de 1853 hasta 21 de septiembre de 1854, del Marqués de la Pezuela en la isla de Cuba...),馬德里1856年版,第15,17—18頁。
- 24 拉米罗·格拉-桑切斯撰文,載前引《古巴民族史》书,第3卷,第80—82頁。
- 25 前引史密斯书,第65頁。
- 26 同上,第66頁。
- 27 同上,第67—68頁。
- 28 前引埃姆斯书,第127,232—233頁。
- 29 倫敦1840年版,第86頁。
- 30 同上,第11—13頁。
- 31 同上,第30,33—34,43,45,49頁。
- 32 同上,第112—115頁。
- 33 同上,緒言。
- 34 佛朗西斯科·阿兰戈-帕雷尼奧文集,哈瓦那1888年版,第2卷,第376—378頁。

- 35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4卷,第249頁。
- 36 前引塞佩罗书,第98頁引目。
- 37 同上,第10章《种族主义与民族問題》(Racismo y nacionalidad),第93—104頁。
- 38 前引薩科:《反对归并》,第1卷,第224頁。
- 39 前引塞佩罗书,第99—100頁引用(重点是作者加的。——方納注)。
- 40 前引薩科:《反对归并》一书,第1卷,第82頁。
- 41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4卷,第210頁。
- 42 前引何塞·佛朗哥:《安东尼奥·馬塞奥的生个簡史》一书,第25頁引用。
- 43 格拉-桑切斯:《古巴經濟、社会与政治史要覽》,第442頁。
- 44 1838年4月16日格雷(T. R. Gray)致約翰·福賽恩函(特里尼达德古巴),載国务院《領事文件集》:特里尼达德,存国家档案局。

### 第十一章 反对奴隶制度的高潮

- 1 前引埃姆斯书,第127, 232—233頁。
- 2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3卷,第193—194頁;格拉-桑切斯:《古巴經濟、社会与政治史要覽》,第407頁。
- 3 前引特恩布尔书,第48, 74—75, 128, 130, 133, 135, 155, 160—162, 266, 279頁。
- 4 同上,第43頁。
- 5 同上,第155頁。
- 6 前引莫拉萊斯书,第1卷,第228—229頁。
- 7 馬里奧·埃尔南德斯-桑切斯伊巴尔瓦(Mario Hernández y Sánchez-Barba):《戴維·特恩布尔和古巴的奴隶問題》(David Turnbull y el problema de la esclavitud en Cuba),載《美洲研究年鑒》(Anuario de Estudios Americanos),塞維利亞1957年版,第14卷,第33—34頁。
- 8 同上,第274頁。
- 9 同上,第274—275頁。
- 10 同上。
- 11 前引史密斯书,第91—93頁。
- 12 前引埃尔南德斯书,第277頁。
- 13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4卷,第127—135, 152, 164—165頁。
- 14 同上。
- 15 前引埃尔南德斯书,第277頁。
- 16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4卷,第176—178頁。
- 17 前引埃尔南德斯书,第282頁引用。
- 18 馬尼亞諾·托倫特(Mariano Torrente):《有关奴隶制度的重要問題》(Cuestión importante sobre la esclavitud),馬德里1841年版,第4—7頁。



- 19 前引薩科:《……历史》一书,第4卷,第187—189頁。
- 20 同上,第194—198頁。
- 21 前引埃尔南德斯书,第284頁。
- 22 格拉-桑切斯:《古巴經濟、社会与政治史要覽》,第402頁。
- 23 同上,第404頁。
- 24 《領事文件集》,1853年哈瓦那第30卷,存国家档案局。証詞是譯文,注有《美国駐哈瓦那領事威廉·罗伯逊証明,1853年10月12日于哈瓦那》(Habana, Oct. 12, 1853, Attested to by Wm. H. Robertson, U. S. Consul in Havana)。
- 25 1843年1月14日韦伯斯特致坎貝尔(Campbell)函,并附德尔蒙特的报告(华盛顿),載国务院《特別代表团》,第1卷,第190—194頁,注明“亲启与机密”,存国家档案局。又見1846年10月1日柯金(Cocking)致帕默斯顿(Palmerston)函(加拉加斯),載《全国档案公报》,哈瓦那1909年,第3卷,第5号,第3—9頁。
- 26 前引埃尔南德斯书,第287—288頁;1842年11月4日和6日卡耳豪恩(J. C. Calhoun)致韦伯斯特函,載国务院《領事文件集》,哈瓦那第18卷,存国家档案局。
- 27 前引埃尔南德斯书,第288—289頁。
- 28 同上,第289頁。
- 29 同上,第290頁。
- 30 同上,第291頁。
- 31 11月4、6日卡耳豪恩致韦伯斯特函,載国务院《領事文件集》,哈瓦那第18卷,存国家档案局。
- 32 格拉-桑切斯:《古巴經濟、社会与政治史要覽》,第407頁。
- 33 前引史密斯书,第101—102頁。
- 34 1844年3月20日注明发自法国巴黎一封信的摘要,載《致卡耳豪恩的书信(1837—1849年)》〔克拉倫斯·包彻(Clarence S. Boucher)和罗伯特·布鲁克斯(Robert P. Brooks)合編〕,載《1929年美国历史协会年報》,华盛顿1930年版,第216—217頁。
- 35 威廉·馬錫森(William L. Mathieson):《英国与奴隶貿易(1839—1865年)》(Great Britain and the Slave Trade, 1839—1865),倫敦1929年版,第68—67,141頁。
- 36 前引塞拉戈薩书,第1卷,第346—368頁。
- 37 同上,第377—380頁。
- 38 同上,第385—388頁。

## 第十二章 埃斯卡萊拉事件

- 1 前引埃尔南德斯书,第52—53頁。
- 2 前引埃姆斯书,第146頁。
- 3 前引塞佩罗书,第88頁引用。

- 4 前引莫拉萊斯书,第1卷,第355頁。
- 5 前引阿吉雷书,第97頁。
- 6 1844年6月9日坎貝爾致卡耳曼恩函,載《領事文件集》,哈瓦那第19卷,存國家檔案局。
- 7 前引史密斯书,第105頁。
- 8 前引波圖翁多书,第105頁。
- 9 前引埃爾南德斯书,第294頁;《古巴奴隸制度:1872年12月3日紐約城庫柏協會會議錄》(A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Meeting, Held at Cooper Institute, New York City, December 13, 1872),紐約1872年版,第17頁(存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 10 格拉-桑切斯:《古巴經濟、社會與政治史要覽》,第415—420頁。
- 11 同上;埃利特里奧·桑托維尼亞撰文,載前引《古巴民族史》,第4卷,第172—173頁。
- 12 前引埃爾南德斯书,第294—296頁。
- 13 前引莫拉萊斯书;岡薩雷斯·德爾巴列(F. González del Valle):《何塞·德拉盧斯-卡瓦列羅在1844年的叛變》(José de la Luz y Caballero en la conspiración de 1844),載《古巴歷史學院回憶錄》(Memorias de la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de Cuba),哈瓦那1925年版;何塞·曼努埃爾·西梅諾(José Manuel Ximeno):《可憐的滑稽演員(普拉西多)》(Un pobre histrión (Plácido)),載《全國第一屆歷史學大會》,第2卷,哈瓦那1943年版。
- 14 前引埃姆斯书,第144—145頁。
- 15 前引1846年10月1日柯金致帕默斯通函(加拉加斯),第3—9頁。
- 16 1845年12月6日約翰遜致布坎南(Buchanan)函,載《領事书信集》(Consular letters),馬坦薩斯第4卷,存國家檔案局。
- 17 前引埃姆斯书,第161頁。
- 18 前引塞佩羅书,第38頁。
- 19 前引史密斯书,第125—126頁。
- 20 何塞·費雷爾·德科托(José Ferrer de Couto):《各國的黑人及其境遇》(Los Negros en sus Diversos Estados y Condiciones),紐約1864年版,第105頁。
- 21 前引史密斯书,第107頁。
- 22 同上,第106—107頁。
- 23 前引薩科:《……歷史》一書,第3卷,第195—201頁。
- 24 拉蒙·德拉薩格拉(Ramón de la Sagra):《對古巴島殖民地的研究》(Estudios Coloniales con Aplicación a la Isla de Cuba),馬德里1845年版,第8頁。
- 25 何塞·安東尼奧·薩科:《有關古巴島的科學、歷史、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論文集》(Colección de Papeles Científicos, Históricos, Póliticos y de Otros Ramos Sobre la Isla de Cuba),巴黎1859年版,第3卷,第85—115頁。
- 26 前引史密斯书,第133—134頁。

- 27 詹姆斯·摩頓·卡拉汉(James Morton Callahan):《古巴与国际关系》(Cub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巴尔的摩 1899 年版,第 184 頁。
- 28 前引史密斯书,第 109—111 頁。
- 29 同上。
- 30 同上,第 113—115 頁。
- 31 烏尔瓦諾·費霍·索托馬約尔(Urbano Feijóo Sotomayor):《古巴島,西班牙工人的移入》(Isla de Cuba, Inmigración de trabajadores españoles),馬德里 1855 年版,第 44—47 頁。
- 32 埃利亚斯·恩特拉尔戈撰文,載前引《古巴民族史》一书,第 3 卷,第 328—329 頁。
- 33 同上,第 344 頁;前引波尔特耳·比拉书,第 1 卷,第 476 頁。
- 34 1843 年 1 月 14 日韦伯斯特致坎貝尔函(华盛顿),国务院《特別代表团》,第 1 卷,第 190—194 頁,存国家档案局,注明“亲启与机密”。
- 35 1843 年 1 月 11 日,2 月 9 日坎貝尔致韦伯斯特函,載《領事书信集》,哈瓦那第 19 卷,存国家档案局。
- 36 前引查尔斯·佛朗西斯·亚当斯所編一书,第 11 卷,第 351—354 頁。
- 37 1838 年 8 月 27 日,1839 年 1 月 9 日哈里逊(Harrison)致福溪恩函;1841 年 3 月 21、22 日,4 月 24 日,5 月 20 日哈里逊致韦伯斯特函;1843 年 6 月 14 日哈里逊致国务卿函,載《領事书信集》,京斯敦第 5—8 卷,存国家档案局。
- 38 1843 年 11 月 9、12 日坎貝尔致阿普休尔(Upshur)函,載《領事文件集》,哈瓦那第 19 卷,存国家档案局;赫罗尼莫·貝克尔(Jerónimo Becker):《十九世紀西班牙对外关系史:外交簡史》(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España durante el siglo XIX: Apuntes para una Historia Diplomática,馬德里 1924 年版,第 2 卷,第 59—66 頁。
- 39 前引貝克尔书,第 65—66 頁;巴瑟耳·劳赫(Basil Rauch):《美国在古巴的利益(1848—1855 年)》(American Interests in Cuba: 1848—1855),紐約 1948 年版,第 41—42 頁。
- 40 1844 年 3 月 2 日华盛顿·欧文致阿普休尔函,国务院《西班牙来文》,第 34 卷,存国家档案局。
- 41 前引劳赫书,第 44 頁。
- 42 1843 年 8 月 27 日卡耳豪恩致阿普休尔函,載国务院《杂类书信集》,存国家档案局,注明“机密”。
- 43 1844 年 4 月 18 日卡耳豪恩致帕肯汉(Pakenheim)函(华盛顿),国务院《致英国公使館的照会》(Notes to British Legations),第 7 卷,存国家档案局。

# 索引

## A

- 阿巴瓜内斯 (Habaquanex) — 印第安人 — 第 17 頁。
- 阿伯登勋爵 (Aberdeen, Lord) — 第 185、187、197、204 頁。
- 阿多欧 (Hatney) — 印第安人的酋长 — 第 5—11、17 頁。
- 阿圭列斯, 唐阿古斯丁 (Argüelles, Don Agustín) — 第 68、154 頁。
- 阿吉雷, 塞尔希奥 (Aguirre, Sergio) — 第 75 頁注, 第 76、192 頁。
- 阿兰戈, 何塞·奥古斯丁 (Arango, José Agustín) — 第 131 頁。
- 阿耳达馬, 米格尔 (Aldama, Miguel) — 第 191 頁。
- 阿馬罗, 图帕斯 (Amaru, Tupac) — 第 75 頁。
- 阿龐特, 何塞·安东尼奥 (Aponte, José Antonio) — 第 73—75 頁。
- 阿普休尔, 埃伯耳 (Upshur, Abel P.) — 第 203—204 頁。
- 埃弗雷特, 亚历山大 (Everett, Alexander H.) — 第 135、159 頁。
- 埃拉斯, 拉斐尔 (Heras, Rafael) — 第 131—132 頁。
- 埃雷迪亚, 何塞·瑪丽亚 (Heredia, José María) — 第 90—91、94、100 頁。
- “埃斯卡萊拉”事件 (La Escalera) — 第 191—204 頁。

## B

- 巴布拉多, 胡安 (Barbrado, Juan) — 第

75 頁。

巴尔德斯, 赫罗尼莫 (Valdés Gerónimo) — 第 182、184、186、189 頁。

巴尔德斯, 弗賴·赫罗尼莫主教 (Valdés, Bishop Fray Gerónimo) — 第 26 頁注。

巴尔德斯, 加夫列尔·德拉孔塞普西翁 (Valdés, Gabriel de la Concepción) — 第 192 頁。

巴罗纳, 恩里克·何塞 (Varona, Enrique José) — 第 179 頁。

巴尔沃亚, 西耳維斯特雷 (Balboa, Silvestre) — 第 53 頁。

巴拿馬會議 (Congress of Panama) — 第 139—145 頁。

巴雷拉, 費利克斯神父 (Varela, Father Félix) — 第 84—85、91、94、101、102 頁。

巴塞爾條約 (Treaty of Basel) — 第 50—51 頁。

巴西 (Brazil) — 第 66 頁。

巴亞莫走私商人 (Bayamo Smugglers) — 第 25 頁。

白种工人 (White Workers) — 第 163—165 頁。

保罗三世 (Paul III) — 第 16 頁。

“包罗万象的权力” (Facultades Omnímidas) — 第 86、100、148、150、154 頁。

被监护人 (Encomendados) — 第 14

頁。  
貝拉斯克斯,迭戈 (Velásquez, Diego) ——第 4、5、8、9、10、11、13、19 頁。  
本頓,托馬斯 (Benton, Thomas H.) ——第 141 頁注。  
比德耳,尼古拉斯 (Biddle, Nicholas) ——第 114 頁。  
比德耳,詹姆斯 (Biddle, James) ——第 120—121 頁。  
比利亚諾瓦,曼努埃爾 (Villanova, Manuel) ——第 88、156 頁。  
比維斯,弗蘭西斯科·迪奧尼西奧 (Vives, Francisco Dionisio) ——第 85、100、101、102、103、130 頁,第 145 頁注,第 153 頁。  
賓克內·威廉 (Pinckney, William) ——第 108 頁。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第 76 頁注,第 87—88、91、106、110、111、114、125、128、129、130、132、133、135、137、141、143、145 頁,第 155 頁注。  
波利瓦爾,西蒙 (Bolívar, Simón) ——第 69、87 頁注,第 93、114、131、139、145 頁。  
“博里夸共和国” (Republic of Boriqua) ——第 87、129 頁。  
波洛克,奧利佛 (Pollock, Oliver) ——第 30 頁。  
波拿巴,拿破侖 (Bonaparte, Napoleon) ——第 46、62、68、106、107 頁。  
波拿巴,約瑟夫 (Bonaparte, Joseph) ——第 62、63 頁,第 107 頁注。  
“波旁王朝开明专制” (Enlightened Bourbon Despotism) ——第 27、39 頁。

波因塞特,乔耳 (Poinsett, Joel R.) ——第 134、137、138、140、144 頁。

布萊恩特,威廉·卡兰 (Bryant, William Cullen) ——第 100 頁注。

布拉沃,岡薩雷斯 (Bravo, González) ——第 203 頁。

布累克利,約西亞 (Blakely, Josiah) ——第 52 頁。

李罗,馬哥 (Polo, Marco) ——第 1 頁。

布耳沃,亨利·利頓 (Bulwer, Sir Henry Lytton) ——第 195 頁。

## C

查孔,克萊門特 (Chacón, Clemente) ——第 75 頁。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第 28 頁注。

查理三世 (Charles III) ——第 29、34 頁。

查理四世 (Charles IV) ——第 62、63 頁。

查理五世 (Charles V) ——第 16 頁。

“常設軍事执行委员会” (Permanent Executive Military Commission) ——第 86、101、102—103、191 頁。

促進委员会 (Junta de Fomento) ——第 44 頁。

## D

达拉斯,亚历山大 (Dallas, Alexander) ——第 110 頁。

达依諾人 (Tainos) ——第 3 頁。

大觉醒时期 (Era of Great Awakening) ——第 43—60 頁。

大陆會議 (Continental Congress) ——第 29 頁。

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 (Douglas, Fre-

derick)——第 168 頁注。  
道奇,安德烈斯(Dodge, Andrés)——第 192 頁。  
德阿毛罗-貝拉斯科, 弗朗西斯科(Aguero y Velazco, Francisco de)——第 102—103 頁。  
德阿兰戈-帕雷尼奥, 弗朗西斯科(Arango y Parreño, Francisco de)——第 43、48—49、58、60、66、69、72、77、78、84 頁, 第 86 頁注, 第 151、174 頁。  
德阿兰戈, 何塞(Arango, José de)——第 131 頁。  
德巴尔德斯, 唐佩德罗(Valdés, Don Pedro de)——第 25 頁。  
德比利亚洛沃斯, 唐加夫列尔(Villalobos, Don Gabriel de)——第 21 頁。  
德比瓦尔, 魯伊·迪亚斯(Vivar, Ruy Díaz de)——第 95 頁。  
德豪雷吉, 唐安德烈斯(Jáuregui, Andrés de)——第 67—68 頁。  
德赫雷斯, 罗德里戈(Jerez, Rodrigo de)——第 1 頁。  
德卡斯蒂略, 貝爾納爾·迪亚斯(Castillo, Bernal Díaz de)——第 5 頁。  
德拉卢斯-卡瓦列罗, 何塞(Luz y Caballero, José de la)——第 148、179、188 頁, 第 192 頁注。  
德拉佩苏埃拉-洛沃, 唐哈科沃(Pezuela y Lobo, Don Jacobo de)——第 19、21、25 頁。  
德拉卢斯, 罗曼(Luz, Román de la)——第 71、109 頁。  
德拉薩格拉, 拉蒙(Sagra, Romón de la)——第 196 頁。  
德拉塞爾納, 馬特奧(Serna, Mateo de la)——第 117 頁注。  
德尔巴列, 弗朗西斯科·岡薩雷斯(Valle,

Francisco González del)——第 194 頁。  
德尔卡斯蒂略, 努涅斯(Castillo, Núñez del)——第 108 頁。  
德拉斯卡薩斯, 巴托洛梅(Casas, Bartolomé de las)——第 2、7、12、13、15 頁。  
德拉斯卡薩斯, 路易斯(Casas, Luis de las)——第 44、47、50 頁。  
德尔蒙特, 多明戈(Del Monte, Domingo)——第 148、153、175、179、186、201 頁。  
德馬達里亞加, 薩爾瓦多(Madariaga, Salvador de)——第 22 頁注。  
德米兰达, 塞瓦斯蒂安·弗朗西斯科(Miranda, Sebastián Francisco de)——第 61—62 頁。  
德莫拉萊斯, 弗朗西斯科(Morales, Francisco de)——第 5、9 頁。  
德納瓦埃斯, 潘菲洛(Narváez, Pánfilo de)——第 11 頁。  
德奧坎波, 塞瓦斯蒂安(Ocampo, Sebastián de)——第 2 頁。  
德奧加瓦恩, 胡安·貝爾納多(O'Gavan, Juan Bernardo de)——第 45、67、83 頁。  
德帕爾馬, 拉蒙(Palma, Ramón de)——第 87 頁。  
德皮尼略斯, 克勞迪奧·馬丁內斯(Pinillos, Claudio Martínez de)——第 86 頁注。  
德皮塔, 唐聖蒂亞哥(Pita, Don Santiago de)——第 40 頁。  
德塞基拉, 曼努埃爾(Zequiera, Manuel de)——第 43 頁。  
德塞亞, 唐弗朗西斯科(Zea, Don Francisco de)——第 135 頁。  
德特辛, 胡安(Tesin, Juan de)——第 11 頁。

德托萊多, 何塞·阿尔瓦雷斯 (Toledo, José Alvarez de)——第 110 頁。  
德托雷斯·路易斯 (Torres, Luis de)——第 1 頁。

得克薩斯的兼并 (Annexation of Texas)——第 204 頁。

第二次改良运动 (Second reform movement)——第 148—160 頁。

第一次改良运动 (First reform movement)——第 58—60、66—68、69—71、77—79、86—87、148—149 頁。

“电鎖鏈” (Cadena Eléctrica)——第 93 頁。

《当选为国家議會議員的古巴島代表的抗議書》——第 154 頁。

杜博依, 佩德羅 (Duboy, Pedro)——第 87 頁注。

杜波依斯博士 (Du Bois, Dr. W. E. B.)——第 32 頁注。

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第 41 頁。

杜安, 威廉 (Duane, William)——第 113、116 頁。

杜桑, 卢維杜尔 (Toussaint L' Ouverture)——第 46 頁。

## E

俄国 (Russia)——第 135—136 頁。

## F

法国革命 (French Revolution)——第 50、61 頁, 第 64 頁注。

反对奴隶制度 (Anti-Slavery)——第 179—190、192—194、202—203 頁。

范布倫, 馬丁 (Van Buren, Martin)——第 145 頁。

斐迪南——阿拉岡王国的国王 (Ferdinand of Aragon)——第 1、4、11、13、15 頁。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第 31、62、63、76、78、79、85、86、97、116、148、152 頁。

費利克斯, 何塞·馬丁 (Félix, José Martin)——第 40 頁。

非洲 (Africa)——第 27 頁。

非洲的奴隶貿易 (African slave trade)——第 32—33、49—50、54—55、56、68、77—80、83—85、88—90、149—153、154—156、158—159、163—164、196—198 頁。

分攤制度 (Repartimiento)——第 13—14 頁。

混合委員會 (Mixed Commission)——第 168、179、181、184、192 頁。

弗朗索瓦·海恩 (Francois, Jean)——第 73 頁。

弗洛雷斯·米格爾 (Flores, Miguel)——第 194 頁。

佛罗里达割让給美国——第 117、119、123—124 頁。

佛罗里达条約 (Florida Treaty)——第 117、119、123 頁。

妇女在古巴独立运动中的作用——第 94 頁。

## G

改良运动与黑人——第 174—175 頁。

监护人(Encomendero)——第 14 頁。

监护制度(Encomienda)——第 13—14、15 頁。

格拉-桑切斯, 拉米罗 (Guerra y Sánchez, Ramiro)——第 71、89、177 頁。

哥伦比亚 (Colombia) ——第 20、57、61、63、91、92、102、121、131、147 頁。

哥倫布, 克里斯托弗 (Columbus, Christopher)——第 1、2、4、5、6 頁。

哥倫布, 迭戈 (Columbus, Diego)——第 4 頁。

哥伦比亚-墨西哥进军解放古巴——第 131—147 頁。

格雷 (Gray, T. R.)——第 178 頁。

格雷, 文森特 (Gray, Vincent)——第 93 頁。

共济会会员 (Masons)——第 65、71、93、102、129 頁。

瓜哈巴 (Guahaba) ——第 6 頁。

瓜馬 (Guamá)——印第安人的酋长——第 17 頁。

瓜納阿卡比貝斯 (Guanahacabibes) ——第 3 頁。

古巴 (Cuba)

古巴归并給美国的要求——第 103—111、119—123、126—128、204 頁。

古巴的归并主义者运动——第 57、183—185 頁。

英国占领古巴哈瓦那——第 27 頁。

古巴的人口調查——第 48 頁注, 第 81

頁, 第 189 頁注。

咖啡生产的破坏——第 149 頁。

壟断貿易——第 23—24 頁。

西班牙人与古巴人在古巴的斗争——第 159—160 頁。

古巴的一八一二年宪法——第 76 頁。

古巴的文化——第 37、40—41、43—45、90—92 頁。

古巴咖啡生产的衰退——第 162 頁。

哥倫布发现古巴——第 1—2 頁。

西班牙議會排斥古巴議員——第 155 頁。

古巴一八一七年的經濟状况——第 81 頁。

英屬西印度群島奴隶制度的廢除对古巴的經濟影响——第 161—162 頁。

古巴在一七九〇年前夕的經濟情况——第 30 頁。

美国革命对古巴的經濟刺激——第 28—29 頁。

古巴的教育——第 44—45 頁。

美国革命在古巴的影响——第 41—42 頁。

古巴一八一二年宪法的影响——第 69—70 頁。

海地革命对古巴的影响——第 45—48、56—57、70—71 頁。

拿破侖入侵西班牙对古巴的影响——第 63—64 頁。

一八一二年宪法恢复的影响——第 80—81 頁。

西班牙重商政策的影响——第 55—56 頁。

选举議員参加西班牙議會——第 154 頁。

对古巴的勘探——第 4—5 頁。

海地革命在古巴引起的恐惧——第 151—152 頁。



害怕古巴独立——第 87—88 頁。  
害怕古巴黑人——第 56—57 頁。  
古巴奴隶主对西班牙即将廢除奴隶制引起的恐惧——第 182—183 頁。  
古巴反对西班牙壟断的斗争——第 24—27 頁。  
第一批定居在古巴的西班牙人——第 9.19 頁。  
“特別法”的統治——第 154—156 頁。  
古巴政府——第 38 頁。  
古巴的大觉醒——第 43—60 頁。  
西班牙限制解除以后古巴經濟的发展——第 27—29 頁。  
移民——第 181—183 頁。  
古巴的独立运动——第 57—58、71—72、89—104、119—120、131—147 頁。  
墨西哥和哥倫比亚支持古巴独立斗争——第 92—93、102—103、131—147 頁。  
美国反对古巴独立斗争——第 92、122—123、132—147 頁。  
古巴的印第安居民——第 3—4 頁。  
南美洲革命对古巴的影响——第 91—93 頁。  
法律上規定廢除对古巴的奴隶貿易——第 77—80 頁。  
墨西哥和哥倫比亚計劃解放古巴——第 132—134 頁。  
古巴奴隶制的性质——第 58—59、161—178、194—196、198—200 頁。  
古巴的黑奴——第 31—33、58—59、161—178、194—195、198—200 頁。  
古巴反对奴隶貿易——第 149—156 頁。  
宜揚黑人是下等人——第 173—176 頁。  
建議在古巴廢除奴隶制——第 67—69

頁。  
古巴的改革运动——第 57—60、65—68、69—71、77—79、86—87、88—89、148—159 頁。  
古巴的宗教——第 27 頁。  
把古巴出售給英国的傳說——第 94—96 頁。  
西班牙恢复壟断——第 29—30 頁。  
古巴对自由的限制——第 40—41、45、65、85—87、100—101、152—154、195 頁。  
古巴在南美洲革命中的作用——第 92—94、102—103 頁。  
古巴的奴隶利益——第 83—85 頁。  
古巴的奴隶貿易——第 54—55、158—159、161—162 頁。  
古巴早期經濟的緩慢发展——第 19—27 頁。  
古巴的社会結構——第 31—42、55—56 頁。  
西班牙重商主义政策对古巴的影响——第 21—24、38—40 頁。  
古巴的蔗糖生产——第 21、24、28、33、49、53—54、80—81、88—89、149—152、161—163 頁。  
古巴对黑人的恐惧——第 189—192 頁。  
古巴的烟草生产——第 2、4、20、21、23—26、28、30、100—101 頁。  
古巴与美国的貿易——第 49—55、110—115、149—150 頁。  
富有的克利奥尔人和西班牙的联合——第 156—158 頁。  
古巴为什么不参加西班牙美洲的革命——第 63—81、86—90 頁。  
古巴的工人人数（一八四六年）——第 164 頁。  
古巴克利奥尔种植园主和西班牙商人

的合作——第 88—90 頁。  
古巴伊比利亚半島人和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团结 第 103—104、194—196 頁。  
反对奴隶制的暴动 - 第 33—34、46—48、72—75、100—101、177—178、189—190、191—192 頁。  
恢复一八一二年宪法的暴动——第 156—158 頁。  
古巴全国历史学家大会 (National Congress of Cuban Historians) ——第 105、108、125、144 頁。  
古巴的归并主义者 (Cuban annexationists) ——第 108、119—122 頁。  
古巴納康共和国 (Republic of Cubanacán) · 第 96—100 頁。  
古巴自由促进委员会 (Junta Promotora de la Libertad de Cuba) ——第 132 頁。  
古里奇-阿尔科塞尔, 米格尔 (Gurich y Alcocer, Miguel) ——第 68 頁。  
戈洛蒙, 薩尔瓦多 (Golomón, Salvador) ——第 37 頁。  
  
归并主义 (Annexationism) ——第 57、183、185—186、204 頁。  
  
国务会议 (Council of State) ——第 181—182 頁。

## H

哈里逊 (Harrison, R. M.) ——第 202 頁。  
哈瓦那皇家爱国-經濟学会 (Royal Patriotic and Economical Society of Havana) ——第 179、188 頁。  
《哈瓦那人报》(El Habanero) ——第 101 頁。

海盗搶劫 (Piracy) ——第 49、54—55、110—111 頁。  
海地 (Haiti) ——第 5—6、30、45—49、73、75—76、134、136 頁, 第 141 頁注, 第 151、181、202 頁。  
海地革命 (Haitian Revolution) ——第 45—48、71、151、162 頁。  
  
汉密尔顿, 詹姆斯 (Hamilton, James) ——第 22 頁注。  
  
霍姆斯, 約翰 (Holmes, John) ——第 142 頁。  
  
黑恩斯, 罗伯特 (Haynes, Robert Y.) ——第 142 頁。  
黑奴解放法 (Emancipation Act) ——第 161 頁。  
黑人 (Negros)  
黑人被送到古巴充作奴隶 ——第 31—33 頁。  
黑人的分类 ——第 166 頁。  
古巴对黑人的恐惧 - 第 56—57、87—88 頁。  
自由黑人 ——第 35—37 頁。  
美国革命中的黑人 ——第 72 頁。  
古巴独立斗争中的黑人 ——第 93—100、102—104 頁。  
以移民替换黑奴的措施 ——第 200 頁。  
黑人的詩歌 ——第 168—174 頁。  
古巴黑人人数 ——第 77 頁注, 第 189 頁注。  
宣揚黑人生来是下等人 ——第 148—178 頁。  
对黑人的限制 第 34—37 頁。  
黑人的叛乱 ——第 33—35、47—49、100、177、186—187、189—190、191—192 頁。

对黑人的恐怖活动——第189—193頁。  
黑人奴隶制度(Negro Slavery)  
美国奴隶主害怕古巴廢除黑奴制——  
第119—120、121—123、131—133、  
140—143頁。  
奴隶制度(黑人)在古巴的开始——第  
33頁。  
奴隶法典的制定——第34—35頁。  
克利奥尔人和半島人决心維持黑人奴  
隶制度——第37頁。  
黑奴制对古巴在反对西班牙的革命态  
度上的影响——第70—71頁。  
奴隶制度对白种工人的影响——第  
163—165頁。  
廢除奴隶制度的运动——第161—188  
頁。  
黑人奴隶制度的性质——第35—36、47  
—48、58—59、88—89、149—152、156  
—158、161—178、194—196、198—  
200頁。  
替奴隶制度辯护的宣傳——第173—  
176頁。  
反对奴隶制度的暴动——第33—35、  
46—48、72—75、100、179、189—190、  
191—192頁。  
“黑鷹团”(Gran Legión del Aguila  
Negra)——第103頁。  
  
橫貫大陆条約(Trans-Continental Tre-  
aty)——第117、119頁。  
  
互济会主义(Freemasonry)——第27頁。  
  
华尔纳, 約翰(Warner, John)——第120  
頁。  
《花匠王子和假的克洛里达諾》(El Prin-  
cipe Jardinero y Fingido Cloridano)  
——第40頁。

皇家愛國-經濟学会 (Real Sociedad  
Patriótica o Económica) ——第44  
頁。  
皇家貿易公司 (Royal Company of  
Commerce) ——第24、27、42頁。  
皇家农工商諮詢局 (Real Consulado de  
Agricultura, Industria y Comercio)  
——第44頁。  
皇家农商促进委员会 (Royal Board of  
Promotion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第179頁。  
《黄金时代》(The Age of Gold) ——第  
5頁。

惠塔克, 阿瑟 (Whitaker, Arthur P.)  
——第116頁。

## J

吉戈特, 路易斯 (Guigot, Luis) ——第  
194頁。  
古特拉斯, 佩德罗 (Guiteras, Pedro J.)  
——第175頁。

加勒比人 (Caribs) ——第3、7頁。

教育 (Education) ——第44—45、90—92  
頁。

解放的黑奴 (Emancipados) ——第165  
—168、179、194—195頁。

杰斐逊, 托馬斯 (Jefferson, Thomas)  
——第53、105—107、121、125、126頁。

禁运 (Embargo) ——第53頁。

## K

卡夫雷拉, 佩雷斯 (Cabrera, Pérez) ——

第 194 頁。  
卡瓜斯 (Caguax)——印第安酋長——第 11 頁。  
卡耳蒙恩, 約翰 (Calhoun, John C.)——第 121、122、123、203、204 頁。  
加勒廷, 詹姆斯 (Gallatin James)——第 138 頁注。  
加內特, 亨利·海蘭 (Garnet, Henry Highland)——第 193 頁。  
卡奧納博 (Caonabó)——印第安酋長——第 6 頁。  
卡斯特羅, 菲德爾博士 (Castro, Dr. Fidel)——第 168—169 頁注。  
卡斯爾雷勳爵 (Castlereagh, Lord)——第 78 頁。  
卡斯特羅, 拉斐爾 (Castro, Rafael)——第 179 頁。  
卡斯特羅, 比森特 (Castro, Vicente)——第 179 頁。  
卡希加爾, 胡安·曼努埃爾 (Cajigal, Juan Manuel)——第 82 頁。  
卡瓦列羅, 何塞·阿古斯丁 (Caballero, José Agustín)——第 43、45、91 頁。  
坎貝爾, 羅伯特 (Campbell, Robert B.)——第 192、201、202 頁。  
坎寧, 喬治 (Canning, George)——第 126、127、136 頁, 第 146 頁注。  
柯金, 弗朗西斯·羅斯 (Cocking, Francis Ross)——第 180、186 頁。  
科爾特斯, 埃爾南 (Cortés, Hernán)——第 9 頁。  
克萊, 亨利 (Clay, Henry)——第 115 頁注, 第 133—137、138—145 頁。  
克利奧爾 (Creoles)——第 31、37—41、56—58 頁。  
科托斯, 塞維雷 (Courtois, Sévère)——

第 93、102 頁。

## L

臘頓伯里, 弗里曼 (Rattenbury, J. Freeman)——第 118 頁注。  
拉米雷斯, 塞瓦斯蒂安 (Ramírez, Sebastián)——第 16—17 頁。  
萊穆斯, 何塞·弗朗西斯科 (Lemus, José Francisco)——第 93—101、102 頁。  
朗戴爾, 托馬斯 (Randall, Thomas)——第 123 頁。  
勒克累, 維克托 (Le Clerc, Victor E.)——第 46 頁。  
勒文斯頓, 愛德華 (Livingston, Edward)——第 149 頁。  
里奇, 威廉 (Ritchie, William)——第 112 頁。  
里卡福爾特, 瑪麗亞諾 (Ricafort, Mariano)——第 153 頁。  
里昂納德, 歐文 (Leonard Irving)——第 22 頁。  
里皮, 弗雷特 (Rippy J. Fred)——第 107 頁注。  
利松迪亞, 胡安·包蒂斯塔 (Lisundia, Juan Bautista)——第 75 頁。  
里斯微克條約 (Treaty of Ryswick)——第 20 頁。  
洛倫索將軍 (Lorenzo, General)——第 156 頁。  
龍卡尼總督 (Roncali, Captain General)——第 164 頁注。  
壟斷 (Monopoly)——第 23—27、29—

30, 38—40, 49—50, 77 頁。

罗德里格斯, 加斯佩尔 (Rodriguez, Gaspar A.)——第 101 頁。

罗德尼 (Rodney, C. A.)——第 120 頁。

罗赫, 巴兹耳 (Rauch, Basil)——第 203 頁。

罗霍, 曼努埃尔 (Rojo, Manuel)——第 103 頁。

罗梅, 托马斯博士 (Romay, Dr. Tomás)——第 43 頁。

罗曼, 何塞·米格尔 (Román, José Miguel)——第 192 頁。

### M

馬德里德, 何塞·费尔南德斯 (Madrid, José Fernández)——第 93 頁。

馬登 (Madden, R. R.)——第 168, 174 頁。

馬蒂, 何塞 (Martí, José)——第 5 頁。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第 32 頁注。

瑪麗亞, 克里斯蒂娜 (Maria Cristina)——第 152—158 頁。

麥迪遜, 詹姆斯 (Madison, James)——第 72, 107, 108, 110 頁。

曼宁, 威廉 (Manning, William R.)——第 127 頁。

曼薩諾, 胡安·弗朗西斯科 (Manzano, Juan Francisco)——第 169 頁。

曼塞博, 唐尼亞·索科罗 (Mancebo, Doña Socorro)——第 94 頁注。

美国 (United States)

美国与古巴的归并——第 57, 105—

106, 119—123, 126—127, 182—185, 204 頁。

美国与巴拿馬會議——第 139—147 頁。

美国对古巴割让給英国的恐惧——第 117—118 頁。

美国政府拖延承认南美洲各共和国——第 111—117 頁。

美国政府反对哥伦比亚-墨西哥派遣远征队解放古巴——第 132—137, 139—147 頁。

美国帮助镇压奥速特的叛乱——第 157 頁。

美国从西班牙获得佛罗里达——第 117, 119 頁。

美国反对英国的廢除奴隶制度計劃——第 203—204 頁。

美国反对古巴獨立——第 92—93, 122—123, 131—147 頁。

美国人民要求承认西班牙美洲各共和国——第 111—114 頁。

美国承认南美洲各共和国——第 129 頁。

美国在非洲对古巴奴隶贸易中的作用——第 158—159 頁。

美国奴隶主害怕在古巴廢除奴隶制度——第 119—120, 121—123, 132—134, 140—146, 182—183, 200—203 頁。

富有的古巴人的子女被送往美国——第 92 頁。

美国南方奴隶主害怕“埃斯卡萊拉”事件——第 203—204 頁。

美国与古巴的貿易——第 28—30, 49—52, 110—114, 149—155 頁。

美国支持西班牙对古巴的主权——第 107—108, 109—116, 117, 122—123, 123—126, 126—128, 129—131, 133

—135, 202—204 頁。

美国的归并主义者——第 57、105—106、107—111、119—123、127、183、185、204 頁。

美国和西班牙之間的关税战——第 149—150 頁。

美国革命——第 41—42 頁。

美国奴隶暴动——第 119、130 頁。

門德斯, 何塞·馬里亞諾 (Méndez, José Mariano)——第 91 頁。

門罗, 詹姆斯 (Monroe, James)——第 109、110、115、117、120、125、127、130、136 頁。

門罗主义 (Monroe Doctrine)——第 127、130、136 頁。

米拉內斯, 何塞·哈辛托 (Milanés, José Jacinto)——第 160 頁。

秘魯 (Peru)——第 63 頁。

密契尔, 何塞·米格尔 (Mitchell, José Miguel)——第 180、202 頁。

摩頓, 乔治 (Morton, George C.)——第 55 頁。

莫拉萊斯, 比达耳 (Morales, Vidal)——第 194 頁。

莫拉萊斯, 尼古拉斯 (Morales, Nicolás)——第 47 頁。

墨西哥 (Mexico)——第 21、49、57、63、68、91、92、100、106、117、120、121、131、132—137、204 頁。

墨西哥-哥倫比亞远征队解放古巴——第 132—140 頁。

墨西哥战争 (Mexican War)——第 159 頁注。

## N

奈耳斯, 赫济凯亚 (Niles, Herekiah)——第 113 頁。

南美各共和国对古巴人爭取独立斗争的援助——第 131—132 頁。

納尔逊, 休 (Nelson, Hugh)——第 124 頁。

尼科耳斯, 罗伊 (Nichols, Roy)——第 55 頁。

奴隶法典 (Slave Codes)——第 34—35、36、188—189 頁。

奴隶貿易的廢除——第 77—80、83—85 頁。

奴隶制度的廢除——第 67—68、72—73、161—162 頁。

## O

奥当納耳, 利奥波德 (O'Donnell, Leopoldo)——第 189、190、191、194、196、197、199 頁。

奥尔斯特因, 杜庫德雷 (Holstein, Ducou-dray)——第 87 頁注。

奥尔蒂斯, 費尔南多 (Ortiz, Fernando)——第 16、18 頁。

奥速特的叛乱——第 156—157 頁。

奥尼斯, 唐路易斯 (Onís, Don Luis)——第 111 頁。

欧文, 巴普蒂斯 (Irvine, Baptis)——第 87 頁注。

欧文, 华盛顿 (Irving, Washington)——第 203 頁。

## P

帕默斯通勋爵 (Palmerston, Lord)——

第 180、181、185、195 頁。

派斯, 何塞·安东尼奥(Paéz, José Antonio)——第 145 頁。

潘恩, 托馬斯(Paine, Thomas)——第 41、42 頁。

佩金斯, 德克斯特(Perkins, Dexter)——第 137 頁。

“普拉西多”(Plácido)——第 192 頁。

## R

人权(Rights of Man)——第 42 頁。

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第 41、42 頁。

《忍耐的模範》(Espejo de Paciencia)——古巴第一部文学作品——第 40 頁。

倫迪安, 埃維利歐·羅德里格斯(Lendíán, Evelio Rodríguez)——第 145 頁。

倫東, 唐弗朗西斯科(Rendon, Don Francisco)——第 30 頁。

《論非洲奴隸的境况》(Observaciones sobre la condición de los esclavos Africanos)——第 83 頁。

日斯巴尼亞(Hispaniola)——第 4、5、6、7、9 頁。

雷耶斯, 胡安(Reyes, Juan J.)——第 165 頁。

## S

薩科, 何塞·安东尼奥(Saco, José Antonio)——第 148、152、153、155、157、

160、167、175、196 頁。

塞兰諾, 馬丁內斯(Serrano Martínez)——第 179 頁。

“三重枷鎖与自由太阳叛乱”(Conspiración de la Cadena Triangular y Soles de la Libertad)——第 161 頁。

桑切斯-巴瓦, 馬里奧·埃爾(Sánchez-Barba, Mario Hernández)——第 193 頁。

“桑切斯先生”(Mr. Sánchez)——第 121 頁。

桑切斯, 曼努埃爾·安德烈斯(Sánchez, Manuel Andrés)——第 102 頁。

森馬納特, 瑪麗亞, 德拉克魯斯(Senmanat, María de la Cruz)——第 168 頁注。

聖多明各(Santo Domingo)——第 20、181 頁, 請參看“海地”條。

聖馬丁, 何塞(San Martín, José)——第 63 頁。

聖卡洛斯-聖安布羅西奧皇家神學院(Real Colegio Seminario de San Carlos y San Ambrosio)——第 45 頁。

《時代報》(Papel Periódico)——第 45 頁。

什一稅(Tithes)——第 21 頁。

史密斯, 羅伯特(Smith, Robert)——第 29 頁。

神父(教士Clergy)——第 16、17、21、25、26 頁注, 第 66、98 頁。

“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第 85、

95、123 頁。

“熟果” (“Fruta Madura”)——第 125 頁。

苏亚雷斯, 华金 (Suárez, Joaquin S.)  
— 第 175 頁。

苏亚雷斯, 薩尔瓦多 (Suárez, Salvador)  
——第 26 頁注。

### T

塔康, 米格尔 (Tacón, Miguel) · 第  
152、153、154、156、157、158、160、161、  
180、181、182 頁。

泰勒, 約翰 (Tyler, John)——第 159、202  
頁。

特別法 (Leyes especiales)——第 154—  
155 頁。

特里斯特, 尼古拉斯 (Trist, Nicholas P.)  
——第 157、158、159 頁。

特恩布尔, 戴維 (Turnbull, David)——  
第 162、165、166、179—188、193、194、  
202 頁。

### W

韦伯斯特—阿希伯頓條約 (Webster-  
Ashburton Treaty)——第 162 頁。

韦伯斯特, 丹尼尔 (Webster, Daniel)  
· 第 201 頁。

維多利亞 (Victoria) ——墨西哥總統  
——第 132、137 頁。

威金逊, 詹姆斯 (Wilkinson, James)——  
第 106 頁。

韦尔伯福斯 (Wilberforce) ——第 77 頁。

委內瑞拉 (Venezuela)——第 61 頁。

維西, 丹馬克 (Vesey, Denmark)——第

119、129 頁。

維也納會議 (Congress of Vienna)——  
第 77 頁。

### X

西班牙 (Spain)

西班牙的廢除奴隸論——第 67—68  
頁。

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給美国——第  
117—118 頁。

西班牙放鬆非洲奴隸貿易——第 162  
—164、166—168 頁。

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开明专制”——第  
27—28 頁。

西班牙在古巴建立壟斷公司——第 24  
—26 頁。

西班牙的自由主义分子——第 152—  
154 頁。

西班牙的重商主义政策——第 22—  
23、39、49—50、55—56 頁。

“神聖同盟”帮助西班牙国王——第 85  
頁。

拿破侖人侵西班牙——第 62—63 頁。

西班牙不承認西班牙美洲共和國——  
第 135—136 頁。

西班牙命令解放所有以被欺詐方式运  
入古巴的奴隸——第 183—184 頁。

西班牙建議取消奴隸制度——第 72—  
73 頁。

西班牙承認西班牙美洲共和國——第  
148 頁。

西班牙拒絕支持反对奴隸制——第 181  
—182 頁。

西班牙把古巴出售給英国的傳說——  
第 95 頁。

西班牙在斐迪南七世的压迫下——第  
85 頁。

西班牙議會通过的對古巴的鎮壓條例



——第 154—155 頁。  
一八一二年宪法在西班牙的恢复——  
第 101 頁。  
反对西班牙的殖民地革命——第 61—  
63、70、83—84、91—92 頁。  
西班牙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第 28  
—29、41 頁。  
美国支持西班牙对古巴的主权——第  
105—106、107—108、110—111、115、  
117、123—124、125、126—128、129—  
131、133—134、135—147、202—204  
頁。  
西班牙与英国的战争——第 50—52  
頁。  
西班牙无敌舰队——第 22 頁。  
西班牙議會 (Cortes)——第 67—73、  
78、83—85、91、108、109、154、195—  
199 頁。  
西波内人 (Ciboneys)——第 3 頁。  
希德 (Cid)——第 95 頁注。  
西韦特斯, 佩德罗·德拉托雷 (Sifontes,  
Pedro de la Torre)——第 40 頁。  
《西古巴旅行記 (附有波多黎各見聞和奴  
隶貿易的札記)》(Travels in the West  
Cuba: With Notices of Porto Rico  
and the Slave Trade)——第 179—  
180 頁。  
西梅諾, 何塞·曼努埃爾 (Ximeno, José  
Manuel)——第 194 頁。  
《西班牙美洲和美国, 一个费拉德非亚  
商人对美国 and 西班牙殖民地积极貿易  
的看法》(Spanish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view on the  
Activ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Spanish Colonies  
by a Merchant of Philadelphia)  
——第 114 頁。

謝勒, 威廉 (Shaler, William)——第 68、  
72、108—110 頁。  
錫馬龍人 (Cimarrones)——第 17、33、36  
頁。

## Y

亚当斯, 約翰·昆西 (Adams, John Qu-  
incy)——第 115、117、121、122、123、  
124—128、130—149、202 頁。  
亚尔德, 詹姆斯 (Yard, James)——第 114  
頁。  
牙买加 (Jamaica)——第 186、187、193、  
202 頁。

烟草 (Tobacco)——第 2、4、20、21、23—  
28、77、82、90、162 頁。  
烟草种植者的暴动 (Sublevación de los  
Vegueros)——第 25—27 頁。  
烟草壟断公司 (Estanco de Tabaco)——  
第 24 頁。  
烟草种植者 (Vegueros)——第 24—26  
頁。

一八三四年宪法——第 152—153 頁。  
一八三五年条約——第 158、168、184、  
197 頁。  
一八五〇年人口調查——第 189 頁。  
一八一二年宪法——第 69、76、83、85、  
154 頁。  
一八一二年战争——第 110 頁。  
一八一七年条約——第 79、83—85 頁。  
一八一七年人口調查——第 77 頁注。  
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二年的人口調查  
——第 48 頁注。  
伊比利亚半島人或半島人 (Peninsulares)  
——第 31、37、39、56、66、153 頁。  
伊达尔戈, 米格尔 (Hidalgo, Miguel)  
——第 92 頁注。

《一个新解放的古巴島奴隶詩集》(Poems by A Slave in the Island of Cuba Recently Liberated)——馬登(R.R. Madden M. D.) 碩士譯——第168—174頁。

伊薩貝爾二世(Isabel II)——第152頁。

伊薩貝拉(Isabella)——卡斯提爾王國的女王——第1頁。

移住(Immigration)——第182、199—200頁。

印第安人(Indians)

印第安人的文化——第3—4頁。

西班牙人宣揚的印第安人的文化——第16頁。

西班牙人消滅印第安人——第5—7、11—12、16—18頁。

阿多歐領導印第安人反西班牙人的鬥爭——第6—11頁。

印第安人反對西班牙暴政的鬥爭——第6—11、17—18頁。

印第安人的土地制度——第14—15頁。

哥倫布時期以前的古巴印第安人部落——第3頁。

印第安人的奴隸制度——第11、13—14、16頁。

因方特, 華金(Infante, Joaquin)——第71、109頁。

英國(England)

英國的反對奴隸制運動——第161—162頁。

英國占領哈瓦那——第28頁。

對英國反對奴隸制活動的恐懼——第109頁。

英國幫助鎮壓奧連特的叛亂——第157頁。

英國對西班牙施加壓力迫使執行反對奴隸貿易的條約——第197頁。

英國建議美英兩國保證西班牙控制古巴——第135頁。

英國和古巴的解放的黑奴問題——第166—167頁。

西班牙將古巴出售給英國的傳說——第95頁。

英國對古巴的奴隸貿易——第77—78、179—189、197—198頁。

英國與西班牙戰爭——第51、52—53頁。

“英國與外國反對奴隸制度協會”——第168頁。

英屬西印度群島奴隸制的廢除——第161頁。

“永遠忠誠的島”(The “Ever-Faithful Isle”)——第61—82頁。

尤班克, 托馬斯(Ewbank, Thomas)——第165頁。

尤卡坦人(Yucatecans)——第201頁。

## Z

征服者(Conquistadores)——第5—9、10—15、17頁。

蔗糖(Sugar)——第21、24、28、33、49、53、54、81、89、149、150、161、163頁。

走私——第25、40頁。

中國人——第182、199、201頁。

中美洲聯合省——第63頁。

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第22、28—29、30、39、50、53、55—56頁。

種族主義(Racism)——第174—176頁。

自治(Autonomy)——第59、150頁。